

1905

[俄]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著



Uni 佐仓绫奈 译校

译校：Uni 佐仓绫奈

封面设计：OverWhite 佐仓绫奈

封底设计：佐仓绫奈

译者主要根据《1905》1922年莫斯科俄文第2版译出，同时也参照了2016年美国芝加哥干草市场图书（Haymarket Books）出版的同名英译本。

本书翻译校对工作的分工情况：德文版序言**主要**由佐仓绫奈翻译和校对。第一部分附件2—4**主要**由佐仓绫奈根据《托洛茨基言论》已有的篇目进行校对。其余部分则**主要**由Uni负责翻译和校对。

封面和封底的图片为俄国画家伊万·弗拉基米洛夫的《普列斯涅的街垒》。

Л.ТРОЦКИ

1905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 ~ 1922**

L . T R O T Z K I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1905**



1 9 2 3

**VEREINIGUNG INTERNATIONALER VERLAGSANSTALTEN G.M.B.H
BERLIN SW 61**

目录

俄文第一版序言	4
俄文第二版序言	11
德文第一版序言	12
德文第二版序言	16
《1905》第一部分	17
第一章 俄国的社会发展与沙皇制度	18
第二章 俄国的资本主义	26
第三章 俄国的农民阶级和土地问题	36
第四章 俄国革命的动力	45
现代城市	46
大资产阶级	47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48
无产阶级	50
贵族和地产	52
农民和城镇	54
俄国革命的性质	55
第五章 “春天”	62
一	62
二	65
三	68
四	69
五	71
六	75
第六章 一月九日	77
一	77
二	82
三	84
四	86
五	88
第七章 十月罢工	90
一	90
二	92

目录

三	94
四	97
五	100
六	102
七	103
八	105
第八章 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产生	111
第九章 十月十八日	120
第十章 维特内阁	125
第十一章 “自由”的最初几天	129
第十二章 沙皇军队在干活	136
第十三章 书报检查的风暴	144
第十四章 反对派与革命派	161
第十五章 十一月罢工	169
第十六章 “八小时工作制和火枪！”	182
第十七章 庄稼人的造反	189
第十八章 赤色舰队	198
第十九章 在反革命的门槛旁	211
第二十章 苏维埃最后的时日	221
第二十一章 十二月	234
第二十二章 总结	248
附件一 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	271
附件二 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	280
一	281
二	284
三	288
四	290
附件三 我们的意见分歧	293
一	294
二	297
三	298
四	303

列夫·托洛茨基《1905》	
五	304
六	306
七	309
附件四 为政权而斗争	310
附件五 论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319
一	319
二	328
《1905》第二部分	335
第二部分代序	336
第一章 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诉讼程序	339
第二章 苏维埃与检察机关	355
第三章 我在法庭上的发言	370
第四章 往	386
第五章 返	409
译后记	458

俄文第一版序言

1905年发生的事件有力地为了1917年革命剧揭开了序幕。在若干年反动派得意洋洋地占上风的时间里，1905年本身作为一场完整的俄国革命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现在它业已丧失了这种自主性，但是其历史意义却丝毫不减。1905年的革命焰苗直接在日俄战争的战火中茁壮成长起来，就像1917年的革命之花是帝国主义大战的结果一样。因此，从起源和发展来看，过往那场序幕中存在过的所有元素都包含在了我们现在见证着并参与着的这场历史大戏之中。不过，在那场序幕中，这些元素都被压缩了，还并不是完全展开的模样。1905年斗争舞台上出场的每一部分力量，而今被1917年的事件投射回来的光芒照亮，变得比当年更明亮清晰。当时（1905年）我们所称呼的红色十月，在12年间成长为了又一个十月——无比强大、真正胜利的十月。

在1905年，我们的巨大优势就在于：即使是在这场革命的序幕中，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用认识历史进程的科学方法论武装自己了。这使得我们能够用理论来理解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在历史的物质发展进程中被覆盖了一层朦胧的面纱。1903年7月发生在俄国南部的那场大罢工，给予了我们充分的材料，以便让我们做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俄国革命的基本方法，便是将无产阶级的总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1月9日发生的事件，生动有力地证实了这一预测，并对革命政权的相关问题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从那时起，俄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内在阶级动态问题就变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最迫切需要解答的设问。在笔者看来，正是1905年的1月9日到10月罢工的这段间隔期，体现了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也就是被笔者概括起来并称之为“不断革命论”的那套理论。这一令人费解的名称表达了这一思想：尽管俄

列夫·托洛茨基《1905》

国革命本身直接面临着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但它不会也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除非让无产阶级掌握权力，否则革命将无法完成它面临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而无产阶级一旦入场，他们就绝不可能容忍革命继续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架之下。正好相反，为了保证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它取得控制的早期发展阶段就已经不会把自己限制在砸烂封建所有制的任务里，而会一并完成砸烂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不仅会与所有的资产阶级团体发生敌对冲突，还会与协助了无产阶级获得政权的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在落后国家发生的工人政权与大多数农民人口之间产生的矛盾，只有在国际的意义上，也就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才能得到解决。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限制框架，会因为历史必要性而爆炸；而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爆破他们头上的民族—国家框架，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应当有意识地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章。

即便事隔 12 年，这一判断也被完全地证实了。俄国革命不能以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上位而结束。工人阶级必须在这场革命中取得政权。如果我们说在 1905 年，无产阶级力量尚且弱小以至于不能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那么事实上它在六三沙皇制^[1]眼皮底下的地下斗争中就已经发展壮大，而并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时期才完成了这一历史进程。得益于 1905 年斗争过的一辈的经验，无产阶级终于在 1917 年走上了权力舞台。年轻工人们如果要掌握这一经验，则必须熟知 1905 年的历史。

* * *

[1] 这里指“六三政变”体制。六三政变即指 1907 年 6 月 3 日俄国沙皇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国会），并逮捕、流放其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1905 年开始的俄国革命时期至此宣告结束。——中译者注

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的附录中，我决定放入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是关于切列万宁^[2]的书的）在考茨基的《新时代》（Neue Zeit）^[3]杂志上于1908年刊出过的文章；而另一篇，则是专门叙述了“不断革命论”，并对当时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个问题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进行了论战。这另一篇文章（我觉得应该是在1909年）在波兰的党刊上刊出过，而这份党刊的指导思想则来源于罗莎·卢森堡和列奥·约基希斯^[4]。在我看来，这些文章不仅能帮助读者将自己置身于那紧随第一场革命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列中进行

[2] 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切列万宁（Федор Андреевич Череванин，1869年11月？日—1938年3月8日），1891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5年革命失败后逐渐倾向于取消主义。一战期间在全俄消费合作社工作。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鼓吹“护国主义”。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大部分措施，但也反对白军。1922年起长期被流放。1930年因“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件被捕。1931年被判处5年徒刑。1935年被流放到阿克莫林斯克。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89年平反。——中译者注

[3]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83年至1923年间出版的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刊物，总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中译者注

[4] 列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1867年7月17日—1919年3月10日），党内化名列昂·蒂什卡（Leon Tyszka），也曾用过格罗索夫斯基（Grosovsky）、约翰内斯·克拉夫特（Johannes Kraft）、奥托·恩格尔曼（Otto Engelmann）、克伦巴格尔（Krumbagel）等化名，出身于立陶宛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少年时就参加了地下革命运动，1888年第一次被捕。1890年在瑞士遇见了罗莎·卢森堡，在1906年之前两人一直是相互的伴侣，而约吉希斯直到卢森堡牺牲之前一直是她的战友。他同卢森堡一起创建了波兰社会民主党，从1897年起，约吉希斯在流亡地德国领导波兰社会民主党。1905年返回波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革命失败后被判处六年苦役，后逃回德国。在一战爆发前，因在关于俄国党的几个问题上同列宁产生分歧，跟列宁在政治上决裂；后来又在关于波兰党的问题上同拉狄克发生严重冲突。一战爆发后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斯巴达克斯通信》的编辑工作，参加组织斯巴达克斯同盟，并支持打入独立党。1918年3月被捕，革命爆发后获释，成为中央局领导人。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入选中央局。1919年1月反对李卜克内西的政策，1919年3月被反动军队杀害。——中译者注

的那场思想斗争，还能够促使我们反思当下最急切的那些问题。1917年10月的这场夺权，绝不是小市民所倾向认为的某种即兴之举；胜利的工人阶级将各种工厂国有化的举措也绝不是什么工人政权的“错误”。他们说这种错误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工人政权没有及时听取孟什维克的警告。这些问题讨论了十五年才在原则上得到了解决。

在这个时代，围绕俄国革命性质的争辩已经远远超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范围，而它已经吸引了世界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的注意。孟什维克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已经在切列万宁的书中得到了最认真的阐述——也就是说，最坏^[5]最坦诚的阐述。它一出现就得到了德国机会主义分子的追捧。在考茨基的建议下，我在《新时代》^[6]上评价了切列万宁的这本书。当时的他就和现已过世的梅林一样，是支持“不断革命论”的。而现在，考茨基已经倒退到孟什维克那儿去了。他想把自己的过去贬低到自己现在的水平。但是，这种在不纯的理论动机驱使下进行的篡改，终敌不过印刷文件的铁证。考茨基在他科学和写作活动较早——且更好——的时期写下来的一字一句（比如他对波兰社会主义者利尤斯尼亚的答复，他对俄国和美国工人的研究，以及他对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革命性质的调查问卷的答复等等），是而且仍然是对孟什维主义毫不

[5] 原文直译为“最扁平的”，这里采用了英译本的译法。——中译者注

[6] 弗兰茨·艾尔德曼·梅林（Franz Erdmann Mehring, 1846年2月27日—1919年1月28日），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作家，曾是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写过许多历史著作和文学批评。长期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并长期为《新时代》写社论。思想上与卢森堡有共鸣，当卢森堡与考茨基决裂后成为卢森堡的伙伴。1914年成为国际主义小组的成员，后来参加斯巴达克斯同盟，在1917年同情布尔什维克。由于健康状况不好，没有参加德共（斯）的成立，但他是德共（斯）党员。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被暗杀，给他造成了很大打击，几周后也病逝了。——中译者注

留情的进攻，是而且仍然是对布尔什维克最新的革命策略的彻底平反。而在今天，以考茨基为首的那群蠢人和叛徒，却在指责同样的事物为“冒险主义”、“妖言惑众”和“巴枯宁主义”。

附录里的第三篇文章则是《为政权而斗争》。这篇文章于 1915 年被发表在巴黎的报纸《我们的言论报》上，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即在第一次革命中初具轮廓的政治关系必须在第二次革命中彻底展现出来。

这本书，正如它所描述的那场运动一样，并未能够以必要的清晰程度给形式民主的相关问题下结论。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即使是十余年后的 1917 年，我们的党也没能完全弄清楚这一问题。但是，这种棱模两可和一致性意见的缺乏却并没有影响到原则性的问题。无论是在 1917 年还是 1905 年，我们离民主的幻想都丝毫沾不上边；我们并不幻想革命的道路会彻底落实民主原则，而是清楚地明白：革命是一场阶级战争。而在这场阶级战争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会为了暂时的需要而不得不利用民主的口号和制度。在当时，我们直接提出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口号。而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从某种“民主式的”统计机会中得来的，而是从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推断出来的。彼得堡工人在 1905 年就已经称呼自己的苏维埃为“无产阶级政府”。这个称呼很快就变得时髦了起来，并且完全符合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纲领。并且，在那时，我们针对沙皇制度提出了发达的政治民主纲领（比如普选权，共和制，民兵等等）——事实上我们也不得不这么做。政治民主是工人阶级发展的重要阶段——但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在某些情况下，工人阶级很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停留几十年；而在另一种情况下，革命形势很有可能使群众哪怕是在政治民主制度还没有形成之前，就能从政治民主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俄国社

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政权（1917年3—10月）彻底地损害了民主，而这个民主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按照任何资产阶级一共和国的稳固模式来进行塑造。但是在这个时期，也就是紧靠在无产阶级政变^[7]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虽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字样，但是，我们仍然在形式上支持民主的口号，还不能给群众（甚至是我们自己）明确回答以下问题：如果形式民主这幅车轮上的齿轮无法与苏维埃制度的齿轮耦合，将会发生什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以及在那很久之后——也就是在克伦斯基^[8]统治时期，我们任务的实质就已经包含了“工人阶级实际地掌握政权”这一项了。在这个过程中，形式上、法律上的部分退居其次——当我们还在面临着物质障碍的时候，我们就根本没有花心思去解决形式上的矛盾。

驱散立宪会议革命地且粗暴地实现了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也许也可以通过推迟或筹备选举的方式达成。但是正是这种对法律程序漫不经心的态度使得革命政权面临的问题尖锐了起来；反过来，无产阶级武装驱散立宪会议的行为，又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民主与专政之间关系的问题。归根结底，无产阶级国际在这里同时收获到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宝藏。

[7] 执政初期（到列宁逝世，以至于到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并不在“政变”一词上避嫌，因此按照原文进行翻译。在这个语境下政变的确是革命的同义词。而我们也并不应当抱着刻板印象去看待“革命”、“政变”还有“起义”等概念，因为这样的一种看待方式往往对于贯彻政治唯物主义——即忠于现实——是有危害的。——Uni

[8] 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克伦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еренский，1881年5月4日—1970年6月11日），俄国律师，在1905年革命后曾为一些政治犯进行过辩护，1912年当选为“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的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5月5日任陆海军部长，7月14日任临时政府总理兼陆海军部长，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简而言之，本书的来历大致如下所述：它作于 1908—1909 年的维也纳，是为在德累斯顿以德语出版而写的。德文版收录了 1907 年出版的俄语书目《我们的革命》中的其中几章。但是，我对那些内容作了很大的修改和调整，以便适应非俄国读者的需要。该书的主要部分是专门为德文版而写的。现在，我不得不重新构思该书的文本，一部分是根据尚存的某些俄文手稿，另一部分则是从德语重新翻译过来。在后一项任务中，我得到了鲁梅尔同志的协助——他以极其认真和谨慎的态度完成了他的工作。我已经对全文进行了校对。我希望，读者不会受到无数谬误，错字，扭曲或是错印的困扰，而上述错误如今经常出现在我们出版物当中。

列夫·托洛茨基

1922 年 1 月 12 日于莫斯科

列夫·托洛茨基《1905》

俄文第二版序言

这本书和俄文第一版的区别在于以下两点：（1）作者在（1907年）伦敦党代会上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按那时的说法）与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关系的演讲；（2）在俄国的历史发展特点的主题上回答波克罗夫斯基^[9]。

列夫·托洛茨基

1922年7月10日

[9]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1868年8月29日—1932年4月10日），生于莫斯科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9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候补委员。1907—1917年侨居国外，1909年参与“前进”集团，同时参与了“召回派”、“造神派”和“最后通牒派”的活动。1911年退出“前进”集团。1913年同托洛茨基合作，试图调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1917年8月回国参加莫斯科武装起义，并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8年参与布列斯特谈判，一度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32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21年任红色教授学院院长。1918年起为社会主义科学院院士，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0—1932年是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波克罗夫斯基曾著有《俄国历史概要》（商务印书馆在1994年出版了此书的中译本），此书受到列宁的喜爱（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50卷第39—40页）。——中译者注

德文第一版序言

对俄国革命做出详尽的评估，还为时尚早；各种社会关系仍不够明晰；革命持续推进，不断迸发出新的因素。匆匆一瞥，不能充分认识其重要性。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并非为历史学工作而作。这本书代表着一位见证者与参与者。作者对事件仍有清晰印象的时候，提笔撰写了这本书，并且试图用作者的派别观点来阐述事实——作者在政治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人，在学术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者。综上所述，作者已经试图去为读者清晰地描绘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场革命，已经到达其高潮，同时也在彼得堡工人苏维埃代表会议的活动，导出了一个悲剧性的结论。作者如果达到这样的目的，就会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主要的任务。

本书的引言介绍了俄国革命的经济基础，内容涵盖了沙皇专制、俄国资本主义、农业结构、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社会阶级：地主贵族、农民、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并且，引言还介绍了阶级与阶级、阶级与国家之前的关系。这些“引言”的内容，旨在运用数据来向读者展现各种社会力量的状况，进而向他们展现出革命的动态。

这本书无法保证事实材料的完整性。我们本来也不打算运用整体的视角，详尽地描绘国家的革命状况。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去罗列一些事实。这些事实也许可供参考，但可能既无法阐释事件的内在逻辑，也展现不了呈现在生活中的形式。我们另寻他路，也就是去选择一些能够反映革命精髓的事件和制度。并且，我们将这些事件放在了彼得堡——我们叙述的中心。我们之所以要选择这个北方的都市，只是因为革命自身由中心地带扩散到了黑海岸边（红色舰队）、农村地区（农民暴动）和莫斯科（12月）。

这样就限定了空间范围，我们也不得不同时间限定时间范围。

我们已经将最主要的篇幅留给了 1905 年的最后 3 个月——10 月、11 月和 12 月——俄国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以全俄总罢工开始，以莫斯科的镇压而结束。

对于事前的准备时期，我们已经从其中抽取了两个时间段，以利于站在整体的角度去理解事件的进程。我们首先讨论一下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蜜月，也就是短暂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1]亲王“时期”，在这个时期，人人都把“信任”挂在嘴边，政府的公告和自由派的社论都像是用混着苯胺和糖浆的墨水写出来的。其次，我们讨论了 1 月 9 日，也就是骇人听闻的恐怖的流血星期日。在这一天，原本洋溢着互信氛围，突然在卫兵的枪声中烟消云散，被无产阶级群众的怒火粉碎地一干二净。自由化之春的喜剧落下帷幕。革命的悲剧开始了。

从 1 月到 10 月，我们经历了几乎完全沉默的 8 个月。这个时期尽管很有意思，但仍然没有出现任何本质上的新事物。10 月罢工几乎就是 1 月冬宫游行的直接结果，就像 12 月起义是 10 月罢工的结果一样。

历史部分的最后一章总结了革命的一年的事件，分析了革命斗争的方法，并且描绘了未来三年的政治形势的发展。这一章的基本结论可以这样表达：革命死了，革命万岁！^[2]

讲述 10 月罢工的那一章从 1905 年 11 月开始写起。这一章写

[1] 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亲王（князь Пётр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1857 年 8 月 30 日—1914 年 5 月 29 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74 年入伍。1877—1878 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并担任亚历山大二世的副官。1895—1897 年任奔萨总督。1897—1900 年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总督。1902—1904 年任维伦斯基、科文斯基和格罗德诺总督。1904—1905 年任内务大臣。1905 年 1 月 9 日“血腥星期日”后，于 1 月 10 日辞职。此后脱离政治活动。

[2] 此处为法语“La révolution est morte, vive la révolution!”——中译者注

于大罢工的最后的时刻。这一时刻逼得统治集团走投无路，逼着尼古拉二世颤抖着双手签署了 10 月 17 日诏书。此时，这一章被分成两期发表在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开端》^[3]上。现在，这一章几乎原封不动地再次发表出来。因为，它能用我们目标的实现程度来展现出罢工的普遍图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其文风还体现了它出版时的政治性文本的特点。

本书的第二部分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讲述了工人苏维埃代表会议遭受的审判以及作者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逃离流放地的事情。然而，两部分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不仅是因为 1905 年末彼得堡工人苏维埃代表会议位于革命的最中心，而且，综上所述，是因为集体逮捕标志着反革命的开始。全国的革命组织都陆续受到反革命的侵害。胜利者们凭借着残暴的意志和嗜血的复仇情绪，系统性地、一步步地彻底消灭伟大运动的痕迹。并且，他们越是感受不到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的可鄙的报复方式就越是血腥。1906 年，彼得堡工人苏维埃代表会议受到了审判，其成员最高被判处剥夺公民权和被无限期流放西伯利亚。直到 1909 年，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工人苏维埃代表会议才受到审判，但结局格外不同：数十名抗议者被判处从事苦役，32 人被判处死刑，其中有 8 人被实际执行。

革命在经历了激烈的战斗和暂时的胜利后，走到了瓦解的阶段：逮捕、流亡、尝试逃脱和流落到世界各地。本书的两部分之间的关系，能够体现这一点。

作序至此，我们谨向扎鲁德纳亚·卡沃斯^[4]女士表示谢意。扎

[3] 《开端》杂志（《Начал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机关刊物，1899 年 1—6 月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由彼·伯·司徒卢威、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编辑。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等人曾为它撰稿。——中译者注

[4] 叶卡捷琳娜·谢尔盖耶夫娜·扎鲁德纳亚—卡沃斯

列夫·托洛茨基《1905》

鲁德纳亚·卡沃斯女士是彼得堡的著名画家，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成员被庭审期间，用画笔和羽毛笔为我们作画。

维也纳，1909年10月

（Екатерина Сергеевна Зарудная-Ковас，1861年6月27日—1917年11月29日），俄国图画艺术家。1887年毕业于圣彼得堡艺术学院。1906年曾同罗莎·卢森堡秘密会面，并为受到审判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成员作画。1917年逝世。——中译者注

德文版序言

德文第二版序言^[5]

德文的第一版早已从商店中消失。在此期间，德国和俄罗斯的人们越来越对 1905 年革命感兴趣。这是因为这场革命运动已进入内部批评、精神和组织上准备以及加深基础的阶段了。革命者若认真对待所生活的时代的特征和他们的成长任务，则有必要更加全面地研究过去。1905 年的俄国革命是前一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直接关乎今天的任务和困难。所以，许多同志希望看到我关于 1905 年的新书。

列夫·托洛茨基

莫斯科，1922 年 3 月 18 日

[5] 德文第二版序言除了最后一段以外，其他部分内容与俄文第一版序言内容基本相同。故译者在此只列出最后一段的译文。——中译者注

《1905》第一部分

第一章 俄国的社会发展与沙皇制度

我们的革命^[1]破除了关于俄国“独特性”的迷思。这场革命向我们证明，俄国的历史发展没有特殊规律。但同时，俄国革命也极具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性造成的结果，又在我们面前开辟了全新的历史前景。

“俄国和西欧之间是否存在‘质’或者‘量’的区别？”我们没有必要纠结如此形而上学的问题。但是，俄国社会发展具有缓慢性 and 原始性——这点却是不容置疑的。俄罗斯国家在本质上并不比欧洲国家年轻多少：俄罗斯的国家生活是从公元862年开始的。然而，不利的自然条件和稀少的人口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极其缓慢的速度，这就耽误了我国社会结晶的进程，使我国的整个历史都打上了极端落后的烙印。

很难想象，俄国国家在封闭的条件下将会何去何从——这种封闭的条件是受内部趋势影响的。我们可以很轻易的说，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俄国的社会现实^[2]，长期面临着西欧发达地区社会关系与国家关系的压力，并且时间过得越久，这种压力就越大。在相对较弱的国际贸易条件下，国家间的军事关系起决定作用。欧洲的社会影响首先体现在军事技术的形式。

俄罗斯国家建立在不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被迫与建立在更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组织发生正面冲突。这里可以存在两种可能性：俄罗斯国家要么像金帐汗国败于莫斯科沙皇国那样，在与这些国家组织斗争的过程中倒下；要么在外部的压力下，消耗掉民族的所有养分，以便超越自身经济关系的发展速度。对前一种可

[1] 这里说的是1905年的革命和它给俄国的社会和国家生活带来的改变：政党的组建，杜马政府，公开的政治斗争等等。——原注

[2] 原文直译为“社会生活”，这里采用英译本的译法。——中译者注

能性来说，俄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太过发达了^[3]。国家并没有崩溃，相反，它开始成长，但其代价却是国家的经济力量——巨大的压力被施加在它们的头上。

上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当然也适用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只不过，不同之处就在于，当其他国家为存亡而互相斗争时，凭借的是大致相同的经济基础。这样一来，它们国家体制的发展就不会遇到这种强大的、在经济上无法忍受的外部压力。

与克里米亚鞑靼人和诺盖人⁴进行的战争加强了这种压力。不过，当然，与英法百年战争带给法国的压力相比，这还算轻的了^[5]。并不是鞑靼人使俄国人不得不装备火枪，组建正规步兵团；并不是鞑靼人使俄国人在晚些时候不得不创建骑兵和步兵部队。真正的压力来自立陶宛、波兰和瑞典。为了战胜那些装备更精良的敌人，俄国政府不得不在自家购置工业和技术、雇佣军事专家，为国家工作的假币制造工匠和火药师傅、进口和筑垒技术有关的课本、引入领航学校和工厂，并“进口”二等文官和三等文官。如果说军事教官和三等文官还可以从国外“进口”，那么物质要素就只能不惜代价地从国内获取了。

俄罗斯国家的经济史就像是由一系列的英雄尝试所组成的锁链，这些尝试旨在为军事组织的继续存在提供必要的手段。整个政府机构就是为了国库的利益而不断重建的。它的职能就是榨取人民积累的每一份劳动，并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

[3] 原文直译为：“俄国的国民经济已经不再原始到可以采用前一种解决方法。”——中译者注

[4] 诺盖人（Норай）是生活在北高加索地区的突厥人，其中多半都在俄罗斯联邦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达吉斯坦共和国。——中译者注

[5] 原文直译为：“不过，当然，并不会超过英法百年战争给法国带来的压力。”——中译者注

政府在搜刮民脂民膏的时候毫不留情：政府任意地向农民摊派苛捐杂税，而这些重税都是居民无法忍受的。政府在农村建立了公社集体负责制（*круговая порука община*）。政府借助“恳求”与威胁，“劝告”与勒索的手段，从商贩和修道院那里巧取豪夺。农民弃耕而逃，商人纷纷移民。十七世纪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俄国的人口日益减少。当时，在 150 万卢布之巨的国家预算中有将近 85% 被用作了军费。十八世纪初，彼得^[6]面临着严重的外患，不得不以新的模式重组步兵并创建海军舰队。十八世纪的下半叶，俄国的国家预算已经达到了 1600 万到 2000 万之巨，其中有 60—70% 被用在了陆军和海军上。即使到了尼古拉一世执政时期，这个比重也没能低于 50%。到了 19 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使得沙皇的专制统治不得不与在经济上更加发达有力的欧洲敌手——英国和法国交战。交战的结果表明，俄国必须在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重整军队。出于财政和军事上的需求，沙皇政府才在 1861 年实现了农民的半解放。

但国内的物质要素当然是不够的。早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时候，政府就已经能够向外举债。在这之后，欧洲的交易所就越来越成为沙皇制度的财政来源。西欧的资金市场正是从那时起就聚集起了庞大的资本，对俄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国家组织的强劲成长在这时已不仅表现在贪得无厌的间接税，同时也体现为疯狂发行国债。在 1898 年至 1908 年的这 10 年里，国债的发行数已经增长了 19%。而且到这十年结束的时候，国债的总额已经有将近 90 亿卢布。俄罗斯专制政府机构对罗斯柴尔德和门德尔松家族的依赖程度，在这样的事实里可见一斑：偿付给这两个家族的利息，占国库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在 1908 年的政府预算中，如果

[6] 这里指彼得一世。——中译者注

把对陆军与海军的投入、付清国债利息造成的损失以及结束（日俄）战争的费用加在一起，就会得到 1018000000 卢布（十亿零一千八百万）这个数字，而这足足占了国家预算全额的 40.5%。

由于面临着西欧的这种压力，专制国家吸收了过多的过剩产品。也就是说，专制国家以牺牲当时正在形成的特权阶级（Привилегированный класс）的利益为代价，限制住了这些阶级本就缓慢的发展。但这还不是全部。国家夺走了庄稼人的基本必需品，断了他们的活路，并趁机把他从还没来得及安居的土地上赶走。这反过来又制约了人口和生产力的增长。因此，由于国家吸收了过多的过剩产品^[7]，本就缓慢的等级分化（сословная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я）过程就被限制住了；由于国家夺走了相当一部分的必需品，它也就那摧毁了唯一支撑着它的落后生产基础。

但是，这个国家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和统治，自身也需要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看吧，这就是为什么它在破坏这种组织发展的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在用国家秩序的手段来为这种组织拔苗助长。并且，它也像所有的国家一样，努力地让等级分化的进程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社会的力量让天平以比西欧历史更为严重地向国家权力倾斜。国家和上层社会集团之间以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进行的那种服务交换，体现在权利与义务，还有特权与重负的分配上。俄国的贵族和神职人员在这种交换中可以获得的利益，要比他们在西欧中世纪的同行要少得多。然而，如果像米留可夫⁸在他的《俄国

[7] 原文直译为“过剩产品中的不成比例的很大一部分”，下同。——中译者注

[8]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

文化史纲》^[9]里那样，说什么在西方是“等级缔造了国家政权”，而在俄国是“国家政权创造了等级”，那就未免有些耸人听闻了。

等级不可能通过立法或是行政手段建立起来。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借助国家权力成为一个成熟的特权等级之前，它必须先在经济上拥有自己所有的社会优势。等级不可能通过提前编制好的官秩表（табель о рангах）^[10]或者荣誉军团（Légion d'honneur）^[11]章程来人工制造。

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沙皇专制在与俄国特权等级的关系中，比起从等级制度森严君主制成长起来的欧洲专制，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立性。

当资产阶级站在第三等级的肩膀上，变得足够强大，足以制衡社会的封建力量时，绝对主义政体的力量就达到了它的顶点。在这种情况下，特权阶级与有产阶级相互斗争，相互平衡，保证了国家组织的最大独立性。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

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

[9] 原文这里并未直接引用书名。原书名直译过来，应该是《关于俄国文化史的论文集》，这里采用通行的译法。——中译者注

[10] 官秩表是俄罗斯帝国军队、政府和宫廷中职位和级别的清单，由彼得大帝于1722年实行，以限制贵族对政治的影响，使得有才能的人可以得到提拔并获得爵位。在官秩表中，每一个对应的等级（Класс）都有相应的文官官衔、军官军衔和贵族官衔（部分缺位），共14个等级。贵族官衔由于二月革命事实上已经被消灭，而文官官衔则在1917年11月25日（公历），被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消灭等级制和文官制度的法令》废除；而军衔官秩表则随着革命向整个俄国扩散而逐步废除。1935年9月22日，苏联恢复了军衔制度；1943年，苏联恢复了检察官与侦查人员的衔级制度；而在如今的俄罗斯联邦，连公务员的等级制度也已经以新的形态卷土重来。——Uni

[11]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是法国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勋位勋章，以表彰对法国做出特殊贡献的军人和其他各界人士。这一勋章系统总共有六个等级，是由拿破仑在1806年创立的。——中译者注

普鲁士的绝对君主制在黑格尔看来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是国家理念现实化的产物。

沙皇专制在努力建立自己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时，并不需要和特权等级的野心做多少斗争，却需要对付野蛮、贫穷以及整个国家各部分经济生活互相隔离的状态。俄国自成一体的官僚专制组织并不像它的西方同类国家那样，创造了经济占统治地位阶级的平衡，而是使得俄国的这种阶级在社会上柔弱，在政治上渺小。从这方面来讲，俄国沙皇专制制度（Царизм）处于欧洲绝对主义制度（Абсолютизм）与亚洲专制制度（Деспотизм）的居中点上，但它可能离后者要更接近一些。^[12]

但是，当半亚细亚的社会条件使沙皇制度变成一个专制（Самодержавный）组织时，欧洲的技术和资本却用欧洲大国才有的一切手段来武装这一组织。这也可能促使沙皇专制介入欧洲的一切政治关系。沙皇专制的重拳在欧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815年，亚历山大一世到达巴黎，复辟了波旁王朝，而自己则变成了神圣同盟的思想化身。而在1848年，尼古拉一世获得了镇压欧洲革命用的巨额贷款，并派俄国士兵镇压起义的马扎尔人。欧洲资产阶级寄望于沙皇军队，希望他们能在今后的某个场合再度充当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掘墓人，就像他们曾经为欧洲专制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己服务一样。

但是历史的发展却选择了另一条路。绝对主义含辛茹苦地培育资本主义，却最终被后者击败了。

[12] 正因为如此，“Царизм”和“Самодержавие”一词会使用在中文语境上与亚洲专制更为接近的“沙皇专制”一词进行翻译。而接下来提到的所有“绝对主义”，指的都是欧洲绝对制度（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君主制），但有时“绝对主义”一词也会用于表示俄国体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主义”会被翻译为专制主义或专制制度。——一中译者注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欧洲的经济只能有限地影响俄国。俄国国民经济的自然性（也就是说，自成一体性）保护了自己，使其不受更高级生产方式的影响。我们的等级结构，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即使是在其终结的时候也未能充分发展。但是，当资本主义关系在欧洲终于取得主导地位时，当金融资本成为新式经济的领头羊时，当绝对主义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从而与欧洲资本主义同流合污时，情况就彻底改变了。

那些不再理解国家政权对社会主义革命意义的“批判”社会主义者，应该至少去研究一下俄国专制制度非系统和野蛮活动的历史，以便认识到国家政权在总体上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时，在纯经济领域能起到的重大作用。

沙皇制度变成推动俄国经济关系资本化的历史工具，其首要目的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当我们日渐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开始觉得需要西方的政治体制时，专制制度就已经在欧洲技术和资本的帮助下摇身一变，成为最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家、银行家、铁路和酒铺的垄断所有者。这一点上得到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的支持。这种机构根本不适合用来调节新的关系，但却能以充沛的精力，有条不紊地完成镇压的任务。电报征服了国家的广阔疆域，使行政当局的行为充满了信心，快速并整齐划一。而铁路则使军队可以短时间内从欧洲的布列斯特要塞开到亚洲的黑龙江边^[13]。而欧洲政府在革命以前根本就不知铁路、电报为何物。专制制度掌握的军队是庞大的——虽然它没能顺利经受住日俄战争的严峻考验，但显然足以去对付“内乱”和维护统治了。无论是昔日的法国当局，还是1848年的欧洲政府，都没有能与现今的俄国军队相提并论的事物。

[13] 原文直译为“……从国家的这头开到那一头。”——中译者注

专制制度的财政和军事力量，不仅压迫并蒙蔽了欧洲资产阶级，同时也遏制着俄国的自由主义，使其不再有信心借助公开的武力斗争来挑战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军事和财政力量，似乎让俄国革命沦为空谈……

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正好完全相反。

一个国家越是中央集权，越是独立于统治阶级，就会越快地转变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自足组织。这样的组织的军事—财政力量越强大，它的生存斗争就会持续的越久，越成功。一个总预算为二十亿卢布，举了八十亿卢布的债，手下还有百万武装士兵的中央集权国家，总是能在它不能继续顺应自身社会发展的需要时，仍然苟活很久。这里的需要还包括军事安全的需要，而它当初正是为了这种需要而创立的。

因此，专制主义的行政、军事还有财政力量能够使它不顾与社会发展脚步的对立而继续存在，而这不仅没有排除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就像自由派认为的那样），而且正相反，它使得革命成为唯一可能的出路。此外，专制主义日益强大的力量不断加深它与推动新的经济发展的人民群众的鸿沟，这一事实提前保证了日后的革命将带有极其激进的性质^[14]。

在自由派以最乌托邦的“现实主义”进行自我暗示的时候，在革命民粹主义者以幻想和奇迹为食的时候，只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事物的发展方向并预测了这种发展的一般形式^[15]。这一点足以令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昂首挺胸了。

[14] 这里的着重号是中译者添加的。——Uni

[15] 甚至是像门捷列夫教授这样的反动官僚，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在谈到产业发展的时候，他提到：“社会主义者在这之中看到了一些东西，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看透了它们，但是他们走入了歧途，因为他们太坚持自己的教条，建议使用暴力，鼓励暴民的动物本能，使他们追求政变与权力。”——原注

第二章 俄国的资本主义

在国家的巧取豪夺之下，生产力发展的低水平并没有为剩余的积累、社会分工的广泛发展和城市化的发展留有余地。手工业既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也没有集中在大城市，而是仍然分散在全国的乡村居民手中。正是由于手工业的分散性质，家庭工匠（Кустарь）不能像欧洲城镇中的手工业者那样按订单生产，而是靠偶然的销售机会生活。商贩（Купец）或旅行者（Гость）在分散的生产者与分散的消费者之间充当中介人。这样一来，人烟稀少与贫穷落后以及由此造成的城镇的碎片化，使得**商业资本**在旧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1]国民经济组织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即便是这种商业资本，也依然是分散的，创造不出任何大的商业中心。

最终，既不是农村的工匠，甚至也不是富商，而是**国家**自身感到有必要建立大工业。瑞典人逼迫彼得建立自己的海军和新式军队。但是在使自己的军队组织更加复杂化后，彼得的国家不得不直接依赖于汉萨同盟、荷兰和英国的工厂。因此，建立“祖国”自己的制造业，以服务于陆军和海军——这就成了国防的重要任务了。在彼得一世之前，从未有人建议过进行工厂生产。而在他去世的时候，俄国已经有 233 家大规模的官办或者私营企业：矿山、军械厂、呢厂、亚麻布厂还有帆布厂，等等。这些新式工业的经济基础一方面来自国家财政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商业资本。除此之外，新的工业部门经常与欧洲资本同时被引进俄国，而这些资本会在若干年内享有相应的特权。

在西欧，商业资本在建立大生产的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那里的制造业，是在手工业的腐尸上成长起来的，而

[1] 这里指的是彼得一世迁都至圣彼得堡之前的俄罗斯。——中译者注

以前自给自足的手工业者转变成了雇佣产业工人。而在莫斯科，从西方引进的制造业根本无法招募自由的手工业者，因此也就不得不利用农奴的劳动力了。

所以，18世纪的俄国工厂从一开始就没有遇到来自城市手工业的任何竞争。农村家庭工匠可不是它的对手：他们服务于大众消费者的需求，而被从头到脚管制的俄国工厂则主要是服务于国家，并在一定程度上服务高等人^[2]。

19世纪上半叶，纺织业打破了农奴劳动和国家管制的怪圈。植根于雇佣劳动的工厂当然是尼古拉俄国的社会关系的死敌。为此，农奴主贵族完全接受了自由贸易主义（Фритрэдерский）。尼古拉基于同情心也完全站在这一边。但是，尽管如此，包含财政利益在内的国家需求还是迫使他采取了禁止性税收和对工厂主进行财政补贴的政策。在对英国机器的禁运解除以后，俄国的纺织业就全然按照英国模式建成了。在40—50年代左右，德国人克诺普^[3]从英国一枚钉子不剩地迁移了122家纺纱厂。在纺织领域，曾经有一句谚语：“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神父；哪里有工厂，哪里就有克诺普。”（где церковь-там поп, где фабрика-там Кноп）由于纺织业是为市场服务的，所以，哪怕农奴制还没被废除，它就已经顶着熟练和自由工人的不足，让俄罗斯的纱锭产量位居世界第五。但是其他的工业部门，尤其是炼铁业（железодельная），在彼得死后几乎停滞不前。这种停滞的主要原因是奴隶劳动阻碍了新技术的应用。如果说廉价的印花布是为满足农奴自身的需求而纺织出来的，那么钢铁就得供给发达的工业、城市、铁路和轮船。然而

[2] 原文直译为“上层阶级”。——中译者注

[3] 约翰·路德维希·克诺普（Johann Ludwig Knoop, 1821年5月15日—1894年8月14日），德国棉花贸易商，曾在俄国开办了多家纺织厂，是19世纪最成功的资本家之一。——中译者注

上述的这些事物不可能以农奴制为基础。农奴制的存续也阻碍了农业本身的发展。随着时间推移，农业越来越为外国市场服务。因此，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废除农奴制势在必行。但谁来落实这项政策呢？贵族根本对此置若罔闻。资产阶级力量尚弱，不能施加足够的压力来落实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也完全不能与德国农民战争或是法国扎克雷（Grande Jacquerie）暴动相比——它们只是星星之火，也没法在城市里找到领导者。它们本身又太弱了，没法摧毁地主的势力。所以，此时只有国家才能一锤定音了。沙皇专制必须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受残酷的军事失败，然后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在1861年通过半解放的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

这标志着国内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的特点就在于：“自由”劳动力的迅速聚集、铁路网的疯狂扩张、港口的设立、欧洲资本和工业技术源源不断的流入、更加唾手可得的低息贷款、股份制有限公司数量的增长、金本位货币的引入、凶猛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国债的爆炸式增长。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1881—1894），俄罗斯民族自成一体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从革命阴谋家的藏身处（民粹党人）到沙皇陛下的枢密院（官方的所谓“民族性”）的整个俄国社会意识。这同时也是一个生产关系中发生无情革命的时代。欧洲资本通过建立大工业，将俄国庄稼汉无产阶级化，自动地破坏了“亚细亚—莫斯科”自成一体的深厚基础。

铁路是国家工业化的有力杠杆。不过主动建设铁路的权利当然在国家手里。俄国的第一条铁路是1851年开通的莫斯科—彼得堡铁路。^[4]在克里米亚的“灾难”发生以后，政府将铁路的建设权

[4] 事实上，书中提到的这条铁路是俄罗斯的第二条铁路，第一条铁路是皇村（现普希金）到巴甫洛夫斯克的皇村铁路，于1837年通车。但本线路并没有什么经济价

让渡给了私人企业。但是，国家仍然像一个不知疲惫的守护天使，紧紧地跟在铁路企业家之后：它帮助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筹集资金，保证资本的利润，并让股东享尽优惠和福利。在农奴制改革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俄国建成了 7000 俄里^[5]的铁路；第二个十年修建了 12000 俄里；第三个十年修建了 6000 俄里；而在第四个十年，光是俄国的欧洲部分就已经修建了超过 20000 俄里的铁路，而在整个帝国内则修建了将近 30000 俄里。

在 80 年代，特别是在 90 年代，当维特^[6]——专制—警察资本主义思想的先驱上台时，铁路就又重新集中到了财政部门^[7]手中。就像在发展信贷的过程中，维特看到了财政部长手中把握着“引导民族工业指哪打哪”的武器一样——他的那颗官僚脑袋告诉他，国有铁道是“控制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他是个股票经纪人和政治白痴，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在聚集革命的力量，磨练革命的武器。到 1894 年，俄国的铁路总长度达到 31800 俄里，而其中有 17000 俄里的国营铁路。在革命的 1905 年里，有 667000 名铁路人员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

俄国政府的关税政策结合了贪婪的财政政策与盲目的保护主义。它几乎彻底把欧洲商品彻底隔离在外。西方资本被剥夺了向俄国倾销其产品的可能性，于是他们便以其最无懈可击、最具吸引力的伪装形式——货币的姿态跨过了他们的东方边境。俄国金融市

值，只是为输送度假的贵族而设。——中译者注

[5] 1 俄里约等于 1.0668 公里。——中译者注

[6] 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俄语：Сергей Юльевич Витте，1849 年 6 月 29 日—1915 年 3 月 13 日），俄罗斯帝国政治家，曾任俄罗斯帝国交通大臣（1892 年）、俄罗斯帝国财政大臣（1892 年—1903 年）、俄罗斯帝国大臣委员会主席（宰相职务，1903 年—1905 年）和第一任俄罗斯帝国大臣会议主席（首相职务，1905 年—1906 年）。——中译者注

[7] 原文直译为“国库”。——中译者注

场上的任何活动都是由国外的新借款协议决定的。同时，欧洲企业家直接控制了俄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欧洲的金融资本张开血盆大口，吸收俄国国家预算的最大最好那一份，然后再以工业资本的形式将其中一部分返还给俄国。这就使它能够通过借助沙皇的财政制度当中中介人，不光耗尽俄国庄稼人的生产力，而且直接利用俄国无产阶级的劳动能力。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特别是在 1897 年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后，流入俄国的境外工业资本就不下 15 亿卢布。而到 1892 年为止的 40 年里，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资本只增加了 9.19 亿卢布，但仅在随后的十年里，它就又增加了 21 亿卢布。

通过下述事实，我们就可以看出西方的“黄金洪流”对俄国工业有着怎样的意义：1890 年我国的所有工厂的生产总值为 15 亿卢布，而到了 1900 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 25—30 亿了。与此同时，工厂和车间工人的数量在这一时期也从 140 万增长到了 240 万人。

如果说俄国经济就像其政治一样，是在欧洲的直接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压力）下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影响的形式和深度，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是不断变化的。在西方手工业—作坊制造业生产时期，俄国借用了西方的技术员、建筑师、工匠以及各种熟练工。而当工厂代替这些作坊制造业时，机械就成了模仿和进口的主要对象。最后，当农奴制为了国家需要而被废除，让位于所谓的“自由”劳动时，俄国为工业资本的直接影响打开了方便之大门，而国家贷款则为此扫清了道路。

编年史告诉我们，在 9 世纪时，我们从海对面召唤了瓦良格人来帮忙建立自己的国家。然后是瑞典人，他们教会了我们欧洲的艺术。随后，托马斯和克诺普教会了我们纺织业。英国人休斯

[8]为我们带来了冶金工业，诺贝尔和罗斯柴尔德把外高加索变成了石油的喷泉。也就是在那时，维京人中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门德尔松把俄国带入了证券交易所的领域。

虽然同欧洲的经济联系还只是被限制在进口欧洲师傅和机器，甚至只到借债以用于生产目的的程度，但归根结底，这就是一个让俄国民族工业的机体消化并吸收欧洲生产的各种元素的问题。但是，当自由的境外资本在追求高额利益的竞赛中，在向中国长城一样的关税保护下，扑向俄国领土时，把俄国的全部经济都灌输进欧洲产业资本主义的机体就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经济在最近的几十年来一直在进行的程序。

在俄罗斯现有工业企业中，只有 15%是在 1861 年前成立的；从 1861 年到 1880 年，诞生了 23.5%的企业；而从 1881 年到 1900 年，诞生了超过 61%的企业。在其中，仅在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就产生了 40%的现有企业。

在 1767 年，俄国冶炼了 1000 万普特^[9]生铁。而到了 1866 年（请读者注意，这都已经是一百年后了！），这个产量翻了一倍，达到了 1900 万普特。1896 年的产量已经达到了 9800 万普特，而 1904 年都 1.8 亿普特了。此外，虽然在 1890 年的时候，南方的生铁冶炼量只占全部的 1/5，但仅仅过了十年，那儿的冶炼量已经占全国的一半了。高加索的石油工业也是以这样的速率增长的。60 年代，石油产量还不到 100 万普特；而到了 1870 年，就已经能生产出 2150 万普特的石油了。到 80 年代中期，境外资本进入了这个领域，占据了从巴库到巴图姆的外高加索地区的油田，并开展了面向

[8] 约翰·休斯（John Hughes，1815 年 6 月 25 日—1889 年 6 月 17 日），英国煤矿资本家。1869 年赴俄国购买土地，用于建造冶金厂，参与创建了顿涅茨克市。1889 年死于圣彼得堡。——中译者注

[9] 1 普特合 16.38 公斤。——中译者注

世界市场的业务。石油产量到1890年就已经上升到2.429亿普特，而1896年的时候就又上升到4.299亿普特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南部地区的铁路、煤矿和石油工业发展突飞猛进，以至于国家的经济重心很快地就转移到了这里，而此时这里的工业才只有二十到三十年的历史。这里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美国特色。在短短的几年里，法国—比利时的资本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草原各省的面貌，使其遍布了在西欧几乎无人知晓的巨大企业。达成这一点需要两个条件：欧美的技术和俄国的国家预算。南方的所有冶金厂，从肉眼可见之处到细微的每一颗螺丝钉，都是从美国订购漂洋过海而来的！是政府的订单保证了它们能活过投产的最初几年。乌拉尔地区的族长—半农奴秩序（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полукрепостнический порядок）以及“民族资本”仍然非常落后，直到最近，英国资本才开始铲除这里的野蛮自足性。

俄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条件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俄国工业还相对年轻，但无论是小规模还是中等规模的生产都无足轻重。在俄国，大工厂生产并不是以任何“自然”或有机的方式从手工业和制造业逐渐发展起来的。因为，手工业本身就没能从家庭工匠中发展起来，甚至在它能够诞生之前，就注定要在经济上被境外资本和境外技术扼杀。棉纺厂没有必要与手工业进行任何斗争；相反，正是棉纺厂自身催生了农村的家庭制棉手工业。同样，南方的炼铁业和高加索的石油业也没有吞噬任何小企业；相反，小企业被它们召唤了出来，以充实一系列辅助性和服务性的经济部门。

由于我国的工业统计状况很差，因此，我们完全没法用准确的数据来说明俄国小生产与大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下面的这一表格只能反应大致的真实情况，因为前两类工厂，也就是工人数不足

50 人的企业的数量是根据极其不完整的材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根据偶然得到的材料得出的。

采矿与工业企业的工人数	企业数	工人数（千人）	工人数占的百分比
≤10	17,436	65.0	2.5
10—49	10,586	236.5	9.2
50—99	2,551	175.2	6.8
100—499	2,779	608.0	23.8
500—999	556	381.1	14.9
≥1000	453	1,097.0	42.8
总数	34,361	2,562.8	100.0

比较俄国不同类别的工商业企业所获的利润，就能生动地说明同样的问题：

单个企业利润	企业数量/占比	该类别企业利润总额（按百万卢布计）/占比
1000—2000 卢布	37,000 / 44.5%	56 / 8.6%
>50000 卢布	1,400 / 1.7%	201 / 45.0%

换句话说，将近一半（44.5%）的企业得到的利润加一起也占不到全部利润的十分之一（8.6%），而六十分之一的企业（1.7%）得到的利润却有剩余部分将近一半（45%）。此外，毫无疑问的是，表中列出的大企业利润被大大低估了。为了表明俄罗斯工业异常的集中程度，我们在下面的表格中转载了德国和比利时的可比数据（不包括采矿企业）。

尽管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上面的第一个表格包含的数据不够完整，但它已经能使我们得出以下无可争议的结论：（1）在同质分类中，俄国企业平均雇佣的工人人数比德国企业的这一数字还要多得多；（2）在俄国，大型（51—1000 名工人）和特大型（1000 名工人以上）企业集中了大量的工人，使得它们在俄国企业中的占比比德国的同质企业在德国的占比高得多。而在最后一组中，这种差异不仅仅是相对的，而且具有绝对属性。第二个表格对俄国和比利时进行了比较，它可以更加直观地得出同样的结论。

我们将会进一步看到俄国工业的这一高度集中的特性，对俄

国革命进程以及整体政治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巨大影响。

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另一种性质同样重要的情况：这种高度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工业只涉及到人口的**少数**，而大多数农民则在等级奴役与极端贫困织成的网下继续挣扎。这一事实又为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限定了狭小的范围。

表一：德国和俄国的比较

工厂人数	德国（1895年统计数据）				俄国（1902年统计数据）			
	企业数	工人数（千人）	工人数占比	平均工人数	企业数	工人数（千人）	工人数占比	平均工人数
6—50	191,101	2,454.3	44%	13	14,189	234.5	12.5%	16.5
51—1000	18,698	2,595.5	46%	139	4,722	918.5	49.0%	195.0
≥1000	296	562.6	10%	1,900	302	710.2	38.5%	2,351.0
总计	210,095	5,612.4	100%		19,213	1,863.2	100%	

表二：比利时和俄国的比较

工厂人数	比利时（1896年统计数据）				俄国（同上）			
	企业数	工人数（千人）	工人数占比	平均工人数	企业数	工人数（千人）	工人数占比	平均工人数
5—49	13,000	162	28.3	12.5	14,189	234.5	12.6%	16.5
50—499	1,446	250	43.7	170.0	4,289	628.9	33.8%	146.3
≥500	184	160	28.0	869.0	726	999.8	53.6%	1,377.0
总计	14,650	572	100%		19,213	1,863.2	100%	

而接下来的表格，将会分别列出俄国与美国的按农业和非农业活动区分的产业活动人口：

	俄国（1897年统计数据）		美国（1900年统计数据）	
	人数（千人）	占比	人数（千人）	占比
第一产业从业者 ^[10]	18,653	60.8%	10,450	35.9%
第二产业从业者 ^[11]	12,040	39.2%	18,623	64.1%
总计	30,693	100%	29,073	100%

在俄国的 1.28 亿人口中，工业部门的就业人口（3060 万）比美国 2900 万多不了多少（他们只有 7600 万人口）。这是国家经济

[10] 这里的第一产业从业者是指农林产业以及其余类似产业。——中译者注

[11] 这里的第二产业从业者是指采矿与矿加工、商业、运输、“自由”职业者和仆人。——中译者注

的普遍落后导致的**农业人口大大超过非农业人口**(60.8%与39.2%)的结果。而这种情况，必然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

在1900年，美国的工厂和大型制造企业生产了价值250亿卢布的商品，而俄国的相应数字却只有它的10%—25亿卢布。这同时也证明了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极低。同年，一些国家的煤炭开采量如下——俄国10亿普特，法国10亿普特，德国50亿普特，英国130亿普特。而铁产量的数字则为：俄国每个工人1.4普特，法国每个工人4.3普特，德国和英国则分别为9普特和13.5普特。门捷列夫^[12]说：“然而，我们可以向全世界供应我们的极其廉价的生铁、熟铁和钢。我们的石油、煤炭以及其他土地里的财富几乎都没有被开发。”但是，如果国内市场没有扩大，居民的购买力没有提高，或者说，如果农民群众的经济没有改善，那么不可想象工业能发展到与这种财富相对应的程度。

此处，土地问题对俄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之决定性意义体现得淋漓尽致。

[12] 帕维尔·巴甫洛维奇·门捷列夫（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 Менделеев，1863年12月31日—1951年7月2日），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1885年进入俄罗斯帝国国务院工作。1887—1889年任参议院刑事上诉司司长。1889—1894年任司法部第一司司长。1900年起任国务委员。1904—1909年任大臣会议办公厅主任。1909年以枢密院议员的头衔退休。1909—1917年任特维尔和图拉省地方自治局议员。1915年起任国务委员。十月革命后逃往乌克兰。1918年参加“俄罗斯国家统一委员会”（Сов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объединения России）。1919年流亡英国。1920年流亡法国。1920—1921年任俄罗斯主要难民委员会书记。1921—1931年任俄罗斯地方自治局援助海外俄罗斯公民委员会书记。1926—1939年任俄罗斯贵族联盟副主席。1939—1949年任俄罗斯贵族联盟主席，1949年起改任名誉主席。1951年死于法国。

第三章 俄国的农民阶级和土地问题

根据（远不够准确的）计算，俄国每年从采矿业和加工业中获得的经济收入为 60—70 亿卢布，而在其中，将近 15 亿卢布，也就是它的五分之一，都被国家吸收走了。这样说来，俄国的贫困程度是欧洲国家的 3—4 倍。正如我们看到的，从事产业活动的人数在所有人口中只是极少数。而且，这些从事工业活动的个体生产力还非常低。这就是工业的现实——年产值与雇佣人数不成正比；但农业生产力仍处于一个无可比拟的低水平。尽管它已经占去了全国 61% 的劳动力，其总收入却只有 28 亿卢布，也就是说，不足国民总收入的一半。

俄国的农业条件（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农业），在本质上，是由 1861 年所谓“解放改革”的性质决定的。这项改革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但在进行过程中却完全被贵族的私利安排了^[1]。庄稼人不仅在土地分配上受到了欺骗，而且还深受税收枷锁的束缚之下。

下面的这个表格列出了农奴制改革清算土地时，三大类农民分配到的土地情况。

农民类型	人数（1860 年数据）	得到的土地面积（单位：俄亩）	每人平均获得（单位：俄亩）
地主的农民	11,907,000	37,758,000	3.17
国家农民	10,347,000	69,712,000	6.74
个体农户	870,000	4,260,000	4.90
总计	23,124,000	111,730,000	4.83（平均）

如果我们假设这样一个经济条件，即国有农民得到的土地（每人 6.7 俄亩^[2]）占去一个农民家庭的所有劳动力的话——这与事实大致相符，那么我们必然能得出一个结论：地主曾经拥有的农奴和独立农民比这一标准少分了大约 4400 万俄亩的土地。在农奴制下，

[1] 原文直译为“改革的方向被重新安排至贵族的私利了。”——中译者注

[2] 1 俄亩约合 1.09 公顷。——中译者注

农民为自身需求而耕种的那些土地，只发挥了它能承载的劳动力的一半——因为他们每周有三天必须为地主工作。然而，在这些被分配出去的本已不足的土地中，足足约有 2% 的良田被地主收割走了（全国各地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农业人口过剩——这一农奴制的基本条件，随着贵族对农民土地的强取豪夺而更加严重了。

在改革以来的半个世纪里，土地所有权发生了相当大的调整，价值达 7.5 亿卢布的土地从贵族手中转入商人和农民资产阶级手中。但是，广大农民群众并没有因为这个客观事实得到任何好处。

在 1905 年，俄国欧洲部分的五十个省的土地分配情况如下表（单位：百万俄亩）：

获分土地	总计	112	
	原国家农奴	66.3	
	原地主的农奴	38.4	
私有土地	总计	101.7	
	公司和合伙经营	15.7（11.4 属于后者）	
	个体所有（按规模分类）	20 俄亩	3.2（2.3 归农民所有）
		20—50 俄亩	3.3
50 俄亩		79.4	
王室和独立土地	145（其中包括约 4—6 的自由非森林适耕土地）		
属于教堂、修道院和市政机构等的土地	8.8		

我们可以看到，根据上面的两个表格中的数据，土地改革后，每个男性农民平均获得 4.83 俄亩的土地。而在 45 年后的 1905 年，哪怕把新获得的土地算在内，平均每个人也只剩下 3.1 俄亩的土地了。换句话说，农民拥有的土地总面积减少了 36%。

工商业活动的发展只吸收了农民人口年增长量的 1/3；向边疆地区的移民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心地区的农民人口；最后，农民银行的活动，使中农和富农在 1882 年至 1905 年期间获得了 730 万俄亩的土地——所有这些因素证明，无法抵消人口自

然增长的影响，也无法提前防止土地贫困的加剧。

据粗略计算，在俄国，约有 500 万成年男子找不到符合自己劳动能力的职业。在这 500 万“多余的人”中，绝大部分属于黑土农民，只有少数是职业流浪者、乞丐等人。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力用在了没有他们也同样可以充分耕耘的土地上，使农民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了 30%。并且，他们由于被整体吸收进农民群众中，通过让广大的农民群众赤贫化避免了自身的无产阶级化。

从理论上讲，加强农业可能是一个出路。但农民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知识、主动权、不受监护的自由和稳定的法律秩序。而这些条件在专制俄国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不过，物质力量的匮乏，一直都是改善我国农业的主要阻碍，这点到现在也是如此。而农民经济危机的这一面，就像他们缺地的事实一样，可以追溯到 1861 年的改革。

对农民而言，那点微薄的土地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必须向地主支付赎买金。国家充当中介，赎买他们以前在农奴制下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就是说，他们要出钱赎买自己的土地。而这些土地的面积，由于改革的缘故进一步减少。赎买土地的费用是由与地主沆瀣一气的政府人员确定的——他们把 8.67 亿卢布的债务压在了农民身上，而非 6.48 亿卢布。这是一个基于资本化后的利润率得出来的数字。因此，农民除了花钱赎回土地以外，实际上还必须向地主额外支付 2.19 亿卢布，来作为他们从农奴制解放的代价。除此之外，他们因为没有土地，还不得不负担起敲诈性的地租和沙皇财政机构的畸形工作。举个例子，农民要为被分配到的每亩土地交 1.56 卢布的直接土地税，而私有土地的直接土地税则是 23 戈比（0.23 卢布）。因此，国家预算的重负几乎就全压在了农民的身上。国家吞噬了农民在耕作过程中获得的绝大部分利润，但却几乎没

有回报农村，不利于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或发展其生产力。政府于1902年组织的地方农业经济委员会确定了一项事实，即在农业家庭净利润中，直接税和间接税就占了50%—100%，有时甚至更多。这一方面积累了一堆无望解决的欠款，一方面又导致农业活动停滞甚至恶化。今天，在俄国中心的广大地区，技术和作物都和1000年前一样。在英国，每公顷土地平均能生产2690升小麦，在德国是1700升，而到了俄罗斯就只有670升了。除此之外，还应该补充一点：农民土地上的庄稼数量比地主土地低46%，而且这种差别越大，一年的收成也就越差。我们的农民甚至早已忘记了如何梦想着储备面包以度过灾年。由于新的商品—金融关系和财政义务，他被迫把自己所有的自然储备和经济盈余都转化为抓得见摸得着的现金，然后拿这些现金去缴纳各种税收和租金。围绕着现金展开的狂热竞赛，迫使农民不断粗暴地对待自己的土地，剥夺了土地的肥力和合理的畜牧能力。每一次歉收，都是大地对受过的虐待的报复，灭顶之灾降临在没有任何储备的村庄。

但是，即便是在所谓“正常”的年份里，农民群众也没法摆脱他们的半饥饿状态。下述的农民预算，应该镌刻在欧洲银行家以及沙皇制度的每一个债权人的金色额头上：农民家庭的每个家庭成员每年在食品上的开支是19.5卢布，住宿3.8卢布，衣着5.5卢布，在其他物质需要上的开支是1.4卢布，而在精神和智力需要上的开支则是2.5卢布！一位熟练的美国工人的直接和间接开支，合起来相当于俄国两个六口之家的开支之和。然而，为了支付这个任何国有道德家都没法斥责为浪费的开支，农民每年从农业少获得10亿卢布的收入。家庭工匠手工业给乡村带来的利润约为2亿卢布。把这两个数字一合计，我们就得到：农民农业每年的总赤字为8.5亿卢布——这正是国家财政组织每年从农民阶级手中抢走的

数额。

在我们对农民农业的描述中，到这里为止还没提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而实际上，这些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并且以农民运动的形式（见《庄稼人的造反》一章）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俄国欧洲部分的50个省，然后去掉北部森林地带，那么，从农民农业和一般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其余地区可以划分为三大类：

1. 工业地带。包括北边的彼得堡省和南边的莫斯科省。彼得堡和莫斯科统治着这一北方资本主义地区，其特点是工厂（特别是纺织业工厂）、家庭工匠手工业、亚麻种植和商业农业（特别是蔬菜栽培业）。和其他所有工业国家一样，这一地区种植的粮食不能满足其需要，不得不从南方进口。

2. 毗邻黑海和伏尔加河下游的东南地区，“俄属美洲”^[3]。这个地区几乎不存在农奴制，而相对于俄罗斯的中央地带来说，它相当于殖民地。所谓的“小麦工厂”利用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将粮食输送到北方的工业地区并出口西部的外国。这种工厂在草原自由地带迅速兴起，并吸引了大量移民。于此并行的，是劳动力向加工业的转移，“重”工业的兴盛和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在这一地区，农民群体的内部分化极其严重。农夫站在天平的一端，而农业无产者则站在天平的另一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农业无产者都是来自黑土省份的移民。

3. 在旧的北方工业区和新的南方工业区之间，有一片广阔的黑土地——“俄属印度”。它的人口即使是在农奴制时也相对密集，而且全部从事农业。但是，1861年的改革使其土地面积减少

[3] 与下面的“俄属印度”一样，均为昵称，并非实际存在的行政单位。——中译者注

了 24%——农民可分配的土地中最好、最赖以生存的部分被转给了地主。地价迅速上涨，地主们从事着纯粹的寄生经济，一部分用农民账目上的土地耕种，一部分则把土地租给农民，而农民则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奴隶制般的租金条件的束缚。数十万农民离开这个地区，到北方的工业区或南方去，致使这些地区的劳动条件恶化。黑土地带既没有大规模的工业，也没有资本主义农业。在这里，农业资本家没法与贫苦的佃农竞争，蒸汽犁在与庄稼人的生理弹性进行斗争时失败了。庄稼人不仅支付了他们“资本”的全部利润，还支付了他们大部分的工资——他们以面粉与木屑或磨碎的树皮混合的食物为生。在某些地方，农民的贫困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连一块观音土^[4]里有臭虫或蟑螂，都能被当成是相对富裕的有力标志。有这样一个事实：农村医生申加列夫（如今是第三届杜马的自由派代表）调查发现，在沃罗涅日省，无地农民家里根本遇不到臭虫，而在村里其他类别的人口中，家中的臭虫数量基本与其“财富”成正比。蟑螂，似乎看上去没怎么沾染贵族习气，但它对舒适度的要求显然也比沃罗涅日的贫民高：由于普遍的饥饿和寒冷，9.3%的农民家庭中没有发现蟑螂。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农业技术仅是空谈罢了。农民的牲畜，包括劳动用的牲畜，都要被卖掉以支付租金和税收，否则就要被吃掉。但是，一个地方生产力不发展，也就不可能会发生社会分化。在黑土上的公社，贫富均等。与北方和南方相比，农民的阶层分化还停留在表面上。在阶级差别还在孕育的时候，贫困化的农民和寄生贵族之间已经产生了尖锐的阶级对立。

当然，上述的这三个地区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地理界限。因为国

[4] 原文直译为“伊兹巴”，似乎这种（可能是食物？）事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彻底消失了。——中译者注

家是统一的，关税壁垒不存在，已不可能形成任何独立经济肌体。在 19 世纪 80 年代，农业半自给自足关系在黑土地地区中部地带的 12 个省份中占主导地位，也普遍存在于黑土地带以外的 5 个省份。而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农业关系在 9 个黑土省份和 10 个非黑土省份占主导地位。剩下的 7 个省里，这两种制度旗鼓相当。

佃农和资本主义农业之间的斗争过去不曾间断，至今仍不停息。这种斗争虽不流血，但也产生了无数的受害者。资本主义农业远没有能力获得胜利。农民陷入被分配到的土地的鼠笼里，被剥夺了兼职挣钱的手段，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被迫不惜一切代价租下地主的土地。他不仅放弃了一切利润，把自己的需求降低到最低程度，而且还卖掉了自己的农业库存，从而进一步降低了自己本就很低的技术水平。面对小规模农业生产这些致命的“优势”，大资本是无能为力的：地主对合理的耕作方法不屑一顾，把自己的土地切割成细小的部分，以便出租给农民。地租和地价的提高，使中央地区人口剩余，同时降低了整个国家的工资水平。这样一来，不仅仅农业，就连其他生产部门，引进机械和现代技术都无利可图。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深刻的经济衰败已经相当深远地扩展到了南部地区。在那里，地租一边增长，农民劳动力的数量一边逐渐减少。农业的危机和农民逐步的贫困化，进一步削弱了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而工业资本主义不得不主要为**国内市场**运作。由于重工业是靠国家明令来维持的，因此农民的逐步贫困化已经威胁到了重工业——它破坏了国家预算的基础。

这些条件本身就足以说明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俄国政治生活的轴心的原因了。全国所有的反对党和革命党都已经受到了土地问题之利刃的残酷伤害：在 1905 年 12 月，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都是如此。今天，第三届杜马就像车轮里的松鼠一样，在土地问题

上乱窜。罪恶的沙皇制度也有可能吊死在同一棵歪脖子树上^[5]。

贵族—官僚国家即使有最好的意图，也无力在一个止痛药早已失去意义的领域进行改革。考虑到国内有 500 万剩余劳动力，国家现在可以支配的 600—700 万俄亩良田完全不够用。但是，国家只能把这些土地卖给农民，并且是以他们从地主手里买地时的价格来卖。这也就是说，即使这几百万俄亩土地像 1861 年那样完全迅速地转到农民手里，每一个庄稼人的卢布也不会在经济中找到其生产性的用武之地，而是落入贵族和政府的无底口袋。

农民不可能从贫困和饥饿的地狱一步跃入集约化和合理化农业的天堂；如果要尽可能实现这一跃，农民必须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立即得到足够的土地，以便运用自身的劳动能力。把一切大、中土地转到农民手中，是任何深刻的土地改革的首要基本前提。与地主手中的只是充当向农民勒索高利贷和租金的手段的几千万俄亩土地相比，用于进行比较合理的大规模农业生产的 1840 块土地扩展到 700 多万俄亩的事实几乎不值一提。然而，把这些私有土地卖给农民几乎引起不了什么波澜：庄稼人之前以租金形式支付的钱，现在就得以购买价格的形式支付。只剩下没收土地一途了。

但是不难看出，即使没收大片土地也不能挽救农民。农业的总利润达 28 亿卢布，其中 23 亿来自农民和农业劳动者，约 4.5 亿来自地主。我们已经提到过，农民每年的赤字能有 8.5 亿卢布。由此可见，即使是没收地主的土地产生的所有收入也丝毫不能填补这一赤字大洞。

那些反对征用地主土地的人，往往也用这种计算为基础进行论证。但是他们忽视了问题的主要方面：在从现在拥有土地的闲人

[5] 原文直译为“沙皇制度也有可能在一个问题上撞破自己的罪恶头颅”。——中译者注

们手里收来的土地上，可以发展技术水平很高的自由农业经济，使土地的总收入成倍增长。但是在俄国，只有在完全清算沙皇专制及其财政、官僚主义的监护、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以及欠欧洲证券交易所的债务后，才可以设想这种美国式的农业。解决农业问题的完整方案如下：剥夺贵族，清算沙皇专制，实行民主。

我国农业只有走这样的道路，才可以摆脱目前的停滞状态。这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并且刺激他们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工业将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动力，并吸收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人口。当然，这一切都不能为农业问题提供最后的解决办法，因为在资本主义秩序下找不到解决办法。但是，无论如何，在即将到来的解决办法来临之前，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来清算专制和封建主义。

俄国的土地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沉重负担——它是革命政党的助手，同时也是它的最大挑战；它是自由主义的绊脚石，也是反革命的必死证（*memento mori*）。

第四章 俄国革命的动力^[1]

我国在欧洲占 540 万平方公里，在亚洲占 1750 万平方公里，人口 1.5 亿。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存在着所有时代的人类文化：从北方森林中吃生鱼、向园木祈祷的原始野蛮状态，直到资本主义城市的现代社会关系——那里，社会主义的工人意识到自己应当积极参加世界政治，并密切注视巴尔干的事态或德国国会的辩论。我国有欧洲最集中的工业，它建立在欧洲最落后的农业基础之上。我国有世界上最巨大的国家机器，它利用技术进步的一切成就来阻碍本国历史的进步。在前面几章中，我们曾试图抛开一切细节，总体勾勒出俄国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矛盾的轮廓。在经济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基础上，社会各阶级不断成长并相互斗争。在最紧张的斗争时期，革命使我们看清了这些阶级的具体状况。但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直接起作用的是有意识地成立的团体：政党、联盟、军队、官僚集团、报刊在其头上的部长、领袖、蛊惑家和刽子手。阶级是一下子看不出来的，它们通常处在幕后。但是，这不妨碍政党、它们的领袖、部长及其刽子手仅仅充当阶级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好是坏，对事态的进程和结局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如果部长仅仅是“客观的国家理性”的临时工，这无论如何都不是说在他们的颅骨下就不必有脑髓，——他们常常忘了这点。同样，从另一方面说，阶级斗争的逻辑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利用自己的主观逻辑。谁不善于在经济必然性的范围内找到发挥首创精神、毅力、才能和英雄主义的广阔天地，谁就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秘密。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我们想要掌握整个政治过程——这里指的是革命——我们就应当善于在政党和纲领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外衣下，

[1] 中译者根据俄文原版和英译版，对《托洛茨基言论》上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的同名章节进行了校订。——中译者注

在某些人的狡诈和凶残背后，在另一些人的勇敢和理想主义背后，揭示扎根于生产关系的深处、开花于意识形态上层领域的社会各阶级的真面目。

现代城市

资本主义各阶级的性质是同工业和城市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着的。的确，俄国的工业人口和城市人口状况不像其他国家那么一致。除了仅仅在形式上不包括在市内的城郊厂区以外，还有农村中的几十个相当大的工业中心。大体上说，企业总数的 57%和工人总数的 58%不在城市。然而，资本主义城市仍是新社会的最充分的体现者。

现代城市化的俄国，是近几十年来的产物。在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内，俄国城市人口为 32.8 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3%。1812 年，城市居民共 160 万人，仍然只占 4.4%。在 19 世纪中叶，城市共有 350 万居民，即占 7.8%。最后，根据 1897 年的统计，城市人口已经有 1630 万，约占总人口的 13%。自 1885 年至 1897 年，城市人口增长了 33.8%；而农村人口只增长了 12.7%。个别城市增长得更快。莫斯科的人口在最近 35 年内从 60.4 万人增至 135.9 万人，也就是增长了 123%。敖德萨、罗斯托夫、叶卡捷林诺斯拉夫、巴库等南方城市的增长速度比这还要高。

19 世纪下半叶，在城市数量和规模增大的同时，城市的经济作用和内部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彻底变化。

为把全部加工工业集中到城内，欧洲行会手工业城市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很多情况下斗争取得了胜利；而旧的俄国城市则相反，它同亚洲专制国家的城市一样，几乎完全不履行生产职能。这是一些军事行政点、军事要塞和某些情况下的商业中心，它们享受一切现成的东西。它们的居民是由那些靠官饷维持生活的

官吏、商人以及到城里来寻找庇护所的农夫组成的。甚至莫斯科这个旧俄的最大城市，也不过是同沙皇的庄园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大村庄。

手工业在城市里无足轻重，因为据我们所知，那时的加工工业以手工业的形式分散在农村。400 万手工业者（1897 年的统计数字）的前辈履行了欧洲城市手工业的生产职能，但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们完全没有参与建立手工工场和工厂的过程。手工工场和工厂出现了以后，使半数以上的手工业者变成了无产者，并直接或间接地支配其余的手工业者。

俄国工业没有经过中世纪手工业时期，俄国城市也没有第三等级在行会、公会、公社和市政局中的逐渐发展。欧洲资本在几十年内建立了俄国工业，而俄国工业则建立了无产阶级履行基本生产职能的现代城市。

大资产阶级

这样，大资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经济领域的统治地位。但是，外国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所起的巨大作用对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产生了致命的影响。由于国债，每年大部分国民收入都流到国外，使欧洲金融资产阶级更加富足和更加强大。但是，交易所贵族在欧洲国家掌握着领导权，并毫不费力地把沙皇政府变成自己的金融附庸。他们不能也不想加入俄国国内资产阶级反对派，因为任何其他国家政府都不能像沙皇当局那样保证他们有如此高额的利息。但是，不仅外国金融资本，而且外国工业资本一方面开发俄国的自然资源和剥削俄国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却在俄国以外，即在法国、英国或比利时的议会中实现自己的政治力量。

但是，本国资本不能领导全国性的反沙皇的斗争，因为它很快同人民群众，即同它直接剥削的无产阶级和通过国家掠夺的农民

处于敌对状态。这种情形尤其适用于重工业。后者现在到处依赖国家的设施，主要依赖军国主义。说真的，它固然对“强硬的民事法制”感兴趣，但更需要集中的国家政权这个财富的伟大布施者。冶金业企业主在自己的工厂里碰到的是工人阶级中最先进和最积极的部分。这部分的工人阶级，每逢沙皇制度风雨飘摇，就趁机向资本进攻。

纺织工业相对来说不那么依赖国家。除此以外，它直接影响到群众购买力的提高。如果要提高购买力，就必须推进广泛的土地改革。因此，1905年，纺织业的莫斯科养活了反专制官僚制度的反对派。这个派别比冶金业的彼得堡的反对派要激烈得多，甚至有力得多。莫斯科市杜马以一种无可置疑的好意观望正在高涨的浪潮。但是，革命一旦在这个反对派面前展示出自己的全部社会内容，同时把纺织工人推向冶金工人的道路的时候，这个反对派就更坚决并“更有原则地”转向坚强的国家政权方面去了。同反革命地产结合的反革命资本，将莫斯科商人、第三届国家杜马多数派首领古契柯夫^[2]视作自己的领袖。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欧洲资本扼杀了萌芽状态中的俄国手工业，从而也就铲除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是否可以把现在的彼得堡或莫斯科与1848年的柏林或维也纳，尤其是与1789年的巴黎相提并论呢？而1789年的巴黎，还不能设想铁路、电报并把拥有三百名工人的

[2]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契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учков，1862年10月14日—1936年2月14日），生于莫斯科一个资本家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曾在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学。1906年出任十月党党首。1910年至1911年担任杜马议长。一战期间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二月革命后，担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1917年4月29日被迫辞职。十月革命后，积极支持反革命白军。白军失败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工场看作最大企业。我们这儿根本就没有那种经历过整整一个世纪的自治和政治斗争的磨练，然后和年轻的、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并肩冲击封建制度的巴士底狱的壮实的小市民阶层。代替它的是谁呢？“新的中等阶层”，职业知识分子：律师、记者、医生、工程师、教授、教师。在社会生产中失去独立作用的、人数不多的、经济上不独立的这个阶层，正确地意识到自己软弱无力，不断寻求可以依靠的壮实的社会阶级。事情妙不可言！他们起先不是在资本家那里，而是在土地占有者那里找到了这座靠山。

领导头两届杜马的立宪民主党是1905年由地方自治立宪党人同盟^[3]和解放社^[4]合并而成的。地方自治派的自由主义的不满捣乱，一方面表现了大农业主对政府的骇人听闻的工业保护关税政策的不满，另一方面表现了较为先进的土地占有者的反对派立场，因为俄国土地关系中的野蛮状态妨碍了他们把自己的经济纳入资本主义轨道。解放社联合了一些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位处“体面的”社会地位，享受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也不愿走上革命道路。地方自治派这个反对派身上总是带有怯懦虚弱的印记，而当至尊的贵胄在1894年把它的政治愿望叫做“无意义的幻想”时，他只是道出了痛苦的真理。另一方面，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因为享有特权并在物质上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国家、依赖于国家庇护的大资本或自由派的注册地产，也无力发展成多少有点威力的政治反对派。

[3] 地方自治立宪党人同盟是俄国自由派地主的非法政治团体，于1903年11月成立。同盟的主要宗旨是在有限的立宪制基础上同沙皇政府进行勾结。1905年7月同“解放社”共同成立了立宪民主党组织委员会，立宪民主党成立后同盟即不再存在。
——中译者注

[4] “解放社”是1904年彼·司徒卢威在国外成立的自由保皇派组织。“解放社”拥护君主立宪，渴望同沙皇政府勾结，用假“民主主义”来掩饰其反对革命的斗争。“解放派”后来成了立宪民主党的核心。
——中译者注

因此，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立宪民主党结合了地方自治派（软弱无力的反对派）和各方面都软弱无力的有学位的知识分子。1905 年底，地主被农村的骚动吓坏了，急剧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旧制度，这充分暴露了农业自由派的真面目。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得不含泪离开地主的庄园（在这里他们实质上只是个养子），到他历史的故乡，即到城市中去寻找归宿。但是，他们除了自己以外，在这里找到了什么呢？保守的大资本、革命的无产阶级以及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

也就是这种对抗在小生产还具有意义的一切部门彻底粉碎了小生产。手工业无产阶级是在大工业的环境中发展的，因而和工厂无产阶级没有多少差别。受大工业和工人运动排挤的俄国手工业工人是个愚昧的、半饥饿的、凶狠的阶级，它和流氓无产阶级一起充当黑色百人团的示威和大屠杀的打手。

结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一片社会主义的诅咒声中诞生了，无可挽回地迟到了，悬浮在阶级矛盾的深渊之上。他们肩负地主的传统的重压，深受教授偏见的束缚，缺乏主动精神，在群众中没有影响，对明天毫无信心。

无产阶级

某些世界性的因素，把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没有身躯的（非常糊涂的）头脑，也促使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发挥杰出的作用。但是，首先，无产阶级的数量有多大？

1897 年的极不完整的数字为我们提供了下列答案：

工人数量

1.工矿、交通、建筑和商业企业	3,322,000
2.农林渔猎	2,725,000
3.临时工和学徒	1,195,000
4.仆人、搬运工和门卫	2,132,000

1897年，无产阶级连同家属占总人口的27.6%，即稍微超过1/4。在这些群众中，各阶层的政治积极性表现出很大的差别，而革命的领导作用几乎只属于第一类工人（见上表）。但是，用俄国无产阶级的相对数量的大小来衡量它在革命中的实际的和可能的作用，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就是说，没有看到纯数字背后的社会关系。

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由它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所决定的。国家最强大的生产资料是直接依赖于工人的。330万劳动力（第一类）所生产的不下于每年国民收入的一半！情况表明，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这个唯一能把广阔的国家变成一个经济整体的铁路，是无产阶级手中无比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阵地。在这里还应该加上邮政和电报事业，它们虽不是那么直接，然而却非常现实地依赖于无产阶级。

农民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而无产阶级却大量地被动员到工厂和工厂中心来了。无产阶级构成了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上都很重要的每一城市的居民的核心，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所具有的一切优势：生产力和资金的集中，居民中最积极的分子同最巨大的文化财富相结合，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无产阶级的阶级优势。它的阶级自觉已经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俄国无产阶级从诞生以来，就面对着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和高度集中的资本的力量。行会传统和手工业偏见丝毫不能支配它的意识。它一开始就走上了不妥协的阶级斗争的道路。

因此，手工业，一般小生产的微不足道和俄国大工业的极其发达在政治上使无产阶级民主派排挤了资产阶级民主派。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生产作用外，工人阶级还夺取了它过去的政治作用及其领导农民群众的历史抱负。在农民阶层从贵族—国库压迫下解放

出来的时代中，工人阶级会实现后者。

按照历史的观点，土地问题是检验城市各政党立场的政治试金石。

贵族和地产

立宪民主党（或者前立宪民主党人）关于按“公平的”估价强行割让大、中地产的纲领，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是通过“立法的创造性工作”所能达到的最高极限。但是，实际上，自由派通过立法的途径尝试剥夺大地产，却导致政府剥夺选举权和发动六三政变（*coup d'État*）（1907年）。立宪民主党人把消灭土地贵族看作纯金融业务，并煞费苦心让地主接受自己的“公平估价”。但是，贵族却以另一种眼光看待事物。它立即以自己绝对正确的本能理解到，这里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出售5000万俄亩——哪怕是按高价出售——而是要取消它作为统治等级的整个社会作用，因此，它断然拒绝拿自己来拍卖。在第一届杜马期间，萨尔蒂科夫伯爵对地主高喊道：“愿你们的座右铭和你们的口号是：决不让出我们的一寸土地，我们原野上的一粒沙子，我们草地上的一棵草，我们森林中的一根树枝！”这不是旷野的呼声，不，革命年代正好是俄国贵族等级集中和政治上巩固的时期。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的最黑暗的反动时期，贵族也算是一个等级，虽然是第一等级。专制制度警惕地保卫着自己的独立性，丝毫不放松对贵族进行警察监督，甚至给贵族的等级私利的嘴巴戴上自己监督的嘴套。现在贵族是名副其实的发号施令的等级：它迫使省长随着自己的笛声翩翩起舞，恐吓大臣并公开撤换他们，给政府下最后通牒并使之实行。贵族的口号是：寸土诚可贵，特权价亦高。若临变革境，二者绝不抛！

在年收入超过1000卢布的6万名地主手中，集中了约7500万俄亩土地，这些土地按市场价格为560亿卢布，每年为土地所

有者带来 4.5 亿以上的纯收入。贵族得到这笔收入的 2/3 以上。官僚制度同地产是密切联系着的。每年几乎 3 万名收入在 1000 卢布以上的官吏的薪水，来自 2 亿卢布的地产收入。在这些中上层官吏中，恰好又是贵族占了明显的优势。最后，正是这些贵族独吞了地方自治机关和与此有关的收入。

如果在革命前，“自由派”地主在“文明的”地方自治工作的基础上被提拔上去，在足足半数的地方自治局里担任领导，那么，革命的年代使这方面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结果站在前列的是毫不留情的地主反动势力的代表。在萌芽时期，权力无限的贵族联合会就会压制政府的一系列尝试。这些尝试，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益，使地方自治局“民主化”或减轻农民身上的等级桎梏。

面对这些事实，作**立法协议**的基础的立宪民主党的土地纲领，是毫无希望的空想，如果立宪民主党人自己悄悄地放弃了它，那也毫不奇怪。

社会民主党主要在“公平估价”方面批评了立宪民主党的纲领。这样做是正确的。仅就财政方面来说，赎买凡是每年能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 1000 卢布以上的一切地产，会在我们 90 亿国债上又增加一笔 50—60 亿的可观数目；这就是说，单利息一项每年大体上就要吞噬 7.5 亿。但有决定性意义的不在于问题的**财政**方面，而是**政治**方面。

所谓的 1861 年解放改革条件规定的过高的农民土地赎金额实际上是为赎买农奴而给予地主的补偿（数额约为 2.5 亿，即占赎金总额的 25%）。在这种情况下，靠“公平估价”确实消灭了贵族的巨大的历史权利和特权，而贵族也能够适应半解放的改革并顺从这种改革。当时，贵族表现了一种正确的本能，就像现在它坚决拒绝以等级自杀来结束自己一样——即使是按“公平估价”。寸土诚

可贵，特权价亦高。若临变革境，二者绝不抛！在这一旗帜下，贵族最终掌握了受到革命动摇的政府机关，并表明，将以统治阶级在生死关头的浑身解数和凶猛劲头来进行战斗。

要解决土地问题，不能指望着同这个等级在议会上达成君子协议，而只能靠群众的革命进攻。

农民和城镇

俄国社会政治野蛮状态的症结在农村，但这并不是说，只有农村才能产生一个能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个症结的阶级。农民分散在欧俄五百万平方俄里的广大土地上（在五十万居民点中），过去一直没有培养出任何团结起来进行政治斗争的习惯。在 1905—1906 年农民骚动时期，造反的农民的任务是把地主从本村、本乡，最后从本县赶出去。当地的贵族则有现成的集中的国家机构来反对农民的革命。农民只有通过同时举行的和坚决的起义才能战胜它。但是，它由于自己生存的各种条件，无力实现这一点。地方性呆小病是农民起义的历史紧箍咒。如果要摆脱这个紧箍咒，农民起义必须不再是纯粹的农民的起义，并同新的社会阶级的革命运动汇合在一起。

早在 16 世纪头 25 年德国农民革命时期，尽管当时德国城市在经济上力量薄弱，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农民就已自然而然地处于城市政党的直接领导之下。农民就其客观利益来说是社会革命的力量，但政治上是一盘散沙的和软弱无力的，没有能力组织自己的政党，因此，它因地制宜，或者使城市里的市民反对党占优势，或者使平民革命党占优势。这个能够保证农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后的、唯一的力量，虽然依靠当时社会最激进的阶级，依靠现代无产阶级的胚胎，但本身完全缺乏全国性的联系和对革命目标的明确认识。由于国家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和国家割据，这两点都是不

可能实现的。因此，骚动的农村和城市平民的革命合作的任务当时没有得到解决，也不可能得到解决。农民运动最终被镇压下去了……

经过三个多世纪，1848年革命中重现了上述的相互关系。自由派资产阶级不仅不想发动农民并把它团结在自己周围，而且极为害怕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这正是因为农民运动首先巩固和加强了那些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本身的城市平民激进派的地位。另一方面，后者仍然没有克服自己社会政治上的不定型状态和分散性，因此没有能力抛开自由资产阶级去领导农民群众。1848年的革命遭到了失败。

但是，比这再早六十年，在法国，正是靠农民和城市平民，即那个时代的无产者、半无产者和流氓无产者的合作，革命任务才得以胜利实现。这种“合作”采取了国民公会专政的形式，即城市对农村、巴黎对外省和无套裤汉^[5]对巴黎专政的形式。

在现代俄国的条件下，工业人口对农业人口的社会优势，比起旧的欧洲革命时代来，大得无法比拟。同时，在目前俄国城市中，轮廓清晰的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取代了杂乱的平民的地位。但有一点没有改变：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必须率领着城市中最革命的群众，并且不会因为敬畏资产阶级所有制而害怕动摇封建所有制，在革命时期能像过去一样依靠农民。现在，只有社会民主党是这样的政党。

俄国革命的性质

俄国革命就其直接任务而言是“资产阶级的”，因为它力求把资产阶级社会从专制制度和封建所有制的束缚和桎梏中解放出来。

[5] 无套裤汉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对革命人民大众的最流行的称呼。——中译者注

但是这一革命的主要动力是无产阶级，因而就其方法而言它是无产阶级的。许多书呆子都无法领会这种矛盾，试图用数学统计的推算，或用形式主义的历史类比来决定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在他们看来，俄国革命的领袖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实际上在革命高涨的各个时期处于先锋地位的无产阶级，这些书呆子却企图裹在他们自己的轻率的理论襁褓之中。对他们来说，某一资本主义民族的历史只是在多少有点偏离的情况下重复另一个民族的历史。他们没有看到目前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统一过程。这一过程吞没在其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国家，并且结合当地的条件和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形成了一种社会混合物。不能用死板的历史公式、而只能借助唯物主义的 analysis 方式，来决定这种社会混合物的性质。

英国，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先锋，在若干个世纪中创造了新的社会形式及其代表者——强大的资产阶级。在现代的殖民地，欧洲资本把现成的铁轨、枕木、钉子和瞭望车厢装在准备好的装甲舰上运给那里的殖民当局，然后用步枪和刺刀使土著居民脱离他们的原始状态，把他们驱赶到资本主义文明中去。英国同现代殖民地之间虽然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但在历史发展方面没有任何类似之处。

新的俄国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质，这是因为它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受到了欧洲资本的资本主义洗礼，欧洲资本这时已达到其最集中和抽象化的形式——金融资本。欧洲资本自身过去的历史同俄国过去的历史毫无联系。欧洲资本为了使自身能在自己的故乡达到现代交易所的高峰，应当：

- 1、跑出手工业城市的狭窄的大街小巷（它曾经学习爬行和行走的地方）；
- 2、在同宗教进行不断的斗争中发展科学技术；
- 3、把整个民族团结在自己周围，通过反对封建的和王朝的特

权的起义来夺取政权；

4、为自己清扫广阔的舞台，断送它自己所由产生的独立小生产，以便后来脱离民族的脐带，离开父辈的遗骸，抛开政治的偏见，摆脱种族的好感，不顾地理的间隔——野心勃勃地在地球上空翱翔。今天用鸦片毒害已被它弄得破了产的中国手工业者，明天用俄国水域上的新装甲舰发财致富，后天搜取非洲南部的金刚钻矿床。

但是，当英国或法国资本这一许多世纪的历史凝结物在顿涅茨克矿区的草原上出现时，它完全不能施展它不断积蓄的社会力量、关系和热情。它不能在新的地区重复它已完成的发展过程，而要从它在故乡所达到的水平上开始。它把机器运过大海和海关，便立即不经任何中间阶段，把无产阶级群众集中在机器周围，它还把凝结在它身上的老一代资产阶级的革命能量倾注到无产阶级身上。

在法国历史上的英雄时期，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尚未暴露出自己地位的矛盾，历史把领导争取事物的新秩序的斗争任务交给它，这个斗争不仅反对法国的陈旧制度，而且也反对全欧洲的反动势力。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各个派别，彻底地认识了自己并成了民族的领袖，它把群众吸引到斗争中来，给他们口号并授以战斗策略。民主派用政治意识形态把民族联合起来。人民——小市民、农民和工人——选送资产者为自己的议员，公社给他们的委托书是用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救世主任务的资产阶级的语言写出来的。在革命时期，虽然暴露了阶级对抗，但是革命斗争的势不可挡的惯性不断地把资产阶级中最保守的分子抛离政治轨道。每个阶层在把自己的能量转移给随后一个阶层之前是不会离去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继续以愈来愈尖锐和愈来愈坚决的手段为自己的目标而斗争。当富有的资产阶级上层脱离运动中的民族核心并同路易十六结成联盟的时候，旨在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要求，便采取

普选权和共和国这一逻辑上不可避免的民主制形式。

法国大革命确实是一次民族革命。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制度争取统治地位、政权和完全胜利的世界性斗争，也在这里，在民族范围内得到了典型表现。

在 1848 年，资产阶级已不能起类似的作用。它不打算也不能承担起以革命的方式清除妨碍它统治的社会制度的责任。它的任务是（这一点它也看得很清楚）使旧制度增添一点必要的保证，不是保证自己的政治统治，而是保证同旧势力共同掌权。它不仅不带领群众冲击旧秩序，反而依靠旧制度，反击向推动它前进的群众。它的意识背离它取得统治的客观条件。民主设施在它的心目中不是它的斗争目标，而是对它的安宁的威胁。革命不可能由它来进行，而只能是反对它的。因此，在 1848 年，革命要取得胜利，需要一个能在不顾资产阶级和违抗资产阶级的情况下领导运动的阶级，需要一个不仅能逼迫资产阶级前进，而且能在紧要关头把资产阶级的政治僵尸从自己的道路上抛开的阶级。

无论是小市民还是农民都不能做到这一点。

小市民阶层不仅敌视过去，而且敌视未来。它仍然受到中世纪的关系的束缚，但已经不能抗拒“自由”工业；它仍然给城市留下自己的印记，但已让位于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它浸透了成见，被事变隆隆声震得惘然若失，它既剥削人又受人剥削，既贪婪又毫无办法，穷乡僻壤的小市民阶层是不能领导世界革命运动的。

农民在更大程度上缺乏独立主动精神。农民分散，被排除在作为和文化神经中枢的城市之外，他们迟钝，视野只限于寨墙，对城市所想到的一切漠不关心，他们不可能起领导作用。他们一旦解除了压在肩上的封建义务的负担便立即心满意足，对曾经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的城市忘恩负义：解放了的农民变成了“秩序”的狂热

拥护者。

知识分子民主派缺乏阶级力量，它一会儿充当它的老大哥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尾巴，一会儿在紧要关头又离开它，从而暴露出自己的软弱无能。它自己给没有成熟的矛盾搞得混乱不堪，并把这种混乱带到各处。

无产阶级太弱，缺乏组织、经验和知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已达到足以使消灭旧的封建关系成为必然的地步，但还不足以使工人阶级这个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物成为决定性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已严重到使资产阶级不可能大胆担任民族领导人的角色，但还不足以使无产阶级承担这一任务。

奥地利极其显著和悲剧性地佐证了革命时期这种未最终完成的政治关系。

维也纳的无产阶级在 1848 年表现了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和巨大的革命力量。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赴汤蹈火。推动他们的只是一种模糊的阶级本能。他们缺乏对斗争目标的总的概念，摸索着从一个口号转向另一个口号。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令人惊奇地转到了大学生手中，这个唯一的民主集团由于其积极性而对群众有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事态有很大的影响。大学生虽然能够在街垒中英勇战斗，并且能够真心实意同工人交朋友，但是，即便是在革命斗争中践行街头“专政”，他们完全不能领导革命的总进程。当整个工人的维也纳在大学生们的号召下于 5 月 26 日起来抵制解除“大学生军团”武装的时候，当首都居民事实上控制了城市的时候，当国王逃亡并失去作用的时候，当最后几支军队在人民的压力下撤出首都的时候，当奥地利的行政权因此成为一份无人继承的财产的时候，却没有一种政治力量起来执掌政柄。自由资产阶级有意识地拒绝享用这种以强盗的办法取得的政权。它一味梦想从无人照

管的维也纳跑到提罗耳去的皇帝再回来。工人有足够的勇气打败反动派，但在组织上和觉悟上都还不足以接管政权。没有能力执掌政权的无产阶级无法推动资产阶级民主派去完成这一历史功绩，后者像往常一样在最紧要的时刻躲开了。总而言之，出现过一种形势，对于这种形势，一位同时代人说得对：“维也纳实际上建立过共和国，但不幸的是，没有人见到它……”拉萨尔^[6]从1848—1849年的事件中吸取了如下不容置疑的教训：“欧洲的任何斗争都不会成功，除非它从一开始就宣布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斗争，任何斗争，如果社会问题在其中只是个模糊不清的因素并处在次要的地位，如果表面上是在民族复兴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旗帜下进行，它就再也不会成功了。”

历史安排在1905年开始的革命中，无产阶级第一次在自己的旗帜下为自己的目标而付诸行动。同时也毫无疑问，没有一次旧的革命像迄今为止的俄国革命那样耗费了如此大量的群众的精力，而提供了如此微小的积极成果。我们远不是想要预言在最近数周或数月事态将如何发展。但对我们来说有一点是清楚的：只有沿着拉萨尔在1849年提出的那条道路才可能取得胜利。从阶级斗争回到资产阶级的民族团结是办不到的。俄国革命的“无所成就”只不过是暂时反映了其深刻的社会性质。在这个没有革命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事物的内部进程推动无产阶级去领导农民并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浪潮由于庄稼汉政治上的迟钝而失败了。这些庄稼汉在自己的村子里搞垮地主老爷，以便占有其土地，但一旦穿上士兵的上衣，却又去向工人开枪。一切

[6] 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1825年4月11日—1864年8月31日），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3年创建了当时最大的、最重要的德国工人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并任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同他的机会主义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一中译者注

革命事件都可以看成一系列无情的具体教训，通过这些教训，历史使农民深刻意识到其地方性的土地要求同国家政权这一中心问题的联系。在严酷的冲突和惨重的失败的历史学校中锻造了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在 1852 年写道：“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去把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重新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积蓄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Hic Rhodus, hic salta!）^[7]（《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7]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Hic Rhodus, hic salta! ——转意；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这是对一个说大话的人讲的话，他硬说自己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引自伊索寓言中的《说大话的人》）。——中译者注

托洛茨基当时采用的俄译文与后来的俄译文不同，这里保持他的引文译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06—607 页。——《托洛茨基言论》编者注

第五章 “春天”

一

现已故的德拉戈米罗夫将军^[1]曾在一封关于内务大臣西皮亚金^[2]的私人信中写道：“他还能有什么内务政策？他只不过是一个猎骑兵军官，一个蠢货。”这一描述太正确了，以至于我们可以忽略其中外强中干的军人式粗暴。西皮亚金走了，上来的是普列韦^[3]，然后是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亲王，然后是布雷金^[4]、维特—

[1]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德拉戈米罗夫（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Драгомиров，1830年11月20日—1905年10月28日），俄国军事理论家。1843年入伍。1869—1873年任基辅军区参谋长。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89—1897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897—1903年任基辅、沃伦和波多利斯克总督。1903—1905年任国务委员。1905年拒绝出任远东俄军总司令，同年10月28日去世。——中译者注

[2]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西皮亚金（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Сипягин，1853年3月8日—1902年4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88—1891年任库尔兰省长。1891—1893年任莫斯科省长。1893—1894年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1894—1899年任内务部副部长。1899—1902年任内务大臣，在任期间残酷镇压革命运动。1902年被一名社会革命党人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3] 维亚切斯拉夫·康斯坦丁诺维奇·冯·普列韦（Вячеслав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фон Плеве，1846年4月20日—1904年7月28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6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学院，随后开始担任检察官。1879—1881年任彼得堡法院检察官。1881—1885年任俄罗斯帝国警察局长，期间兼任国务委员，参与镇压了民意党的活动，并开始为革命组织中安插特务。1883年起担任枢密院议员。1884年起担任参议员。1885—1894年任内务部副大臣。1894—1902年任国务卿兼国务院编纂部主任。1899年升为实际枢密院议员。1899—1902年代理芬兰大公国国务卿。1902—1904年任内务大臣兼宪兵团团长。1904年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4] 亚历山大·格里高利耶维奇·布雷金（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улыгин，1851年8月18日—1919年9月5日），生于梁赞省一个地主家庭，1871年毕业于帝国法学院，随后进入司法部工作。1905年1月20日出任内务大臣，并于同年8月19日宣布召开国家杜马，但由于工农群众的强烈抗议，布里根于同年10月17日下台。1919年被梁赞省契卡处决。——中译者注

杜尔诺沃^[5]……他们和西皮亚金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其中一些人没当过猎骑兵军官，而另外一些人自作聪明。但是他们之中的所有人，接二连三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留下的只有上层的疑惑和恐惧以及下层的痛恨和藐视。脑袋进水的猎骑兵军官或者专业密探；内心仁慈但头脑愚笨的绅士又或者没有良心和荣誉感的股票经纪人——他们接二连三、旗帜鲜明地打算制止“动乱”（Смута），恢复丢光颜面的政权威信，维护国家的基础；他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打开了革命的水闸，自己也被它的潮流冲走了。“动乱”仿佛是按照某个雄伟的计划发展起来的，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巩固自己的阵地，粉碎每一个阻挡在它面前的障碍；而在这种伟大努力的背景下，玩弄权力的小人凭借着这种努力的内在节奏，以“不自觉的天才”的身份粉墨登场：他们发号施令，大举新债，向工人开枪，洗劫农民。结果，他们使他们本要捍卫的政府权力深陷泥沼而无法自拔。

这帮人在办公室和官僚部门阴谋的氛围中长大，而他们在这种氛围中学会了傲慢无知与赤裸裸的背信弃义；他们对当代历史的进程或意义、群众运动或革命规律一无所知；他们带着两三种可悲的“纲领性思想”，给远在巴黎的股票经纪人作参考；这帮人试图把十八世纪宠臣的方法与西方议会“政治家”的风度结合起来——恕我直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做只会越来越难。^[6]他们用

[5]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杜尔诺沃（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Дурново，1842年11月23日—1915年9月11日），1860年入伍，服役于海军。1872年退役，随后担任检察官。1883—1884年任俄罗斯帝国警察局副局长。1884—1893年任警察局长。1893年起任参议员。1903—1905年任邮电大臣。1905年起担任国务院议员。1905年革命期间指使黑色百人团破坏革命。1906—1915年任枢密院议员，期间反对同德国开战。1915年在彼得堡逝世。——中译者注

[6] 原文直译为“时间越久，就越难。”——中译者注

谄媚的语气和来自欧洲的证券交易所的西方记者聊天，在他们面前卖弄自己的“计划”、“预测”、“纲领”，每个人都情不自禁表达了他们的希望：他们终于能成功地解决他们的前辈们白费气力却没能解决的问题啦！只要赶在其他事情发生之前制止“动乱”就行啦！他们出发点虽然不同，但导致的结局却都是一样的：发布命令将子弹射向“动乱”的胸膛。但是，他们被“动乱”的不死之躯吓坏了！……他们的政治生命以可耻的崩溃告终。而如果恐怖分子的子弹没有把他们从悲惨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的话，他们就会活下来，亲眼见证“动乱”以其特有的才智，将其计划和预测的一切铸成自己的胜利。

西皮亚金倒在了左轮手枪的枪口下。普列韦被炸弹撕成碎渣。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在1月9日^[7]变成了一具政治上的尸体。布雷金仿佛是一块破布，被十月罢工扔了出去。维特伯爵被工人和士兵的起义弄得筋疲力尽，在他自己创建的国家杜马的门槛上跌跌撞撞，昔日的光彩不复存在。

在反对派的某些圈子里，特别是在自由派地主和民主派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人们向来把模糊的希望、期望和计划同大臣的更换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对于自由派报纸的宣传和立宪派地主的政策来说，究竟是站在警察中的老战狼普列韦一旁，还是站在“信任部大臣”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一旁，这些选择并非无关紧要。当然，普列韦和他的继任者一样，都对人民的“动乱”束手无策，但他对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和农村阴谋家的王国来说却是个可怕的祸害。他厌恶革命，就像一个昏聩腐朽的警方密探看到哪都像有炸弹一样；他用血红的眼睛追寻着“动乱”的身影——

[7] 即公历1月22日，流血星期日。本书如无特别说明，正文全部采用俄历（儒略历），注解全部采用公历。——中译者注

但只是徒劳无获！……于是，他就在教授、地方自治工作者（земец）、记者上为自己的无能狂怒找到了替罪羊；他假装在他们当中找到了革命的公开“煽动者”。他把自由派报刊逼到了最屈辱的境地。他将那些记者看作乌合之众（en canaille）：不仅流放他们，关押他们，而且还像对待小孩儿那样在他们面前摇手指。在他面前，那些根据维特的倡议组织的农业委员会的成员不再是“可敬的”的乡绅^[8]，而是狂暴的学生。他得到了他想要的：自由派圈子在他的面前瑟瑟发抖，向他表达无能的仇恨。许多自由派法利赛人^[9]从来都不知疲倦地抨击“左派暴力”和“右派暴力”，在7月15日发生炸弹袭击之后，竟像看到了弥赛亚^[10]那样对此表示欢迎。

普列韦吓得自由派魂飞魄散，但对“动乱”来说，谁坐在他的位置上也不差。^[11]群众运动因其必要性而忽略了“允许”与“禁止”之间的界限——这些小幅的界限变化，对群众运动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12]

二

反动的官方文宣^[13]作家如果不是竭力想把普列韦摄政时期描绘成一个歌舞升平^[14]的时期，那至少也打算描绘成普遍安定团结的日子。但事实上，这位沙皇的宠臣甚至无力建立起警察治下的平

[8] 即“地方自治工作者”。下同。——中译者注

[9] 法利赛人在圣经中是伪善者的代表，这里如果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当然，这类人到现在还不少。——Un

[10] 基督教术语，指受上帝指派，拯救世人的救世主。——中译者注

[11] 原文直译为“对‘动乱’来说，他不会比其他人更好，也不会比其他人更坏。”——中译者注

[12] 原文直译为“既然如此，这些界限窄一点或者宽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中译者注

[13] 原文直译为“官方的反动的歌功颂德者们”——中译者注

[14] 原文直译为“全民幸福”。——中译者注

静。他刚一上台，还没等他参观最高级的修道院^[15]以体现其东正教皈依者的狂热，就被哈尔科夫和波尔塔瓦省的农民运动逼着南下了。在此之后，小规模农民骚乱也从未停止过。1902年11月著名的罗斯托夫罢工和1903年7月整个南方工业地区奋勇斗争的时光，预示着无产阶级未来的全部行动。街头示威从未消失过。农业需求委员会的辩论与决议拉开了接下来农民运动的序幕。大学早在普列韦上台之前就已经成为激烈政治动荡的策源地——在他统治时期也是如此。1904年在彼得堡召开的两次大会——技术和医疗领域的大会^[16]——为民主派知识分子发挥了前哨罢工的作用。因此，社会之“春”的序幕发生在普列韦统治期间。疯狂的报复、监禁、审讯、入室搜查和流放引发了恐怖主义，却甚至连自由派圈子的动员能力都无法完全瘫痪。

普列韦统治的最后六个月恰逢日俄战争伊始。“动乱”平静了下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潜伏起来了。维也纳记者胡戈·甘茨^[17]写了一本名为《灾难之前》（*Vor der Katastrophe*）的书，其中就描绘了战争头几个月里官僚圈子和自由派上层圈子的情绪。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情绪是近乎绝望的张皇失措。“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出路何在？没人知道——无论是退休的达官显贵，还是那些出名的自由派律师，抑或是著名的自由派记者，都不知道。

“社会疲软无力。人民的革命运动是令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人民

[15] 原文直译为“拉夫拉修道院”，拉夫拉是东正教中最高级别的男修道院。——中译者注

[16] 原文直译为“技术和皮罗戈夫的大会”，其中，皮罗戈夫是俄国历史上一位医学家的名字。——中译者注

[17] 胡戈·马库斯·甘茨（Hugo Markus Ganz，1862年4月24日—1922年1月2日），德国记者。早年在《法兰克福日报》工作，后移居维也纳。1904年居住在彼得堡，撰写了《灾难之前》（*Vor der Katastrophe*）一书，描述了日俄战争前的俄国局势。后移居瑞士，在《新苏黎世报》工作。

即便真的动起来了，也不会去反对现政权，而只是对着有钱的老爷们无能狂怒。”那么，救赎的希望何在？财政上的破产和军事上的失败。雨果·汉斯在彼得堡度过了战争的头三个月，向我们指证道^[18]：在温和的自由派与许多保守派中，流行着一种共同的祈祷方式：“上帝，请让我们被打败吧！”（Gott, hilf uns damit wir geschlagen werden.）当然，这并不妨碍自由派圈子模仿官方的爱国主义口吻。在连篇累牍的讲话里，地方自治会和杜马接连宣誓效忠沙皇，毫无例外；他们还承诺，为了沙皇和俄国的荣誉与力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他们当然清楚自己用不着这么做！跟在自治会和杜马后面的是由一群可耻的教授组成的队伍。他们接二连三地对宣战发表了祝词，里面充斥着经院哲学式的华丽词藻和拜占庭式愚蠢内容的混合物。这不是疏忽或者误解。这种策略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和解！因此，他们努力让与专制主义的和解情感戏剧变得更轻松一些。他们组织起来不是为了打倒专制，而是为了服务于专制；不是为了打倒政府，而是为了诱惑政府；如果要争取它的感激和信任，就得成为它不可或缺的人。这种策略就和俄国的自由主义一样古老，并且，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一点也不长记性，一点也没赢得几分尊重！^[19]从战争一开始，自由主义反对派就竭尽所能地破坏局势。但是事件的革命逻辑是无法被停止的。^[20]旅顺舰队全灭，马卡洛夫^[21]上将玉碎，

[18] 原文直译为“他报告说”。——中译者注

[19] 原文直译为“在这么多年里它没有变得更明智，也没有变得更有尊严。”——中译者注

[20] 原文直译为：“在这么多年里它没有变得更明智，也没有变得更有尊严。”——中译者注

[21] 斯捷潘·奥西波维奇·马卡洛夫（Степан Осипович Макаров，1849年1月8日—1904年4月13日），俄国海军上将，海洋学家、极地探险家。1865年入伍。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94—1895年任地中海中队司令。1899—1904年

战火蔓延到内陆——鸭绿江，金州，大石桥，瓦房店，辽阳，沙河——所有这些不同的名字只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专制制度的屈辱失败。政府的处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政府内部中的士气低落，使得他们在国内事务中不再团结一致和坚定不移。犹豫、妥协、绥靖变得不可避免。普列韦的死为风向的改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借口。

三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亲王，前宪兵队头子，被指定建立政府的“春天”^[22]。为什么呢？让他自己来解释这项任命，是最为合适不过的了。

这位政客的政治个性在外国记者对他关于其纲领的采访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亲王殿下，”《巴黎回声报》(Echo de Paris)的记者问道，“请问您对近些日子里流行在公众中的意见，即‘俄国需要对公众负责的大臣’，是怎么看的呢？”

亲王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所有这些所谓的责任，不过是人为捏造、装潢门面罢了。”

“那么，亲王殿下，您如何看待宗教自由？”

“我坚决反对宗教迫害，但对此有所保留……”

“您是否真的会倾向于给予犹太人更多的自由？”

“幸福的结果可以通过善良的手段来实现。”

“总而言之，大臣阁下，您是否会认为自己站在进步的一方？”

他给出的回复如下：大臣打算“使他的行动与真正且广泛的

任喀琅施塔得省长兼舰队司令。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战死。

[22] 这个获得了极大知名度的名字，是《新时代报》(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的编辑苏沃林给“当局与人民和解的时代”起的。——原注

进步精神相一致，至少，是在不违背现有秩序的情况下。”这里的转达一字不差！

但是就连亲王本人也没打算郑重其事地对待自己的纲领。诚然，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委托给我们照顾的民众谋取福利”，但他对美国记者汤姆逊坦言，其实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权力有什么用。

“如果说，”大臣说道，“我已经有了什么明确的纲领，那是错的。土地问题？是的，是的。我们已经就有关问题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但到目前为止，我也只是通过报纸来了解这个问题。”

亲王安抚彼得宫城^[23]，安慰自由派，并向外国记者作出保证——这证明了他心地足够善良，但却无可奈何地暴露出了他缺乏政治家的天赋。

而这个挂着宪兵穗带的无助绅士的形象，无论是在尼古拉二世的脑子里，还是在自由派的想象中，都是被看作是命定之人，命中注定要解开那束缚我们伟大国家百余年的枷锁！

四

似乎每个人都满怀热情地接受了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反动的《公民报》（Гражданин）的编辑梅舍尔斯基^[24]亲王写道，“俄国正派人士^[25]这个巨大的家庭”迎来了欢庆的日子，因为终于

[23] 即彼得霍夫宫，设计者是彼得大帝，作为夏宫使用，有时被称为“俄罗斯的凡尔赛宫”。——中译者注

[24] 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梅舍尔斯基（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 Мещерский，1839年1月26日—1914年7月23日），俄国作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57—1872年期间服役于陆军。1872年创办极右翼杂志《公民》（Гражданин）。1873年起担任国务委员，多次鼓吹“结束”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改革措施。长期为保守派、自由派和革命派所不齿。1914年病死。——中译者注

[25] 原文即可作“上流社会”用，也可作“正派人”用，这里选用后者，英译版

有“一位理想的正派人士”被任命为大臣了。“一个独立的人是思想高尚的人^[26]”，年迈的苏沃林^[27]写道，“而我们非常需要高尚的人。”乌赫托姆斯基^[28]亲王在《彼得堡公报》上提请大家注意，新任大臣是“一位来自可以通过莫诺马赫追溯到留里克的古老王室家庭的后裔”。维也纳《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满意地指出，亲王具有以下突出品质：“人道”、“公正”、“客观并同情启蒙”。《证券交易所公报》提醒我们，亲王只有47岁，因此，他还不至于浑身浸透了官僚主义的陈规陋习。

这些诗句和散文的发表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睡着了”，而特别宪兵队的前指挥官将以一种自由派的姿态将我们从睡梦中唤醒，并为“人民与当局的和解”指明了道路。当读到这些言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20倍大气压的愚蠢气体在空气中飘荡！

只有极右派设法在这场“自由主义的狂欢节”中保存了理智。《莫斯科公报》无情地提醒亲王，说他不仅接管了普列韦的职位，

同样做了此种处理。——中译者注

[26] 原文直译为“独立是高尚的亲戚”。——中译者注

[27] 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苏沃林 (Алексей Сергеевич Суворин, 1834年9月23日—1912年8月24日, “老苏沃林”), 俄国作家、记者、剧作家、戏剧评论家。早年同契诃夫密切联系, 积极参与自由主义运动, 多次被捕。1876年收购报刊《新时代》(Новое Время), 逐渐转向君主派。1901年发起成立君主派组织“俄罗斯议会”(Рус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晚年潜心研究戏剧。1912年病逝。——中译者注

[28] 埃斯珀·埃斯佩罗维奇·乌赫托姆斯基亲王 (Князь Эспер Эсперович Ухтомский, 1861年9月7日—1921年11月26日), 旧译鄂多穆斯契 (晚清译法), 俄国外交官、诗人、翻译家、东方学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80年毕业于彼得堡历史语言学院。1886—1890年期间在俄罗斯帝国外交部工作。1890—1891年期间陪同尼古拉皇太子 (即尼古拉二世) 赴东方考察。1896—1910年任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 期间兼任满洲铁路董事会主席。1896—1917年2月期间出版《彼得堡公报》, 支持君主制, 但反对保守主义。十月革命后从事翻译工作。1920—1921年期间在俄罗斯博物馆工作。1921年病逝。——中译者注

也在接管他手上的任务。“如果说我们在地下印刷厂、各种公共组织、学校、报刊和大街上拿着炸弹的内部敌人已经开始抬起头来，准备攻击我们内部的旅顺港，这也只是因为他们利用了完全错误的理论来迷惑社会和统治集团里的某些人士。这个错误理论大概就是说，人们必须铲除俄罗斯国家最稳固的基础——它的沙皇专制，它的东正教教会和人民的民族自觉性。^[29]”

斯维亚托波尔克打算走一条中间路线：专制，但因法律而不再僵硬；官僚，但依赖公众的支持。《新时代报》（Новое Время）因为亲王的掌权而支持亲王，半官方地为自己揽来了充当政治皮条客的任务。这显然是一个有利的机会。

大臣的仁慈并未能在尼古拉的佞臣中间得到回应，于是，他就胆怯地尝试在乡绅之中寻找支持——这就是他拟议召开农村参议会（управа）代表大会的目的。《新时代报》建议乡绅从左翼施加谨慎的压力。但是社会上的兴奋和媒体的高调口吻搞得人们更加担忧大会的结果了。10月30日的《新时代报》便决定性地改变了自己的基调。“无论大会成员的大成的决定多么有趣，多么具有启发性，人们都不应忘记，由于大会的成分和其邀请方式，官方圈子很正确地只把它看作是一个私人会议——它的决定只具有学术意义，而它只承担精神上的义务。”

最后，本应为这位“进步”大臣提供支持基础的乡绅大会，却被这位大臣禁止了，最后只能在私人公寓里半合法地举行。

五

1904年11月6日至8日，100名具有名望的地方自治工作者以70票对30票的多数通过了决议，提出了公共自由、人身不可

[29] 这三点就是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教育大臣乌瓦洛夫（Сергей Семёнович Уваров）提出来的三位一体理论。——中译者注

侵犯和人民代表参与立法的要求，只不过，他们没有提到一个“神圣的”单词：宪法。

欧洲自由派报刊对这一巧妙的省略表示了敬意，他们认为自由派找到了一种方法，既能说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又能避免使用可能会令斯维亚托波尔克无法接受的字眼。

这个看法完全正确地解释乡绅宣言玩的含蓄把戏。乡绅们在制定其要求时只想到了他们必须与之达成协议的政府，而没有想到他们也许可以呼吁的人民群众。

他们规定了政治妥协交易的各种要点，却没有放入任何政治鼓动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不过是忠于自己而已。

“公众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现在该轮到政府了！”新闻界以一种混杂着挑战与顺从的语气大声疾呼。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政府接下了这份“挑战书”，并立即向自由派杂志《权利》（Право）发出了警报——因为是它发出了上面引用过的那种顺从的呼吁。报纸被禁止刊登或讨论有关乡绅大会决议的内容。切尔尼戈夫^[30]地方自治会发表的一份温和的请愿书被宣布为“无理取闹的”。当局的春天即将结束；自由主义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乡绅大会是“有教养的公众”反对情绪的出气口。诚然，大会成员并未包含所有的地方自治会代表，但它确实包含了市议会的代表和许多“权威”人士（他们的守旧思想本身就使它们的观点具有份量和意义）；诚然，这次会议没有得到官僚机构的合法化，但它确实是在官僚机构知情的情况召开的。因此，如果说那些饱受屈辱因而变得极度胆怯的知识分子，由于这场大会的决议，现在相信了他们那内心最深处的立宪愿望——那令其彻夜不眠的秘密夙愿——已经半合法了，也不足为奇。在这种情况下，饱受屈辱的自

[30] 位于今乌克兰。——中译者注

由派圈子从未感到如此精神抖擞，哪怕这只是黄粱一梦。这是因为，它的诉求根植于在**法律**^[31]的土壤。一个宴会、决议、宣言、抗议、备忘录和请愿书的季节开始了。各类团体和集会以专业需要、地方事项、周年庆典的形式开始，又都以立宪诉求的措辞结束。这些立宪诉求都出现在了今后著名的乡绅大会“十一条”决议案。民主派们急匆匆地在乡绅领袖周围建立起合唱团，以便强调决议的重要性，并增加它们对官僚机构的影响！自由派圈子当下的整个政治任务都被简化为“站在地方自治会背后给政府施加压力”。起初，这些决议看起来依靠自身就能像怀特海德设计的地雷那样，炸掉官僚机构。但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那些写下这份决议的人，以及被这些决议反对着的人，都开始习惯它们了。新闻界的喉舌被“国内信心部”抓得越来越紧，充满了无的放矢的愤怒……与此同时，反对派也开始变得四分五裂。越来越多不安、态度生硬、不耐烦的激进人士在各种宴会上站出来发言——一会是个知识分子，一会是名工人，他们严厉地揭穿乡绅，要求知识界喊出更加清晰有力的口号，制定更加明确的政策。人们试图让这些**人**冷静下来^[32]，安抚他们，奉承他们，斥责他们，堵上他们的嘴，讨好他们，欺骗他们——最后，把他们赶了出去。但是，这些不胜其烦的人继续做他们的工作，把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推向了革命道路。

当在物质上或思想上与自由主义有联系的“公众”的右翼试图证明乡绅大会宣言的温和与忠诚，并在斯维亚托波尔克亲王身上呼唤政治家的理性时，激进知识分子（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加入了11月的运动，旨在引导它脱离其可怜的路线，打算为它注入更强的战斗性，并将其与城市工人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这引起了

[31] 这里的着重号是中译者自行添加的。——中译者注

[32] 原文直译为“向这些人挥手”。——中译者注

两次街头示威：一次是 11 月 28 日，在彼得堡；一次是 12 月 5 日到 6 日，在莫斯科。这些激进的“儿女”的示威，是自由派“父亲”提出的口号的直接结果和必然结果：一旦决定了要求立宪，就必须下定决心投入斗争。但是这些“父亲”们丝毫不打算接受这种政治思想一贯性。相反，他们立刻就感怕，害怕过分的仓促和冲动破坏了那脆弱的蜘蛛网——信任。“父亲”并不支持“儿女”，他们把“儿女”五花大绑扭送给了自由派亲王的哥萨克和骑马宪兵。

但是，学生也没有得到工人方面的支持。这其实就清楚地表明了 1904 年 11 月至 12 月那些“宴会运动”造成的影响实际上是多么的有限；只有无产阶级的“贵族”成分参加了这一运动。而那些“真正的工人”——他们的出现使人们产生了敌对恐惧与好奇的混合情绪——在这些宴会上只能说有个位数或十位数。那些发生在群众自身意识中的深刻的内在过程，当然不会根据革命学生草率发表的演说行事。^[33]于是，归根结底，青年学生们只能孤军奋战。

然而，在战争导致的长期政治休战之后，在军事失利导致国内形势尖锐化之后，这些在两都^[34]发生的游行示威便具有了敏感的政治性质，被迅速地由电报向全世界报道。这些游行示威作为一种征兆，在政府的心中留下了比自由派报刊的所有明智告诫还要深刻的印象……政府振作起来，并急于展示其勇气。

[33] 而历史则向我们证明了，这种草率的演说不仅不会使群众的意识按照其期望（如果我们假设他们真的有这种期望的话）发展，还会把部分工人推得离革命的可能越来越远。——Uni

[34] 即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中译者注

六

这场立宪运动，以在科尔萨科夫^[35]的雅致寓所举行的几十名乡绅的会议为开端，以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警察局逮捕监禁了几十名学生结束。政府对这场运动作了两方面的回应：以改革为目的的“指示”（указ）和警察式的“通报”（сообщение）。1904年12月12日的这一指示，正是这场“春天信任”政策能保留下来的最好结果，它使维护帝国不可动摇的基本法律成为了推进任何改革的必要条件。总而言之，这项指示从头到尾都充斥着斯维亚托波尔克亲王在外国记者面前展现的良善的愿望和谨慎的保留。这足以为其明码标价了。指示发布的两天后，政府发布了通报，而这份通报在政治上的清晰度比起之前的指示来讲高的无可比拟。它给11月的乡绅大会定了性，将其视作后来那些“与俄国人民格格不入”的运动的主要根源，并提醒了杜马和乡绅大会：讨论11月的决议是违法行为。政府还进一步声称，其合法职责在于维护国家秩序和社会和平；为此，当局将采取一切合法手段取缔一切反政府性质的集会。如果说亲王和平改革的努力无所建树的话，但是，我们可以说，他出人意料地完成了更具一般性的任务——事实上，这也是历史让他在适当的时候担任政府首脑的原因：完成摧毁普通人的政治幻想与偏见的任务。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时代在大张旗鼓的和解号角声中开始，又在哥萨克人皮鞭的呼啸声中结束。这个时代让所有那些有多少有点政治意识的民众愈发仇恨专制主义，让这种仇恨情绪加

[35] 伊万·阿西格克里托维奇·科尔萨科夫（Иван Ассигкритович Корсаков，1850年？月？日—1912年3月24日），俄国律师。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早年即参与自由主义运动。1879年当选为莫斯科地方自治局议员。20世纪初先后参加了“解放社”和“地方自治组织—立宪主义者联盟”。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在党内是右翼。1906年当选为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1912年去世。——中译者注

深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政治利益的身影更加明晰，不满情绪更加深刻，也变得更加原则性。昨天思想觉悟并不高的人，今天却已经狂热地投入到政治分析的工作中去了。所有的邪恶与专制现象背后的本源都被迅速地归结出来了。现在谁也不怕革命口号了。正相反！口号一呼百应，变成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谚语。社会意识就如同海绵吸收水分，吸收了每一个反对或谴责专制主义的词汇。专制主义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做事了。^[36]它每迈出的笨拙的一步，都会成为它接下来的绊脚石。它的献媚只换回了嘲笑。它的恐吓激起了仇恨。诚然，斯维亚托波尔克亲王的内阁确实向新闻界做出了相当大的让步，但新闻界的利益诉求显然比最高新闻事务局的容忍程度增长得更快。所有其他领域也是如此：被恩赐的半自由刺激着人们，其程度不亚于完全的奴役。在革命的年代，妥协退让的命运大多如此；它们不能满足任何人，而只能激起更坚定明确的诉求。在报刊、集会和代表大会上，人们提出了更多的坚定明确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又反过来激怒了当局，使当局很快就失去了信任，并诉诸镇压手段。集会和大会被关闭，新闻界遭到重拳出击，示威游行被无情地驱散。最后，也许是为了帮助普通市民更清楚地理解12月12日指示的真正意义，斯维亚托波尔克亲王在12月31日发出通令（циркуляр），宣布将对之前的指示中的农民相关内容进行检讨，而检讨过程将以普列韦的方案为基础。这是政府在1904年的最后一次行动。开启1905年的事件，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划出了一条致命的边境线。它们用血线终结了“春天”，终结了政治意识的童年期。斯维亚托波尔克亲王，和他的仁慈，他的计划，他的信心还有他的通令……所有这一切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36] 原文直译为“对专制主义来说这些都不是应该被放过的。”——中译者注

第六章 一月九日

射击兵头子

尊贵的君王，
我们无法控制住人群——
他们强冲进来，大声叫嚷：
“我们想给鲍里斯行个礼，
想见一见沙皇鲍里斯。”

鲍里斯

大门开敞：
没有什么能够
阻断俄罗斯臣民和沙皇。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沙皇鲍里斯》）^[1]

—

“皇上（Государь）！我们这些工人，偕同我们的妻室儿女，以及无依无靠的老人——我们的父母，来到您这里，向您寻求正义（Правда）和保护。我们饥寒交迫，深受压迫，扛千钧之劳力，忍辱负重。我们不被承认为人，我们被当作奴隶——必须默默屈从于自己命运的奴隶。我们也忍过，但是压在我们头上的却是越来越多的贫困、不公和无知。专制与人治横行霸道，令我们窒息。我们的力气已丧失殆尽，皇上！我们的忍耐已趋于极限；对我们来说，可

[1]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83年1月10日—1945年2月23日），苏联作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908年起开始发表作品。一战期间任战地记者。支持二月革命，但反对十月革命。1919年起先后流亡土耳其和法国。1923年回国。1936—1938年任苏联作家协会代主席。1937—194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45年逝世。——中译者注

怕的时刻已经到来。与其继续忍受那本就令人不堪的折磨，不如尽早去死。”

彼得堡工人的著名请愿书（Петиция），正是从这样的庄严音符下起头的——在这庄严的音符中，无产阶级的威胁意味压倒了忠诚臣民的哀吟。它描绘了人民遭受到的所有压迫与侮辱；它列举了一切：从工厂寒冷刺骨的穿堂风，到政治上的不公。它要求大赦、公共自由、政教分离、八小时工作制、公平的工资以及还地于民。但是，它把通过普遍与平等选举召开立宪会议作为首要任务。

“看吧，皇上，”请愿书的结尾写道，“这些就是我们的主要诉求，我们把它们带到了你（Ты）^[2]面前。命令并宣誓使其得到满足——而你将使俄罗斯伟大而光荣，并让你的名字流芳百世。但是，如果你闷不做声，对我们的哀求置之不理——我们就死在这里，死在你这宫殿前的这个广场上。我们无处可去，也无事可做。留给我们的只有两条道路——要么走向自由和幸福的康庄大道，要么走向黄泉不归路。皇上，给我们指明一条路——我们就会走下去，哪怕是走向死亡。让我们为受苦的俄罗斯而从容赴死吧！我们将无怨无悔地做出这样的牺牲，因为我们心甘情愿。”

然后他们就牺牲了。

工人的请愿书不仅用政治民主的精辟口号替代了自由主义决议中的含糊措辞，而且也通过要求罢工自由和八小时工作制来使这些口号充满了阶级内容。但是，它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纸面上的文字，而在于铁的事实。请愿书只是行动的先导，而这一行动使工人群众在理想君主制的幽灵下团结起来，以便立刻使无产阶级和现实的君主制变得势不两立。

[2] 值得注意的正是这里：他们没有使用俄语中“您”（Вы）的尊称，这的确说明了托洛茨基之前提到的——在请愿书中，威胁的语气占上风。——中译者注

事件的进程对所有人来说都记忆犹新。它只持续了短短的几天，并以一种引人注目的计划性展开。1月3日，普梯洛夫工厂^[3]爆发了罢工。到1月7日时，罢工人数达到了14万。罢工的高潮发生在1月10日。13日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复工。总之，在一开始，这是一场由偶然原因引发的经济罢工。罢工蔓延开来，吸引了数万名工人参加。因此，它变成了一场政治风波（событие）。罢工是由“工厂工人协会”组织的，这一协会具有警察背景。激进派的宴会政治已穷途末路，急于星火。他们不满罢工的纯经济性质，于是就把他们的领袖加邦^[4]向前推。而这位加邦走到了政治列车的站台上，并在工人群众中发现了不满、愤怒与革命能量的无底洞，而

[3] 普梯洛夫工厂（Путиловский завод），即现基洛夫工厂（Кировский завод），成立于1801年，正如同前面的章节提到的一样，该厂并不是由私人企业家自发建立的，而是由政府统一领导的工业化的产物。其最初只是一个为俄国陆军生产炮弹的钢铁铸造厂，1812年之后工厂开始逐渐扩大业务。1824年，该厂遭遇洪水，在此后四十余年里一蹶不振；最终在1868年，俄罗斯企业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普梯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Путилов）从政府手中买下了该工厂，并将其改名为普梯洛夫工厂，开始生产铁轨、机车、炮弹、战舰大型炮塔、涡轮、其他大型金属机械。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期间，该厂的工人冲在了革命的第一线。俄国内战期间，工厂工人们组成了25个赤卫队单位参加了作战。值得注意的是，该厂在1905年革命前已经是相对来讲福利较好、培训制度完善的工厂，有自己的医院、餐厅、图书馆、公园，甚至还有自己的剧场；有自己行之有效的职业培训制度，培养了层出不穷的专业技术人员与技术工人。——中译者注

[4] 格奥尔基·阿波罗诺维奇·加邦（Георгий Аполлонович Гапон，1870年2月5日—1906年3月28日），1893年起担任神父。1902年接受祖巴托夫邀请建立合法工人组织。1904年发起成立“圣彼得堡工厂工人会议”，并发起请愿活动。1905年1月发动罢工，1月9日带领群众队伍赴冬宫请愿，遭到血腥镇压，被迫流亡瑞士。在瑞士期间支持社会革命党，并试图促成社会革命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间的合作，共同反对沙皇专制。1905年5月加入社会革命党，但不久即退党，流亡英国，转向无政府主义。1905年9月发起成立“全俄工人大会”，逐渐与社会革命党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决裂。1905年11月回国，支持《十月十七日宣言》。1906年重新试图回到安全局，但被拒绝，3月28日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中译者注

这一无底洞使得自由主义鼓舞者的小盘算无以落地。社会民主党人走到了前排。起初他们遭到了敌视，但很快就适应了他们的听众，并掌握了后者。他们的口号被群众接受，并被牢牢钉在（закрепляться）了请愿书上。

政府停摆了。原因何在？是奸诈的挑拨吗？抑或是可悲的张皇失措？两者都是。斯维亚托波尔克亲王那类官僚已经愚蠢地陷入了慌张。特雷波夫^[5]一伙急于给“春天”画上休止符，并因此有意识地希望大屠杀发生，以便让事件按照他个人的逻辑结束。电报被允许完全自由地向整个世界发送有关一月罢工所有阶段的信息。连巴黎的门房，都提前三天就已经知晓了东方的彼得堡将在1月9日星期日下午2点发生革命。而俄国政府丝毫就不打算避免血腥清场。

工人“协会”的十一个部门接连不断地开会。他们起草了请愿书，讨论了向皇宫行进的计划。加邦在一个又一个部门进进出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者变得声嘶力竭，筋疲力尽地倒下了。警察袖手旁观，压根就没出过场。

按照约定，前往皇宫的游行是和平的，没有歌声，没有横幅，也没有演讲。人们穿着他们的主日服装。在城市的某些地方，他们托着圣像，举着神幡。请愿者在各处都遇到了军队。请愿者请求放行，哭泣，试图绕过和冲破障碍物。士兵们终日开枪。死者数以百计，伤者数以千计。死伤数据是不可能被精确统计出来的，因为警

[5] 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特雷波夫（Дмит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Трепов，1855年12月2日—1906年9月2日），俄军少将。1896—1905年任莫斯科警察局长，期间执行祖巴托夫政策，渗透工人运动。1905年1—11月任彼得堡总督，期间大力镇压群众运动。1905年5—10月兼任内务部副部长。1905年10月支持《十月十七日宣言》。1906年因心脏病去世。——中译者注

察在晚上将死者秘密地运走并掩埋。[6]

在1月9日的午夜，格奥尔基·加邦写道：

“我以牧师的身份诅咒那些杀害了无辜兄弟及其妻儿的士兵和军官，诅咒一切压迫人民的人。我祝福那些帮助人民争取自由的士兵。我赦免他们对叛徒沙皇的军事誓言。这个叛徒沙皇下令屠戮无辜的人。”……

历史利用加邦的荒诞计划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而加邦接下来要做的就只剩下用自己的圣人权威来核验历史的革命结论。

在1月11日的大臣委员会会议中，当时还没有掌权的维特伯爵提议讨论1月9日发生的事件和“今后防止类似事件(Событие)再次发生”的措施。维特的提议被拒绝，因为其“不属于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没有列入本次会议的议程。”大臣委员会错过了俄国革命的开端，因为俄国革命并没有写在他们的会议议程上。



(1月9日，士兵在等待。)

[6] 相同的场景在1962年6月1日至3日的新切尔卡斯克工人运动中也可以看见：同样是经济斗争（抗议涨价和要求撤换厂长），同样是开了枪，同样是秘密掩埋尸体（而且还被埋进了别人的坟墓里以便掩盖真相），可见，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在堕落的工人国家，官僚还是官僚，军警也还是军警。当然，今日十分之九自由十分之九民主资本主义的俄罗斯联邦也毫不例外。——Uni

当然，1月9日的历史事件采取的形式是任何人都无法提前预料到的。历史如此出人意料地将一位牧师连续数日置于工人群众的头顶，而这位牧师将自己的人格、观点及其牧师地位强加给了这一事件。这些事件的形式一叶障目，掩盖了其实质内容。但一月九日的内在意义远远超出了冬宫游行的象征意义。加邦的袈裟只是道具。主角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从罢工开始，团结起来，提出政治诉求，走上街头，引发全体人民的极大的同情心，与军队发生了冲突，拉开了俄国革命的序幕。加邦并没有创造出彼得堡工人的革命力量，而只是出乎自己意料地把后者释放了出来。这是一个牧师的儿子，后来又成为了中等宗教学校的学生（Семинарист），神学院院士，监狱牧师，最后成为了工人中间的鼓动员。这位鼓动员很明显受到了警察的恩惠，突然间就发现自己站在了十万人的头上。官方身份、袈裟、还不够觉醒的群众的本能兴奋以及事件神话般的快速进展，所有这一切使加邦变成了一个“领袖”。

作为一个以冒险主义为心理基础的幻想家，从南方来的带有一点狡猾血性汉子^[7]，以及在社会问题方面不学无术的人，加邦几乎不能引导事件，也不能预见事件。事件把他抛在了身后。

自由派圈子长期一直认为，1月9日事件的所有秘密都体现在加邦的人格之中。他们把加邦和社会民主党人对立起来，就仿佛这位牧师是个知道如何控制群众这一秘密的政治领袖，而社会民主党人是一群宗派教条主义者一样。^[8]他们这么以为，是因为他们忘

[7] 加邦来自波尔塔瓦省，在今乌克兰东北部，也就是整个沙皇俄国的西南部分。
——中译者注

[8] 请读者注意，这里指的当然是1917年以前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Uni

记了——如果加邦没有遇到几千名受过社会主义学校教育^[9]的觉悟工人的话，1905年的1月9日就不会载入史册。^[10]这些觉悟工人立即就在加邦身边围成了一个铁环，使其无以挣脱。但他没有试过挣脱。他被自己的成功催眠了，任由自己被浪潮卷走。

但是假如我们在“血腥星期日”之后的某一天，就让加邦充当政治舞台上的配角，那么我们无疑是在高估了他的人格。他头顶愤怒牧师的光环，嘴里叨念牧师的诅咒，远远看去，就好像是来自圣经的人物。似乎强大的革命激情，已经在这位彼得堡中转监狱的牧师胸中被唤醒了。然后呢？当火焰熄灭的时候，加邦在所有人看来都完全是一个政治和道德上的无名小卒。他在欧洲的社会主义者面前的装腔作势，在国外写的既粗糙又幼稚的可怜的“革命”文章，以及回到俄国后与政府保持的阴谋关系，维特伯爵用于收买的银子，与保守派报社成员自命不凡的荒唐谈话，喋喋不休与热爱吹牛的性格，以及最后招致其结局的可悲背叛……所有这一切终于摧毁了人们对1月9日之加邦的任何幻想。我们不禁想起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11]的远见之言——他在收到宣布加邦离开俄国的第一封电报时说道：“很可惜……如果他像出现时那样神秘地从现场消失，那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字会更光彩。一个美丽的浪漫传说会留下来，讲述这位打开俄国革命闸门的神父……对有些人来说，”阿德勒带有他特有的微妙讽刺语气补充道：“烈士的角色会比党的同志的角色更适合他们……”

[9] 这里泛指工人运动的洗礼。——Uni

[10] 原文直译为“1月9日就不会发生”——中译者注

[11] 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年6月24日—1918年11月11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一战中公开支持奥匈帝国参战。1918年任临时政府中的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俄国现时还不存在革命的人民这种事物。”彼得·司徒卢威^[12]在自己的国外机关报《解放》（Освобождение）中写到。他是在1905年1月7日写下它的，而两天后恰恰就是禁卫团镇压彼得堡工人示威。

“俄国不存在革命的人民这种事物”俄国自由派借一个社会主义的叛徒之嘴说出了这句话。自由派成功地在三个月的宴会期里说服了自己，使他们相信自己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这一声明还没来得及传回俄国，电报线就把俄国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

我们一直在等着它，从未怀疑过它。多年来，对我们来说，这一切只是我们的“学说”推导出来的结论，而这一学说曾受到遍布在整个政治光谱上的各种无名小卒嘲笑。他们不相信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相反，他们相信乡绅请愿书的力量，相信维特，相信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相信炸药罐……就没有一种政治上的偏见是他们不相信的东西；而我们对无产阶级的信念则是他们认为唯一属于偏见的东西。

不只是司徒卢威，而且还有他最近加入的那个“有教养的圈子”也被吓了一跳。他们惊恐而无力地瞪大眼睛，透过窗户亲眼观看这场历史大剧。知识分子对这场事件的干预实在是可怜而又微不足道

[12] 彼得·伯恩哈多维奇·司徒卢威（Пё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Струве，1870年1月26日—1944年2月22日），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19世纪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脱党，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彻底决裂，加入资产阶级自由派。1903—1905年成为该派组织“解放社”的理论家和组织者。1905年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是该党右翼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先后参加邓尼金和弗兰格尔的反动政府，后来移居国外。在巴黎去世。——中译者注

道。一个由几位文学家和教授组成的代表团拜访了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亲王和维特伯爵，“希望”如自由派报刊解释的那样，“以一种能够避免使用武力的方式来阐明问题。”局势排山倒海^[13]，而这一小撮民主派认为，只要到两个大臣的前厅参观一下，就足以避免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斯维亚托波尔克拒绝接待代表团，维特无奈地打了个手势。然后，警察仿佛得到了莎士比亚的许可，在最伟大的悲剧中引入了闹剧的元素——他们宣布这个可悲的代表团为“临时政府”，并把他们送进彼得保罗要塞关起来。然而，一月的时日，在知识分子那模糊无定形如薄雾一般的政治意识中，划出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知识分子暂时把以下两种事物归入了档案：我国传统的自由主义，以及他们对政府人物的成功交替抱持的信念。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愚昧统治对这种自由主义来说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的时代。12月12日的改革指示就是它最成熟的果实。但是1月9日扫走了“春天”，取而代之的是军事独裁，并赋予了特雷波夫以无限的权力——自由派反对派才刚刚从莫斯科警察局长的位置上把这位被遗忘的将军撤下来。同时，在自由派圈子里，民主派和合法反对派之间日益泾渭分明。工人的行动巩固了激进分子在知识分子中的地位，正如早前的乡绅大会为机会主义分子提供了一张王牌一样。政治自由的问题，在反对派左翼的意识中第一次拥有了具体的形式，比如斗争问题，力量的优势，还有人民群众的强大冲击力。革命的无产阶级对他们来说，在昨天还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虚构”，今天就已经被看作为一个强大的现实。

“现在——在一月血腥的时日过去以后，”有影响的自由派周刊《权利》写道，“是不是对俄国城市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进行

[13] 原文直译为“一座山在向另一座山移动”。——中译者注

怀疑的时刻？很显然，这个问题，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时刻，已经得到解决了——不是由我们解决的，而是由那些工人解决的。他们在那值得纪念的一月的日子里，在那些血腥的事件中，把自己的姓名写在了俄国社会运动的神圣书籍上。”在司徒卢威的文章和上述几句话之间只隔了一个星期——然而，在它们之间，却隔着一个完整的历史时代。

四

1月9日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之政治意识的转折点。

在革命开始之前的几年里，令资本非常不满的是，俄国已经产生了一个完整的由政府煽动运动的学派（即所谓的祖巴托夫学派^[14]）。它的目的是激起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的经济冲突，从而转移他们与国家的冲突^[15]。但现在，在流血星期日发生以后，工业生活的正常进程已经完全中断了。生产只是在动乱时刻的间隙里，在零星的时间里完成。军事供货的巨额油水并没有流向处于危机状态的工业，而是流向了一小撮享有特权的强盗—垄断者那里去了，于是，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调和资本与日益累进的内部无政府状态

[14] 即“Зубатовщина”。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祖巴托夫（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Зубатов，1864年6月7日—1917年3月15日）是一名警官，1896年至1902年任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莫斯科局局长，1902年至1903年任俄罗斯内务部警察厅官员。任内，他出面在莫斯科、明斯克等地建立在警察监护下的社会主义组织，如1901年5月在莫斯科首先建立了“机械工人互助协会”。它们在工人中宣称沙皇自愿满足工人的经济要求，甚至鼓动和策划工人举行拥护沙皇的示威游行；当工人发动罢工时，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组织就要厂主向工人让步，答应工人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等经济要求；它们还向工人极力介绍和宣扬改良主义思潮，以此钝化工人的革命斗志。这种做法被称作“警察社会主义”。1903年，革命工人纷纷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祖巴托夫的警察社会主义组织被迫解散，警察社会主义宣告破产。1917年俄国革命时自杀。——中译者注

[15] 这里的黑体是中译者加的。——Uni

了。一个又一个工业部门转入了反对派方面。股票交易所协会，工业代表大会，所谓的“招商局”^[16]——也就是伪装起来的辛迪加组织^[17]——以及其他的资本组织，昨天在政治上还是新手，现在却发泄着对专制警察国家的不信任情绪，并开始说起自由主义的语言了。城市商人向我们表明了，在反对派的事业中，他们不会屈服于“开明的”地主。杜马不仅加入了地方自治会的行列，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把自己放在了他们的前面；而作为商人组织的莫斯科杜马也在此时进入了前排。

各资本部门之间为争夺财政部的恩惠和赏金而进行的斗争，在普遍要求恢复公共和国家秩序的情况下暂时消退了。在原先的优惠与补贴这种简单观念占据的位置上，或者与这些观念并列，开始出现了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还有扩大内需^[18]这样更为复杂的观念。在这些思想起主导作用的同时，在各种企业家组织的所有的请愿书、备忘录和决议中，都出现了对安抚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强烈关切。资本对警察镇压的灵丹妙药表示失望——它就像一根鞭子，一头抽打着工人的活体，而另一头捶打着实业家的口袋；于是它得出了一个庄严的结论：资本主义剥削的和平进程需要一个自由的制度。“吾儿，亦有汝焉？”（И ты, Брут）^[19]——反动的报刊如此

[16] 原文直译为“协商局”，这里采用意译。——中译者注

[17] 辛迪加（法语：Syndicat）是指由多个实体自我建立的组织形态，属于低级垄断形式，虽然不会垄断整个市场，但会造成局部垄断与规模经济。它是通过少数处于同一行业的企业间相互签订协议而产生的。所有这些加入了辛迪加的企业，都由辛迪加总部统一处理销售与采购事宜。它是一种自我组织的团体，由个人、公司或实体组成，以处理某些特定的业务、追求或促进共同的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成立集团的目的是扩大利润。这个单词在法语中，同时也是工人组成的工会的意思，但在此处不属于此例。——中译者注

[18] 原文直译为单纯的“发展生产力和扩大国内市场”。——中译者注

[19] 这是一句拉丁语名言，“Et tu, Brute?”被后世普遍认为是凯撒临死前对刺杀自

嚎叫起来，因为他们看到莫斯科那些旧礼仪派教徒——商人们（купцы-старообрядцы）——这个古老传统的保卫者——竟举起手支持立宪的“纲领”。但是，这样的嚎叫还没有使纺织业的布鲁图停下脚步。他不得不勾画出自己的政治抛物线，以便在年底无产阶级运动到达顶点的时候，再回去寻求那神圣、唯一而又不可分割的警鞭的保护。

五

但是，一月大屠杀最深刻、最重要的影响，是它对全俄国无产阶级的影响。巨大的罢工浪潮横跨欧亚^[20]，席卷了全国，使整个国家的躯体都为之震颤。据粗略计算，罢工波及 122 个城镇和地方，顿涅茨克盆地的几个矿井和 10 条铁路。无产阶级群众的热情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了。罢工吸引了近百万人参与。没有任何计划，有时甚至都没有提出任何诉求，时停时起，只服从于团结的本能——罢工正是如此统治了这个国家将近两个月。

在 1905 年 2 月罢工风暴的高潮时，我们写道：“1 月 9 日以后，革命已不知停止。它已经不再满足于唤起一批又一批人投身于地下秘密工作；它现在正在公开并紧急地在自己的战斗连、团、营和师中进行点名。它的军队的主力是无产阶级，而这就导致革命把罢工作为它进行这种点名的手段。”

“一行接着一行，一个工厂接着另一个工厂，一座城接着另一座城，人们把工作丢到一旁。铁路人员充当了罢工的雷管，而铁路线是罢工‘疫情’的传播媒介。^[21]被提出来的经济诉求几乎一下

己的养子布鲁图说的最后一句话。它被广泛运用于表达最亲近之人背叛的场景。——中译者注

[20] 原文直译为“从这头到那头”。——中译者注

[21] 翻译到这里，我想起一位友人曾经和我的谈话：“在资产阶级眼中，我们与新

子就全部或部分得到了满足。但是，无论是罢工的开始，还是其结束，都并不完全取决于诉求的性质和它们得到满足的形式。罢工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经济斗争被建立在成型的要求之上；正相反，诉求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必须有罢工。工人必须向自己，向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最后向全部人民展现出自己积累的力量，自己的阶级反应能力，自己的战斗准备情况。以上这些全部都要接受革命的总检阅。罢工者自己和支持他们的人、同情他们的人、害怕他们的人和憎恨他们的人都意识到或者朦胧地感觉到，这一场罢工风暴，从一个地方席卷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又飞起来，向前猛冲去。它不仅仅是为自己出现，而是革命的意志把它派到了这片土地上。在罢工的行动区，即整个国家的上空，笼罩着某种可怕、凶恶并充满果敢的东西。”

“1月9日以后，革命已不知停止。革命不顾军事秘密，公开地、喧闹地嘲弄单调的日子^[22]并驱散它对我们的催眠，将我们引向了革命的最高潮。”

冠病毒无异，我们也乐意它像病毒那样传播。”在此祝愿未来的工人运动能有比新冠病毒更高的传播系数。——Uni

[22] 原文直译为“墨守成规的生活”。接下来我会经常把“时日”（дни）和“生活”（жизнь）的贬义形式翻译成“日子”，并偶尔把“秩序”和“治安”（порядок）分开翻译，以区别原词汇在政治语境上的不同之处——中译者注

第七章 十月罢工

——所以你认为革命正在路上？

——在路上！

（1905年5月5日的《新时代报》）

——这不是来了嘛！

（1905年10月14日的《新时代报》）

一

完全自由的人民集会在大学的围墙内举行着，特雷波夫匪徒却在大街上横行霸道。这，就是在1905年革命政治发展期中，那秋天的几个月份里，最令人吃惊的悖论之一。某位年老无知的格拉佐夫^[1]将军，不知道为什么竟发现自己担任了教育大臣的职务，他创造了一——令他自己也很吃惊的一——这些言论自由的避难所。自由派教授抗议说：大学是科学的地盘，在学术中没有街头的位置。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2]亲王死的时候嘴里还在念叨着这一真理。但几个星期以来，大学的大门仍然大开着。“人民”挤满了走廊，教室和大厅。工人们直接从工厂走进大学。当局惊慌失措。只要工人还在家里或者大街上逗留，当局就可以压制、逮捕、踩踏并射杀

[1] 弗拉基米尔·加夫里洛维奇·格拉佐夫（Владимир Гаврилович Глазов，1848年9月12日—1920年？月？日），早年进入俄军服役。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91—1893年任第一救生团团长。1893—1895年任莫斯科救生团团长。1895—1899年任近卫军参谋长。1899—1901年任芬兰军区参谋长。1904—1905年任公共教育大臣。1909—1918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退役。——中译者注

[2]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鲁别茨科伊（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рубецкой，1862年8月4日—1905年10月12日），俄国宗教哲学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8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888年起在莫斯科大学任教。1900—1905年期间出版《哲学与心理学问题》杂志。1902年起担任国务委员。1904年起鼓吹政治改革。1905年6月带领一个自由派代表团拜见尼古拉二世，同年10月12日病逝。——中译者注

他们。但是只要工人一越过大学的门槛，他们就立刻变得不可侵犯了。因此，当局得到了一个客观的教训：宪政法律比起专制法律优势何在。

9月30日，第一次自由的人民集会在圣彼得堡大学和基辅大学举行。官方电报社对聚集在弗拉基米尔大学礼堂的听众感到惊恐。报告中提到，除了学生以外，人群中还饱含大量的“男女无关人员、中学生、来自城镇私立学校的青少年、工人、各式各样的地痞流氓和衣衫褴褛者”。

革命的话语已不再潜伏于地下，而是走进并挤满了大学的大厅、教师、走廊和庭院。群众贪婪地吸收着这些朴素而又美丽的革命口号。在官僚机构中的蠢货和反动报刊中的骗子们看来，这群无组织、随随便便的人群，就像“各式各样的地痞流氓”一样，但他们却表现出了甚至连资产阶级记者都感到惊奇的道德纪律和政治敏感性。

一位专栏作家在《罗斯》（Русь）中写道：“你知道在大学里的集会最让我吃惊的是什么呢？是非凡的、模范的秩序。大厅里刚宣布中场休息，我就到走廊上散步去了。大学的走廊颇像一整条街。走廊边上的讲堂里都坐满了人，里面正在开独立的部会。走廊本身就挤满了人，人群在来回走动。其他人则坐在窗台、长椅或柜子上面。他们抽烟。他们低声交谈。人们可能以为自己是在参加一个招待会，只不过这场招待会比一般常见的那种要更严肃一些。然而，这就是人民——真正的人民，他们的手因辛勤的体力劳动变得粗糙，他们具备那种在封闭、不健康的场所中过日子的人特有的肤色。他们都有雪亮的眼睛，深深地镶嵌在自己的眼眶里……对于这些不高、瘦弱、营养不良的人来说，对于这些从工厂或厂房、从冶炼钢铁或者铸造铁器，高温和烟雾令人窒息的车间来到这里的人

来说，大学就像一座庙宇，高大、宽敞、白得耀眼。在这里被提出来的每一句话中，都有着祈祷的声音……他们刚被唤醒的求知欲像海绵一样吸收着任何一种（？）理论。”

不，这群受到启发的人并没有吸收一切理论。那些声称在极端政党和群众之间不存在任何政治团结的反动青年曾试图向这一人群大放厥词，但他们不敢。他们紧紧地坐在自己的反动地洞里，等待着一个喘息的机会，以便对过去进行诽谤性的攻击。但是也不只有他们，甚至连自由主义政治家和演说家也没能向这个一望无际、变化无常的听众发表意见。在这里，是革命的演说家在叱咤风云。在这里，是社会民主党人化作不可分割、至关重要的政治纽带，把人民的原子团结起来。在这里，他们把群众伟大的社会激情翻译成了革命口号的完美语言。离开大学的那群人，已经不再是当初进入大学的那群人了……这样的集会每天都在举行。工人们的情绪越发高涨，但党没有发出任何号召。群众的行动预计会在相当晚的时候开始——恰逢一月九日的纪念日，和本该在1月10日就召开的国家杜马正式召开之日。铁路工人工会威胁要拒绝让布雷金的杜马代表进入彼得堡。但是，事态的发展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迅速。

二

9月19日，莫斯科西廷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举行了罢工。他们提出了缩短工作日、提高每1000字母的计件费，且计件费内不能包括标点符号的要求。这个小事件引发了全俄罗斯的政治罢工——罢工的原因是标点符号，终点是打倒专制主义。

警察局在自己的通示中控告说，西廷的罢工被一个当局钦定的非法协会——“莫斯科印刷和石印工人联盟”利用了。到24日晚，罢工已经蔓延到50家印刷厂。25日，在一场市行政长官（Градоначальник）允许的会议上，索赔方案被制定了出来。这个

方案被市行政长官解释为“印刷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独断专行”，并且，这位警察暴君以“工人的个人‘独立性’受到了无产阶级的主动性的蛊惑”为名，试图用他那笨拙的拳头来镇压印刷工人的罢工。

但是，因标点符号而引起的这场罢工，已经成功蔓延到其他产业了。莫斯科的面包师罢工了，而且罢工得非常顽强，以至于顿河哥萨克第一团的两个连，不得不以其舍己忘身的勇敢以及其特有的充满荣誉的武器，来猛攻菲利波夫的面包店。10月1日，一封电报从莫斯科方面发出，说工厂和车间里的罢工已经开始平息。但是，他们只不过是喘口气罢了。

10月2日，彼得堡的印刷业排字工人决定通过三天的罢工来表示其与莫斯科同志的团结。从莫斯科来的电报里提到，莫斯科的工厂“继续罢工”。街头事件没有发生：大雨是法律和秩序最可靠的盟友。

将在十月斗争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铁路部门发出了第一个警告。9月30日，政治风波开始在莫斯科—库尔斯克以及莫斯科—喀山两条铁路的机修厂里发酵。这两条铁路已经准备好在10月1日开始运动。他们被铁路工会挡下来了。工会根据2月、4月以及7月各条线路罢工的经验，准备在国家杜马召开的同时举行一次全铁路总罢工；目前它反对零散的行动。但是，这场风波依旧没有停止。在之前的9月20日，在彼得堡就召开了官方的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以讨论养老基金的问题。这次会议自发地扩大了它的职权范围，并且在整个铁路界的掌声下，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职业—政治代表大会。各方对大会的问候纷至沓来。风波加剧了。立即举行全铁路总罢工的想法在莫斯科地区得到支持。

10月3日，我们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电话信息，大意是讲工

厂和车间的罢工正在逐渐减少。在车间罢工了的莫斯科—布列斯特铁路上，明显可以看到支持复工的运动。

罢工还没有下定决心。它还在思索和犹豫。

来自印刷、机修、细木、烟草等行业的工人代表组成的会议通过了成立莫斯科全体工人总委员会（苏维埃，СОБЕТ）的决定。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似乎一切都在走向平静。里加的罢工结束了。10月4日和5日，莫斯科有许多印刷厂复工了。报纸出现了。就在一天后，萨拉托夫版也在终端一周后出现了：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即将到来的事件。

10月5日，在彼得堡的大学里的集会上，一项决议通过了一一要求在指定日期前停止“因同情”而开始的罢工。从10月6日开始，彼得堡的排字工人在为期三天的罢工声援后，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同一天，彼得堡市行政长官已经宣布了关于什利谢利大街的秩序完全恢复以及被莫斯科的新闻打断的全面复工的消息。7日，涅瓦造船厂的一半工人复工了。除了奥布霍夫厂宣布政治罢工持续到10月10日以外，涅夫斯基门外的所有工厂都在运转。

平常的日子似乎要回来了——日常生活当然回来了，只不过是革命的日常生活。看起来，好像是罢工做了几次无组织的尝试，放弃了它们，然后离开了……但这只是“看起来”。

三

事实上，罢工马力十足，准备就绪。它的目的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自己的工作——以便立即接管铁路。

受各条线路，特别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线路上普遍存在的紧张情绪的影响，铁路工人工会中央办公室决定宣布总罢工。他们在这样做决定的时候，只想到了试探性地动员各地的战斗力量；战斗本身还是计划到1月份开始。

决定性的一天在 10 月 7 日。“心脏的痉挛已经开始了，”《新时代报》如此写道，“莫斯科的铁路正在一个接着一个地死去。莫斯科俨然化作孤岛。^[3]焦急的电报在电报线上飞奔，一个追赶另一个——下新城（Нижний）^[4]，阿尔扎马斯（Арзамас）^[5]，卡希拉（Кашира）^[6]，梁赞（Рязань）^[7]，韦尼奥夫（Венев）^[8]，都在抱怨铁路停摆。”

10 月 7 日，莫斯科—喀山铁路进入罢工状态。下新城的罗莫丹诺夫支线罢工。第二天，罢工蔓延到莫斯科—雅罗斯拉夫（Ярославль）线、莫斯科—下城^[9]线和莫斯科—库尔斯克线。但其他枢纽地带没有立即作出回应。

10 月 8 日，彼得堡铁路枢纽的职工会议通过了决定，积极着手组织全俄铁路工会（这是在 4 月的莫斯科代表大会上被首次提出来的），以便随后向政府提交最后通牒，并通过整个铁路网的罢工来支持自己的要求。然而在这里，罢工也被无限期地推迟到了将来。

莫斯科—基辅—沃罗涅日以及莫斯科—布列斯特等线路于 10 月 9 日罢工。罢工控制住了局势，并感到自己已经稳稳扎根，推翻了一切对它有敌意的、抑制的、拖沓的决定。

10 月 9 日，在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彼得堡紧急会议上，制定了铁路罢工的口号，并立即用电报将它们传达到各条线路。它们

[3] 原文直译为：“莫斯科被与全国隔离了。”——中译者注

[4] 即下诺夫哥罗德，距莫斯科约 410 公里，在东边。——中译者注

[5] 在今下诺夫哥罗德州，距莫斯科约 400 公里。——中译者注

[6] 在今莫斯科州，莫斯科以南约 110 公里。——中译者注

[7] 在今梁赞州，莫斯科东南方向约 190 公里。——中译者注

[8] 在今图拉州，莫斯科以南约 160 公里。——中译者注

[9] 即下诺夫哥罗德（下新城）在俄语中的另一种拼法（Нижегородский）。——中译者注

是：八小时工作日、公民自由、大赦和立宪会议。

罢工开始信心满满地接管这个国家。它不再犹豫和彷徨。罢工参与者的自信心与他们的人数同步增长。革命的阶级要求比职业的经济要求更早地提出。罢工无视了地方和行业的界限，开始感到自己是一场革命——因此也获得了空前的胆量。

罢工沿着铁轨向前冲去，威严地封锁了经过的所有地方。它通过铁路电报的电线宣布了自己的到来。“罢工吧！”——罢工对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命令道。10月9日，报纸向全俄罗斯通报了一则公告，提到喀山铁路上的一位叫别德诺夫的电工被捕。他们还希望通过没收一摞传单来阻止罢工。一群蠢货！工潮仍然向前进发……

它遵循着一个雄伟的计划——停止整个国家的工业和商业生活——，它没有忽略任何一个细节。在电报机拒绝为它服务的地方，它用武力斩断了电线，或推倒了电线杆。它使发电站陷入了停顿，而如果这样做太难的话——它就破坏电缆并使火车站陷入黑暗。在遇到顽强抵抗阻碍其计划的地方，它毫不犹豫地破坏线路，毁坏信号，推翻机车，在线路上设置障碍或将铁路车厢放置在桥梁上。它渗透到起降机上，并阻止绞车工作。无论它在哪里看到了货运列车，都会使其停止运行，而客运列车通常会开到最近的枢纽站或其目的地。

罢工只会为了自己的目的，才允许自己打破雷打不动的誓言。它需要革命的新闻公报时，就会让印刷厂开工；它需要发出罢工指令时，就会启用电报；当车上有罢工者的代表时，它就会放行列车。

一切都不能幸免：它关闭了工厂，药房，杂货店，法院。

它的注意力会时不时地疲惫，警惕性也时常松懈，有时在这里，有时在那里。有时，零散的列车会冲过罢工的障碍，——然后，罢工就会出发去追赶列车。这零散的列车就像逃亡的罪犯，在黑暗和

列夫·托洛茨基《1905》第一部分

空旷的车站里奔跑，接不到任何电报通知，与恐惧和未知相伴前行。但是，最终，工潮最终会追赶上列车，停下机车，赶走司机并放掉蒸汽。

它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它呼吁，说服，恳求；它跪下来乞求——这是一位女演说家在莫斯科的库尔斯克火车站做的事情；它威胁，恐吓，投掷石块，最后，它还扣下了勃朗宁枪的扳机。它不惜一切代价想达成自己的目的。它压上了太多赌注：父亲的血，儿女的面包，还有自己力量的名誉。整个阶级都服从它；而当这个阶级中被敌对力量腐蚀的一小部分人，挡在它的路上时，罢工粗暴地把障碍物踢到一边——这难道很奇怪吗？



(1905年10月)

四

这个国家的运动神经正在逐渐死亡。经济肌体越来越麻木。斯

摩棱斯克，基尔萨诺夫，图拉，卢科亚诺夫无助地抱怨铁路的完全罢工。笨拙的铁路营无能为力，因为所有的线路和站点都在反对他们。10日，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几乎所有线路都闲置了，包括远至特维尔的尼古拉耶夫铁路^[10]——莫斯科就此彻底迷失在无边无际的平原中心。以莫斯科为枢纽的最后一条铁路——萨维奥洛沃铁路在16日开始了罢工。

10日晚，罢工的铁路员工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开会，决心继续罢工，直到其所有要求被满足。

铁路罢工从中心出发，跨过高山，越过平原，迈向边境。梁赞—乌拉尔线在8日罢工，波列斯基铁路的布良斯克线和斯摩棱斯克—丹科夫线在9日罢工；库尔斯克—哈尔科夫—塞瓦斯托波尔铁路和叶卡捷琳娜铁路（Екатерининская ж.д.）^[11]以及以哈尔科夫为中心的所有铁路则在10日罢工。各地的食品价格开始迅速上涨。到了11日，莫斯科已经开始抱怨牛奶短缺。

当天，铁路罢工进一步蔓延。萨马拉—兹拉托乌斯特^[12]铁路交通开始停顿。然后是奥廖尔枢纽。西南铁路最大的车站——哈尔科夫—尼古拉耶夫—克列缅丘格铁路的卡扎京、博祖利和敖德萨也开始了罢工。全天只有三辆列车到达了萨拉托夫，而这三辆列车里除了罢工者选出的代表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乘客。电报报道说，这些代表的列车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铁路罢工无情地蔓延，一条线接着一条线，一列接着一列都被卷入进这场罢工。10月11日，库尔斯省^[13]总督发布了一项紧急法令，规定停止铁路上的工作可以判处三个月的监禁。对这一挑战的

[10] 即莫斯科—圣彼得堡铁路。——中译者注

[11] 这是一条横穿南乌克兰和俄罗斯欧洲部分东南地区的铁路。——中译者注

[12] 位于今车里雅宾斯克州。——中译者注

[13] 在今拉脱维亚西部。——中译者注

回复马上就出现了。到了12日，莫斯科到克雷兹堡^[14]之间已经没有列车运行，这条铁路线处于罢工状态，文达瓦^[15]没有列车到达。15日的时候，文达瓦的起重机和商业铁路机构也停止了运作。

10月11日至12日夜间，维斯瓦河畔地区^[16]所有支线的交通都已经停止了。早上，前往彼得堡的列车并没有从华沙开出。就在同一天，也就是12日，罢工包围了彼得堡。革命的本能促使罢工采取了正确的策略：首先唤起各省工人的情绪，然后利用成千上万封惊恐的电报淹没彼得堡，从而制造“心理时刻”，恐吓中央政府，然后才亲临现场，以便打出最后一击。12日上午，以彼得堡为枢纽的所有铁路完全一致地停工。只有一条芬兰线在还在运行，等待整个芬兰的革命动员——这条线路只持续运行了4天，即在16号就停止了。10月13日，十月罢工蔓延到了列威利^[17]、利巴瓦^[18]、里加和布列斯特。彼尔姆站停止了工作。塔什干铁路的一部分停止运行。14日，布列斯特枢纽，外高加索铁路和中亚铁路的阿什哈巴德和新布哈拉站先后开始了罢工。同日，工潮开始席卷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赤塔和伊尔库斯克开始，由东向西移动，于17日到达车里雅宾斯克和库尔干。巴库站于15日罢工，敖德萨于17日罢工。

这种运动神经的麻痹伴随着感觉神经的麻痹——11日，哈尔科夫的电报信息中断，13日车里雅宾斯克和伊尔库斯克中断，14日莫斯科中断，15日则是彼得堡中断。

由于铁路罢工，邮政系统被迫拒绝所有城市的通信收件。

[14] 今拉脱维亚克鲁斯特皮尔斯自治市。——中译者注

[15] 今拉脱维亚文茨皮尔斯市。——中译者注

[16] 在今波兰。——中译者注

[17] 今爱沙尼亚塔林。——中译者注

[18] 今拉脱维亚利耶帕亚。——中译者注

在莫斯科的老公路上，人们一度看到了马拉的三套车。

不仅全俄罗斯和波兰的所有铁路，还有弗拉季高加索、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亚铁路都处于停顿状态。整个铁路大军——75 万人，都在罢工。

五

面包、商品、肉类、蔬菜、鱼类等交易所开始发出忧虑的公报。食品价格，特别是肉类价格迅速上涨。金融交易所在颤抖——革命一直是其死敌。他们一旦面对面，交易所就失魂落魄。它冲向电报机，可电报机保持着敌意的沉默。邮局也同样拒绝服务。交易所敲开了国家银行的大门，却被告知，银行不能保证在固定的日期内完成转账。铁路和工业的股票就像一群受惊的鸟儿一样离开了栖息地，飞走了——只不过不是向上飞，而是向下飞。在证券交易所投机的阴暗王国里充斥着惊慌失措和咬牙切齿。货币流通受阻，各省的付款停止流入两京。以现金方式结算的企业停止了付款。拒付期票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发票人，保证人，付款人和收款人烦躁，辗转反侧并要求违反为他们的用途而制定的法律（Закон），因为*她*（*она*）——罢工和革命——违反了经济运转的所有如同法律一般的准则（Закон）。

但是罢工并不将自己限于铁路。她要变成总罢工。

在放掉了机车里的蒸汽，熄灭了车站里的灯光后，她和铁路工人的人群一起进城，占领了有轨电车；让马车的马停下来并让乘客们不得不下马；关闭商店、餐厅、咖啡馆和酒馆，并自信地靠近工厂的大门。里面已经有人在等待她了。警报哨声响起，工作停止，街上的人潮立马增加。她继续向前走，并已经举起了红色的旗帜。旗帜上面写道，说她想要立宪会议和共和国，她要为社会主义而战。她路过了一家反动派报纸的编辑部，满怀仇恨地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受污染的意识形态之源。如果有一块石头碰巧在手，她就会把它扔到窗户上。自由派报刊自以为是在“为人民服务”，派代表接近她，发誓为这可怕的时日带来“和解”并恳求她的宽恕。她丝毫不理睬这些请求。排字字盘被关上，排字工人冲上街来。办公室和银行关门了……罢工统治了一切。

10月10日，莫斯科、哈尔科夫和列威利开始举行政治总罢工。11号——斯摩棱斯克、科兹洛沃、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罗兹^[19]。12号——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萨马拉、萨拉托夫和波尔塔瓦。13号——彼得堡、奥尔沙^[20]、明斯克、克列缅丘格和辛菲罗波尔^[21]。14号——戈梅利^[18]、卡利什^[17]、顿河河畔罗斯托夫、第比利斯^[22]和伊尔库斯克。15号——维尔纽斯^[23]、敖德萨和巴统^[24]。16号——奥伦堡。17号——尤里耶夫、维捷布斯克^[18]和托木斯克。里加、利巴瓦、华沙、普沃茨克^[17]、比亚韦斯托克^[17]、考纳斯^[25]、陶格夫匹尔斯^[26]、普斯科夫、波尔塔瓦^[27]、尼古拉耶夫、马里乌波尔^[25]、喀山、琴斯托霍瓦^[17]和兹拉托乌斯特等地都发生了罢工。各处的工业都崩溃了，许多地方的商业生活也完全停顿了。教育机关被关闭了。知识分子的“工会”也加入了无产阶级罢工的行列。在许多地方，陪审团拒绝开庭，律师拒绝辩护，医生拒绝看病。调解法官关闭了它们的暗箱。

[19] 在今波兰。——中译者注

[20] 在今白俄罗斯。——中译者注

[21] 在今克里米亚共和国。——中译者注

[22] 今格鲁吉亚首都。——中译者注

[23] 今立陶宛首都。——中译者注

[24] 在今格鲁吉亚。——中译者注

[25] 在今立陶宛。——中译者注

[26] 在今拉脱维亚。——中译者注

[27] 在今乌克兰。——中译者注

六

罢工组织了巨大的集会。群众的紧张情绪和当局的失望情绪同时增长，相互交织。街道和广场上到处都是骑兵和徒步巡逻队。哥萨克人挑拨罢工以求反击：他们向人群冲锋，抽打着鞭子，用马刀劈砍，从角落毫无预警地开枪。

然后，罢工在任何其可以表明的地方表明了一点：它绝不仅仅进行观望的停工，绝不仅仅进行在胸前画十字祈祷的消极抗议。它保卫自己，并在这种保卫之中转入进攻。

在南方的一些城镇里，罢工竖起了街垒，夺取了武器店以武装自己，并进行了抵抗——如果抵抗不是胜利的，那也至少是英勇的。

10月10日，在哈尔科夫的一次集会后，人群夺取了武器店。11日，工人和学生在大学附近设置了街垒。电报杆被拆掉，横铺在街道上；在上面堆着的，有铁门，百叶窗，格栅，包装箱，木板，原木；所有这些东西都被用电报线捆起来了。有些街垒被建在了石基上；从人行道上挖出来的重石板被堆在了原木上。到下午一点，10个街垒就按照这种简洁而又优雅的建筑风格建好了。大学的窗户和过道也被设置好了障碍物。“在大学所在的区域”，被宣布处于戒严状态……该地区的权力被托付给某位无疑是英勇的毛(Май)中将。但是，总督选择了讲和。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充当调停人的情况下，体面的投降条件被制定了出来。一支民兵(милиция)被组织了起来，并受到了公民的热烈欢迎。民兵恢复了治安(Порядок)。但是，彼得堡要求武力粉碎这种治安。民兵几乎是刚一成功出现就被驱散了，城市又变成了骑马或步行的流氓的天下。

10月11日，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在哥萨克人背信弃义地向和平人群开枪以后，街道上第一次出现了街垒。它们一共有六个。

最大的那个被矗立在布良斯克广场上。马车，铁轨，电线杆，以及几十种小物件——正如维克多·雨果说的，革命能找到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向旧秩序的头颅投掷——都被用来建造街垒。街垒的骨架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土，两边挖了沟，沟前竖起了铁丝网。从早上开始，每个街垒都驻有几百人。军队的第一次攻击没能奏效；直到下午3点30分，士兵才夺取了第一个街垒。在他们进攻的过程中，有人从屋顶上接连投下两枚炸弹；士兵中也有死伤。傍晚时分，部队夺取了所有街垒。12日，镇上再现死寂。军队在擦拭自己的步枪，而革命在安葬自己的牺牲者。

10月16日是敖德萨设置街垒的日子。从早上开始，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街和黎塞留街，有轨电车被掀翻，商店的招牌被取下，树木被砍伐，街边的长椅被集中到一堆。四个由有刺铁丝网组成的街垒和整条街一样宽，拱卫着它。这些街垒在战斗后被士兵们清走，并在清洁工的帮助下撕裂。

罢工者和士兵之间的街头冲突，以及设置街垒的尝试在许多其他城镇都有发生。但总的来说，10月的时日仍然是一次政治罢工，是一场革命的演习，是一次对所有战斗力量的同时检阅，但无论如何，都还不算是一次武装起义。

七

然而，专制主义却让步了。笼罩着全国的可怕紧张局势，从各省传来的压倒性数量的惊慌失措的报告，未来局势的完全不明朗——所有这些都当局的行列中造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慌。他们对军队没有完全的、无条件的信任：集会上出现了士兵；在集会上发言的军官声称，三分之一的军队“和人民站在一起”。此外，铁路罢工在军事镇压面前摆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最后，还有欧洲的证券交易所。它明白它在面对的是一场革命，并宣布它不打

算再容忍这样的事态。它要求建立秩序和宪法保障。

专制主义处于彻底的混乱，开始作出让步。一份宣言被发表了（10月17日）。维特伯爵当上了首相，而且——如果他能否认的话，就让他否认吧——这要感谢革命罢工的胜利，或者更确切的说：要感谢这个胜利的**不彻底性**。从10月17日夜里开始到18日，人们打着红色的旗帜在大街上游行，要求大赦，在一月大屠杀的发生地高唱《永恒的记忆》^[28]，并在波别多诺斯采夫^[29]和其《新时代报》办公室的窗户前高喊“天杀的（анафема）”……18日上午，宪制时代的第一批血型清场事件开始了。

敌人没有被扼杀。他们只是在出人意料的力量面前一时撤退了。十月罢工表明，革命现在能够使整个俄罗斯的城市化地带同时站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当权反动派在对十月的力量考验作出反应时，他们一方面发表了10月17日的宣言，另一方面又动员其的所有战斗部队参加其黑色恐怖的事业，这表现出他们对这一事实的正确认识。^[30]

[28] 《Вечная память》，一首东正教圣歌。——中译者注

[29] 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波别多诺斯采夫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1827年11月30日—1907年10月23日），俄国保守派政治家、作家、律师、翻译家、历史学家。1860—1865年任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民法教授。1861—1865年期间为亚历山大二世的长子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教授民法。1865年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死后，又为亚历山大三世教授法学。60年代协助亚历山大二世进行司法改革。1865—1868年任司法部咨询委员。1868—1907年任参议员。1872—1907年任国务院委员。1880—1905年任圣公会首席检察官。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担任其首席顾问，并于1881年4月29日起草了《帝国宣言》，期间推行教区教育改革，并为尼古拉二世教授法学。1905年因反对发表《十月十七日宣言》而被解职。1907年死于彼得堡。

[30] 原文直译为“当权反动派评估了这些力量”。——中译者注

八

十年前^[31]，普列汉诺夫在伦敦社会主义大会上说，俄国革命运动将作为工人运动取得胜利，否则就根本不会取得胜利。

1905年1月7日，司徒卢威写道：“俄国不存在革命的人民这种事物。”

10月17日，专制政府为革命的第一次严肃胜利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而这个胜利是由无产阶级取得的。那时的普列汉诺夫是对的：革命运动作为工人运动取得了胜利。

诚然，十月革命的发生，不仅有资产阶级的物质帮助，而且还有自由职业者罢工的支持。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形势。工程师、律师、医生的罢工不可能有任何独立的意义。它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增加了劳动者总罢工的政治意义。因此，它强调了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不容置辩的无限领导权（гегемония）。自由职业者在1月9日以后采取了彼得堡工人提出的基本民主口号，在10月份甚至也采用了无产阶级特有的斗争方法：罢工。知识分子中最革命的那一翼，早已把罢工式的斗争从工厂带到了大学——伴随着整个自由派教授集体的庄严抗议。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进一步发展，使罢工蔓延到了法院、药房、地方自治管理局和城市杜马。

十月的罢工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表现，同时也是农业国中城镇领导权的表现。

被民粹运动神化的土地旧势力，已经让位给**资本主义城镇的专制（деспотия）**了。

城镇左右着局势。它吞噬巨大的财富，它用铁轨把村庄连接在一起——它沿着这些铁轨把所有生活领域中最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力量矿藏都吃进了自己的肚子里；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31] 原文是在1905年写成的。——原注

它都控制着整个国家。反动派徒劳地计算着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并自我安慰说“俄国仍然完全是一个农业国家”。现代城镇的政治作用不能够用居民的数量来衡量，更不能用其经济作用来衡量。面对罢工的城镇，农村的沉默下反动派的退缩就是城镇专政(диктатура)的最好证明。

十月的时日表明，革命的领导权属于城镇，而在城镇里则属于无产阶级。但同时也公开暴露了**自觉革命的城镇与自发兴奋的农村在政治上的隔绝性(отрезанность)**。

十月的时日在实践中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军队站在谁的一边？他们表明，俄罗斯之自由的命运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革命的十月时日导致了反动派的十月狂欢。黑恶势力利用了革命的低潮时机并发动了血腥的攻击。这次攻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罢工—革命放下了手中的锤子，**却还没有拿起剑**。十月的时日用一个可怕的力量向革命表明：革命需要武装。

把农村组织起来，把它和自己绑定；与军队建立密切的联系；武装自己——这些都是十月斗争和十月胜利教给无产阶级伟大而又简单的结论。^[32]

革命正是建立在这些结论的基础之上的。

* * *

在我们写于自由主义“春天”时期的纲要《到1月9日以前》中，我们试图描绘出革命关系未来发展的路线。我们尽力强调了^[33]群众的政治罢工是俄国革命的必然方法。某些诚挚的政治家(应该补充说，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指责我们试图为革命开

[32] 而且，谨记了这一结论的俄国无产阶级成功地在那个十月里取得了政权。——Uni

[33] 原文直译为“以最大的能量提出”。——中译者注

好处方。这些批评者向我们解释说，罢工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特有的方法，是不能在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起到我们“强加给它”的作用的。事件的发展已经违背了许多深邃的思想家列好的死板公式，早已使我们没有任何必要答复这些可敬的批评家^[34]了。与1月9日爆发的悲剧共享同一基础的彼得堡总罢工，是在我们的纲要还没付印的时候发生的：显然，我们的“处方”是从革命的实际发展中简单地剽窃写成的。

1905年2月，在彼得堡“流血星期日”直接挑起的混乱、不相配合的罢工此起彼伏时，我们写道：

“1月9日以后，革命已不知停止。它已经不再满足于唤起一批又一批人投身于地下秘密工作；它现在正在公开并紧急地在自己的战斗连、团、营和师中进行点名。它的军队的主力是**无产阶级**，而这就导致革命把**罢工**作为它进行这种点名的手段。”

“一行接着一行，一个工厂接着另一个工厂，一座城接着另一座城，人们把工作丢到一旁。铁路人员充当了罢工的雷管，而铁路线是罢工‘疫情’的传播媒介。被提出来的经济诉求几乎一下子就全部或部分得到了满足。但是，无论是罢工的开始，还是其结束，都并不完全取决于诉求的性质和它们得到满足的形式。罢工的发生并不是因为经济斗争被建立在成型的要求之上；正相反，诉求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必须有罢工。工人必须向自己，向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最后向全部人民展现出自己积累的力量，自己的阶级反应能力，自己的战斗准备情况。以上这些全部都要接受革命的总检阅。罢工者自己和支持他们的人、同情他们的人、害怕他们的人和憎恨他们的人都意识到或者朦胧地感觉到，这一场罢工风暴，从一个地方席卷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又飞起来，向前猛冲去。它不仅仅

[34] 这里指的是文人—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唐恩以及其他一些人。——原注

是为自己出现，而是革命的意志把它派到了这片土地上。”

我们并没有搞错。十月大罢工正是根植于九个月的罢工运动准备好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

对于本质上幼稚的自由派来说，十月罢工就像一月九日那样出人意料。这些事件并没有在他们预设的历史路线图上出现过；它们像楔子一样切入其中，而自由主义思想则后知后觉地接受了这些事件。不仅如此。如果说到十月罢工前，自由派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乡绅上，从而轻视了总罢工的想法，那么可以说到10月17日之后，同样的自由派，以其左翼为代表，把希望寄托在罢工的胜利事实上，从而拒绝了其他所有形式的革命斗争。

“这次和平的罢工，”普罗科波维奇^[35]先生在《权利》上写道，“所涉及的受害者人数比一月运动要少得多，最终使政变（переворот）发生了，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国体（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的革命。”

“历史，”他继续说，“在剥夺无产阶级其中一个争取人民权利的手段——即街头起义和街垒的同时，也给了它一个更为有用的手段，即政治总罢工。^[36]”

上述引文表明了，在“激进主义”的普罗科波维奇们还在寄厚望于乡绅反对派的时候，我们给作为俄国革命的必然方法——群

[35]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普罗科波维奇（Сергѣ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Прокопѳович，1871年？月？日—1955年4月4日），俄国经济学家。早年参加民粹派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世纪90年代末转向经济派。1904年加入解放社。1905年发起成立立宪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08年起在大学任教。一战期间任莫斯科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贸易和工业部长、食品部长。十月革命后被捕，获释后发起成立救国和革命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不久再次被捕，但很快获释。1918年加入俄罗斯复兴同盟。1921年再次被捕。1922年被驱逐出境，相继流亡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1955年在日内瓦病逝。——中译者注

[36] 摘自《权利》1905年第41期。——原注

众性政治罢工赋予了怎样巨大的意义。但是我们绝不就此认为，总罢工取消或者替代了原先的革命方法。它只是修改和补充了这些方法。同样，无论我们如何高度评价十月罢工的意义，我们也完全不能承认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国体”。恰恰相反，所有后来的政治发展都只能用国家体制**停滞不前**来解释。不仅如此，罢工也**不可能**实现政变（переворот）。作为一场政治罢工，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即把死敌们面对面放在了一起。

铁路和电报的罢工无可争议地把极端的无组织状态引入了政府机关。而且，这种无组织状态存在得越久，罢工也就持续得越久。但是，长期的罢工会瓦解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并必然削弱工人自身的力量。归根结底，罢工不可能不告一段落。但是，只要第一台机车又开始冒出蒸汽，第一台莫尔斯电报机又开始咔咔作响，被保持住的权力就能把所有断掉的杠杆都换掉，一般说来，还能对国家机器老旧不再适用的部件进行更新。

在斗争中，削弱敌人是极其重要的；这就是罢工完成的工作。同时，罢工还能同时使革命的军队站立起来。但是，这两者本身都不能制造政变（переворот）。

权力还是要从旧的持有人手中夺过来，并转交给革命。这是一项根本任务。总罢工只是为它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但完全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本身。

旧的国家政权依靠其物质力量，尤其是军队。军队阻碍了真正的，而非纸面上的“政变”。在革命的某一时刻，关键的问题就变成了：士兵是站在他们的同情心一方，还是刺刀？这不是一个可以借助调查表来回答的问题。关于现代城镇的街道宽度和笔直程度，又或者是最新型武器样品的特点等等——调查表可以在这些方面提出许多有用的、适当的意见。但是，这些技术上的考虑都不能取

代关于革命接管国家政权的问题。必须克服军队的落后保守。革命，是通过把人民群众与军队对立起来，来克服这种问题的。总罢工为这种对立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一种严酷的方法，但历史别无抉择。

第八章 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产生

1905年的10月、11月和12月是革命的最高潮。它以莫斯科排字工人的小规模罢工开始，以政府血洗了俄罗斯沙皇的古老首都结束。但除了闭幕的时刻，即莫斯科起义以外，莫斯科在这一时期的事件中并没有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圣彼得堡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不能与巴黎在18世纪革命中的作用相提并论。法国一方面在经济上具有原始性（特别是通讯手段的原始性），而在另一方面，法国在行政上是中央集权的——这使得法国革命能够在巴黎城墙以内进行。这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多少大型产业中心，就创造了多少独立的革命策源地。这些产业中心是独立的，但也是互相紧密联系的。尽管国家具有中央集权的特点，而铁路和电报使得革命分散化了，但是它们又使革命的所有分散行动统一起来。如果从这一个结果来看我们就说彼得堡的声音具有最主要的意义，那么这并不意味着革命集中在涅瓦大街又或者是冬宫外，而只是在说它的斗争口号和斗争方法在全国范围内都得到了有力的革命的回应。彼得堡采用的组织类型，以及彼得堡报刊的口吻，立即成为各省的典范。地方各省的事件，除了舰队与要塞的起义以外，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意义。

因此，如果我们有权利把涅瓦河畔的首府看作是1905年底所有事件的中心的话，那么，就可以将工人代表苏维埃视为彼得堡本身的重点。这不仅是因为苏维埃直到今天为止都是人们见过最伟大的工人组织；这不仅是因为彼得堡苏维埃给莫斯科、敖德萨和其他一些城市树立了榜样；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纯粹以阶级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就其本身而言，是革命的组织。苏维埃是一切事件的轴心，事件的每一条线索都交汇于它，每一次行动的号召

都来自于它。

那么，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什么？

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出现，是对事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客观需求的回应——需求呼唤这样一种组织：既具权威，而又无传统，一下就能卷进多达几十万人的分散群众，而又几乎没有任何组织的依靠；团结无产阶级内部的革命潮流，能够主动和自动地控制自己；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在 24 小时内从石头里蹦出来。在地下把几百名彼得堡工人结实地焊接在一起，并在思想上与几千名彼得堡工人相连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善于向群众传递自己的口号；但是，它却无力和几十万人群建立起活生生的**组织上的联系**——它一直都在群众眼光之外的秘密实验室里从事主要工作，仅仅这一点就让它如此无力了。社会革命党人的组织也有同样的地下工作者职业病，并且病情还因为其软弱无力和不稳定性而不断加重。社会民主党中两个同样强大的派别之间的倾轧，以及这两个派别与社会革命党的斗争，使得另外建立一个**非党的组织**变得绝对必要。^[1]这样的组织为了能在诞生的第一天就在群众的心目中树立权威，就必须以最广泛的代表性为基础。如何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不言而喻。由于生产过程是联结无产阶级群众的唯一纽带，而这一无产阶级群众在组织上还相当缺乏经验，因此，只能使选派代表的制度

[1] 译者手上的原书（俄罗斯国家出版历史图书馆）在“在地下把几百名……变得绝对必要”的部分上打下了疑似删除的标记，请各位读者予以注意。就译者本人看来，与主张错误理论的派别作斗争，是绝对必要的。真正的问题在于，与错误理论作斗争的人是否就真的也没有犯错？历史以一种相当鸡贼的方式向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1917 年，列宁颠覆了布尔什维克的秩序，托洛茨基也就颠覆了自己的派系调和主张。——Uni

与工厂和车间联系在一起。^[2]施德洛夫斯基^[3]参议员的委员会就提供了一个组织上先例。

10月10日，在最大规模的罢工临近的时刻，彼得堡的两个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其中一个抓住了主动权，建立革命工人自治。13日晚，后来的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在技术学院的建筑里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不超过三四十人。会议决定立即号召首都无产阶级举行政治总罢工并选举代表。“工人阶级，”在第一次会议上起草的呼吁书上写道，“将诉诸世界工人运动最后的、最强大的武器——总罢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俄国将发生决定性的事件。这些事件将决定工人阶级今后许多年的命运，我们必须在我们共同的苏维埃的团结下，做好充分准备应对这些事件。”

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得到一致通过的——而且，况且，这里并没有对总罢工及其方法、目的和可能性开展任何原则性的辩论。尽管不久之后，正是这些问题在我们的德国党的行列中引起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这一事实没有必要用民族心理的差异来解释；相反，这意味着我们俄罗斯人总是病态地倾向于在战术问题上自作聪明并作细节上的预测。原因就在于这一时代的革命性质。苏

[2] 每 500 名工人派（посылать）出一个代表。小型工业企业为组成选举小组而汇合在一起。那些年轻的工会也可以获得（委派）代表权。但是，也有必要指出，数字标准并未被严格遵循——有的时候 100—200 名工人就能派出一个代表，有时甚至更少。——原注

[中译者补注 1] 为了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选举”进行区别，这里特地根据原文用词重新斟酌了中文翻译。英译本此处直接使用了选（elect）。

[3] 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施德洛夫斯基

（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Шидловский，1843 年 11 月 26 日—1907 年 3 月 14 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65 年进入俄罗斯帝国国务院工作。1879 年历任助理国务卿和代理国务委员。1885 年起任枢密院议员。1892 年起任参议员。1895—1907 年任国务院国务秘书，在任期间于 1905 年领导了“希德洛夫斯基委员会”。1907 年去世。

维埃从诞生那刻起，直到它灭亡的那一刻，一直处在革命自发力的强大压力下，而这一自发力以毫不客气的方式超越了政治意识的工作。

工人代表的每一步都是事先注定的，而他的战术则是显而易见的。斗争的方法不必讨论——几乎没有时间来制定这些方法……十月罢工满怀信心地接近了自己的顶峰。金属工人和印刷工人冲锋在首。他们是第一批参加战斗的人，并在10月13日的时候明确无误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口号。

* * *

“我们宣布举行政治罢工，”革命的堡垒奥布霍夫厂如此表示道，“并将为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权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而战斗到最后一刻，以便在俄国引进（Введение）民主共和国。”

发电站的工人喊出了同样的口号：“我们与社会民主党人一道，将为自己的诉求战斗到最后一刻，并在全体工人阶级面前展示我们拿起武器为人民解放作斗争的战斗准备。”

印刷工人在10月14日向苏维埃派出自己的代表时，更加坚决地制定了当下的任务：

“我们认识到了仅仅作消极斗争和怠工是不够的，因此我们通过决议：把罢工工人阶级的军队转变为革命的军队，也就是说，立即组织工人战斗队。让这些工人战斗队负责武装剩余的工人群众，最好是通过突袭枪店，并尽可能地没收警察与军队的武器。”这项决议并不曾流于空话。印刷工人的工人战斗队异常成功地夺取了城市最大的印刷厂，以便印刷《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й Совета Рабочих Депутатов）并在组织邮政—电报罢工方面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0月15日，大多数纺织厂仍在工作。为了吸引非罢工工人参与罢工，苏维埃制定了一整套方案——从口头呼吁到强行胁迫。但是，极端的方法并没有派上用场。在传单召唤没有效果的地方，只要有一群罢工者出现在现场——有时只需要几个人——工人就会立马停止工作。

“当我经过佩克利耶（Пеклие）工厂时，”一位代表向苏维埃作报告：“我看到它还在运转。我打了个电话，表明了自己是工人苏维埃的代表。‘你想干什么？’工厂经理说道。我说：‘我以苏维埃的名义要求你们的工厂立即关闭。’‘好的，我们将在下午三点停工。’”

到10月16日，所有的纺织厂都开始了罢工。除了市中心以外，贸易都停止了。在工人区，所有的店铺都关闭了。苏维埃通过扩大罢工，巩固并提升了自己的地位。每一座进行罢工的工厂都选出了一名代表，并为他准备了证明文件（грамота），以便将他派去苏维埃。参加第二次会议的已经有来自40个大工厂的代表，2个车间和3个职业工会——印刷工人工会、店员工会和办事员工会。在这次于技术学院的物理教室举行的会议上，这几句话的作者第一次参加了会议。

这是在10月14日——一面是罢工，另一面是政府的分裂——坚定地走向危机时刻。那天是特雷波夫下达著名命令的日子：“不放空炮，不留子弹。”而在第二天，也就是10月15日，这同一个特雷波夫认识到，“人民对会议的需要已经成熟了”，便禁止了高等教育机构围墙内的集会，并承诺拨出三座市政建筑供会议使用。我们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里这样写道：“这24小时以来的变化真大啊：我们昨天还不够成熟而只能吃子弹，今天就已经成熟到可以开人民会议了。双手沾满鲜血的恶棍是对的：在这些

伟大斗争的日子里，人民正日渐成熟。”

尽管有禁令，但在 14 日晚，高等教育机构还是人满为患。到处都是集会。我们对当局的答复是这样的：“我们，聚集起来，宣布特雷波夫将军为我们彼得堡革命人民准备的圈套对我们来说太窄了。我们声明，我们将继续在大学、工厂、街道以及其他所有我们认为必要的地方进行集会。”在技术学院的礼堂，我们讨论了要求市杜马武装工人民兵的必要性，并从那里进入了物理教室。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前一天成立的代表苏维埃。有 100 名工人代表和革命政党成员坐在阶梯室的长凳上。主席和秘书们被安排在演讲台后坐下。会议与其说是一个议会（парламент），不如说像是一个军事委员会（военный совет）。连篇的废话（这是代表机构的症结）丝毫不见踪影。讨论的问题——扩大罢工和向杜马提交要求——都具有纯粹实际的性质，而且讨论进行得认真求实、简短有力并充满活力。人们感到分秒必争。主席坚决制止了哪怕是只言片语的夸夸其谈，并得到了整个会议的严肃赞同。一个特别代表团奉命向城市杜马提出以下要求：

- 1.立即采取措施，规范数千数万名工人群众的粮食供应；
- 2.拨出房舍以供会议使用。
- 3.应该立即停止向警察、宪兵等机关提供粮食、房舍和资金。
- 4.发放资金武装为自由而战的彼得堡无产阶级。

鉴于杜马是由官僚和房东们组成的，表达这种激进的要求纯粹是一种煽动性的步骤。不言而喻，苏维埃在这一方面不抱有任何幻想。它既没有期望，也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结果。

10 月 16 日，在经历了一系列事故、逮捕的尝试等危险以后（请允许我们提醒一下，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立宪宣言发表之前），彼得堡市杜马以“个人会面”的形式受到了接见。在开始讨论以前，

在议员不遗余力的支持下，杜马决定，倘若工人代表遭到逮捕，就会将市长派到市行政长官那里去，以声明：议员将会把代表的逮捕看作是对杜马的侮辱。在这之后，代表们才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代表团的发言人拉丁同志（已故的克努尼扬茨^[4]）是这样总结他的讲话的：“俄国正在进行的政变是一场资产阶级政变，有产阶级也有利益在里面。先生们，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应该推动这场革命尽快完成。如果你们有任何的远见卓识，如果你们广泛地了解了最有利于自己的阶级的事物，那么就应该全力以赴帮助人民，以让他们最迅速地战胜专制主义。我们不需要从你们这里得到同情的决议，也不需要你们对我们的要求给予柏拉图式的支持。我们要求你们用一系列实际行动来表达你们的合作。”

“‘多亏’我们畸形的选举制度，一个拥有 150 万人口的城市财产被掌握在几千名有产者手中。工人代表苏维埃有权要求——它有权要求，而非请求，因为它代表着这个首都城市的几十万工人、居民，而你们只代表少数选民。——工人代表苏维埃要求把这个城市的财产供它的全体居民使用，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既然如今最重要的社会任务是与专制主义做斗争，而我们为了完成这场斗争需要会议场所，那么，就向我们开放我们的市政大楼吧！”

“我们需要资金以继续罢工——因此，为罢工拨出市政资金，而不是用于支持警察和宪兵！”

[4] 博格丹·米尔扎赞诺维奇·克努尼扬茨（Богдан Мирзаджанович Кнунянц，1878年11月26日—1911年5月14日），1897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1年被流放到巴库，随即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和高加索委员会委员，并参与创立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组织。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4年在莫斯科被捕。1905年获释，并担任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委员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被捕并被判处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7年越狱，流亡国外。后回国，在巴库开展地下活动。1910年再次被捕。1911年在狱中病逝。——中译者注

“我们需要武器以获得并保卫自由——因此，为组织无产阶级民兵拨出资金！”

代表团在一部分议员的保护下离开了会议厅。杜马拒绝了苏维埃的所有主要诉求，并表示了对警察的信任——对警察作为秩序之守护天使（охранительница порядка）的信任。

* * *

随着十月罢工的发展，苏维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全民关注的政治焦点。它的重要性不是每日，而是每小时地增长。工业无产阶级是首先团结在它周围的第一批人。铁路工会出来与其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从10月14日开始与罢工汇合的工会联盟，几乎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不得不置于苏维埃的保护关系（Протекторат）下。众多的罢工委员会——工程师、律师以及政府官员的罢工委员会根据苏维埃的决定来调整自己的行动。通过把零散的组织划归到自己控制下，苏维埃把革命团结到了自己周围。

政府队伍的分裂也在同一时间不断加剧。

特雷波夫横冲直撞，扣下了扳机。10月12日，他逼宫尼古拉，让他把自己安排在全彼得堡卫戍部队头子的位置上。14日，他就已经下达了不留子弹的命令。他把首都分为四个军区，每个军区都由一个将军做头子。他以总督的身份威胁所有食品商：倘若关闭商店，就以24小时内驱逐出城伺候。16日，他拔除了所有位于高等教育机构的“城池”，并让部队占领了它们。在没有正式宣布戒严的情况下，他实际上实施了戒严。骑在马背上的巡逻队在街上制造恐怖。部队无处不在——在政府机构，在公共建筑，在私人住宅的院子里。在连帝国芭蕾舞团的艺术家都参加了罢工的时候，特雷波夫则坚持在空荡荡的剧院内塞满了士兵。他笑咪咪地摩拳擦掌，期待着一场畅快淋漓的战斗。



（十月的时日——被关闭的大学。）

但是他的小算盘打错了。反对他的官僚派系赢得了胜利。他们希望与历史做一个狡猾的交易。维特正是为此目的而被召来的。

10月17日，特雷波夫的手下驱散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会议。但是苏维埃又找到了开会的办法，并决定以加倍的精力继续罢工，建议工人在复工以前不交房租，也不支付购买货物赊的账，并号召房东和店主不要向工人催账。10月17日这一天，《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一期发行。

也就是在同一天，沙皇签署了立宪宣言。

第九章 十月十八日

10月18日令人摸不着头脑。彼得堡的大街上人群摩肩接踵，乱糟糟地走来走去。人们被赋予了宪法。接下来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在那动荡的几天里，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借宿，这个朋友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1]。18日早晨，他手上拿着《政府公报》来找我。他充满智慧气息的脸上露出了真诚快乐的笑容，与他那习惯性的怀疑主义格格不入。

“宪法宣言出来了！”

“这不可能！”

“请读一下来听听。”

我们开始朗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面对“动乱”时慈父式的悲哀，然后是对“人民的悲哀就是我们的悲哀”的担保言论，最后，以对一切自由、杜马立法权和扩大选举法的坚决承诺而结束。

我们默默地交换了眼神。用言语是很难表达宣言引起的矛盾思想和情感的。集会自由，人身不受侵犯，对行政机关进行监管……当然，这些只是说说而已。但这不是自由派决议中的文字，而是沙皇宣言中的文字。尼古拉·罗曼诺夫，大屠杀制造者捷列马克·特雷波夫的“尊贵”庇护人——竟就是这些文字的作者！而这一奇迹是由总罢工创造出来的。十一年前，当自由派呈交一份卑微

[1] 亚·亚·李肯斯，康斯坦丁诺夫炮兵学院的一名高级医生。——原注

[中译者补注1]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李肯斯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иткенс, 1863年3月26日—1941年7月5日)，苏联治疗师、双语学家。1905年起在康斯坦丁诺夫斯基炮兵学校担任医生，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伏罗希洛夫的私人医生。1922年起在红场开办私人诊所。1929年开办医院便于理疗。1938年被授予红星勋章。1940—1941年任国防人民委员会医院副院长。1941年在莫斯科逝世。

的请愿书，希望在专制君主与人民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时，加冕的容克像对待小孩子一样扯起他们的耳朵，对这种“无意义的梦想”嗤之以鼻。这就是他的原话！而现在他垂手而立，站在罢工的无产阶级面前。

“你怎么看？”我询问了我朋友的意见。

“他们害怕了，蠢货们！”这是我得到的回答。

那是在我们自己的同类之中一句经典的短语。我们接着读了维特的上奏文，上面印着沙皇的按语：“原则上准了。”

“您说得对，”我说道，“蠢货们的确害怕了。”

五分钟后，我出了趟门。我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个学生，气喘吁吁，手里拿着帽子。他是党的一个同志^[2]，认出了我。

“昨晚部队在技术学院开火了……说是有人从里面向他们扔了炸弹……显然是个挑衅……就在刚才，一支巡逻队用军刀驱散了在泛巴尔干大街举行的小型会议。发言人塔尔列^[3]教授被军刀砍成重伤，人们说他已经死了……”

“这样啊，一个不坏的开始。”

“人群到处游荡，在等着发言者呢。我正在去参加党的鼓动者

[2] A.A.李肯斯，上述医生的小儿子，青年布尔什维克，在受到大惊吓的不久之后就去世了。——原注

[3] 叶夫根尼·维克多罗维奇·塔尔列（Евгений Викторович Тарле，1874年11月8日—1955年1月5日），苏联历史学家、教育家。1900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一度支持合法马克思主义者。1903年进入彼得堡大学任教。1905年革命期间曾被宪兵殴打致重伤。1909—1910年期间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工作。二月革命后进入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工作，参与调查沙皇政权罪行。1918年以后相继在彼得格勒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任教。1927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年因被指控为“工业党”成员而被捕，并开除出苏联科学院。1931年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1937年平反，并恢复苏联科学院院士身份。卫国战争时期前往喀山国立大学任教。1955年在莫斯科逝世。

会议的路上。您怎么看，我们应该谈些什么？大赦在现在是主要话题吗？”

“即使没有我们，也会有人关于大赦说上两句的。请您要求军队从彼得堡撤出。方圆 25 俄里内不能有一个士兵。”

这位学生继续跑，在空中挥舞着帽子。一支骑兵巡逻队从街上经过。特雷波夫还在马鞍上。学院的枪击事件是他对这份宣言的评论。这个好伙计不失时机地摧毁了人们可能会产生的任何立宪幻想。

我经过了技术学院，那里的门仍然是锁着的，由士兵看守着。特雷波夫“不留子弹”的旧承诺仍然挂在墙上。有人在旁边贴上了沙皇的宣言。一小群人挤在人行道上。

“到大学去！那里会有演讲。”有人如此说道。

我就和他们一起去了，在沉默中快速行走。人群每分每秒都在增加。没有喜悦之情，而是不确定感和不安感……倒是没有看到更多的巡逻队。孤立的警士胆怯地避开人群。街上挂着三色旗。

“啊哈，恶棍夹着尾巴逃走了……”人群中的一个工人大声说道。

这句话引起了同感的笑声。人们的情绪明显高涨了。一个男孩从大门上抢过一面三色旗和旗杆，撕下白蓝条纹，将“国旗”的红色部分高高举起。数十人以他为榜样。几分钟后，人群已经成为了红旗的海洋。白色和蓝色的条布碎片到处都是，人群用脚踏踏着它们……我们穿过了一座桥，来到了瓦西里岛。码头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斗，无数的群众不耐烦地涌入其中。每个人都试图挤到演讲者要发言的阳台上。大学的窗户和尖顶上到处点缀着红色的旗帜。我好不容易才挤进了建筑物里。我的发言顺序排到了不记得是第三名还是第四名。我站到阳台上，眼前浮现了非常特别的景象。街

道上人山人海。学生们的蓝帽和红旗点缀了十几万人群。现场一片寂静，每个人都想聆听这场演说。

“公民们！在我们向统治匪帮的胸口上打了一记重拳后，我们获得了自由的承诺。我们获得了选举权和立法权的承诺。这是谁承诺的？是尼古拉二世。出于良心发现？还是抱着一颗洁白无暇的心？我们都没法替他下结论。他的统治是从祝贺其辉煌的法纳哥里团的士兵谋杀了雅罗斯拉夫工人开始的——踩着一具又一具尸体，他来到了1月9日那个血腥的星期日。我们正是迫使了这位在王座上不知疲倦的刽子手给我们以自由的承诺。多么伟大的胜利啊！但是不要急着庆祝胜利，因为胜利还没有完成。难道支付的承诺和真金白银是一回事吗？难道自由的承诺和自由本身是一回事吗？如果你们当中有谁相信沙皇的承诺，就请大声说出来——我们很乐意见到这位奇人。看看周围，公民们：难道今天和昨天相比有了什么变化吗？难道监狱的大门已经打开了吗？难道彼得保罗要塞已经不再主宰这个城市了？难道你们没听见从它那可恶的墙后面传来的埋怨声与痛骂声吗？难道我们的兄弟们已经从偏远的西伯利亚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大赦！大赦！大赦！”下面的人群喊道。

“……如果政府是真诚地决定与人民和解，那么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应该是大赦。但是，公民们，难道，只有大赦——就没了？今天他们可以放走几百名政治斗士，第二天他们就能把另外上千名抓起来。难道在关于自由的宣言边上，贴着的不是‘不惜子弹’的命令吗？难道昨天晚上他们没有在技术学院开枪吗？难道今天早上他们没有对和平聆听演讲的人使用了刺刀？难道刽子手特雷波夫已经不是彼得堡的主人了吗？”

“打倒特雷波夫！”传来了回应的喊声。

“……打倒特雷波夫！但难道只有他一个吗？难道官僚机构的后备军里就没有人可以把他们换下来了吗？特雷波夫倚仗着军队的，骑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沾满 1 月 9 日鲜血的禁卫军是他的靠山和力量。他下令对你们不留活口，不留子弹^[4]。我们不能，不想也不应该生活在枪口之下。公民们！我们要求：军队滚出彼得堡！在首都 25 俄里的范围内不应该留下任何一个士兵。自由的公民将自己来维持治安（порядок）。人民将把每个人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打倒（Долой）军队，把他们赶出彼得堡！”

“……公民们！我们的力量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必须手持利剑，为自己的自由站岗。至于沙皇的宣言——请看看吧，不过就是一张废纸罢了。你们看，它在我的手里变成了一团废纸。今天他们能把它发布出去，明天他们就会把它拿走，把它撕成碎片，就像我现在在你们面前撕毁了这张‘纸面的自由’一样！……”

还有其他两三个发言者发言了。他们最后都呼吁下午 4 点在涅瓦大街集合，并从那里向监狱游行，要求大赦。

[4] 原文直译为“他命令不要留下一颗用于射向你们胸膛和头颅的子弹”。——中译者注

第十章 维特内阁

10月17日，几个世纪以来，血债累累、万恶不赦的沙皇政府向工人群众的罢工抗议投降了。任何复辟的努力都无法从历史上抹去这一事实。沙皇专制主义的神圣皇冠上永远印着无产者靴子的印记。

在内外战争中，沙皇投降的预兆是维特伯爵。维特，在世袭贵族组成的上层官僚的包围下作为一个平头百姓（Плебей-parvenu）平步青云，像他的同僚们一样，不受任何一般思想、政治和道德原则的影响。维特比他们还更有优势——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平头百姓，他不受宫廷、贵族或马背传统的约束。这一事实帮助他发展成为了“理想类型”的官僚，不仅不受民族、宗教、良心和荣誉的影响，而且还不受等级偏见的影响。同样的事实使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需求更加敏感。在猎骑兵的世袭低能儿之伍中，他的政治天才就此显现。

维特伯爵的宪政生涯完全建立在革命之上。十年来，他一直是不受专制控制的簿记员和出纳员。他在1902年，被他的对手普列韦贬到了革命前的部长委员会主席这一无权职位。在普列韦被恐怖分子的炸弹“免职”后，维特在热心记者的帮助下以俄罗斯之救世主的身份自居，并非没有成功。人们曾意味深长地说，他支持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的一切自由化道路。面对东方的失败，他敏锐地摇了摇头。在1月9日到来的前夕，他告诉惊恐万状的自由派：“你们也明白，权力不在我手上。”就这样，恐怖分子的袭击、日本人的胜利和革命事件为他扫清了道路。他，签署完了由世界证券交易所及其政治代理人支配的条约，从朴茨茅斯凯旋而归。^[1]任何人都可能认为，不是大山元帅，而是他维

[1]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俄战争前，维特就反对和日本开战。——中译者注

特在东亚大获全胜。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的注意力都聚焦于这个天选之人。巴黎《晨报》(Matin)在其头版展示了一张吸墨纸——维特曾用它来涂抹他在朴茨茅斯的签名。自此，一切都引起了舆论界闲人的兴趣：他高大的身板，甚至还有他不成形的裤子和半塌的鼻子。他与威廉皇帝的会面进一步地给他作为最高级别政治家的光环增添了光彩。另一方面，他与移民司徒卢威的秘密会谈证明了他在驯服谋反自由派的成功。银行家们很兴奋：这是一个能确保利息能被按时支付的人。回到俄国后，维特踌躇满志，恢复了他无权无势的职位，并在其委员会中发表了自由主义的讲话，很明显，他在押宝“动乱”，称罢工铁路工人的代表团为“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力量。”他的算盘没有打错：十月罢工把他抬到了立宪俄国专制大臣的位置上。

在他纲领性的《上奏文》中，维特敲出了他最具自由主义的音符。该奏文试图超越宫廷奴才和国库官吏的观点，并达到了政治归纳的高度。奏文意识到，席卷全国的“动乱”并不仅仅是煽动教唆的结果，而是由于俄罗斯有思想的“公众”和其生活的外在形式之间的平衡收到了干扰。但是，我们如果暂时忘记了撰写奏文那一环境的平均脑力，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政治家”的纲领，那么就会因其思想上的苍白无力、形式上的懦弱逃避和语言上官吏式的不协调而震惊。公共自由的生命是以一种模糊不清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而这种形式的模糊性是由其限制性解释的能量造成的。在鼓起勇气采取立宪改革的举措时，维特并没有念出“宪法”这个词。他希望落实它，而不引人注目，因为它仍然需要不想听到它名字的那些人的支持。但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一段风平浪静的时期。他宣称，尽管逮捕、扣押和枪决仍在旧法的基础上进行，但今后将“本着”十月十七日宣言的“精神”来进

行。他以其骗子般简单幼稚的头脑，希望革命能立即跪在他的自由主义面前，就像前一天专制主义在革命面前投降一样。他犯了个大错。

如果说维特的上台是十月罢工胜利的结果，或者说是其胜利的不彻底性造成的结果，那么同样的条件也使他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完全的无望境地。事实证明，革命的力量不足以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并从其自身的组织要素中建造一个新的。军队还是被同一个人掌握着。所有旧的被精挑细选以满足专制需求的行政人员，从省长到县警，仍然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同样，在新的法律颁布前，所有的旧法律也仍然是不可侵犯的。因此，专制制度作为一个物质事实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它甚至作为一个名称被保留了下来，因为“独裁者”（Самодержецъ）这个词并没有从沙皇的头衔上摘下来。不错，当局被命令按照十月十七日宣言的“精神”来实施专制制度的法律。但这就像告诉法斯塔夫^[2]要“本着”贞洁的精神过他的放荡生活一样。结果就是俄国的60个总督辖地的地方专制者们完全失去了理智。他们要么跟在革命示威后面，向红旗敬礼；要么就模仿哈斯勒，坚持认为臣民应该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因为他们代表着神圣的皇上；要么允许社会民主党人领着部队去宣誓，要么就公开组织反革命的屠杀。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处于支配地位。不存在任何立法机构，甚至不知道何时、如何建立这种机构。

对议会是否会召开的疑虑增加了。在所有这些混乱中，维特

[2] 约翰·法斯塔夫爵士（Sir John Falstaff）是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首次提到的艺术形象。他是一个嗜酒成性又好斗的士兵，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是非常自负的一个人，而在《亨利四世》的演绎里则显得有些忧郁。他的名字法斯塔夫已成了体型臃肿的牛皮大王和老饕的同义词。——中译者注

伯爵一直在努力欺骗彼得宫城和革命，最成功的，也许还是欺骗他自己。他无休止地接见激进派和反动派的代表，对两者同样客气，在西方记者面前语无伦次地制定计划，每天写政府通令，含泪告诫高中生不要参加反政府示威，并提议学校所有班级

（Класс）和社会所有阶级（Класс）打起精神，重新回到正确的工作岗位上——简而言之，他完全失去了理智。

另一方面，官僚机构中的反革命分子也在忘我地工作。他们学会了重视“社会力量”的支持，在各地号召成立屠杀组织，并无视官方的官僚等级制度，将自己组织成一个统一的机构，并在内阁中安插了自己人——杜尔诺沃。这个俄国官僚机构最肮脏的标本，这个连令人难忘的亚历山大三世本人都不得不提高嗓门喊道“扔走这个猪猡”赶走的窃国官员杜尔诺沃，又重新被从垃圾桶里捡了起来，以内务大臣的身份为“自由派”首相提供制衡。维特接受了这种合作——即使对他来说这样是一种耻辱——而且，目前，这种合作将他自己贬到了与官僚机构的实际做法分毫误差的虚伪，贬低了十月十七日宣言。在发表了一系列令人厌烦的自由主义—官僚主义书法字帖后，维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俄国社会缺乏基本的政治思想、道德力量和社会本能。他开始相信自己的破产，并预见到血腥的报复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报复政策是为新秩序的建立做的“准备”。但他不认为自己注定要执行这样的政策，认为自己缺乏“必要的能力”，并承诺将自己的位置让给另一个人。即便是在这件事上，他也做了个骗子。在整个12月和1月期间，他一直担任着无权无势的首相职位，受到所有人的鄙视；而杜尔诺沃，这个局势的主人，则卷起袖子加油干，继续担任反革命屠夫，完成自己血腥的工作。

第十一章 “自由”的最初几天

在宣言发布那天，苏维埃就非常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它的态度。无产阶级代表提出了下列要求：大赦、解除各级警察的职务、从城市撤军并建立人民民兵。在《消息报》的一篇头版文章中评论这一决定时，我们写道：“就这样，我们获得了一部宪法。我们获得了集会自由，但是集会被军队包围了。我们获得了言论自由，但审查制度依旧固若金汤。我们获得了学术自由，但大学却依旧被军队占领。我们人身不受侵犯了，但监狱里却挤满了囚犯。我们获得了维特，但特雷波夫还在位置上。我们获得了宪法，但专制制度依然存在。我们什么都有了，却什么都没得到。”他们想要岁月静好？那么他们就得不到岁月静好。“无产阶级制造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无产阶级不想要警察流氓特雷波夫，不想要自由派的经纪人维特；即不想要狼嘴，也不想要狐尾。他不想要宪法羊皮纸包裹着的鞭子。”苏维埃下定决心：**继续总罢工！**

工人群众出奇一致地执行了这项决议。工厂的烟囱停止了呼吸，见证了宪政幻觉未能在工人区扩散的事实。然而，尽管如此，10月18日之后，罢工失去了它的直接斗争性。它变成了一场巨型的不信任示威。但在首都之前参与斗争的各省，现在都已经复工了。莫斯科的罢工在10月19日结束。彼得堡苏维埃决定在10月^[1]21日中午12时结束罢工。它是最后一个离场的，组织起了一场令人吃惊的展示，展示出了无产阶级的纪律：在同一时间使数十万工人回到了他们的车床前。

甚至在十月罢工结束之前，苏维埃就能够在一个星期内检验它的巨大影响力：在无数的群众要求下，它把自己处于群众的领导地位，并和他们一起在彼得堡的街道上游行。

[1] 原文为11月，应该为笔误。——中译者注

18日下午4点，数十万群众聚集在喀山大教堂旁。口号是大赦。他们想向监狱前进，于是便要求领袖，并向工人代表开会的位置出发。下午六点，苏维埃选出了三名代表来领导示威游行。他们出现在二楼的窗台前，头上和胳膊上都系着白色的布带。人海的巨浪在下面汹涌澎湃。红色的旗帜在他们头上挥舞，就像革命的风帆一样。巨大的呼声欢迎了被选中的三人。苏维埃的全体成员都走下了楼，进入了人群中。“发言人！”几十只手臂向议长伸去；一瞬间，他的脚就搭在了某人的肩上。“大赦！向监狱！”革命的颂歌，呐喊……在喀山广场和亚历山大洛夫公园人头攒动：在这里，1月9日受害者的灵魂加入了游行队伍。群众唱起了《永恒的记忆》和《你们已光荣牺牲》（Вы жертвою пали）。波别多诺斯采夫的门前飘扬着红旗。口哨声与咒骂声响起。老秃鹫听到了吗？……让他毫无畏惧地看向窗外：这个时候没人会碰他。让他用那苍老而有罪的眼睛注视着革命人民——彼得堡街道的主人。前进，前进！

再过两三条街，人群就到了预审羁押所外。人们得到消息，说那里有军队在把守。示威的领导人决定出发去侦查。同时，一个来自工程师联盟的代表团（后来发现是自封的）宣布大赦令已经被签署了。所有的监禁场所都已经被军队占领了，而且，根据“联盟”得到的“可靠的消息”，如果人群接近监狱，那么特雷波夫就可以解放双手，因此，流血事件就不可避免了。经过短暂的协商，领导人驱散了人群。示威者承诺，如果法令没有公布，他们将会在苏维埃的召唤下再次聚集起来，向监狱进军……

争取大赦的斗争在全国各地展开。10月18日，在莫斯科，数千名人群迫使总督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他们的名单被交至罢工委员会的代表^[2]，由他们来监督释放的执行。同一天，辛菲罗波尔

[2] 这一委员会后来很快就成为了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原注

的人群砸开了监狱大门，用马车送走了政治犯。在敖德萨和列威利，示威者的坚持致使囚犯被释放了。在巴库，释放囚犯的尝试导致了人群与军队的冲突，造成了3人死亡，18人受伤。在萨拉托夫，文达瓦，塔什干，波尔塔瓦，科夫诺……到处都有走向监狱的示威游行。“大赦！”——不仅是铺路石，就连彼得堡城市杜马也在回响着这一呼声。

“喏，上帝保佑！我祝贺你们，先生们！”维特放下电话，走向三个工人。这三个工人是苏维埃的代表。“沙皇已经签署了大赦令。”

“大赦是完全的还是部分的，伯爵？”

“大赦是以应有的慎重态度进行的，尽管如此，它还是足够广泛的。”

10月22日，政府终于公布了沙皇“关于释放在宣言发布前的国事犯”的法令。这是一份可悲的、吝啬的和唯利是图的文件，它对“仁慈”进行了分级，是由特雷波夫代表国家体制、维特代表了自由主义的那个政权的真正产物。



（1905年10月31日的集会，圣彼得堡帝国大学。）

但是有一类“国事犯”，是这项法令没有也不可能影响到的。他们就是那些受严刑拷打，被砍杀，受绞刑，被刺刀刺穿，被子弹射中而为人民的事业牺牲的人。在十月示威的期间，当革命群众在彼得堡血迹斑斑的广场上虔诚地纪念1月9日的牺牲者时，宪政时代的第一批受害者尚有余温的尸体已经躺在了警察的停尸房里。革命无法将生命还给自己新的殉难者；它决定在10月23日举行全民葬礼式示威。有人提议应该事先通知政府，并援引了一些先例：在一个案例中，应苏维埃代表的要求，维特伯爵安排释放了两名被捕的街头集会领袖；而在另一个案例中，他命令开放国有的波罗的海工厂——这座工厂因十月罢工关闭。尽管社会民主党的官方代表作出了警告，苏维埃还是决定派出一个特别代表团通知维特伯爵：苏维埃将承担示威期间维持秩序的责任，并要求军队和警察撤离。

维特伯爵很忙，而他刚刚才拒绝接待两位将军，但是却毫无怨

言地接待了苏维埃的代表团。游行？他个人一点也不反对：“这样的游行在西方是允许的。”但是，这件事并不在他的职权范围内。苏维埃应该向德米特里·费多尔维奇·特雷波夫交涉，因为城市在他的护卫之下。

“我们不能向特雷波夫交涉：我们没有被授权这样做。”

“真遗憾。你们本来可以自己发现，他根本就不是人们说的那种衣冠禽兽。”

“那出名的‘不留子弹’的命令怎么说呢，伯爵？”

“哦，那只是一句气话……”

维特给特雷波夫打了通电话，恭敬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最好不流血”，并等待决定。特雷波夫傲慢地把他打发到了市行政长官那里去。伯爵匆匆忙忙地给后者写了几句话，然后把信交给了代表团。

“我们会接受你的信，伯爵，但是我们保留行动的自由。我们不确定会不会需要用到它。”

“当然了，当然了。我完全不反对这点。”^[3]

这就是十月生活在我们面前展现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维特伯爵向革命工人祝贺了大赦令的签署。维特伯爵希望一切都能“像欧洲一样”不流血。他不确定是否能成功赶走特雷波夫，顺便，再试试把无产阶级和特雷波夫调和起来。他——政权的最高代表，通过工人代表团作为中间人，乞求市行政长官，使宪法置于其保护之下。“怯弱，诡计，愚蠢”——这就是立宪内阁的座右铭。

可是，特雷波夫照直走。他宣称，“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当一

[3] 《在维特伯爵那里》是代表团成员兹里德涅夫在1906年的集体著作《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史》中写的一篇纪实文章。执行委员会在听了代表团的报告后，决定“指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把信退回给大臣委员会的代表。”——原注

部分人准备拿起武器进行反对另一部分人的举动时，为了示威者自己的利益，任何的政治示威都不能被允许”，并邀请示威的组织者“断了自己的念头……因为警政当局可能会被迫采取严厉的措施，可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些言论就像划过的马刀或者步枪的射击那样尖锐而清晰。通过警察局武装城市恶棍，放他们去对示威者放肆，制造混乱，然后利用这群架的场面，命令警察和军队进行干预，像龙卷风一样席卷整座城市，留下遍地鲜血、满目疮痍和咬牙切齿的痛恨。这就是那个被加冕的低能儿托付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警察恶棍雷打不动的纲领。在那一刻，当局的天平开始摇摆起来。是维特，还是特雷波夫？是扩大宪政试验，还是将其淹没在血泊之中？在新政策的蜜月期，几十个城市将成为血腥事件的舞台，而引线则在特雷波夫的手上。但是门德尔松和罗斯柴尔德是支持宪法的：证券交易所的法则，就像摩西的律法一样，禁止食用新鲜血液。维特的力量就在这里。特雷波夫的官方地位开始动摇，而彼得堡是他的最后赌注。

这是一个责任重大、意义深远的时刻。代表苏维埃没有兴趣，也不希望支持维特——只要几天它就会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但它更不愿意支持特雷波夫。选择上街，等于是加入了他的计划。当然，政治形势并不仅限于证券交易所和警察刑讯室。超越维特和特雷波夫的计划，是有可能的。还可以有意识地迎合冲突，以便拜托他们两个。这就是苏维埃政策的总方向：睁着眼睛走向不可回避的冲突。不过，它也并没有觉得自己应该加快冲突的到来。越晚越好。在十月罢工的极度紧张状态已经开始松懈并屈服于心理上的暂时满足和暂时疲劳时，如果把决定性的斗争安排在与追悼式示威同时进行，那么就意味着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笔者（有必要提及这一事实，因为事后他经常因此而受到严厉

的指责)提出了取消葬礼性示威的提案。在10月22日凌晨一点多的苏维埃紧急会议上,经过激烈的辩论,这一提案以压倒性的票数获得了通过。以下是其文本:

“工人代表苏维埃打算在10月23日星期日为当局恶棍的受害者举行隆重的葬礼。但是彼得堡工人的和平意图使垂死制度的所有血债累累的代表人物都站了起来。特雷波夫将军是踩在1月9日的尸体上获得晋升的,在革命面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今天,他向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抛出了最后的挑战书。特雷波夫在他的声明中无理地暗示,他打算用警察武装的‘黑色百人团’来对付和平的游行,然后在安抚的幌子下,再度让彼得堡的街道充满血腥。鉴于这一恶毒阴险的计划,代表苏维埃指出:彼得堡无产阶级将不会在特雷波夫选定的日子里,而是在无产阶级本身足够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有利时机,向沙皇政府发起最后的斗争。为此,代表苏维埃决定:用各处庄严的、向牺牲者致敬的集会来代替总的葬礼活动,以此记住我们死去的斗士们——他们用他们的死亡,嘱咐我们千百倍地努力进行自我武装的事业,并以此尽早将特雷波夫和整个警察匪帮扔进君主制残余的垃圾桶。”

第十二章 沙皇军队在干活

苏维埃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结束了罢工。殒命婴儿的哭声、母亲疯狂的咒骂声、老人垂死的喘息和绝望的强烈哀嚎响彻了整个国家的云霄。俄罗斯的上百座城镇都化作了地狱。烟雾笼罩不见天日，烈火吞噬整个街道——吞噬了街道的房屋和人。这就是旧秩序对其受到的轻视的报复。

它在每一条小巷、每一座贫民窟到处招募它的战斗长枪方阵（Фаланга）^[1]。这里有小店主和衣衫褴褛者，小酒馆老板和他们的常客，看门人和警察间谍，职业小偷和业余强盗，小工匠和青楼护卫，饥饿愚昧的庄稼人和被工厂机器声震聋的农村移民。凶恶的赤贫、无光的黑暗以及堕落的腐败使他们听命于特权阶层的私利和达官显贵的无政府状态。

这些人在日俄战争初期的所谓“爱国”示威活动中获得了第一次大规模街头行动的经验。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们的基本道具为人所知：皇帝的标准像，伏特加瓶子，还有三色旗。从那时起，社会渣滓的有计划组织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如果说参加屠杀的群众（如果这里的“群众”一词合适的话）或多或少仍是杂乱无章的，那么相对而言，可以说核心人物始终是有纪律的，并按照军事化的方法组织起来。它从上面接收口头号令并向下传，决定每次屠杀行动的时间和规模。警察局的一名所长曾经说过：“你可以任意地安排大屠杀，想杀 10 个就杀 10 个；想杀 1 万，你就可以去杀 1 万。”^[2]

[1] 这一词语日后也可以解作“长枪党”。有趣的是，黑色百人团可以算是没有法西斯意识形态时的原法西斯了——它将国家社会化，以群众运动对抗群众运动。——Uni

[2] 这一事实是由前内务部副大臣乌鲁索夫亲王在第一届杜马上讲述的。——原注
[中译者补注 1]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乌鲁索夫（Серг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每个人都提前知道了即将发生的大屠杀：大屠杀的宣言被分发，嗜血的文章出现官方的《省公报》上，有时甚至还会用特版开始。敖德萨的市行政长官以自己的名义发布了挑衅性传单。而当一切都似乎准备就绪的时候，就出现了由一群自称“专家”的巡回演员。他们在物质的群众中散布谣言：犹太人正打算给正教徒降下灾难，社会主义者玷污了神圣的圣像，大学生撕毁了沙皇的画像。在没有大学的地方，这一流言的对象就被改编成自由派地方自治会，甚至还有高中。最疯狂的消息在电报线上到处传播，有时还盖上了官方的印章。与此同时，技术准备工作也已经完成：特别关注人员和房屋名单被拟定了出来，总体战略计划被制定了，指定数量的饥饿暴徒被召集起来了。指定的这天里，教堂举行了特别的祈祷会。主教发表了庄严的演说。一支爱国的队伍开始出发——神职人员走在了最前面，端着从警察局那里取来的沙皇标准像，举着大量的国旗。一个军乐队在不停地演奏。游行队伍的两侧和后面则是警察。总督向游行队伍行举手礼，警察局长当众亲吻了著名的黑色百人团成员。队伍经过的教堂敲响了他们的钟声。“脱帽！”外地来的“教官”和身着便衣的当地警察分散在人群中，而他们之中不

Урусов, 1862年3月19日—1937年9月5日), 188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890—1892年任卡卢加地方自治委员会主席。1902—1903年任坦波夫副省长。1903—1904年任比萨拉比亚总督。1904—1905年任特维尔总督。1905年5月15日至11月6日任内务部副大臣。1906年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并参加了民主改革党(Парти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х реформ)。杜马被解散后签署了《维堡宣言》。1908年被捕入狱，获释后参加了共济会。1915—1916年任全俄西南阵线城市联盟委员会主席。二月革命后参加了立宪民主党，并于1917年3—6月任临时政府内务部副部长。1917年11月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十月革命后多次被捕。1919年加入红军。1920年因“战术中心”案被捕，但很快获释。1921—1925年期间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25—1929年期间在国家银行工作。1933年在国有农场人民委员会工作。晚年在苏联作家协会图书馆工作。1937年逝世。

少人还没有来的及换掉制服裤子。他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刺激人群，催促他们继续前进，让人的意识里充满一种一切都被允许的感觉，并寻找公开行动的借口。开始时是窗户被砸烂，零散的路人被打，然后闯进酒馆，喝得酩酊大醉。军乐团不停地演奏《上帝，保佑沙皇》——大屠杀的战歌。如果找不到什么借口，他们就会选择去制造一个：有人爬上阁楼，在那里向人群开枪——大部分情况下其实都是空包弹。武装到牙齿的警用左轮保卫着人群，以确保他们的狂怒不会被恐惧麻痹。他们对挑衅者的枪声做出回应，对先前选定的公寓窗户打一排子弹。一些商店被一扫而光，抢来的布匹和丝绸被铺在了爱国队伍脚下。如果他们遇到了任何自我防卫措施，正规军就会前来救援。他们用两三发子弹击倒反抗者，或者不让他们进入步枪的射程，使其无力化。在士兵巡逻队的前后保护下，哥萨克连的侦察下，警察和职业挑衅者的领导下，雇佣兵的帮助下，志愿者的轻松获利下，这帮匪徒在街上横冲直撞，就着血腥味喝伏特加^[3].....无业游民进行着统治。在一个小时前，他还只是个战战

[3] “在许多情况下，警察亲自指挥流氓人群破坏和抢劫犹太人的房屋、公寓和商店，为流氓配备用砍下的树木制成的棍棒，也亲自参与破坏财产、抢劫、谋杀，并亲自控制人群的行动。”（参议员库兹明斯基关于敖德萨大屠杀的上奏文）市行政长官内德加特承认，“参与屠杀和抢劫的流氓人群热情地迎接他，喊着乌拉。”当地的部队指挥官考尔巴斯男爵向警官发表了讲话，开头是这样的：“让我们用他们的黑话来称呼事物。让我们承认，我们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同情这场大屠杀！”——原注

[中译者补注 1]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考尔巴斯男爵

（Барон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аульбарс，1844年5月23日—1925年1月25日（或1929年？月？日）），俄国地理学家。出身于一个瑞典裔贵族家庭。1861年入伍。1863年参与镇压了波兰起义。1872—1873年任驻喀什使馆馆长。1873年参加了希瓦战役。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82—1883年任保加利亚公国防大臣兼大臣会议主席。1900—1901年期间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1904年任敖德萨军区副司令。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历任满洲第3军、第2军司令。1904年1—10月、1905—1909年任敖德萨军区司令，在任期间于1905年月在敖德萨制造了针对犹太人的

兢兢的奴隶，遭受警察和饥饿的困扰，现在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暴君了。他被允许为所欲为，无所不可为，掌握着财产和荣誉，享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可以把一个老妇人和一架大钢琴从三楼扔出去，可以往婴儿的头上扔椅子，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强奸一个小女孩，可以把一根钉子钉进一个活人的身体里……他摧毁了整个家庭；他把煤油倒在房子上，然后纵火；如果有人胆敢逃跑，他就会用棍子将其打死。一群畜生冲进亚美尼亚人的残废收容所，用刀砍老人、病人、妇女和儿童……他不需要停下这些酷刑……这些都是由酒精和愤怒弄得发狂的大脑臆想出来的……他不需要停下来！他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敢做……“上帝保佑沙皇！”这里有位见过死亡面孔的青年瞬间白发。这里有位十岁的男孩为其父母残缺不全的尸体发狂。这里有位军医经历了旅顺港围攻的所有恐怖，但却无法忍受敖德萨几个小时的大屠杀，陷入了永夜的疯狂。

“上帝保佑沙皇！……”血迹斑斑、浑身焦黑、发狂的受害者仍然在噩梦般的惊慌之中寻求着救赎的机会。有些人穿上了死去之人的血衣，躺在尸体堆里，在那里呆了两三天……其他人则跪倒在军官、警察和恶棍面前，向他们伸出手臂，在尘土之中匍匐，亲吻他们的军靴，乞求怜悯。回答他们的只有带着酒味的笑声。“你们想要自由，这就是给你们的自由。”在这句话中包含了屠杀政策的全部地狱式道德……流氓们呛在血泊中争先恐后地向前冲锋。他什么都能做，他什么都敢做——他在统治一切。“白色沙皇”允许他做一切事情——白色沙皇万岁！^[4]他也没有说错。除了全俄罗斯的

大屠杀。1909—1917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在西南阵线指挥陆军航空队作战。十月革命后逃回敖德萨。1918年参加白军。1919年流亡土耳其，随后流亡到保加利亚和法国。1925年（或1929年）死于巴黎。

[4] “在其中一次这样的游行中，三色旗被抬在前面，沙皇的标准像紧跟其后，而画像的正后方是一个银盘和装有脏物的麻袋。”（参议员图劳乌的奏文）——原注

独裁者以外，也的确没有其他人充当这个半官方的屠杀—强盗团伙的最高保护者了。这个团伙可以在官方官僚机构中进进出出，可以把一百多个主要的行政官僚称为自己人，而其总部就在宫廷贵族之中。尼古拉·罗曼诺夫头脑迟钝又胆小怕事，微不足道又有无限权威，全部偏见相当于一个爱斯基摩人，他的皇室血统被几代人的缺陷所害。他像他的许多同业者一样，浑身浸透了肮脏的淫欲和冷漠的残酷。1月9日开始的革命，撕下他身上的每一件神圣面纱，最终腐蚀了他。他满足于呆在暗处，利用特雷波夫作为他的特务代理人处理屠杀事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5]现在他炫耀起他和这群肆无忌惮的酒馆混蛋和下流囚犯们的关系了。他把“党外君主”的愚蠢虚构踩在脚下了，与众所周知的暴徒交换了友好的电报，为这些被所有人鄙视的爱国者提供听众，并在俄罗斯人民联盟（Союза Ру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的要求下，毫无例外地赦免了那些被他自己的法庭判处刑罚的杀人犯和强盗。很难想象还能有什么比这位君主的行为更能够嘲弄君主制的庄严神秘。任何国家的法院都不得不依据他的行为判处他强制劳动，只要法院能承认他精神足够健全！……

在这十月的黑色酒神节（вакханалия）面前，连圣巴多罗买之

[中译者补注 1] 叶夫根尼·费多洛维奇·图劳乌（Евген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Турау，1847年3月4日—1914年4月29日），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1869年毕业于新罗西斯克大学，同年进入俄罗斯帝国司法部工作。1872—1875年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地区法院助理检察官。1881—1887年任华沙法院助理检察官。1888—1900年任华沙法院检察官。1900—1906年任参议员。1906—1914年任国务院委员，在任期间曾于1907—1910年任人事委员会副主席，1910—1911年、1912—1913年任立法机构委员会副主席。1912年起任代理枢密院议员。1914年去世。

[5] “根据广泛的意见，特雷波夫向皇上报告事务状况……并影响政策路线……特雷波夫将军在被任命为宫廷警备司令时，曾要求并获得了用于特务开支的特别资金拨款……”（罗普奇恩参议员的信）——原注

夜^[6]都相形见绌。100 个城镇中有 3500—4000 人被杀，多达 10000 人残疾。物质损失如果不是高达数亿卢布，也至少数倍于农潮给地主带来的损失……这样，旧秩序就为自己的耻辱报了仇！

工人在这些破坏性事件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10 月底，北美工会联合会主席给维特伯爵发了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强烈呼吁俄国工人采取立场坚决反对屠杀——这场对他们刚刚赢得的自由构成威胁的大屠杀。“我不仅代表 300 万已经阻止起来的工人，也代表全合众国的所有工人，请求您，伯爵，将这封电报转给您的同胞——我们的工人兄弟。”这个维特伯爵最近才在美国冒充真正的民主人士，宣称“笔比剑更有力”，现在就发现自己内心已经足够寡廉鲜耻，以便让他把这封信悄悄地藏在办公桌里的一个秘密抽屉里。直到 11 月，苏维埃才辗转知道了它的存在。然而，以俄国工人的名誉，他们不必等待来自大洋彼岸朋友的警告，就能积极介入血腥事件。在一些城镇里，他们组织了武装战斗队，对恶棍进行了积极、在某些地方是英勇的抵抗；而在部队表现得或多或少中立的地方，工人民兵轻而易举就制止了流氓暴行。

涅米罗维奇—但钦科^[7]——一个离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非常

[6]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法语：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又称圣巴托罗缪之夜、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发生于 1572 年法国宗教战争期间，由宫廷内部针对新教结盟宗新教徒（又称雨格诺派、胡格诺派，属于法国加尔文归正主义）领袖的刺杀行动引发，之后发生天主教徒针对结盟宗新教徒的暴动。传统上认为此事件是由查理九世的母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煽动。屠杀发生于国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德·瓦卢瓦与新教徒亨利·波旁（未来的亨利四世）婚礼的五天之后。这场婚姻导致了绝大部分众多最有权势、最富有的结盟宗人物在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巴黎聚集，成为了天主教徒将其集体清洗的契机。——中译者注

[7]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但钦科（Васілій Іванович Немирович-Данченко，1845 年 1 月 5 日—1936 年 9 月 18 日），俄国作家、旅行家。出身于行伍家

遥远的老作家，在那些日子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在这些噩梦的一旁，在这个濒临死亡的怪物的沃普尔吉斯之夜^[8]里——请看看吧，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毅力惊人有条不紊，并且纪律严明。他们没有用抢劫和谋杀来玷污自己——正相反，他们到处帮助公众，而且不消说，他们比警察、哥萨克和宪兵更好地保护公众免受嗜血该隐的破坏性妄想的影响。哪里有流氓开始作恶，哪里就出现工人武装战斗队。这支第一次进入历史舞台的崭新力量，在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时表现得非常平静，在自由和善良的理想胜利时表现得很温和，像一支真正的军队一样有组织、服从上级，知道自己的胜利就是所有人的胜利，人类为这些胜利而生活，思考和欢呼，战斗和受苦。

* * *

彼得堡没有发生大屠杀。但是它的公开准备工作却在全力进行。首都的犹太人一直惶恐不安。18日之后，每天都有学生、工人鼓动员和犹太人在城市的不同地方受到殴打。不同的帮派大喊大叫，吹着口哨，不仅在郊区，而且还在涅瓦区，使用链锤、芬兰刀和短马鞭进行攻击。苏维埃代表的生命几近受到威胁，他们不失时机地用左轮手枪来武装自己。警察探员敦促商人和店员攻击计划于10月23日举行的葬礼队伍……如果黑色百人团不得不满足于游击行动，那也不是他们的错。

工人为保卫他们的城市做了积极的准备。某些工厂承诺，只要电话一打进来，不管有任何威胁，都要整个上街去。武器店无视警

庭。曾在俄土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担任战地记者。1906年加入共济会。1921年起先后流亡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1936年死于布拉格。——中译者注

[8] 沃普尔吉斯之夜，全称圣沃普尔吉斯之夜（德语：Sankt Walpurgisnacht），又译瓦尔普吉斯之夜等，是广泛流行于中部和北部欧洲的一个传统的春季庆祝活动，也是纪念圣徒沃尔普加的一个基督教节日，举办于每年的4月30日晚至5月1日。庆祝活动通常是篝火晚会以及舞蹈演出。——中译者注

察设下的所有交易限制，疯狂地交易勃朗宁手枪。但是左轮手枪价格昂贵，广大的群众买不起：革命党和苏维埃很难成功武装他们的工人战斗队。与此同时，关于大屠杀的谣言也越来越泛滥。所有能够获得钢铁的工厂和工房都开始自发地制造冷兵器。几千把锤子正在锻造匕首、枪矛、钢丝鞭和铁指套。晚上，在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一个又一个的代表登上讲台，把他们的武器高高举过头顶，传达他们对选出他们的人的庄严承诺——一旦屠杀发生，就一定立即扑灭。这样的一次展示就足以让蹂躏者的所有主动性瘫痪了。但工人们并未就此罢休。在涅瓦哨所外的工厂区，他们组织了一支真正的民兵队伍，定期进行夜间值班。他们还确保了革命报社建筑的安全问题。在那些记者写作、排字员派字时口袋里都得装着左轮手枪的紧张时日里，这是一切都是必要的……

无产阶级武装起来保卫自己免受黑色百人团的侵害，就自动等于武装起来反对沙皇政权。政府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它发出了战斗警报。11月8日，《政府公报》向公众通报了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即工人最近开始用左轮手枪、猎枪、匕首、刀和矛来武装自己。政府的通报继续写道，“根据现有的资料，武装起来的工人达到了6000人，还成立了所谓的‘自卫队’（самооборона）和民兵，人数约为300人；他们在夜间以保安为借口，10人一组在街上行走；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保护革命者免遭警察或军队逮捕。”

在彼得堡，一场针对民兵的正规武装攻击开始了。战斗队被驱散，武器被没收。但那时，大屠杀的危险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大的危险。政府在给他们的非正规军放假，并把自己的正规部队——哥萨克团和禁卫团——投入行动。它正在为全线作战作准备。

第十三章 书报检查的风暴

彼得堡苏维埃发动了一场辉煌的运动来捍卫出版自由。这场运动组织良好，政治上完美并取得了胜利。它在这场斗争中的忠实同志是一个崭新但团结的行业—政治组织——印刷工人工会（Союз рабочих печатного дела）。

一位工人发言者在十月罢工前的一次工会大型会议上说道：“我们需要新闻自由，因为它不仅是一项政治权益，同时也是一项经济要求。摆脱了审查制度虎钳的文学将使印刷业及其相关的所有分支行业的工业繁荣兴盛。”从那一刻起，印刷工人就开始了系统性对抗审查规章的运动。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在整个 1905 年，合法的印刷厂就已经开始印刷非法出版物了。但这项工作秘而不宣、规模较小且谨小慎微。从 10 月起，大量排字工人被吸引到出版非法印刷品的工作中去了。印刷厂内的阴谋手段几乎完全消失了。同时，工人对出版商也在施加更多的压力。排字工人坚持不顾审查条件出版报纸，并威胁说，如果不能这么做，就拒绝继续工作。10 月 13 日举行了一次定期刊物出版社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新时代报》的爬虫们和最激进的分子并肩而坐。这一彼得堡新闻界的诺亚方舟决定“不与政府接触以要求出版自由，而是不经许可地直接实现这种自由。”这份决议是多么鲜明地体现出公民的勇气啊！幸运的是，总罢工庇护了这些出版商，在受到考验前就保卫住了他们的勇气。接下来救驾的则是“宪法”。政治蒙难的殉道地，在“与新内阁达成协议”的诱人前景面前，不过昙花一现罢了。

十月十七日宣言对出版自由保持了沉默。然而，维特伯爵向自由派代表解释说——这种沉默是一种同意的信号，宣称的言论自由也会延伸到出版方面。但是，首相补充说，在颁布关于出版的新法律以前，审查制度仍然有效。呜呼，他错了：事实证明，他那种

宪法下的审查就和他本人一样无力。它的命运，不是由出版商决定的，而是由工人决定的。

10月19日，苏维埃表示：“沙皇的宣言宣布了俄国的‘言论’自由，但最高出版事务局仍然存在，检查员的铅笔仍然在发挥作用……出版言论自由仍需要由工人来争取。代表苏维埃决定，只有那些编辑无视审查委员会，拒绝将自己的报纸交给审查机构检查，像代表苏维埃出版自己的报纸那样出版的刊物才可以出版。因此，排字工人以及其他参与报纸出版的印刷工作的工人同志，只有在编辑宣布‘准备落实出版自由’时才会继续工作。到那之前，报社工人将继续罢工，而代表苏维埃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使罢工同志领取到他们的工资。不接受本决议的报纸将被没收充公并销毁，并且印刷机也会被捣毁；而不接受代表苏维埃决议的工人将被排斥。”

这一决议的范围在几天后被扩展到所有的杂志、小册子和书籍出版物，变成了新的出版法。印刷业的罢工连同总罢工一起持续到了10月21日。印刷工人工会作出决定：即使是要印刷《立宪宣言》，也不给它开小灶。这一决定得到了严格遵守。宣言只能出现在由士兵负责印刷的《政府公报》上。除此之外，只有反动的《光明报》（Свет）偷偷地背着自己的排字工人出版了沙皇10月17日的‘地下传单’”。《光明报》因此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他们的印刷厂被工厂工人捣毁了。

这不是离1月的冬宫朝觐才过了仅仅9个月吗？难道这群人恳求沙皇给予他们新闻自由的景象，不是前一年冬天发生的事情吗？不，我们的旧历法在说谎！革命有自己的历法，几个月对它来说是几十年，而几年对它来说则是几个世纪。

沙皇的宣言，在两万名工人中，找不到半双忠诚的手，来把自

已印刷出来。与此相对的，是写有有关宣言的消息和对其的评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传单，在 10 月 18 日就已经有大量被散发了出去。与此相对的还有苏维埃《信息报》的第二期，也在同一天被散发到了每一个街角。

罢工之后，所有的报社都做出了声明：从今往后，他们将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进行出版活动。然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对于这项措施的真正发起人只字未提。只有《新时代报》通过斯托雷平^[1]（未来首相的兄弟）的笔，战战兢兢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慨，说什么自己完全准备在新闻自由的祭坛上做出牺牲，但苏维埃找到了他们，要求了他们，强迫了他们——摧毁了他们“自我牺牲，舍己为人”的喜悦感。除此之外，还有某位巴什马科夫^[2]，《人民之声报》（Народного Голоса）的编辑和一家法语外事报纸《圣彼得堡日报》（Journal de St.-Petersbourg）没有表现出其应有的自由主义式准备——幸福微笑地面对安灵弥撒（bonne mine a mauvais jeu）的准备。巴什马科夫从内阁取得许可：不需要向审查机关递交其校样，也不需要提交成品报纸。《人民之声报》还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了以下

[1] 亚历山大·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Александ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1863 年？月？日—1925 年 11 月 23 日），俄国记者、诗人、作家，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的弟弟。1902 年起担任《彼得堡新闻报》编辑。1904—1917 年任《新时代报》编辑。1905 年加入十月党。十月革命后流亡南斯拉夫。1925 年死于贝尔格莱德。

[2]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巴什马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шмаков，1859 年 1 月 6 日—1943 年 8 月 1 日），俄国律师，泛斯拉夫主义者。1881 年毕业于新罗西斯克大学。1898 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04—1905 年任内务部官方外交刊物《圣彼得堡日报》（Journal de St. Pétersbourg）编辑。1905 年革命期间，鼓吹血腥镇压革命。1906 年加入俄罗斯议会。1906—1913 年任《政府公报》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вестник）主编。十月革命后同邓尼金合作。1919 年经土耳其流亡塞尔维亚。1924 年流亡法国，继续参与流亡君主派活动。1943 年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愤慨的声明：

这位警察式法制的守护骑士写道：“尽管我坚信，法律，哪怕是恶法，也应该被遵守，只要它还没被合法权力废除，就应该被遵守，但是，我还是在胁迫下犯法了——我不得已在规避审查的情况下发布了这期的报纸，尽管我没有权利这样做。我衷心抗议我所受到的胁迫，并且，我宣布，只要有些许的可能性，我就会遵守法律。因为，我认为，在目前的动荡时期，把我的名字和那群罢工者相提并论，是一种耻辱。——亚历山大·巴什马科夫”

这段话，几乎最为完美地描述了这一时期官方法制和革命法律之间的实际相互关系。公平起见，我们认为应该补充一点，即巴什马科夫先生在行为上要优于半十月党人（Полуоктябристского）的《言语报》（Слово）——后者正式地从工人代表苏维埃那里得到了“不将自己的报纸送交审查”的书面许可。这些人在敢于蔑视旧政权的权威之前，需要得到新主人的许可。

印刷工人工会一直保持着警惕。今天，它制止了一个出版商的图谋——他试图通过与一个无所事事的审查办公室建立关系来规避苏维埃的决议；明天，它又伸手阻止了一个利用闲置的印刷机煽动大屠杀的计划。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与煽动屠杀的出版物进行的斗争，始于一份订单的没收——订单要求印刷10万份由“一群工人”签署的、呼吁起义反对“新沙皇”（即社会民主党人）的传单。在这份煽动屠杀传单的原稿上，有奥尔洛夫—达维多夫^[3]伯爵和穆辛娜—普希金娜女伯爵的签名。排字工人向执行委员会请

[3] 阿列克谢·阿纳托利耶维奇·奥尔洛夫·达维多夫（Алексе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Орлов-Давыдов，1871年12月13日—1935年1月1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6年进入首相府工作。1907年加入进步党。1909年加入共济会。1912—1913年、1913—191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支持克伦斯基，参加了全俄民主会议。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中译者注

求指示，他们得到的答复是：停止印刷机，销毁铅板，没收任何成品副本。而执行委员会则把高贵流氓的宣言和自己的评论一起刊印在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上。

执行委员会和印刷工人工会采取的一般原则是：如果不直接包含呼吁暴力和屠杀的语句，就不阻止出版印刷。在排字工人的努力下，所有煽动屠杀的出版物都被赶出了私人印刷厂。因此，现在只有在警察部门和宪兵局里，在大门和百叶窗紧闭的情况下，血腥的呼吁才能从那些很久以前从革命者手里没收的手摇印刷机里印刷出来。

一般说来，反动报刊的出版是完全不受阻碍的。不错，在最初的几天里，确实有少量例外情况发生。我们知道，在彼得堡，曾有排字工人尝试给反动文章加上注解，还有几次是对反革命的拙劣狂妄举动进行了抗议。在莫斯科，排字工人拒绝印刷那时出现的十月党人集团的纲领。

未来的“十月十七日联盟”领导人古契科夫在一次乡绅大会上抱怨道：“这就是你们的新闻自由！这就只是旧制度翻了个儿。能做的就只有这个制度用过的方法：把印刷材料送到国外，或者开办地下印刷厂。”

不言而喻，资本主义自由式法利赛人的愤慨是个无底洞……在他们那看来，排字工人不必对他们自己排好的文章负责。但在那个特殊时期，政治热情已经如此紧张，以至于工人在自己的专业工作的时候，也丝毫不曾有一刻在自己的意识中失去革命责任感。一部分反动出版社的排字工人走的更远：他们不惜放弃自己的工作，自愿陷入贫困。当然，他们拒绝为反动派或自由派对本阶级的诽谤排字，一点也不算违反“出版自由”。最糟也只不过算是违约。

但是，“自由雇佣”这一残酷的形而上学是多么深深浸透了资

本，迫使工人从事最令人厌恶的工作（建造监狱和铁甲舰，锻造脚镣，印刷充满资产阶级谎言的纸张），以至于它总是不厌其烦地把这种出于道德动机拒绝工作的行为说成是对人身“劳动自由”权或者“新闻自由”权的侵犯。

* * *

10月22日，俄罗斯的报纸第一次从世代代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对蜂拥而至的新旧资产阶级报纸来说，畅所欲言的能力不是一种福报，而是一种诅咒。要么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无话可说；要么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他们可以或应该对新读者说的那些话语；要么还可能是因为审查制度的崩溃还是在他们内心里留下了自我审查的习惯和作为他者的审查员^[4]。社会主义报刊那清晰而有力的声音，在这一兄弟会上泛滥的那政治上的笨口拙舌之间，——它们要么被穿上了最高政治智慧的长袍，要么就被用粗糙的激进主义铃铛装饰了起来——立即脱颖而出。

社会民主主义的《开端报》（Начало）^[5]如此宣称：“我们的报纸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机关。俄国无产阶级以其无私的斗争为我们开启了言论自由的大门——我们自由的言论将为俄国无产阶级服务。”我们这些俄国社会主义的时评员，多年以来一直像鼯鼠一样过着革命的地下生活，知道开放的蓝天、新鲜的空气和自由的言论对我们的价值。我们人少、弱小、分散且缺乏经验，就像小孩一样，对抗可怕的末日野兽。我们，仅以对国际社会主义福音的无限信仰为武器，来对抗用国际军国主义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我们躲在“合法”社会的犄角旮旯里，向专制宣战。这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我

[4] 原文直译为“审查制度的崩溃在他们心中留下不可侵犯的内部审查员，和环顾四周对统治的谨慎。”——中译者注

[5] 《开端报》是孟什维克的合法报纸，1905年11—12月在彼得堡出版。——中译者注

们的武器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文字。如果要计算我们的党为每个革命单词而坐牢和流放的小时数，会得到一个很可怕的数字……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倾注了精气神和心血的统计数字！

在这条布满陷阱漫长道路上，在非法作家与非法读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非法的中介：排字工人、运输工人、推销员……这是一条多么艰辛而又危险的链条啊！只要走错一步，就会使所有人都功亏一篑……有多少印刷厂，在开始工作之前就被充公了；有多少文献，在到达读者手中之前就在宪兵局的院子里被烧毁了；有多少劳动被浪费，多少力量被瘫痪，多少人的生活被打破！

我们可怜的秘密胶印机，我们自制的手工秘密印刷机，就是我们与政府官方谎言和被许可的自由派的旋转印刷机相抗衡的武器。这不就像用石器时代的武器来对抗克虏伯的大炮吗？他们曾经嘲笑过我们。而现在，在十月的时日里，石器时代的斧头赢了。革命的言论出现在了公开场合，为自己力量感到惊讶和陶醉。

革命报刊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彼得堡出版了两份大型社会主义报纸。两者都在诞生的第一天就拥有超过 5 万名订户。还有一份较为便宜的报纸，其发行量在开头的两三周内就上升到了 10 万份。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张。同时，在短时间内各自创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报纸的各省对首都的革命出版物的需求也很大，并且不断增加。

出版条件，和其他所有政治条件一样，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一切都取决于反动派与革命派在这一地区的力量状况。在首都，审查制度实际上不复存在。在外省，审查制度虽然继续存在，但受首都报纸语气的影响，变得非常宽松。警察对与革命报刊的斗争缺乏任何统一的思想。没收个别出版物的命令被发出，但得不到认真落实。“被没收”的社会主义报刊公开出

售——不仅在工人区，甚至还在涅瓦大街上。各省像得到天赐甘露一样吸收着来自首都的报刊。买报纸的人在火车站排起了长队，等待着邮政列车的到来。卖报人几乎被撕成了碎片。某个人会打开新的一期《俄罗斯报》（Русская газета）开始大声朗读其头版文章。火车站会人满为患，变成一个喧闹的礼堂。这种情况重复了第二天，第三天，于是之后就变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但有时，甚至不少见到警察的完全被动性被肆无忌惮的暴力取代。宪兵队的军士会在彼得堡的“煽动性”报刊还没来得及离开车厢的时候，就将其没收，并成捆销毁。讽刺杂志为警察的狂热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目标。反对它们的活动是由内务大臣杜尔诺沃领头的——他后来提议恢复对出版物图画의初步审查制度。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援引亚历山大三世曾经做过的权威性描述：漫画家们总是把内务大臣的愚蠢脑袋安在一只猪身上……然而，杜尔诺沃并不孤独。他有着沙皇所有的御前侍卫、高级宫廷侍从、皇室侍从长、猎骑兵军官、御马监带着复仇的愤恨陪着他。

这个匪帮也最终成功地篡改了出版法——就是那部内阁决定“从现在起，一直到国家杜马通过，用于实现出版自由”的法。换句话说，他们实际上，成功地约束了那归功于彼得堡无产阶级已实际赢来的出版自由。11月24日的暂行办法将出版界重新置于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规定任何煽动罢工或示威的行为、侮辱部队的行为、传播有关政府活动的虚假信息，以及任何造谣行为，都将受到惩罚。在俄国，各种各样的“暂行办法”通常是最持久的立法形式。出版方面的暂行办法也是如此。在国家杜马召开之前颁布的这些暂行办法受到了普遍的抵制，并且像维特的整个内阁一样，一直半悬在空中不得落地。但是，反革命在12月的胜利却为维特《出版法》的实施扫清了障碍。暂行办法开始生效，并伴随着一个补充条

款：一方面，“美化犯罪”也会受到惩罚；另一方面，总督和市行政长官获得了自由裁量权。这些恶毒的办法经历了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考验，无疑，也将安全地度过第三届……

在争取出版自由的历史方面，我们还得讲讲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消息报》是如何出版的。这些革命公报的出版史，无疑构成了俄国无产阶级争取言论自由这一章节中有趣的一页。

* * *

在“立宪”前出版的第一期，无论在报的容量上，还是在印刷量上，都不大。它是由一家私人印刷厂为赚钱而秘密印刷的。第二期是在10月18日印刷的。^[6]一群志愿者被派到了激进的《祖国之子报》（Сына Отечества）的印刷厂——这个厂稍后落入了社会革命党人手里。管理层犹豫不决。当时的情况还很动荡，谁也说不清印刷革命出版物会有什么后果。

“那你得先逮捕我们。”管理层中有人这样警告道。

“你们被逮捕了。”他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以武器的力量。”另一个志愿者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一边补充说。

“你们被逮捕了！所有人都被逮捕了！”编辑室和印刷厂里响起了这样的话语声。

“所有人都可以被放进去，但都不准出来！”

“你们的电话呢？去拿电话来！”命令被下达了。

工作开始了，印刷厂里不断出现新面孔。这些人是职员，其中包括有排字工人。排字工人被邀请到车间去，并开始了排字工作，

[6] 后续的所有情节，都是根据苏维埃“飞行印刷厂”的主要组织者斯曼诺夫斯基（Симаковский）的笔记《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是如何出版的》进行描述的。——原注

职员们则被要求撰写短文。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社会利益报》(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ольза)的印刷厂被占领了。入口被封，岗哨进驻。

定型工头走进了定型车间。字型在被敲打，炉子被点燃。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

“谁在这里发号施令？谁允许你们这么做的？”刚进来的人如此喊道，并试图扑灭炉子。他被制止了，并被威胁关进储物室里。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们向他解释道，这里正在印刷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的第三期。

“你们干嘛不早点说呢……至于吗？……我时刻准备着呢……”岗位上出现了一双有经验的手，并开展工作。

“你们打算怎么印刷？我们不都停电了吗？”被逮捕的管理人员问道。

“你们是从哪个发电站取电的？半小时后就会来电。”

管理人员说出了发电站的名字，但却心存疑虑。几天来，他一直试图恢复电力供应，哪怕只是为了公寓里的照明，但都徒劳无功。因为，被海员取代了罢工工人的发电站，只向国家机构供应电力。

正好半小时后，灯亮了，机器也可以开始运转了。管理人员的脸上出现了带有尊敬的诧异。片刻之后，被派往发电站的工人带着负责军官的字条回来了。“应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要求，已恢复对大亚切斯基街(Большая Подьяческая улица) 39号的电力供应，供《社会利益报》的印刷厂使用。”跟着的是一个签名。

在和谐甚至是愉快的气氛中，突击队员和“被捕者”一起印刷了大量第三期的副本。

最终，《消息报》的印刷地点被警察发现了。他们出现在印刷厂，但为时已晚：《消息报》已经被带走了，活字盘也被打乱了。直到11月3日至4日的第二次罢工期间，警察才成功地捕捉到了《消息报》“飞行队”的行动。这发生在《我们的生活报》（Наша Жизнь）的印刷厂，而那里的工作已经连续开展两天了。在得到拒绝开门的回复后，警察破门而入。斯曼诺夫斯基^[7]写道，“在一个步兵连的保护下，警察手持左轮手枪闯入印刷厂，但他们自己也被印刷工人在刺刀出现时平静地继续工作的和平场面弄得很尴尬。”



（阿·斯曼诺夫斯基，《苏维埃消息报》夺取大印刷厂行动的组织者）

^[7]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斯曼诺夫斯基（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имаковский，1862年？月？日—1926年5月20日），俄国革命家。12岁时成为纺纱工，后来成为车工。1905年革命期间在科斯特罗马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科斯特苏维埃成员，同年被捕入狱。1917年二月革命后领导科斯特罗马金属工会，十月革命后当选为科斯特罗马市执行委员会成员。1926年5月20日去世。——中译者注

“我们都是奉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命令来的，”工人们宣称道，“我们要求警察撤离，否则我们无法保证印刷厂财产的安全。”

在与警察谈判的时候，在警察收集原稿与校样并把它们封在桌子和构图框上时，被捕的工人并没有浪费时间——他们立即开始在士兵和警察中进行鼓动工作：悄悄地小声向他们宣读苏维埃对士兵的号召，并分发《消息报》在他们手上。然后，排字工人被登记名字并被释放。印刷厂的门被封住，入口处有警察驻守。但是，哈！第二天到达的调查单位什么也没找到。门是锁着的，封条还是完整的，但既没有排好的字版，也没有样稿和原稿。所有东西都被转移到了《证券交易所公报》的印刷厂——那里正在毫无阻碍地印刷着《消息报》第六期。

11月6日晚，这类行动中的最大的一个发生了一——《新时代报》的巨型印刷厂被占领了。第二天，这家有影响力的报纸的爬行动物，用两篇文章报道了这起事件，其中一篇的标题是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官方报纸是怎样被印刷出来的》。

以下是“受害者”眼中看到的故事：

“晚上六点左右，三个年轻人出现在了印刷厂……经理恰好也在这时进来了。经理得知了来访者们的身份，并邀请他们进入印刷厂的办公室。

‘让所有人都出去，’三个人中的一个开口道，‘我们必须和您单独谈谈。’

‘你们有三个人，而我只有一个人，’经理说，‘我宁愿在有人见证的情况下和你们讲话。’

‘我们请求您让大家在隔壁房间等候，我们只有几句话要跟您说。’

经理同意了。来访者于是开始向他解释，他们是奉执行委员会

的命令前来的：他们要接管《新时代报》的印刷厂，以便在那里印刷第七期《消息报》。

‘我没法跟你们讨论这个问题，’经理说，‘这地方不是我的，我必须征求我主人的意见。’

‘您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如果需要的话，把您的主人叫过来。’代表们回答。

‘我可以在电话里传达你们的提议。’

‘不，您能做的，只有请他来这这里。’

‘好吧……’”

经理在两位代表的陪同下，走到了电话机前，把（小）苏沃林^[8]请过来。那边拒绝了，说自己不舒服，并让编辑部的成员戈尔德施泰因代替他来。后者相当准确地描述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过程，只不过强调了几点，以便显示自己作为公民的勇气。他讲述道：“当我前往印刷厂时，煤气灯已经不亮了，街道上几乎一片漆黑。我注意到有几号人在印刷厂大楼旁边和附近的一些地方，而大门外的人行道上，有那么八到十个人。院子里，在围墙门旁，还站着三四个人。一个工头接待了我，并把我带到了办公室。我在那里看见了印刷厂的经理和三个不认识年轻人——显然是工人了。当我进去的时候，他们站了起来。

‘先生们，你们想说什么？’我问道。

其中一位年轻人默不做声地给我递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指示，要求在《新时代报》的和印刷厂印刷下一期

[8] 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苏沃林（Михаил Алексеевич Суворин，1860年12月18日—1936年8月17日，“小苏沃林”），俄国作家、记者。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苏沃林的长子。1903年起担任报刊《新时代》主编，持反犹主义立场。十月革命后逃离彼得格勒，同邓尼金合作。1920年经保加利亚流亡南斯拉夫。1936年死于贝尔格莱德。——中译者注

《消息报》。命令被写在了一张碎纸上，并被盖上了某种好似印章样的记号。

‘轮到你们印刷厂了。’其中一位使者对我如此说道。

‘什么叫做轮到我们了？’我问道。

‘我们已经在《罗斯报》、《我们的生活报》、《祖国之子报》、《证券交易所公报》那出版过了，而现在轮到您这了……您必须代表苏沃林向我们保证：在我们完成工作之前，您不会举报我们。’

‘我不能代表苏沃林，也不打算以自己的名誉担保。’

‘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会让您离开这里了。’

‘我想走就能走。警告你们，我是有武器的……’

‘我们和您一样有武器，甚至更好。’代表们一边掏出左轮手枪，一边说道。

‘请打电话给看门人和工头。’代表们跟经理说道。

他带有疑问地瞟了我一眼。我摊了摊手。看门人被叫来了。他们要求他脱下短皮大衣。我们都被逮捕了。一分钟后，我听到人群从楼梯走上来的脚步声。办公室门口和前厅里都站着人。

‘接管’就这么发生了。

三个代表进进出出，表现得极为活跃……

我对其中一位代表说道：‘恕我冒昧问一下，您打算用哪台机器？’

‘那台旋转式的。’

‘万一您弄坏了它呢？’

‘我们有一流的师傅。’

‘那上哪去找纸张？’

‘就用您的。’

‘这不就是明摆着的抢劫嘛！’

‘这也没办法啊……’”

最后，戈尔德施泰因先生屈服了。他答应保持沉默，并被允许离开。他叙述道：“我下楼了。门口一片漆黑。大门边上有一个拿着左轮手枪的‘无产者’，穿着从看门人那里拿来的短皮大衣，正在值班。另一个人划了一根火柴，而第三个人把钥匙插进锁里。咔嚓一声，大门打开，我走了出去……”

“那个夜晚宁静地过去了。印刷厂经理被告知，只要他能保证不说什么，他就可以走。但是他拒绝离开。无产者也让他留了下来……排字工作进行得相当缓慢，手稿的到来更是缓慢。最新的印刷材料还没有来。当经理提出加快工作速度的提议时，他得到的回答是：‘不着急，能成的。’直到早上五点，看上去很有经验的拼板工人和校对员出现了……”

“排版工作是在早上六点完成的。然后他们开始敲打字模，为铅板上色。由于罢工，没有煤气来给炉子点火，以便加热铅板。两名工人被派到了某个地方，煤气就通了。所有的商店都被禁止营业了，但整个晚上都能毫无困难地获得食物。商店为无产者开放。早上七点，无产阶级的官方报纸开始印刷。工作是在旋转式机器进行的，进行得很顺利。印刷工作一直持续到早上11点。这时，印刷厂被清空，一捆捆印刷好的报纸被抬到马车上送走。这些马车的数量充足，来自各地……警察第二天知道了这件事后，瞪大了眼睛……”

工作结束一小时后，一支庞大的警察勤务班在步兵连、哥萨克连和看门人的陪同下，冲进了印刷工人工会的房舍，准备没收第七期《消息报》。警察遭到了最激烈的抵抗。警察被告知，他们不会自愿交出现有的副本（35000份中的153份）。许多印刷厂的排字工人再听到警察闯入它们的工会建筑后，立即停止了才刚刚在十

一月罢工后恢复的工作，以等待进一步发展。警察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在场的人转过身去，警察偷走《消息报》，而执法记录将会把没收写成是由武力进行的。但这一妥协被愤然拒绝。警察没有冒险使用武力，并在完全的战斗队形中撤退，未能拿走任何一份《消息报》的副本。

在接管《新时代报》的印刷厂后，市行政长官通知警察局：今后在自己辖区内倘若发生类似接管事件，那么辖区警官将受到严厉处罚。执行委员会给出的答复时，只在总罢工时出版的《消息报》，今后在必要情况下将以同样的方式印刷。而事实上，在十二月罢工期间，第二届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届成员被逮捕以后的那个）又出版了四期《消息报》。

《新时代报》中关于对印刷厂的突袭的详细报道产生了非常出人意料的结果。各省的革命者也运用了这种模式。从此，为出版革命文献而接管印刷厂的做法在整个俄国变得很普遍……然而，在使用“接管”（Захват）这个词的时候，应该说有相当的保留。我们这里讲的，不是那些管理层只知道逃避责任，并因此表示完全准备好被逮捕的左翼报纸的印刷厂。但即使是关于《新时代报》最振聋发聩的情节，如果没有全体人员消极或者积极的同情，也是不可能实现接管的。一旦接管的带头人宣布了“包围状态”，从而免除了印刷厂人员的责任，被围困者和围困者之间的界限就消失了。“被捕”的排字工人非常乐意设置革命的原稿，师傅站在自己的机器旁，而经理则鼓励自己的人和外人都加快工作。当然，成功不是靠任何提前精心准备的接管计划，当然也不是靠物理上的武力，而是靠那种普遍同情的革命气氛。没有这种气氛，苏维埃的任何活动都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乍一看，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苏维埃选择夜袭这种危险

的方法来出版自己的报纸。社会民主主义的报刊在这期间是完全公开的。它的语气和《消息报》比起来差距不大。它公布了苏维埃的决议，并且完整地报道了它的会议。不错，《消息报》几乎只在大罢工期间，其他报刊保持沉默的时间出现。但是，苏维埃难道不能让合法的社会民主主义报纸破格不参加罢工，从而使自己不必突击资产阶级报刊的印刷厂吗？但是，它没有这么做，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孤立的，那么就没办法得出答案。但是，如果我们把苏维埃当作一个整体，从它的起源和它的所有策略来看，把它当作是最高革命权利在最紧张时刻的有组织的化身，那么当它不能也不想适应自己的敌人时，当它不顾一切前进，英勇地扩大自己的领土并扫除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时，一切就显而易见了。在总罢工期间，当所有的生活都完全停止时，旧政权以不间断印刷自己的《政府公报》为荣，并且这还是在士兵的保护下进行的。与此针锋相对，苏维埃使用自己的工人战斗队，确保了革命机关报的出版。

第十四章 反对派与革命派

于是，宣言非但没有恢复秩序，反倒帮助揭开了俄国社会两极之间的全部矛盾——煽动大屠杀的贵族—官僚反动派和革命的工人之间的矛盾。在最初的几天里，或者更确切地说，甚至是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宣言似乎完全没有影响到反对派中最温和分子的情绪。但这也只是“似乎”。10月18日，其中一个最强大的资本组织，即所谓的“钢铁工厂主咨询办公室”给维特伯爵写了封信：

“我们必须直言不讳：俄罗斯只相信事实；她的血和她的贫穷不再允许她相信话语。”在提出全面大赦的要求时，咨询办公室“特别高兴地注意到”，革命群众的暴力表现极其有限——他们行动的纪律性是前所未闻的。根据该办公室自己的声明，它并不是普选权“在理论上”的支持者。但这一办公室确信，“工人阶级已经有力地彰显了其政治意识及其政党纪律，必须吸纳其参与人民自治。”心胸多么宽广！但是，唉！转瞬即逝。如果我们要说这纯粹是一种装饰性的政策，那还是太蠢了。毫无疑问，幻想元素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资本仍抱着某种希望，即广泛的政治改革将会立即使工业的飞轮畅通无阻地转动起来。这里就解释了一个事实：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对十月罢工本身采取了友好的中立态度。几乎没有关闭工厂的情况。莫斯科地区的金属工厂主决定拒绝哥萨克人的服务。但对斗争的政治目标表示同情的最普遍的方式还是在整个十月罢工期间支付工资：在等待工业在“法治社会”下开花结果的同时，他们也把这笔开支记在了“特殊生产成本”一栏。但是，在支付这些工人罢工日的工资时，资本也很清楚直白地说过：这是最后一次了！工人身上体现出的行动力量使他们意识到了保持警惕的必要性。资本最美好的愿望仍没有实现：群众运动并没有在宣言公布后平静下来；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力量、

独立性和社会革命性质越来越清楚的展现在世人面前了。就像当制糖业的种植园主受到没收土地的威胁时那样，整个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会被迫在工人面前一步步地退却：提高工资，缩短工时。

除了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恐惧以外（这种恐惧在 1905 年的最后两个月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还有一些更狭隘但同样尖锐的利益，促使资本立即与政府结盟。首先是对金钱平凡而又不可抗拒的需求，而企业家们虎视眈眈并展开攻击的对象，就是国家银行。这一机构承当了专制“经济警察”的液压机，而维特在其主宰财务的十年中一直是这液压机的大师傅。对巨型企业来说，是生存还是死亡，这个问题取决于银行的运作，并辅以部长的观点和同情心。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不合规章的贷款、梦幻般的票据贴现、经济政策领域普遍存在的任人唯亲——所有这些都为资本重生为反对派贡献了不小的力量。但是，银行在战争、革命和危机的三重影响下将其业务减少到最低限度时，许多资本家发现自己陷入了真正的困境之中。他们不再关心一般的政治观点——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需要钱。他们在 10 月 18 日到 19 日的凌晨两点对维特伯爵说：“我们不相信话语，给我们事实。”维特伯爵于是就把手伸进了国家银行的钱箱里，给了他们“事实”……大量的事实。核算本里的数字疯狂上升——1905 年 11 月和 12 月到 1.385 亿卢布，而去年同期才 8310 万卢布。对私人银行的借贷增加得更为迅猛。1904 年才 3900 万卢布，1905 年 12 月 1 日就已经达到 1.482 亿卢布了。其他所有业务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增长。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维特政府适当考虑了资本主义辛迪加提出来的口号——“俄国的血液和贫穷”，其结果就是“十月十七日联盟”的成立。这个党的诞生，与其说是源于政治恩惠，不如说是源于一次普通的金钱贿赂。工人代

表苏维埃，从一开始，就遇见了一个坚决的、有意识的敌人，那就是在自己“专业”或者政治的联盟中组织起来的企业家。

但是如果我们说十月党人至少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明确的反革命立场，那么，在那些日子中最可悲的政治角色则是由知识分子——小市民激进主义者的政党扮演的。在这六个月后，这个党在塔夫利宫的戏台上上演了一场非同寻常虚假的古典主义悲情表演。我们在这里说的就是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十月罢工的高峰期举行的。只有不到一半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其余的人都被铁路罢工堵在了路上。10月14日，新党定下了自己对事件的基调：“鉴于我们完全同意提出的要求，我党认为有责任宣布自己与罢工运动的完全团结。我党断然（断然！）拒绝通过与政权代表进行谈判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目标的想法。我党将采取一切行动以防止冲突，但事先声明：如果失败了，我们的同情和支持站在人民一边。”三天后，沙皇签署了立宪宣言。革命政党终于摆脱了地下状态的诅咒，还没有来得及擦去额头上的血迹和汗水的时候，就一头扎进了人民群众，向他们发出呼吁，团结他们进行斗争。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人民的心脏被革命的铁锤重新锻造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立宪民主党人——这些穿着燕尾服的政治家，法庭上的发言人，乡绅会议上的政论家，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消极地等待着宪法之水开始流淌。宣言有了，但还没有议会。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议会，也不知道它会怎么到来，更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到来。他们不信任政府，更不信任革命。他们的秘密梦想就是把革命从自身拯救出来，但无计可施。他们不敢参加人民的会议。他们的报刊暴露了自身的软弱无能和胆小怕事，也无人问津。因此，在俄国革命最艰难的时期，立宪民主党人发现自己是局

外人。一年后，米留可夫完全承认了这一事实，并为自己的政党辩解——不是辩解自己没有把力量放在革命的天平上，而是辩解自己没能试图阻止革命。他在第二届杜马选举的时候写道：“即使是像立宪民主党这样的政党的行动，在 1905 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也是绝对做不到的。那些指责我党在当时没有举行集会抗议以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的人……只是单纯不理解，或者忘记了参加集会的民主派公众的情绪。”这就是“人民”政党的自我辩护：它不敢走向人民，因为害怕人民会被它的丑恶嘴脸吓跑！

工会联盟在这一期间则起到了更值得尊敬的作用。十月罢工的普遍化有激进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他们通过组织罢工委员会并向其派出自己的代表，阻止了那些不处于工人直接影响下的机构的活动。这样一来，地方自治会、市议会、银行、办公室、法院、学校甚至参议院的工作都被停止了。知识分子的左翼向工人代表苏维埃提供的财政支援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如果是论它在一切领域中的公开活动的话，那俄国和西方资产阶级报刊对它巨大作用的描述就显得很荒谬了。工会联盟负责革命的补给，充其量只是一个辅助的战斗单位。它自己也从未声称过自己处于领导地位。

事实上它能做到这一点吗？它最初的组成单位，一直到现在，都是被历史剪掉了翅膀的受教育的庸人。革命唤醒了他们，把他们放到了原先高不可攀的位置。革命让其没有了报纸，熄灭了公寓里的电灯，在黑暗的墙上用火书写下了新的、模糊不清但伟大的落款。他想信，但不敢信。他想向上飞，但飞不起来。也许，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理解他的灵魂大戏，那最佳的观察时机不是在他写激进决议的时候，而是在他坐在自己的茶桌前的那一刻。

* * *

罢工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去了认识的一家人那里做客，这个家庭生活在小市民激进主义的正常城市氛围中。在餐厅的墙上高挂着的，是我们党刚刚印在大纸上的纲领：它是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在罢工后出版的第一期中的附件。整个家庭都洋溢着兴奋的气氛。

“嗯，嗯……不坏嘛。”

“这是啥？”

“您说呢？是你们的纲领啊！请您读一下这上面写了什么。”

“我已经读过不止一次了。”

“不，这不够！……这里每个字母清楚明晰地写着，‘本党把推翻沙皇专制作为其当前的政治任务……’您明白吗？**推翻！**

‘……以民主共和国取而代之’……共——和——国！您晓得不？”

“我觉得我是晓得了。”

“但这是合法印刷的，是在警察眼皮底下发售的，您可以在冬宫旁边用5分钱^[1]买到一份！消灭沙皇专制——‘零售价5戈比’！怎样？！”

“那您喜欢它吗？”

“哎呀，‘喜欢’……我喜不喜欢有什么关系呢？指的是*他们*，现在不得不在彼得宫城闻着这新报纸的油墨香味呢。现在再让我来问问您：他们会喜欢这样吗？”

“我怀疑！”

一家之主（*pater familias*）是所有人之中最激动的一个。两三周前他还带着从青年时代就浸泡在民粹党人偏见的激进小市民习气来憎恨社会民主主义，今天他就用一种全新的感觉——崇拜和恐惧的混合物，来替代这种仇恨了。

“今早我们在帝国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处那也读到了这同一份

[1] 1卢布合100戈比，戈比在我国相当于分。——中译者注

纲领——那也收到了这份报纸……您应该瞧瞧那些先生们！主任把他的两个副手和我一起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锁上门，把这纲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老实跟你讲吧，当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您怎么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主任这么问了我一句。”

“然后我回问了一句：‘不，您怎么看，谢苗·彼得洛维奇？’”

“‘你们知道吗，’他说，‘我哑口无言。难道，不正是在不久之前，报纸上连批评个小警官的字眼都不能出现吗？而今天他们居然就能公开地对我大俄国当今皇上（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о Государь Император）说：滚出去！这群人一点也不讲礼数……一点也不……说话口无遮拦……’其中一个副手开口道：‘语气确实有点重，要是稍微轻点就好了……’而谢苗·彼得洛维奇透过眼镜框看着他：

‘毕竟这对你来说不是周日的小品文，而是最值得尊敬的党纲……’您知道这群公共图书馆的先生们，他们是怎么结束对话的嘛？他们问，‘那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呢？’您觉得这怎么样？”

“非常喜欢。”

“唔……那到底怎么才能成为你们那个党的党员呢？”主人有点犹豫不决地问道。

“没什么能比这更简单的了。最重要的是，你要认可这个纲领。然后你就加入当地的组织，定期交党费。毕竟你喜欢这个纲领嘛。”

“妈的，的确，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但您对目前的形势怎么看？不过请您不要像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报纸的编辑一样回答我这个问题，要绝对坦诚……当然，离民主共和国还远着呢，但是宪法不是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吗？”

“不，在我看来，共和国要比您认为的近得多，宪法才是远得多。”

“那我们他妈的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难道这不是宪法吗？”

“不，这只不过是戒严的序幕。”

“啥玩意？扯淡。这只不过是您报纸式的行话罢了。您自己都不信。天方夜谭！”

“不，这是最纯粹的现实主义罢了。革命的力量和勇气都在增长。您看，工厂和车间，还有大街，在发生什么……最后，看看您挂在墙上的那张纸吧。两星期前您还不可能会这么做。那现在让我问您刚才您问我的这个问题：他们在彼得宫城，怎么看这件事？毕竟，他们还活着，也想活下去。他们手头上还有军队。您是不是希望他们能够不战而降？不，首先，在离开之前，他们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投入到行动中去，直到最后一把刺刀。”

“那宣言呢？那大赦呢？难道它们就不是事实了？”

“宣言仅仅意味着暂时休战，只不过是一声喘息。那大赦呢？……从您家的窗户，还可以看到彼得保罗要塞的尖顶：它仍然坚固地矗立着。克雷斯蒂监狱^[2]是这样，保卫部^[3]也是这样……您怀疑我的坦诚，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那么我现在就这么跟你说吧：我个人完全有资格接受大赦，但是我不急于恢复合法身份。到收场以前，我都会以这个假护照继续生活。宣言既没有改变我的法律地位，也没有改变我的策略。”

“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先生，你们应该采取更谨慎的政策？”

[2] 克雷斯蒂监狱（Кресты，意为“十字”）是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所监狱，位于市中心以东涅瓦河畔的复活滨河路，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大道，包括两座十字形建筑（因此得名）和东正教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该监狱有 960 间牢房，最初为 1150 名囚犯设计。在建造一个现代化的监狱设施（也以十字架的形式）之后，计划关闭。——中译者注

[3] 即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中译者注

“举个例子？”

“比如不要谈论有关推翻专制制度的内容。”

“您的意思是说，您认为，如果我们能够使用更礼貌的语言形式，彼得宫城就会同意建立共和国并没收土地？”

“唔……我觉得您在夸大其词……”

“我们将拭目以待……先失陪了，我要去参加苏维埃的会议。入党的事情怎么说？您只要说一声，我们就能马上给你做登记。”

“感谢，感谢……有的是时间……局势太不确定了……我们之后再谈谈……祝您好运！”

第十五章 十一月罢工

十月内阁在无数的水下暗礁中摸索着一个又一个危险。往哪走呢？它自己也不清楚。

10月26日和27日，喀琅施塔得——一个距彼得堡只有步枪射程三倍远的地方，发生了武装起义。士兵中具有政治意识的部分试图阻止群众，但自发的愤怒还是爆发了。由于无法阻止运动，军队中最优秀的分子走在了它前面。但是，他们没能成功预防当局挑起的一些流氓屠杀。在这些屠杀中，起最主要作用的是著名的“显圣者喀琅施塔得约翰”（чудотворец Иоанна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го），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最黑暗无知的水手。28号，喀琅施塔得宣布戒严，不幸的起义被镇压了。最优秀的士兵与水兵受到了处决的威胁。

在喀琅施塔得要塞被攻占的那天，政府向全国发出了强烈的警告，在整个波兰实行戒严——这是宣言内阁成立后在第十一天时给彼得宫城佞臣丢下的第一块大骨头。维特伯爵承担了走下这一步的全部责任：他在一份政府通告中，诽谤说波兰人妄图分裂祖国（！），并警告他们不要逾越雷池一步，“这不是第一次了”。第二天，为了不使自己成为特雷波夫的俘虏，他不得不鸣金收兵。他承认，鉴于“波兰人过于敏感”，政府与其说是考虑实际发生的事情，不如说是预测其可能的发展后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戒严令是宪法对波兰人民政治性情的赞美。

10月29日，切尔尼戈夫省、萨拉托夫省和坦波夫省的一些地区爆发了农潮，宣布了戒严。看起来，坦波夫的庄稼人也“过于敏感”了。

自由派圈子的牙齿开始因恐惧而打颤。尽管他们对维特嗤之以鼻，但还是打自心底相信他。但现在，杜尔诺沃自信地从维特背

后走了出来。杜尔诺沃拥有足够的才智，以便把加富尔^[1]的箴言“任何傻瓜都可以在围困状态下执政”^[2]改编成一种理论，供自己管理时参考。

工人的革命本能告诉自己：允许反革命公开进攻而不教训它，就是鼓励它更加放肆。10月29日、30日和11月1日，彼得堡的大多数工厂都举行了群众集会，要求苏维埃采取严厉的抗议措施。

在11月1日的一次拥挤而骚动的会议上，经过热烈的讨论，苏维埃的大多数成员通过了下述决定：

“政府继续踏着尸体前进。它正在召开军事法庭，审判那些奋起捍卫自己的权利、人民的自由的喀琅施塔得陆海军士兵。它把戒严令的绳索套在了受压迫的波兰的脖子上。”

“工人代表苏维埃呼吁彼得堡的革命无产阶级，采用已经受考验证明其力量的政治总罢工，以及群众总集会的形式，表达与喀琅施塔得革命士兵和波兰革命无产阶级兄弟般的团结。”

“明天，11月2日，中午12点，彼得堡工人将以下述口号停止工作：打倒军事法庭！打倒死刑！打倒笼罩在波兰和整个俄罗斯的戒严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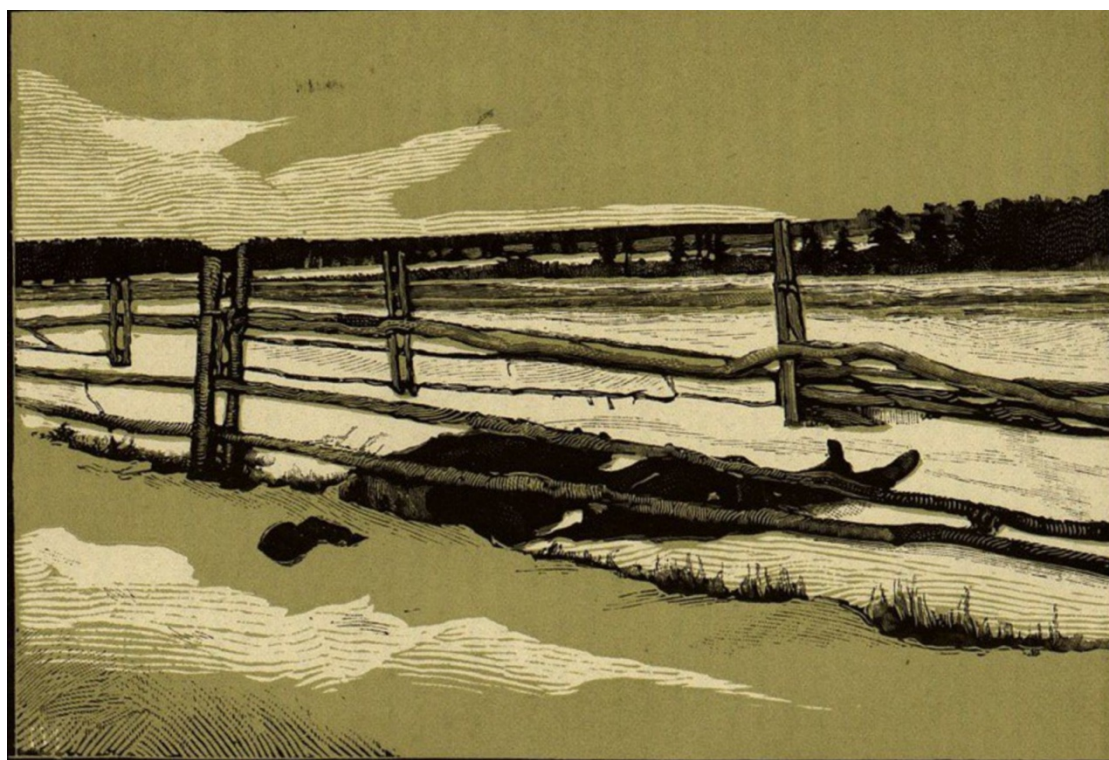
这一呼吁的成功程度远超所有人的预期。尽管距离十月罢工

[1] 卡米洛·保罗·菲利波·朱利奥·本索，加富尔、切拉伦戈与伊索拉贝拉伯爵（Camillo Paolo Filippo Giulio Benso, conte di Cavour, di Cellarengo e di Isolabella, 1810年8月10日—1861年6月6日），意大利资产阶级政治家、外交家，统一运动“三杰”之一。出身于贵族家庭。1832—1849年任格林扎内·加富尔（Grinzane Cavour）市长。1848—1861年任撒丁王国议会议员。1850—1852年任撒丁王国农业和商业大臣，1851—1852年兼任财政大臣。1852—1859年、1860—1861年任撒丁王国首相，期间领导了统一战争。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后担任首相，同年6月6日逝世。——中译者注

[2] 此句名言原文为：“Tutti son capaci di governare con lo stato d'assedio.” ——中译者注

列夫·托洛茨基《1905》第一部分

的停止还不到两个星期，但彼得堡的工人还是团结一致地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到11月2日12点以前，往苏维埃派了代表的所有大型工厂和车间都举行了罢工。迄今为止还未参与政治斗争的中小型工业场所也加入了罢工，选出了代表，并把他们都派到了苏维埃。彼得堡铁路枢纽的地区委员会也通过了苏维埃的决定，并且，除了芬兰铁路以外，其他所有线路都停止了运营。参与十一月罢工的绝对人数不仅超过了一月的，同时也超过了十月的人数。邮政与电报部门、马车夫、有轨马车和大多数店员没有参与罢工。只有《政府公报》、《彼得堡市行政长官公报》和《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仍在出版——前两份是在士兵保护下印刷的，而最后一份则是在工人战斗队的保护下出版的。



（在波罗的海边疆区。路上的射击。）

维特伯爵完全没有料到。两周前他还以为，既然手握权柄，那他要做的只有领导、鼓励、约束、威胁、管理……十一月罢工，这一无产阶级对政府之虚伪的愤怒抗议，把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打得晕头转向，找不着北。没有什么比他希望安抚无产阶级的那封电报

更能说明他对革命事件含义的无知，面对这些事件时的幼稚困惑，以及他的刚愎自用。以下是未经删改的内容：

“工人兄弟们，回去工作吧，停止动乱吧，想想你们的老婆孩子。不要听信那些愚蠢的建议。皇上作出批示，要我们特别关注工人的问题。为此，当今皇上下令成立了商务和工业部，它将负责在工人与企业之间建立公正的关系。给我们以时间——但凡一切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都能给你们办好。请听从一个对你们有好感而又希望你们过得好的人的建议吧。维特伯爵。”

这封无耻的电报，笑里藏刀，收敛了懦弱的仇恨，试图摆出友好屈尊的姿态，在 11 月 3 日的苏维埃会议上被收到并公开，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随即，我们提出的答复在热切的一致下被通过，并在第二天的《消息报》上发表。以下是它的内容：

“工人代表苏维埃，听完了维特伯爵给他的‘工人兄弟’的电报，首先要表达自己的惊讶：沙皇的宠儿竟不拘礼节，允许自己称呼彼得堡工人为自己的‘兄弟’。无产者和维特伯爵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家庭亲属关系。

关于问题的实质，苏维埃宣布：

1. 维特伯爵呼吁我们为自己的老婆孩子着想。作为回答，工人代表苏维埃呼吁所有工人计算一下，自维特掌权之日起，工人的队伍中增加了多少孤儿寡母。

2. 维特伯爵提请我们注意皇上对工人的关怀。工人代表苏维埃提醒彼得堡无产阶级，回忆起 1 月 9 日那个流血星期日。

3. 维特伯爵想要我们给他‘时间’，并承诺为工人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工人代表苏维埃知道，维特已经找到了时间，以便把波兰交给军事刽子手。而且，工人代表苏维埃毫不怀疑维特伯爵会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以便扼杀革命的无产阶级。

4. 维特伯爵自称对我们有好感，并且希望我们过得好。工人代表苏维埃宣布，它不需要沙皇宠儿的恩惠。它要求一个建立在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选举权基础上的人民政府。”

据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称，伯爵收到他那些罢工的“兄弟们”给他的回信后，几近窒息。

11月5日，彼得堡的电报社报告说：“鉴于各省正在散布(!)将对参与喀琅施塔得骚乱的下层官兵进行军事法庭审判并处决的谣言，我们被授权声明，所有这些谣言都是为时过早(?)且没有根据的……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参与者没有也不将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这个明确的宣言，除了意味着政府在罢工面前屈服以外，没有别的意思。当然，在彼得堡抗议的无产阶级暂时中断了首都的贸易—工业生活的时候，对“各省的谣言”的无稽之谈，当然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在波兰问题上，政府甚至更早开始作出让步，宣布一旦那里的“兴奋平息”，就打算在波兰王国的各省解除戒严。^[3]

11月5日晚，执行委员会认为心理学上的高潮时刻已经到来，向苏维埃提交了结束罢工的决议。作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描述，我们这里引用执行委员会报告人的讲话：

“刚刚公布了一份政府电报。电文指出，喀琅施塔得水手将不由战地军事法庭审判，而是被送交地区军事法庭。

这封电报不过是沙皇政府软弱的表现，不过是我们力量的表现。我们可以再一次祝贺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取得了道德上的巨大胜利。但是，让我们直说吧：即使这封政府电报没有出现，我们还是应该呼吁彼得堡的工人停止罢工。今天的这封电报表明，整个俄罗斯的政治示威正在减弱。我们这场真正的罢工具有**示威**的性质。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判断其成败。我们的直接目的，是向觉

[3] 戒严是由11月12日的命令解除的。——原注

醒的军队表明，工人阶级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工人将不会默默地看着他们被欺负。难道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吗？难道我们没有把每个诚实的士兵的心吸引到我们一侧来吗？谁能否认这一点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难道有人能够断言我们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吗？罢工的结束能够被视为我们的失败吗？难道我们没有向整个俄国证明：伟大的十月斗争结束还没几天，在工人们还没来得及洗去他们的血迹，愈合自己的伤口时，群众的纪律性仍然强大，以至于苏维埃只要一句话，就能让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罢工。请看吧！这次罢工甚至连最落后的工厂都参与进来了——它们以前从来没有参与过罢工；而现在，在苏维埃，和我们一起开会的，就有从那些工厂里来的代表。军队中的先进分子组织了抗议集会，他们以这种方式参加了我们的示威。这还不算成功吗？这还不算出色的结果吗？同志们，我们已经干了我们该干的。欧洲的证券交易所再度向我们的力量致敬。关于工人代表苏维埃决议的消息，一经放出，就使我们的离岸汇率大幅下跌。因此，我们每一个行动——无论是对维特伯爵的答复，还是对整个政府作出的回应，都对专制主义造成了决定性的打击。

一部分同志要求罢工持续下去，直到陪审团参与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的审判，以及当局解除波兰的戒严令为止。换句话说——就是直到现政府垮台，因为为了对付我们的罢工，沙皇专制会调动一切力量。同志们，我们必须面对这个事实。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行动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制度，那么，我们当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该将愤慨深藏胸中，并拒绝进行抗议示威。但是，同志们，我们的战术，完全不是基于这种模式。我们的行动——是一系列连续的战斗。它们是为了瓦解敌人，赢得新朋友的同情。对我们来说，有谁的同情能比军队的同情更宝贵的吗？请明白

这一点：当我们在讨论是否继续罢工的问题时，我们实质上是在讨论：是保留罢工的示威性质，还是把它变成一场决战，或者说，把它继续下去，直到完全胜利或失败。我们即不害怕鏖战，亦不害怕失败。我们的失败，只不过是通往成功的台阶罢了。我们不止一次地向我们的敌人证明过这一点了。但是，对于每一场战斗，我们都会寻求最有力的条件。事件是为我们工作的，强迫它往前走对我们没有好处。我问问你们，推迟决定性的冲突，对谁有利？是有利于我们，还是有利于政府？当然是我们，同志们！因为明天我们会更强大，而后天还会比明天更强大。同志们，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最近才拥有了举行上千人集会、组织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并通过我们的革命报刊向全国所有居民讲话的条件。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条件，在无产阶级队伍中进行广泛的鼓动和组织行动。我们必须延长群众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间，而且是尽可能的延长；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两个月，以便届时作为一支可能更紧密结合的、更有组织度的大军进行行动。当然，对政府来说，在现在，也就是我们还没准备好进行最后的斗争时，对我们开枪更方便。有些同志，就和取消葬礼性示威那天一样，抱着同样的疑问：如果我们今天打了退堂鼓，以后还能再度唤醒群众吗？群众难道不会再度入睡吗？对此，我得反问：难道现制度能够创造条件，让群众安然入睡吗？难道我们真的需要担心未来不会发生能够唤醒他们的事件吗？请相信我，会有很多这样的事件的——沙皇专制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也请不要忘记，在我们面前有一个选举运动，必须通过它使整个革命无产阶级站立起来。谁知道这场选举运动会不会以无产阶级把现有政权炸上天告终？让我们保持冷静，让我们不要预测起事件来。我们应该给予革命无产阶级更多的信任。难道他们在1月9日以后就睡着了吗？施德洛夫斯基的委员会之后呢？

黑海事件之后呢？不，革命的浪潮正在稳步上升；它打翻并淹没整个专制制度的时刻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一场决定性的、无情的斗争正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罢工，让我们对其巨大的道德胜利感到满意，让我们竭尽全力去创造并巩固我们最需要的事物：组织、组织和组织。我们只要环顾四周，就会发现每天都能收到这一方面的最新成果。

铁路工人、邮政—电报官员正在组织起来。他们将用铁轨和电报导线，把我国所有的革命策源地融合成一个整体。他们将使我们能够在时机到来之时，在 24 小时之内就能够让整个俄国站起来。我们必须为这一时刻做好准备，以最高的纪律与组织面对它。开始工作吧，同志们！

我们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工人的战斗组织，并武装他们。请你们在每个工厂里选出十人组成一个十人战斗小组（十人队），选出百人组成一个百人战斗小组（百人队），并在这一百个人中设立一个指挥官。请你们将这些支部的纪律发展到极高的程度，以便在每个必要的时刻整个工厂都能在第一声召唤下开始行动。记住，在决定性行动时，我们只能依靠我们自己。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开始不信任我们，并敌视我们。民主派知识分子也在摇摆不定。工会联盟在第一次罢工中欣然加入我们，但对第二次罢工的同情心则要少很多。他们中的一个成员在几天前告诉我：‘你们的罢工正在使自己的公众反对自己。你们难道真的期望孤军奋战就能战胜敌人吗？’我提醒他，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个瞬间，当时国民公会颁布作出了这样的决议：‘法兰西人民不会在其自己的领土上与敌人签署任何条约。’国民公会中的一名代表喊道：‘难道你们和胜利签订了条约？’他得到的回答则是：‘不，我们已经与死亡缔结了条约。’

同志们，当自由派资产阶级仿佛为自己的背叛行为感到骄傲，询问我们‘你们是否打算在没有我们帮助的情况下进行战斗？难道你们和胜利签订了条约？’时，我们就应该把答案扔在他们脸上：‘不，我们已经与死亡缔结了条约。’”

苏维埃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在11月7日星期一中午12时取消罢工式示威的决定。印有苏维埃决议的启示被分发到各工厂和车间，并在全市张贴。在指定的时间里，罢工以它开始时的那种团结一致结束了。它持续了120个小时，比波兰的戒严状态少了三倍时间。

当然，十一月罢工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解开了几十名水兵脖子上的绞索——在一场会吞噬数万人的革命中，几条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同样，意义也不在于它迫使政府匆忙停止了对波兰的戒严——对一个长期受苦受难的国家，哪怕再延长一个月的紧急法又有什么区别呢？十一月的罢工是向整个国家发布的警报呼喊。谁知道，假如波兰的实验成功以后，无产阶级并没有表明它“活着，精力充沛，并准备好以牙还牙”^[4]的话，一场野蛮的反动狂欢节会不会在全国展开？这场革命中不同民族之间的完全团结，与1848年奥地利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彼得堡无产阶级以革命本身的名义，不能也不敢将自己的波兰兄弟毫无抗议地交到不耐烦的反动派手中。而且，尽管它关心自己的未来，他不能也不敢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临近保持沉默。11月的罢工，是无产阶级跨过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头向军营内的囚犯发出的团结呼声。而这一呼声被听见了。

《泰晤士报》（The Times）的记者在报道十一月罢工的时候，引用了一段禁卫军上校的话：“不幸的是，不能否认，工人对喀琅

[4] 苏维埃决议中的原话。——原注

施塔得造反者的干预对我们的士兵产生了令人遗憾的道德影响。”这“令人遗憾的道德影响”，就是十一月罢工的主要意义。它一击就震醒了军队中的一大圈人，并在短短几天内导致了彼得堡卫戍部队营房中的一些集会。在执行委员会，甚至在苏维埃本身的会议里，不只是个别士兵，而且还有士兵代表，发表讲话，要求帮助；与士兵的革命联络获得了巩固，传单得到了广泛的散布。

在那些日子里，军队中的兴奋情绪甚至上升到了其贵族领导层那里去。在十一月罢工期间，笔者作为“工人的发言人”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这在当时是第一无二的。在此值得讲一下这件事。

我带着 X. 男爵夫人^[5]的邀请卡，在晚上 9 点来到了彼得堡最豪华的别墅之一。看门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在那些日子里下定决心对任何事情都司空见惯的人。他脱下我的大衣并把它挂在长长的一排军官大衣中间。仆人等着我的名片。呜呼！一个黑户能有什么名片呢？为了让他摆脱困窘，我把女主人给我的邀请卡递给了他。来到大厅的首先是一个学生，然后是一个激进的编外副教授——《坚固》(Солидный)杂志的编辑，最后是男爵夫人本人。显然，他们以为“工人的发言人”会是什么更厉害的角色。我报了自己的身份。他们热情地邀请我进去。掀开门帘，我看到里面有六七十个人。在过道的一侧的一排椅子上，坐着三四十名军官，还包括一些优雅的禁卫兵；而在另一侧的则是一群女士。在前面的一个角落里，有一群穿着黑色礼服的政论家和激进的律师。一位不知名字的老先生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担任主席。我在他旁边看到了罗季切夫^[6]——立宪民主党未来的“代言人”。他讲了关于在波兰实行戒

[5] 现在可以提到这个人的人名了：依克斯库尔·冯·希尔德布兰德。——原注

[6] 费奥多尔·伊兹马伊洛维奇·罗季切夫 (Фёдор Измайлович Родичев, 1854 年 2 月 9 日—1933 年 2 月 28 日)，1876 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同年参加了塞土战争。1878 年起任特维尔地方自治局法官。1903 年加入解放社。1905 年发起成立立宪民

严的问题，以及自由派圈子和军队中的有思想的部分对波兰问题应负的义务。讲话沉闷而无力，思想短视而萎靡。最后的掌声也非常萎靡。之后发表讲话的，是昨天的“斯图加特流亡者”彼得·司徒卢威，他是得益于十月罢工才可以回国的，并且利用了这个机会立即占据了乡绅自由派中极右翼的位置，在这个位置发起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暴力运动。他是一个蹩脚得无可救药的演讲者，结结巴巴，气喘吁吁，试图证明军队应该站在十月十七日宣言的基础上，保护这个宣言不受来自左和右的攻击。这种保守的毒舌在一个前社会民主党人的嘴里听上去特别奇怪。我听完这个人的演讲时，就想起七年前这个人曾写道：“欧洲越往东，资产阶级在政治关系上就越弱小，越胆小，越卑鄙”，之后，他自己拄着德国修正主义的拐杖，跑进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营帐，以便亲身证明他历史上那句概括的真理性……在司徒卢威之后，激进政论家普罗科波维奇谈到了喀琅施塔得起义，然后是一位失宠的教授——他正在犹豫到底是选择自由主义，还是选择社会民主主义——他什么都谈，又跟什么都没说似的；然后是一位著名的律师（索科洛夫^[7]），他请军官们不要阻止军营中的鼓动。发言变得越来越坚决，气氛变得越来越热烈，轮到我讲话时，我指出，工人没有武器，和他们一起的自由也没有武装，国家军火库的钥匙在军官们手中。在决定性的时

主党，并于次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06—191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在任期间自居为“进步派”，曾将绞刑架比喻为“斯托雷平的领带”。二月革命后在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工作，反对芬兰独立，主张继续战争。十月革命后逃往俄罗斯南部，同邓尼金合作。1919年流亡塞尔维亚，企图建立一个“塞尔维亚军团”武装反对苏维埃政权。1920年任波兰志愿军代表，随后流亡法国，在立宪民主党巴黎派活动。后退休，流亡瑞士，1933年死于洛桑。——中译者注

[7]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索科洛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околов，1882年？月？日—1927年3月20日），俄国律师，立宪民主党人。内战期间曾同邓尼金合作，后流亡保加利亚，在索非亚大学任教。1927年死于保加利亚。——中译者注

刻，这些钥匙必须交给人民——它们理应属于人民。这是我第一次，可能也是一生中最后一次在这样的听众面前讲话了……

无产阶级对士兵施加的“令人遗憾的道德影响”导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措施。在一个禁卫军团中进行了逮捕；一些水兵从彼得堡被押送到喀琅施塔得。各方士兵都在问苏维埃该怎么做。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发表了一份名为《告士兵书》的宣言，以下是它的内容：

工人代表苏维埃答复士兵们：

陆海军的士兵兄弟们！

你们经常向我们工人代表苏维埃寻求建议和支持。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士兵遭到逮捕时，你们向我们寻求帮助；当军事电子技术学校的学员被逮捕的时候，你们向我们寻求帮助；当舰队船员从彼得堡被押送到喀琅施塔得的时候，他们寻求我们的保护。

许多团都向我们派出了自己的代表。

士兵兄弟们，你们是对的。除了劳动人民以外，没有人可以保护你们。除非工人为你们站出来，否则你们就没有救了。被诅咒的军营会掐死你们。

工人总是站在诚实的士兵一边。在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工人与水手们同战斗，共存亡。政府成立了一个战地军事法庭来审判喀琅施塔得的水手和士兵，而在那一刻，彼得堡的工人立即在各地举行了罢工。

他们愿意挨饿，但不愿意在士兵被虐待时袖手旁观。

我们，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全体彼得堡工人的名义告诉你们，士兵们：

你们的麻烦就是我们的麻烦；你们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而我们的胜利将是你们的胜利。只有人

民和军队的联合努力，才能打破这些枷锁。

如何解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人？如何解救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清除沙皇的监狱和军事法庭。我们没法单枪匹马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人放出来，也没法独立拯救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人。我们必须以团结一致的强大力量强攻，把专制与独裁从我们的祖国脸上扫除。

谁能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

只有劳动人民和他们在武装部队中的兄弟们。

士兵兄弟们！觉醒吧！起来吧！到我们这里来吧！诚实勇敢的士兵们，和组建自己的工会吧！

唤醒睡着的人吧！拉一把落后的人吧！与工人达成协议吧！与工人代表苏维埃建立联系吧！

前进，为了真理，为了人民，为了自由，为了我们的妻子和儿女！

工人代表苏维埃向你们伸出了兄弟般的手。

这个宣言是在苏维埃存在的最后时日通过并发表的。

第十六章 “八小时工作制和火枪！”

在这场战斗中，无产阶级孤军奋战。没有人愿意或者能够帮助它。这次斗争的重点不是出版自由，也不是制服暴徒的横行霸道，甚至也不涉及普选权。工人要保证自己的肌肉、神经和大脑能够得到保护。他决定为自己赢回一部分生命。他不能再等下去了，也不想再等下去。在革命事件中，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从中瞥见了更高的生命形式。他仿佛为精神生活重生了。他所有的感官都像乐器上的琴弦一样绷紧了。他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无边无际的、光辉灿烂的世界……为描写工人群众革命重生的图画的诗人，是不是很快就要出现了呢？

在十月罢工将烟雾缭绕的工厂变成了革命言论的殿堂后，在一场让最疲惫的心都充满骄傲的胜利后，工人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机器的诅咒控制之中。凌晨，他在灰色黎明中，半睡半醒地跳进工业地狱；而在深夜，他在令人厌烦的机器吹响哨声以后，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了黑暗、可恨的洞里。周围都有明亮的灯光——那么近，又那么远——那是他自己点燃的。社会主义报刊、政治会议、党内斗争——这是一场利益和激情的巨大而美丽的盛宴。出路何在？在八小时工作制上。这是纲领中的纲领，也是遗训中的遗训。只有八小时工作制才能立即解放工人阶级的力量，用于当时的革命政治。彼得堡的无产者们，拿起武器吧！残酷的斗争之书打开了新的篇章。

还在大罢工进行的时候，代表们就经常说，在复工时，群众绝不会同意旧有的工作条件。10月26日，彼得堡某区的代表们决定在不过问苏维埃的情况下，通过革命手段在自己的工厂内实行八小时工作制。27日，代表们的建议在几次工人会议上得到一致通过。在亚历山德罗夫机械厂，为了避免带来压力，这个议题是以无

记名投票方式决定的。结果是：1688票赞成，14票反对。几个主要的金属加工厂从28日开始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同一时间，彼得堡的另一端，也爆发了一场同样的运动。10月29日，运动的发起人向苏维埃报告说，八小时工作制已经通过“接管的方式”在三个大型工厂实行了。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没有迟疑的余地。难道不是接管给了我们集会和出版自由？难道不是革命的主动性才给我们带来了立宪宣言吗？难道对我们来说，资本的特权比君主的特权要更加神圣吗？怀疑者的胆怯声音被淹没在普遍的热情浪潮中。苏维埃通过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决议：它要求所有工厂和车间都自发主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个决定是在几乎没有任何讨论的情况下通过的，仿佛它就是完全理所当然的一步。苏维埃给了彼得堡工人24小时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这个时间对工人来说完全足够了。一位来自金属厂的代表，我的朋友涅姆佐夫^[1]写道：“苏维埃的提议得到了我厂工人的热烈响应。在十月我们为整个国家的要求斗争，而现在我们提出了自己无产阶级的要求，这将清楚地向我

[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涅姆佐夫（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Немцов，1879年4月28日—1937年11月26日），出身于一个枪械工人家庭。1899年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移居彼得堡，并当选为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失败后被捕并被终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二月革命后获释，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并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兼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3月5日至4月5日任秋明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18—1919年任图拉苏维埃主席。1919—1920年任坦波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兼俄共（布）坦波夫委员会主席。1921年1—2月任俄共（布）坦波夫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1922年任司法人民委员会委员。1923—1924年期间支持左翼反对派。1922—1930年期间历任最高革命法庭司法委员会副主席、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成员、苏联最高法院成员、老布尔什维克协会执行委员会书记等。1930—1932年任莫斯科地区法院院长。1932—1937年期间历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主任、联共（布）中央组织部书记兼联共（布）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委员。1937年公开反对大清洗，同年10月10日被捕，11月26日遇害。1955年平反。

们的资产阶级老板们表明：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我们自己的阶级要求。经过讨论，工厂委员会（车间的代表会议，在其中起代表作用的是苏维埃的代表）一致决定从11月1日起，实行8小时工作制。同一天，代表们向全部车间宣读了工厂委员会的决定……他们建议工人带着食物去工作，这样就不用像往常一样在午饭时间休息了。11月1日，工人们照常早上6:45到达了工厂。12点的时候，午饭哨吹响了；这让许多工人讲起了笑话，他们只决定休息30分钟吃午饭，而不是规定的1小时45分钟。下午3:30，工厂全体人员停止了工作，整整工作了八个小时。”



（被告人——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涅姆佐夫，工人——布尔什维克）

我们在第五期《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上读到了这样的文字：“10月31日，星期一，我们地区的所有工厂工人，按照苏维埃的决定，在完成了8个小时的工作后，离开车间，走到街上，打着红色旗帜，唱着《马赛曲》。在路上，示威者‘扫荡’了几家仍在继续工作的小企业。”其他地区也凭借着同样的革命决心贯彻了苏维埃的决定。11月1日，运动蔓延到几乎所有的金属厂和巨型纺织

厂。什利谢利堡的工人给苏维埃打电话，问道：“从今天起，我们应该工作多少个小时？”这场运动在不可抗拒的一致意见下发展。但是，为期五天的十一月罢工在一开始就像楔子一样切入了这个运动。局势变得越来越困难。政府内的反动派正在拼命地站起来，并非没有成功。资本家正在维特的保护下充满能量地联合起来进行反击。资产阶级民主派则对罢工感到“厌倦”。他们只渴望安稳与宁静。

到十一月罢工以前，资本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工人自行减少工作时间的行动：有的威胁要立即关闭工厂，另外一些则只是从工资中扣除相应的金额。在一些工厂和车间，管理层做出了让步，同意将工作日缩短到 9.5 小时，甚至 9 个小时。有些人，比如印刷工人工会就接受了这样的提议。企业家的情绪普遍不稳定。到十一月罢工结束的时候，统一起来的资本成功恢复了自己的元气，并采取了寸步不让的立场：八小时工作制将不实施；如果工人坚持下去，将会有一次普遍的关厂行动。政府通过率先关闭国有工厂，为企业家扫清了道路。工人的会议越来越普遍地受到武装力量的驱散，以打击工人的士气。局势每天都在恶化。一些私有工厂也紧随国营工厂关闭了。数以万计的工人被赶到了街上，无产阶级被逼上了绝路。撤退是不可避免的。但工人群众坚持自己的要求。他们不想听到关于在旧条件下恢复工作的话。11月6日，苏维埃通过了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取消了要求的普遍性质，并呼吁人们只在那些有成功希望的企业单位里继续进行斗争。这个解决方案显然不令人满意：它没有明确地亮出自己的口号，有可能将运动分解成一系列不相干的斗争。与此同时，形势继续恶化。在代表们的坚持下，国营工厂重新开放，在旧条件下继续进行工作时，另有 13 个新的工厂和车间的大门被私营企业家关闭了。19000 人出现在街上。

对重新开放工厂的关切，哪怕建立在旧的条件之上，也越来越往后推迟了占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议题。此时需要采取更坚决的措施，而11月12日，苏维埃决定鸣金收兵。这是工人议会中所有会议里面最具戏剧性的一场了。出现了分歧。两个先进的金属厂坚持要继续斗争。他们得到了几个纺织厂、玻璃厂和烟草厂的支持。普梯洛夫厂则坚决反对。麦克斯韦工厂的一位中年织布女工起身发言。她有着一张精致的、开放的脸。虽然已经是深秋，但她穿着一件退了色的印花布大衣。她的手因为兴奋而颤抖，紧张地寻找自己的衣领。她有着响亮、鼓舞人心、令人难以忘怀的声音，对普梯洛夫厂的代表们说：“你们让你们的妻子习惯了睡在柔软的床上，吃甜美的食物，这就是你们害怕拿不到工资的原因。但我们并不害怕。我们准备好了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死。我们已准备好斗争到底。要么胜利，要么死亡！八小时工作制万岁！”

时至今日——30个月过去了，这个充满希望、绝望和激情的声音仍在我耳边回响。这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责备，一个不可战胜的号召。穿着褪色花布衣的英雄般的同志，你现在在哪里？啊，没有人可以让你习惯甜美的食物和柔软的床……

响亮的声音戛然而止……出现了片刻痛苦的沉默。然后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因资本主义枷锁下的重压聚集而起来的代表们，在那一刻超越了他们对自己日子的忧虑。他们是在为自己在未来战胜血腥厄运而鼓掌。

经过四个小时的讨论后，苏维埃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一项退却的决议。决议指出，统一资本与政府的联盟已经把彼得堡的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转变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因此，彼得堡工人不能在脱离全国工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因此，苏维埃作出决议：“由于这个原因，工人代表苏维埃认为，有必要暂时停止使用立即、普

遍接管的方法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要以有组织的方式进行撤退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许多工人倾向于选择麦克斯韦的织布女工指出的路线。一家大工厂的工人决定继续为九个半小时工作制进行斗争，他们给苏维埃写信说：“其他工厂和车间的工人同志们，请原谅我们这么做，但我们已经没有力气再忍受这种身体和精神上的逐渐衰竭了。我们将战斗到只剩最后一滴血……”

* * *

当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运动开始时，资本主义报刊当然会大声喊叫，说苏维埃要毁掉祖国的工业。自由民主派报刊，在这一时期对其左派主子战战兢兢，一言不发，保持缄默。只有在12月革命失败，使它摆脱束缚的时候，它才开始把反对派对苏维埃的所有指控都翻译成自己那自由主义的黑话。为八小时工作制进行的斗争是他们后来最强烈谴责的行动。但是，应该强调的是，用接管的方法（也就是在没有事先与雇主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进行事实上的停工）来缩短工作日的想法，即不是在10月，也不是在苏维埃中间诞生的。在1905年这罢工的一年里，已经进行过不止一次类似的尝试了。这样的尝试也不总是以失败告终的。在政治动机高于经济动机的国营工厂里，工人就是通过这种行动争取到了九小时工作制。然而，仅在彼得堡，仅经过24小时就通过革命手段实行正常工作制的想法，可能会显得完全不可思议。比如，在某个团结的工会组织里，某个受人尊敬的现金保管员可能会认为这彻头彻尾的疯狂行为。的确，从“合理的”时代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个疯狂的行为。但是，在革命“疯狂”的条件下，这种行为有自己的“合理性”。当然，只在彼得堡这一个地方实行正常工作制，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苏维埃相信，彼得堡的尝试会使整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站起来。当然，八小时工作制只有在国家政权的配合下才能被建立

起来。但无产阶级恰恰就是在那时，把自己置于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的斗争之下。如果它赢得了政治上的胜利，那么，八小时工作制就不过只是“天方夜谭的实验”自然发展的结果。但是如果它没能赢得胜利，当然，这也就是它最严重的“罪过”所在。

即便如此，我们也认为，苏维埃采取的行动，不仅是它可以采取的，也是它应该采取的。实际上，它没有选择。如果在“现实的”权宜之计下它对群众喊了一声“**退后！**”，那么群众根本就不会服从它。斗争还是会爆发，但会缺乏领导；罢工还是会出现，但会是孤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失败会导致士气的完全低落。不过，苏维埃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任务。它的领导分子决不指望运动会立即获得全面成功；但他们把强大的自发运动看作成一个事实，并决定使它化为一个雄伟的、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运动中都未曾见到过的示威，以支持八小时工作制。这场运动的实际果实——在一些企业中被大大减少的工作时间，很快又被雇主们加了回去。但是，它的政治结果却在群众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从此以后，八小时工作制的想法即使是在工人阶级最落后的一层中也得到了普及，而这却是多年来的费力宣传达不到的结果。同时，这一主张也与政治民主的基本口号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遇到了倚仗着国家政权的资本的有组织抵抗后，工人群众再次回到了革命政变、起义的必然性以及武装的必要性这些议题上。

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员在苏维埃中为退却的决议进行了辩护，用以下的话总结了这次运动：“我们可能并没有为群众夺得八小时工作制，但是我们肯定为八小时工作制夺得了群众。从现在起，每个彼得堡工人的心中都会响起这样的战吼：八小时工作制和——火枪！”

第十七章 庄稼人的造反

这场革命的决定性事件都发生在城镇里。但是，农村并没有默不做声。它开始喧闹地、笨拙地、磕磕绊绊地骚动起来，仿佛刚从漫长的睡眠中苏醒来一样；但是即便如此，这场运动在一开始把统治阶级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

在革命前的最后两三年里，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极度恶化了。“争执”不断涌现，一会在这里，一会在那里。从1905年春天开始，农村的浪潮就以一种威胁性的方式高涨起来，在全国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粗略地说来，农民的“革命”有三个主要的集中地：（1）北部，其特点是加工业得到了相当的发展；（2）东南部，那里土地相对丰富；（3）中部，那里原本就土地贫乏，因工业的悲惨状况而雪上加霜。反过来，农民运动也同样发展成了四种主要的斗争类型：接管地主的土地，并赶走地主，破坏他们的庄园——这是为了扩大农民自己的土地使用情况；没收面包、家畜、干草并采伐森林，以立即满足饥饿村庄的需要；罢工——抵制运动，旨在降低地租，或者增加工资；最后一种是拒绝提供新兵、拒绝交纳赋税或支付欠款。这些形式的斗争以不同的组合方式，遍布全国，适应每个地区的经济条件。农民运动最激烈的地方是在不幸的中部，在这里，破坏的毁灭性就像龙卷风一般。在南方进行的，主要是罢工和抵制地主经济。最后，则是运动最弱的北方，砍伐森林是那里最常见的形式。凡是经济上的不满开始与政治上的激进相结合的地方，农民都拒绝承认行政当局并抗税。不过所有的农民运动都是在十月罢工以后才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质的。

让我们仔细看看庄稼人是怎样进行自己的革命吧。

在萨马拉省，这种混乱蔓延到了四个县。起初，农民来到了个人所有的大庄园，除了家畜的饲料以外，什么也不拿走；然后，对

每个农场的家畜数量进行精确统计，留下了喂养牛需要的饲料，然后剩下的全部用自己的大车拉走。农民们安静地行动，没有暴力，试图达成协议，以免“造成任何不愉快”。他们向主人解释说，现在是新时代，人们必须以新的、更公平的方式生活：谁拥有多的东西，就应该跟没有这种东西的人分享……然后，成群结队的“全权代表”就会出现在存放了大量地主家余粮的火车站。他们会确定这些面包的主人，并宣布根据“大众”的决定，带走粮食。“你们说‘带走’是什么意思，兄弟们？”站长开始抗议，“我会被追究责任的……可怜可怜我吧……”令人恐惧的“剥夺者”随后同意说：“那倒是，我们不想欺负你……但是问题在于，火车站比较近，而我们不想大老远跑去农庄，太远了……但是没有办法，看来我们只有去找‘他本人’，直接从他的谷仓里拿了……”储存在车站内的食物保持不动；而大庄园里的粮食则会被公平分配。但很快，关于“新时代”的争论开始对地主失去了作用：他鼓起勇气来，试图赶走农民。然后，善良的农民就会顽强地站起来——连颗石子也没有给人留下……

在赫尔松省，大批的农民从一个庄园移动到另一个庄园，以便取走“被分配”的财产。并没有发生暴力或杀戮，因为受惊的地主和他们的管事的人在一听到农民的要求后，就打开所有的门闩和百叶窗逃走了。就在这同一个省，发生了一场为降低地租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价格由农民协会自己在“公正”的基础上确定。仅仅从贝久科夫修道院，就有 15000 俄亩的地皮被无偿拿走，理由是“僧侣应该向上帝祈祷，而不是为了利益买卖地皮”。

然而，最激烈的事件发生在 1905 年底的萨拉托夫省。在被卷入运动的村庄里，没有一个被动的农民。所有人都站起来了。地主和他们的家人被赶出了庄园，所有可动的财产都被分掉了，牛被牵

走，雇农和家仆结算了工资，最后，房子上被放了一只铁公鸡^[1]。武装分队带着这些农民“纵队”进行了袭击。村里的县警和卫兵很少，而且，在某些地方，他们还被这些分队逮捕了。地主的建筑物被放火烧毁，以便使其在一段时间内无法返回自己的土地。但是，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在大庄园被完全摧毁以后，农民就会写一份判决书，说明从第二年春天起，土地将会转到“公众”手里。在农庄办公室、国有酒类商店以及卖酒人那里缴获的钱财将会立即成为公有财产。地方农民委员会或兄弟会负责分配被收缴的物品。这些洗劫几乎从不受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个别关系约束：反动地主的被毁，自由派的也会被毁。政治上的细微差别被等级仇恨的浪潮冲走了……自由派乡绅的住宅被夷为平地，古老的乡间别墅及其宝贵的书藏和画廊都被烧掉了，不留任何痕迹。在与某些县里，残存的地主庄园用手指头都能数出来。这场庄稼人的十字军征战的图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一位记者写道：“它开始了，天空被火光照亮了一整夜。这是一幅可怕的画面。早晨，你们能看到长长的三套车队伍，上面坐满了从庄园里逃出来的人。而当夜幕降临时，地平线就像是戴上了一条用火做成的项链。有些夜晚，你们甚至能数出多达 16 束火光……地主仓皇而逃，恐慌沿着他们的路途四处蔓延。”

在很短的时间内，全国就已经有 2000 多个地主的庄园被破坏和烧毁，其中仅萨拉托夫省就有 272 个。根据官方数据，其中损失最严重的 10 个省，地主的损失达到了 2900 万卢布——其中光萨拉托夫这一个省就将近 1000 万了。

如果说阶级斗争的进程不以政治意识形态为转移的结论是普遍正确的，那么这一真理就三倍适用于农民身上。萨拉托夫的庄稼

[1] 就是被放火烧掉的意思。——中译者注

人当然有充分有力的理由（在他自己的家园、打谷场和村子的范围内的理由）把一捆点燃的稻草扔到贵族的屋顶上。然而，如果完全忽视政治鼓动的影响，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尽管农民起义进行的很混乱，但在它之中已经包含了实现普遍政治化的尝试。这些尝试是由各党派进行的。在这个 1905 年，即使是自由派乡绅也在试图给农民带来反对派的启蒙教育。在一些地方自治委员会机构中，引入了半官方的农民代表，提出并讨论了一般性质的问题。与此相比，地方自治会里的雇员要比这些有土地的自由派激进的多，比方说——统计员、教师、农艺师、女医师。这些人当中有许多属于社会民主党人或者社会革命党人；大多数则是无党派的激进分子，而对他们来说，土地私有制绝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在 1905 年前的若干年里，社会主义政党通过地方自治会的雇员在农民中间组织了革命小团体，并传播了非法的文献。1905 年，政治鼓动达到了群众化的程度，并不再处于地下状态。2 月 18 日发布的荒唐命令在这一事态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命令规定了类似于请愿权的某种权利。鼓动家们利用了这一权利，或者更确切地说，利用了该命令在地方当局中造成的混乱，组织了乡村大会，鼓励农民通过关于废除土地私有制并实行人民代表制的决议。在许多地方，签署了这种协议的农民把自己看作是“农民联盟”的成员，并从自己的行列中选出了委员会，而这些委员会在许多情况下都完全把合法农村政权排挤到了一边。例如，在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居民中就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哥萨克的集镇（Станица）里聚集了 600—700 人。一位鼓动员如此写道：“真是个奇怪的聚会，桌子后面坐着全副武装的哥萨克首领（атаман）。到处都站着或坐着带马刀或者不带马刀的人。这样的人，我们在自己的会议和集会中，见得多了，他们总是作为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壮丽尾声而出现。当他们慢慢

地燃起心中对地主和官员的熊熊怒火之时，那景象真是令人感到奇怪。站在队列里的哥萨克和站在犁旁的哥萨克之间的区别是多么不可思议啊！”鼓动员受到了热烈欢迎，一队队哥萨克骑着马在几十俄里之外迎接他们，并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不被警察发现。但在许多的偏远地区，农民对自己的角色只有一个混乱的概念。许多庄稼人在决议上签完名字后会说：“谢谢你们这些好心人为我们张罗了土地。”

8月，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附近举行。来自22个省的100多名代表在一个远离公路的大型谷仓内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议。在这次大会上，首次形成了成立“全俄农民联盟”（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Союз）的想法，而该联盟将联合许多党与非党的农民和知识分子。

十月十七日宣言为农村的政治鼓动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甚至连海登^[2]伯爵（现已去世），一个及其温和的普斯科夫乡绅，也开始组织各乡的集会，以解释“新制度”。起初，农民们兴趣不大，但最终，他们被唤醒了，并决定把话语变成行动。作为开始，他们决定“罢工”掉一个森林^[3]。那个自由派伯爵瞪大了眼睛。因

[2] 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海登伯爵（Граф Пё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ейден，1840年10月29日—1907年6月15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世纪60年代参与了自由主义改革运动。1889年起担任普斯科夫地方自治局议员。1890年起任枢密院议员。1895—1905年任帝国自由经济协会（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е Вольн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И. В. Э. О.）主席。1905年发起成立立宪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06年当选为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杜马解散后表态支持，同年6月12日另行组建和平革新党（Партия мирного обновления），并于1906—1907年任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07年死于莫斯科。——中译者注

[3] 在农民和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中，“罢工”成了“革命”的同义词。“罢工”意味着采取任何一种革命行动。“给县警察局局长来次罢工”指的是逮捕或者杀掉这个官。但是，这词的这种奇怪用法，证明了工人巨大的革命影响力和斗争方法。——原注

此，拥有土地的自由派在试图根据沙皇的宣言建立等级和谐的过程中烧掉了自己的手指，但革命的知识分子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个别省份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政治鼓动变得热火朝天，革命文献堆积如山，农民联盟的力量和规模都在增长。在偏远的维亚特卡省召开的农民代表大会召集了 200 人。当地陆军营里的三个连也派出了代表，表达自己的同情并承诺给予支持。当地的工人代表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当局大吃一惊，给这些在乡镇和城镇毫无阻碍地组织起来的集会提供了许可。集会在所有的省里都连续举行了两个星期。大会关于停止缴税的决议得到了积极的贯彻……尽管形式多种多样，农民运动还是在整个国家都产生了大规模的现象。在边境附近，它立刻就呈现出了明确的革命性质。立陶宛农民根据 2000 名代表参加的维尔纽斯大会通过的决议，用革命手段取代了村里的书记（писарь）、乡长和国民小学的老师，赶走了宪兵、地方自治官员并设立了选举法院和乡执行委员会……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农民采取了更加激烈的行动形式……

11 月 6 日，农民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而且是公开地举行了。出席会议的有来自 27 个省的 187 个代表，其中有 105 名是由乡和村授予了全权的，而其余的则是由省和县委员会和联盟的地方小组认可的代表。代表中包括 145 位农民，而剩下的则是靠近农民的知识分子，有男女人民教师，地方自治会雇员，医生等。从民俗学的意义上来讲，这是革命最有趣的一次大会了。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鲜明生动的形象，比如省里的自然成才者，“自己思考悟出道路”的革命者，具有热情气质和更热情希望但思想相当混乱的乡村政治家。这里就有几张由大会的一位与会者画的轮廓草图：“安东·谢尔巴克，苏梅省的一位‘老爹’，身材高大，

白发苍苍，留着短小的胡子，眼睛炯炯有神，就像是从列宾^[4]的《扎波罗热人》的画布里走出来的哥萨克一样。但是，他自称是来自两个半球的农场主，在美国待了二十年，与他的俄罗斯家人在加利福尼亚拥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农场……来自沃罗涅日省的代表米列茨基神父提交了五份乡里的‘判决书’。在一次演讲中，他将耶稣基督描述为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基督如果今天在这里，就会站在我们这边……’两名身穿印花布女短衫、毛织头巾和羊皮鞋子的农妇——作为同一个沃罗涅日省的村庄妇女代表出席了会议……别列列申^[5]上尉作为同样的沃罗涅日省的工匠代表出席了会议。他穿着军装，拿着马刀出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厅里甚至有人喊道：‘打倒警察！’然后，这名军官起身，在普遍的掌声中讲道：‘我是别列列申上尉，沃罗涅日省的代表，从来不掩饰自己的信念，从来公开行动，因此我穿着我的制服前来……’”

讨论的中心是策略问题。一些代表赞成和平的斗争手段：集会、“判决”、“和地平”抵制当局、建立革命自治政府、“和平地”接管地主土地、“和平地”拒缴税并拒送新兵。另一些人，特别是来自萨拉托夫省的人，呼吁进行武装斗争，呼吁立即支持任何起义——无论它们在哪里爆发。最后，会议通过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决议指出：“只有将所有的土地转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才能结束人民因土地贫乏而产生的苦难。条件则是，土地只能由那些和他们的

[4] 伊里亚·叶菲莫维奇·列宾（Илья Ефимович Репин，1844年8月5日—1930年9月29日），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画家。

[5]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别列列申（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Перелешин，1856年9月4日—1910年4月3日），1878年入伍。1889年以海军二级上尉军衔退役。19世纪90年代起在地方自治局工作。1901年起进入科斯特罗马地方自治局工作。1904年加入解放社。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并担任立宪民主党科斯特罗马委员会委员。1906年任国务委员。1907年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杜马解散后脱离政治活动。——中译者注

家人或集体一起合作耕种的人使用。”公正土地制度的建立被委托给了立宪会议，而立宪会议将在最民主的基础上“不晚于（！）明年二月”召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农民联盟将与他们的兄弟——工人，城镇、工厂、车间、铁路以及其他工会，以及其他所有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组织达成协议……在人民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农民联盟将诉诸农业（！）总罢工，也就是说，它将拒绝为所有类型的农场所有人进行劳动，并以此来关停这些农场。至于总罢工的组织问题，将通过与工人阶级的协议来决定。”在进一步决定了停止饮酒以后，大会在决议的最后声明：“根据从俄国各个角落得到的消息，如果人民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就会给我国带来巨大的麻烦，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普遍的农民起义，因为农民的忍耐宛若杯中之水，已经溢出来了。”尽管这项决议中的某些段落很幼稚，但是，它还是表明了进步农民正在采取革命的路线。没收地主土地的幽灵已在政府和贵族的眼前升起了，展现了这个庄稼人议会会议里的所有残酷现实。反动派用力地敲响了警钟——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

11月3日，也就是代表大会召开的几天前，政府发表了一份宣言，宣布逐步取消被分配土地的赎买费，并扩大农业银行的资金规模。宣言表示，希望政府与杜马结盟，以便成功满足农民的基本需求——“在不损害任何其他土地所有者的情况下。”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似乎并不符合这些希望。但是，“我们心目中那亲爱的农民”在各地的实际做法却更不令人满意。不止是破坏和焚烧，还有“和平地”对私人大地产的接管，以及单方面确定工资和地租的行为，使地主对政府猛烈地施压。要求派遣军队的要求从各地传来。政府振作了起来，意识到多愁善感的时候已经过去——现在是时候“做事”了。

农民代表大会在11月12日闭幕了，而14日的时候，“联盟”莫斯科办公室的人员就被逮捕了。两三个星期后，内务大臣在答复有关农潮的询问时，作出了以下指示，我们在这里逐字逐句转载：“应立即用武力剿灭暴动者。如果他们胆敢反抗，应烧毁其住所。在这一分钟里就必须得一劳永逸地根除任何‘自治’。目前，逮捕是达不到目的的，审判上百上千人是做不到的。部队必须充分理解上述指示。——彼得·杜尔诺沃”这种吃人的命令开启了反革命地狱式狂欢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首先在城镇发展，然后才蔓延到农村。

第十八章 赤色舰队

那个在官僚机构服务的大爬虫老苏沃林在 11 月末写道：“革命给人非凡的热情，并获得了众多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忠实的狂热追随者。反对革命的斗争之所以如此艰难，正是因为在那面有众多的热情、勇气、真诚的雄辩和热烈的兴奋。敌人越强大，它就越坚决、越勇敢，而每一次的胜利都会为它吸引来一窝蜂的崇拜者。谁不知道这一点，谁不知道革命的吸引力就像一个美丽、热情的女人张开双臂，用发热的嘴唇热切地吻你，谁就没有年轻过。”

造反精神席卷了俄罗斯大地。无数人的心中正在发生着一个巨大的、神秘的过程——恐惧的束缚被打破；个性几乎无暇认识自己，并溶解在了群众中，而群众本身也被溶解在激情之中了。在摆脱了继承下来的恐惧和想象的阻碍后，群众不想也不能看到它的**现实**阻碍。这是它的弱点，也是它的力量。它就像被风暴掀起的浪潮一样，向前迅速奔涌。每天都有一层新的人站起来，并产生新的机遇。仿佛有人在用一把大勺子搅动社会这口大锅，直至锅底。当自由派官员在裁剪并布雷金杜马尚未披上的袍子时，这个国家片刻不得安宁。工人的罢工，无止境的集会，街头的游行，乡间的庄园破坏行动，警察和看门人的罢工……最后则是水手和士兵的骚动和起义。一切都瓦解了，一切都混乱了。然而，与此同时，在这种混乱之中，出现了对新秩序的需求，而这种秩序的要素也开始结晶。规则地重复举行的集会自身就引入了组织的原则。集会分离出了代表团，而代表团又发展成为代表机构。但是，正如自发的愤怒赶超过了政治意识的工作一样，对行动的需求也将疯狂的、组织上的创造力远远抛在了后头。

革命——任何革命的弱点就在这里，但它的力量也在这里。任何想在革命中发挥影响力的人就必须掌握革命的全部内容。某些

深沉的战术家以为革命可以像芦笋一样，可以将其可食用的部分与不可食用的部分武断地剥开，这样的人注定要成为一个失败说教者。由于**没有任何**革命事件为他们“理性”的战术应用创造了“理性”条件，这种人命中注定要被留在**所有**事件之外，落后于**所有**事件。最后，他们除了重复费加罗的话以外，什么也没能留下：“哎，我们不会再有下一场可以让你们有理由忘记第一场缺点的演出了……”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阐述，甚至不是要列举 1905 年发生的所有事件。我们只是笼统地勾画了革命的进展的轮廓（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表达的话），而且，从整个国家来看，是在彼得堡的范围内进行的勾勒。但是，即便是在我们选择的框架内，我们也没法忽视，那在十月罢工和十二月街垒战之间发生的这一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塞瓦斯托波尔的军事起义。它始于 11 月 11 日，而 11 月 17 日的时候，海军中将丘赫宁^[1]就已经向沙皇作出了报告：“军事风暴已减弱，而革命风暴则还在刮。”

波将金号（Потёмкин）的传统在塞瓦斯托波尔并未消逝。丘赫宁残酷地对待了红色战舰的水兵^[2]们：4 人被枪决，2 人被绞死，几十人被送去做苦役，最后，连波将金号本身都被改名为潘捷列伊蒙号（Пантелеймон）了。但他并没能向任何人灌输恐怖，而只是成功地加剧了舰队内部的造反情绪罢了。十月罢工开启了一个巨型街头集会的阶段，而在这个集会中，水手和士兵不仅是持续的参与者，而且也是发言人。一个水手军乐队在革命示威的前头演奏了

[1] 格里戈里·巴甫洛维奇·丘赫宁（Григорий Павлович Чухнин，1848 年？月？日—1906 年 6 月 28 日），俄罗斯帝国海军少将。1858 年入伍。1904—1906 年任黑海舰队司令。1906 年 6 月 28 日被社会革命党人暗杀身亡。——中译者注

[2] 接下来为贴近原文，海军战斗员会被翻译为水手或水兵（Матросс），陆军战斗员会被翻译成士兵（Солдат）。——中译者注

《马赛曲》。总之，“士气低落”完全占据了上风。一项禁止军人参加民众集会的命令，导致了特别军人集会在陆海军军营的大院中的举行。军官们不敢对此表示抗议，而军营的大门也日夜为我们党的塞瓦斯托波尔委员会的代表敞开。他们不得不与水兵的不耐烦不断地作斗争，他们被要求采取“行动”。变成苦役船的普鲁特号（Прут）在附近巡航，时刻提醒着人们，就在不远处，六月起义的牺牲者仍在为他们参与了波将金号的事业而受折磨。波将金号的新船员宣布，他们已经准备好把战舰开到巴统，以便支援高加索起义。最新造好的巡洋舰奥恰科夫号（Очаков）也在一旁做好了战斗准备。但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坚持采取观望的策略：建立水手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将其和工人组织密切联系起来，并举行舰队起义以支援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政治罢工。水兵的革命组织接受了这个计划。但是，事件则超越了它。

大会越来越频繁，其规模越来越大。这些大会被移到了将水手营房和布列斯特步兵团营房分隔开来的一个广场上举行。由于军人不被允许参加工人的集会，所以工人就成批地参加了士兵的集会。上万人被聚集了起来。联合行动的想法在一片欣喜若狂中被接受。先进的连队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军队长官决定采取措施。军官们试图在集会上发表“爱国”演说，却只获得了很遗憾的结果。深谙辩论艺术的水兵们让他们的上司羞愧地逃走了。然后，禁止一切集会的决定就下来了。11月11日，一个战斗连被部署在海军营房的门口。海军少将皮萨列夫斯基^[3]用大家都听得见的声音对海军营房喊道：“任何人都不得离开军营；如果有人不服从命令，格杀勿

[3] 谢尔盖·彼得洛维奇·皮萨列夫斯基（Сергей Петрович Писаревский，1848年7月12日—1908年11月8日），1869年进入俄罗斯帝国海军服役。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905—1906年任黑海舰队参谋长。1905年11月塞瓦斯托波尔起义期间被打伤。1906年以海军中将军衔退役。——中译者注

论。”刚接到这个命令的连的一位水兵彼得洛夫走向前去，在大家的注视下给步枪上了膛，第一枪杀死了布列斯特团的斯坦因^[4]中校，第二枪打伤了皮萨耶夫斯基。一位军官立即下令：“逮捕他。”所有人都停在原地不动。彼得罗夫把他的步枪扔到了一边。“你们还在等什么呢？快把我带走吧。”彼得罗夫被逮捕了。水兵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要求释放他，并表示愿意为他做担保人。激动的气氛达到了顶点。

一位军官试图找到解决办法，向彼得罗夫询问：“彼得罗夫，你刚才那是意外走火吗？”

“意外？离列，上膛，瞄准。你管这叫‘意外’？”

“但你的队友要求释放你……”

然后彼得罗夫被释放了。水兵们迫不及待地立即投入行动。所有值班军官都被逮捕、解除武装并被锁在了办公室里。最后，水兵们受到一位社会民主党演说者的影响，决定等待明天早上进行的代表会议。大约有 40 名水手代表连夜开会。他们决定释放军官，但不再允许他们进入军营。他们还决定，继续履行那些他们认为有必要的那些职责。他们还决定派一个带军乐团的游行队伍，前往步兵的军营，以便吸引士兵参加运动。早上，一个工人代表团前来协商。几小时后，整个港口都进入了停顿状态；铁路也停止了运行。事件临近。一封半官方的电报提到：“海军营房内保持着模范般的秩序。水手们的行为表现都很端正。没有人酗酒。”所有的水兵被分成了没有武器的连。只有一个留下来保卫营房免受突然袭击的连装备了武器。彼得罗夫被选为这个连的指挥官。

[4] 奥古斯丁·阿夫古斯蒂诺维奇·斯坦因（Августин Августинович Штейн，1875 年？月？日—1905 年 11 月 12 日），1894 年入伍。1905 年任比亚韦斯托克第 50 团训练队队长，11 月 12 日在塞瓦斯托波尔起义中被击毙。——中译者注

一部分水兵在两位社会民主党演说者的带领下，去了附近布列斯特团的军营。士兵的情绪远没有那么坚定。只有当水兵施压的情况下，士兵们才决定解除军官的武装并把他们驱逐出军营。参加过奉天会战的军官没有任何抵抗就交出了自己的军刀和左轮手枪，并说道：“我们没有武器了，请你们别碰我们”，然后恭顺地穿过了下层士兵的队伍。但士兵们从一开始就是动摇的。在他们的坚持下，几名值班军官被留在了营房里。这对后来的事件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士兵们开始列队，以便和水兵们一起穿过小镇，走向比亚维斯托克团的营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警惕地注视着，以防“非军人”（вольный）混入队列，只让他们单独走。在准备工作最紧张的时刻，要塞指挥官涅普留耶夫^[5]和师长谢杰利尼科夫（Седельников）将军一起乘坐自己的马车来到了营房。指挥官被要求拆除从早上开始就安放在伊斯托里切斯基大道（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бульвар）的机枪。涅普留耶夫回答说，这不是他可以决定的事物，应该去找丘赫宁。于是，他就被要求作出保证：作为要塞指挥官，他不会使用这些机枪。这位将军表现出足够的勇气拒绝了要求。于是便决定解除他的武装，并将其逮捕。他拒绝交出武器，而士兵们则没有下定决心使用武力。最后，几个水兵不得不跳上马车，把将军带到自己的海军营房那里去。在那里，将军被立即无言地（sans phrases）解除了武装，并被关进了办公室里。之后，他们终究还是被释放了。

士兵们在军乐队的演奏下走出了营房。水兵们严格地按照行进顺序走出了军营。大批的工人已经在广场上等着了。多么美好的

[5] 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涅普留耶夫（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Неплюев，1847年2月15日—？），1868年入伍。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903—1905年任奥恰洛夫要塞司令。1905—1907年任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司令。1907—1908年任科夫诺要塞司令。1908年以上将军衔退休。——中译者注

时刻啊！相遇进行的很热烈。大家握手、拥抱。空气中弥漫着兄弟般的寒暄。到处都是相互支持到底的庄严承诺。重新整队后，游行队伍在充分的秩序下向城市的另一面进发——那里有比亚维斯托克团的营房。士兵和水手打着圣乔治旗，而工人打着社会民主党的旗帜。半官方社报道说：“示威者以模范的秩序列队通过城市，走在最前面的是军乐团，队列打着红旗。”他们经过了设有机枪的伊斯托里切斯基大道。水兵呼吁机枪连撤走机枪——而机枪连也这么做了。但是，之后，机枪又出现了。半官方社报道说：“比亚维斯托克团的武装连在其军官在场的情况下，撤掉了岗哨，并允许示威者通过。”在比亚维斯托克团的营房旁，举行了一场巨大的集会。然而，他们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士兵摇摆不定——一部分宣布了与水兵的团结，另一部分仅仅只是保证了不开枪。最后，军官甚至成功地将比亚维斯托克团带离了营房。游行队伍则直到傍晚才回到了海军营房。

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的旗帜被打在了波将金号上。罗斯季斯拉夫号（Ростислав）则打出了回答信号：“我看到你了。”其他军舰没有回应。水手中的反动部分抗议说，革命的旗子比圣安德烈旗还要高。红旗不得被取下来。形势仍不明朗。但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被关押在判前羁押所单人牢房内的托洛茨基。辩护人叶利谢耶夫摄影。）

在海军军营办公室里，一个由来自不同兵种（其中包括七艘军舰）的水手和士兵代表、以及受到邀请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几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不断地开会。一位社会民主党人被选为常设主席。所有的消息在这里汇合，所有的决定从这里发出。在这里，水手和士兵的特殊要求也被制定了出来，这些要求也与一般政治要求结合了起来。对广大群众来说，这些纯粹兵营式的要求占据了首位。委员会最担心的是弹药的短缺。步枪的数量是够的，但是子弹却很少。从波将金号事件起，弹药储备都是秘密存放的。一位积极参与事件的人写道：“我们也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一点，那就是我们缺少一个精通军事事务的领导人。”

代表委员会充满能量地坚持要求队伍应该解除其军官的武装，并把他们从军舰和营房带走。这是一项必要措施。那些留在军营里的布列斯特团军官完全瓦解了士兵。他们积极进行反对水兵、“非

军人”和“犹太佬”（Жид）的鼓动，并在士兵中间施加了酒精的影响。晚上，在军官的带领下，士兵无耻地跑到了营地——不是通过由革命战斗连把守的大门，而是通过被凿坏的围墙。第二天早上，他们再次回到了营房，但已经不再积极参与斗争了。布列斯特团的踌躇不决不可能不反作用于水兵营房内的情绪。然而，在第二天，胜利的太阳再度升起：工兵与起义汇合了。他们带着武器，整齐划一地来到了水兵营房。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并在军营里驻扎了下来。情绪变得高涨且坚定。各方的代表都出现了：要塞炮兵、比亚维斯托克团以及边防军都承诺“不开火”。长官不再依靠当地的团，而是开始从周围各城——辛菲罗波尔、敖德萨、费奥多西亚抽调部队。人们在新来的部队中进行了积极且成功的革命鼓动。委员会与海军舰艇的通信遇到了许多困难，特别是因为水手们不明白信号。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收到了来自奥恰科夫号巡洋舰、波将金号装甲舰、以及自由号（Вольный）和珍贵号（Заветный）扫雷驱逐舰以及后来其他几艘鱼雷艇完全团结的宣言。其他的舰船摇摆不定，也只是答应“不开火”。13日，一名海军军官带着一份电报来到了营房：沙皇要求哗变者在24小时内放下武器。这位军官受到嘲笑，被赶到门外。为了保护城镇免遭受可能的大屠杀，水手们组成了巡逻队。这一措施立即安抚了居民，并赢得了他们的同情。水兵们自己守着酒类商店，防止有人酗酒。在整个起义过程中，城镇内充满了楷模般的秩序。

11月3日晚是事件发展的决定性时刻：代表委员会邀请了在十月集会期间获得了巨大声望的退役海军中尉施密特^[6]担任军事

[6] 彼得·彼得洛维奇·施密特（Пётр Петрович Шмидт，1867年2月17日—1906年3月6日），俄国革命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80年入伍。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1905年革命期间同崩得建立联系，同年11月领导了塞瓦斯托波尔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1906年英勇就义。——中译者注

指挥。他勇敢地接受了邀请，并从那天起成为了运动的领袖。第二天晚上，施密特在奥恰科夫号巡洋舰住了下来，并一直在那上面待到了最后一刻。他在奥恰科夫号上升起了将旗，并发出了信号“施密特现在指挥舰队”，希望以此来吸引整个分舰队参与起义。然后，他把自己的巡洋舰开向普鲁特号，以便释放上面的“波将金人”。他们没有遇到反抗。奥恰科夫号把苦役水手到上了自己的船舷，带着他们在整个分舰队周围航行。每艘船上都传来了“乌拉”的欢呼声。其中一些船——包括波将金号和罗斯季斯拉夫号——升起了红旗；只不过红旗在后者旗杆上只挂了几分钟。

在接管起义的领导权后，施密特通过以下声明宣布了他的行动方针：

“致市长先生：

我今天向皇上发出了以下电报：

光荣的黑海舰队神圣地保卫自己对人民的忠诚，要求您，皇上，请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并停止听从您的部长们。

舰队指挥官
公民施密特”

彼得堡发来了电报命令：镇压起义。丘赫宁被后来声名狼藉的梅勒—扎科梅利斯基^[7]取代了。城市和要塞进入特别戒严状态，所有街道都被军队占领了。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起义者指望军队能

[7]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梅勒—扎科梅利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ллер-Закомельский，1884年11月1日—1928年4月15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62年入伍。1863年参与镇压了波兰起义。1873年参加希瓦战役。1877—1878年期间参加俄土战争。1898年晋升为中将军衔。1905年镇压了塞瓦斯托波尔起义。1906年镇压了赤塔工人武装起义。1906年担任波罗的海地区临时总督。1909—1911年任国务院议员。二月革命后被捕。十月革命后被勒令退役。1918年流亡法国。1928年死于尼斯。——中译者注

够拒绝开火，以及分舰队中的其余船只能够加入。其中几艘船的军官已经被实际上逮捕了，并被安置在奥恰科夫上听从施密特的命令。顺便一提，他们希望这一措施能够防止旗舰不受敌方的打击。大量的群众在岸上等待着宣布分舰队加入起义的礼炮。但这一期望落空了。“安抚者”并没让奥恰科夫号完成它第二次在分舰队周围的巡航，还开火了。人们一开始以为第一声炮响是礼炮，但很快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惊恐地逃离了码头。炮弹从四面八方袭来——从船上，从要塞和野战炮，从伊斯托里切斯基大道的机枪。第一轮炮击摧毁了奥恰科夫号上的电机。仅仅过了六炮，奥恰科夫号就不得不停止射击，打起了白旗。尽管如此，对巡洋舰的射击仍在继续，直到船上起火才停止。波将金号的命运更加糟糕。这里的水手没有时间把撞针和炮闩上好，所以在被射击的时候完全无能为力。波将金号一枪未发就升起了白旗。岸上的水兵营地坚持的时间最长，直到弹尽才投降。红旗在造反军营里飘到了最后。军营最终在早上六点左右被政府军占领。

当射击引起的首次恐惧过去后，部分人群回到了港口。我们之前已经引用过的那个起义参与人写道：“我们眼前的景象很可怕。几艘鱼雷艇和小艇立即被交叉火力击沉了。很快，奥恰科夫号着火了。漂浮在水面上的逃生水兵呼救。炮火继续向他们所在的水中射击。前去救援的小舟也遭到了射击。游到了军队站着的岸边的水兵被当场枪毙。那些游到了同情人群所在的岸上的人获救了。”施密特试图装扮成水手逃跑，但被抓获了。

“平息”刽子手的血腥工作到凌晨三点前完成了。之后，他们必须把自己转变成“法院”刽子手。

胜利者报告说：“超过 2000 人被俘虏或逮捕……被革命者逮捕的 19 名军官和平民已被释放；缴获了 4 面旗帜，钱箱和大量国

家财产；还缴获了子弹、武器装备以及 12 挺机枪。”丘赫宁中将给皇村发去了电报：“军事风暴已减弱，而革命风暴则还在刮。”

与喀琅施塔得的造反相比，这是多么巨大的进步啊！在那里，一场自发的爆燃以野蛮的屠杀告终；而在这里，发生的是一场按照计划发展的、有意识地寻求秩序和统一行动的起义。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开端报》(Начало)^[8]在塞瓦斯托波尔事件的高峰期写道：

“在起义的城市里，流氓和抢劫犯销声匿迹，简单的盗窃案件发生数量降低了。原因很简单，身着路海军的贪官污吏已经被从这个幸福的城市赶走了。公民们，你们是不是想知道，什么是武装的民众支撑下的民主？那么请看看塞瓦斯托波尔吧。请看看共和制的萨瓦斯托波尔，它的唯一政权是由选举产生的、负责任的政权……”

而这个革命的塞瓦斯托波尔只坚持了四五天，在弹尽粮绝之前就投降了。战略错误？领导人的犹豫不决？这两点都不能否认。但是，最后的结果是由更深层次的原因造成的。

这次的起义是由水手领导的。他们的军事活动性质要求他们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这使他们比陆军士兵更加自力更生。普通水兵和封闭高种姓——海军军官之间的对立，要比陆军步兵和他们的平民指挥员之间的对立更加深刻。最后，海军肩负着的最新战争耻辱，摧毁了水兵对他们那些贪婪、懦弱的上尉和将军们的所有尊重。

正如我们看到的，工兵最坚决地加入了水兵。他们带着武器出现，住在了海军营房里。在我国陆军的所有革命运动中也都可以看到同样的事实：冲锋陷阵的是工兵、地雷工兵、炮兵。总之，不是愚昧无知的文盲，而是熟练的、文化水平较高的、受过技术训练的士兵。与这种知识层面的差距相符合的是社会的差距——绝大多

[8] 这是孟什维克的报纸。——中译者注

数步兵是从年轻的农民中招募的，而工程部队和火炮部队则主要是从产业工人中招募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布列斯特团和比亚维斯托克团在整场起义中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他们是被决定赶走所有军官的。起初，他们加入了水兵，然后落荒而逃。他们承诺不开火，最后却完全屈服于自己长官的影响，可耻地向海军营房开了火。后来，我们在西伯利亚铁路和芬兰堡（Свеаборг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中农民出身的步兵身上也看到了同样的革命不可靠性。

但受过技术训练的人——也就是无产阶级分子，并不是只在陆军中发挥了作用。是谁领导了“造反”的水手们？是谁在战舰上升起了红旗？是技术水兵，轮机班。这些穿着水手服的产业工人，在船员中只占据少数，但却占主导地位，因为他们控制着战舰的心脏——轮机。

武装部队中的无产阶级少数和农民多数之间中的摩擦在我们所有的军事起义中都有发生，而它使军事起义变得软弱无力并瘫痪。工人带着他们的阶级优势来到了军营，比如文化修养、技术本领、果断，还有协调行动的能力。农民则带来了自己的压倒性数量。军队通过普遍征兵，以机械的方式克服了庄稼人的不协调性，而它的主要政治缺陷——被动性，则被转化为一种不可替代的优势。即使农民组成的团因为其营房内的直接需要而被卷入了革命运动，他们也总是倾向于采取观望的策略，而在敌人哪怕第一次采取决定性进攻的时候，他们就会扔下“造反者”，并再度将自己置于纪律的桎梏下。由其可见，军事起义的应选方法是坚决进攻——不停的进攻，否则就会造成动摇和混乱。但是，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革命的进攻策略也会遇到其最大的阻碍，即庄稼人士兵那落后的、不信任的消极态度。

这种矛盾，不久之后就在对 12 月起义的镇压中充分地显现了出来，而这场起义也是俄国革命第一章的结尾。

第十九章 在反革命的门槛旁

精明的保守派托克维尔说过：“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事件每天都越来越坚决地向维特伯爵证明这句话。革命坚决地、无情地反对着他。自由主义反对派不敢公开支持他。宫廷里的奸党都在反对他。政府机构在他手里摇摇欲坠。最后，他自己也在反对他——他对事件一无所知，没有计划，依靠阴谋而不是行动方案。在他无助地瞎忙活时，反动派和革命派正在互相逼近。

1905年11月，根据维特的指示，一份主旨为“与特雷波夫帮斗争”的秘密备忘录中这样写道：“一些事实，甚至是从警察局的档案中提取出来的一些事实，正在清楚的表明：在宣言发表后的几天里，社会和人民对政府提出的严重指控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有根据的——存在一些政府高官成立的政党，以‘有组织地打击极端分子’；政府组织了爱国主义的示威，而其他示威者则被驱散；和平的示威者遭到了枪击，人们在警察和军队的眼皮子底下遭到殴打，一个省级地方自治委员会也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被烧毁；没人敢碰一下屠杀者，但敢于在屠杀之中自我保护的人却遭到枪击；带有大城市政权最高代表签字的官方公告有意或无意（？）地煽动人群使用暴力，而当混乱发生的时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进行镇压。所有这些事实都在俄国各地持续了3—4天，它们在居民当中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完全冲洗掉了十月十七日宣言给人们带来的愉快感想。

居民因此坚信，所有这些出乎意料地在同时席卷全俄罗斯的大屠杀，都是由同一只手挑起并指挥的，而且这只手具有很大的权力。不幸的是，居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这么想。”

当库尔兰总督发来电报，支持两万人会议提出的取消戒严令

的上诉状，并表示“戒严令与新形势不相容”的观点时，特雷波夫自信地发回了以下文字：“关于10月20日发来的电报。不同意您关于‘戒严令与新形势不相符’的结论。”维特，在其下属的出色解释，——即“戒严令并不违背十月十七日宣言”面前，忍气吞声。他甚至还试图说服一个工人代表团：“他根本就不是人们说的那种衣冠禽兽。”

我一字没改。不错，特雷波夫在普遍愤慨的压力下，辞去了自己的职务。但是，接替他担任内务大臣的杜尔诺沃，也好不到哪里去。此外，同一个特雷波夫被任命为宫廷警备长，这让他保留了对事物进程的影响力。省级官僚机构对他的依赖远超于对维特的依赖。

之前引用过的同一份备忘录写道：“极端政党获得了力量，因为在尖锐地批评政府的每一个行动时，他们太频繁地被证明是正确的了。如果群众在宣言被公开发表后，立即看到政府确实实地决定走宣言中概述的新道路，而且也确实实地走上了这条道路的话，那这些政党就会失去相当一部分威望。不幸的是，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而极端党派又获得了一次机会——一次重要性难以估量的机会，使自己以正确估计了政府承诺的意义为荣。”11月，正如备忘录所示，维特开始理解这一点了。但他不曾有过在实践中运用自己的理解的可能性。根据他的指示写给沙皇的备忘录仍然是“未得到采用”的。^[1]

维特无助地使劲挣扎，此后只能被反革命拖着走。

早在11月6日的时候，莫斯科就举行了一次乡绅大会，以便确定自由主义反对派对政府的态度。情绪摇摆不定，但无疑是偏右

[1] 这份有趣的备忘录被印在了题为《俄国反革命史资料》（圣彼得堡，1908）的文集中（当然，这本文集被没收了）。——原注

的。诚然，也出现了一些激进的声音。有人说：“官僚机构没有能力进行创造性的行动，只能进行破坏”；有人说，任何创造性的力量都应该从“产生了十月十七日宣言的强大工人运动”中寻找；有人说，“我们不希望恩惠性的宪法，而只想要从人民的手中接过它。”对伪古典主义风格有着不可抗拒的喜爱的罗季切夫大声高呼：“要么实行普遍直接选举权，要么就没有杜马！”但是，就在这同一次大会上，也有人说：“农业骚乱、罢工——所有这些都造成了恐惧；吓到了资本，吓坏了富人。他们把银行里的钱取出来，跑国外去了。”地主清醒而又高亢的声音响起了：“总督辖地的机构作为打击农业骚乱的手段受到嘲弄，但谁能提出一个更符合宪法的手段来打击它们？”“与其让斗争尖锐化，不如接受任何妥协……”第一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古契科夫喊道：“现在是叫停的时候了，我们只是亲手在为一场会将我们所有人吞噬的大火上浇油。”

塞瓦斯托波尔舰队起义的早期消息，使乡绅的反对勇气受到了力不胜任的考验。一位自由派乡绅中间的睿智长者（Нестор），彼得鲁肯维奇^[2]先生宣称道：“我们现在拥有的不是革命，而是无政府状态。”在塞瓦斯托波尔事件的直接影响下，立即与维特内阁达成协议的倾向占了上风。米留可夫试图阻止大会采取任何可能的妥协性措施。他安慰乡绅道：“塞瓦斯托波尔的暴乱正在结束，主要的叛变者已经被逮捕了，任何担心似乎都是为时尚早的。”徒

[2] 伊万·伊里奇·彼得鲁肯维奇（Иван Ильич Петрункевич，1844年1月4日—1928年6月14日），俄国律师。1868年起担任切尔尼戈夫地方自治局议员。1878年因鼓吹改革而被捕。1879年被流放到科斯特罗马。1887年移居特维尔。1890年当选为特维尔地方自治局议员。1903年移居克里米亚，同年参加了解放社。1904年反对日俄战争。1905年创立立宪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06年任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杜马被解散后签署了《维堡宣言》。1908年被捕并被判处三个月监禁。1909—1915年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19年经希腊流亡法国。1921年流亡瑞士。1924年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28年死于布拉格。——中译者注

劳无益！大会决定向维特派出一个代表团，递交了一份用反对派—民主主义的措辞表达有条件信任的决议。与此同时，大臣会议在自由派右翼的几个“社会活动家”参与下，正在讨论国家杜马的选举制度。这些所谓的“社会活动家”赞成普遍选举权，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必要性。维特试图证明逐渐完善布雷金的天才制度的好处。他们没取得任何结果，而从11月21日起，大臣会议在没有“社会活动家”的帮助下继续进行。11月22日，由彼得鲁肯维奇、穆罗姆耶夫^[3]和科科什金^[4]几位先生组成的乡绅代表团将地方自治派的照会提交给维特伯爵。他们7天都没有得到答复，耻辱地回到了莫斯科。伯爵的回复紧随其后，是以一种达官显贵、高级官僚的口吻写出来的。大臣会议的首要任务是执行最高意志；任何超出十月十七日宣言范围的将被取消；动乱使得不可能放弃宣言中的限制性条款；至于那些不愿意支持政府的社会团体，政府唯一关心的，是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

作为对乡绅大会的制衡，11月24日，图拉省乡绅代表团，由于其软弱无力，以及无疑因此导致的对乡绅和杜马情绪的偏离，被

[3] 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穆罗姆采夫（Серг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Муромцев，1850年10月5日—1910年10月17日），俄国律师、社会学家。出身于贵族家庭。1880—1899年任莫斯科律师协会主席。1881—1885年、1888—1908年任莫斯科市杜马议员。1905年创立立宪民主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06年任第一届国家杜马主席，杜马被解散后签署了《维堡宣言》。1908年被捕并被判处三个月监禁。1910年去世。——中译者注

[4] 费奥多尔·费奥多洛维奇·科科什金（Фёдо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окошкин，1871年7月14日—1918年1月7日），生于卢布林一个贵族家庭，1897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07年成为教授。1905年参与创立立宪民主党。1906年当选为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并担任杜马副主席。二月革命后出任临时政府司法委员会主席、立宪会议选举章程起草委员会主席。1917年7月—8月担任临时政府审计长。十月革命后被捕，1918年与盛加略夫一同被处决。——中译者注

带到了皇村。代表团的团长博布林斯基^[5]在一次具有拜占庭式奴性的讲话中说道：“我们不要求特别多的权利，因为我们自己的利益要求沙皇的政权强大而有效……皇上，您不能偏听偏信，而只能从您合法召开的国家杜马中了解人民的需求。我们恳请您不要拖延它的召开时间。人民习惯了8月6日进行选举的法令……”

事件就像约定好的一样，正在加速把有产阶级送进秩序的营帐。早在11月中旬，邮政—电报罢工出乎意料地自行爆发了。这是邮政部门的觉醒奴隶对杜尔诺沃“禁止官员组建工会”通令的回应。邮政—电报工会给维特伯爵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取消杜尔诺沃的通令，并恢复因参加工会而被解雇的官员的职务。11月15日，邮政—电报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召集了73名代表，一致决定向所有线路发出以下电报：“未收到维特的答复。开始罢工吧。”紧张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西伯利亚在最后通牒中指出的时限还没过，就已经开始了罢工。第二天，罢工在广大进步官员团体的掌声下，占领了整个俄罗斯。维特明智地对各种各样的代表团解释说，政府“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自由派开始担心起邮政通信中断对“文化”造成的损害，开始皱着眉头研究比较“德国和法国职业协会自由的限度”……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没有丝毫的犹豫。而且，邮政—电报罢工虽然并不是在其倡议下爆发的，但在彼得堡也得到了苏维埃的积极支持。苏维埃从钱箱里给罢

[5] 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博布林斯基伯爵（граф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Бобринский，1868年1月9日—1927年11月9日（或11日）），俄国君主派政客。出身于政治世家。1892—1897年任博戈罗季茨克区地方自治局议员。1895—1898年任博戈罗季茨克区地方自治委员会主席。1897—1904年任图拉地方自治局议员。1905年参加俄罗斯人民同盟。1906—191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14—1915年期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5—1917年期间在杜马领导进步党党团。1916—1917年任国家杜马主席助理。十月革命后参加了白军。内战结束后流亡法国，继续参加流亡君主派的活动。1927年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工者发放了 2000 卢布。执行委员会派人到他们的会议上发言，印刷他们的呼吁书，并组织纠察队对付工贼。很难评估这个策略对“文化”的影响；但毫无疑问，它使邮政官员开始同情无产阶级。在罢工一开始，邮政—电报代表大会就向苏维埃派了五名代表……

邮政通讯的中断即使没有伤害文化，但也必定极大地损害了贸易。商人和股票经纪人在罢工委员会和部委之间来回奔走，一会儿恳求官员们结束罢工，一会儿又要求对罢工者采取镇压措施。由于他们的腰包不断受到新的影响，资产阶级日趋反动。与此相伴，皇村阴谋家反动的无礼行为以小时计在不断增加。如果还有什么能抑制反动的冲击，那就只剩下对革命不可避免的回应的恐惧了。接下来提到的事变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中亚库什卡要塞的军事法庭对一些铁路职员进行了判决，由于这个判决的关系，事变爆发了。事实非常引人注目，我们因此将在这里用几句话来讲述它们。

11 月 23 日，在邮政—电报罢工的最高潮，彼得堡铁路枢纽委员会收到了一份来自库什卡的电报。电报中说，要塞司令工程师索科洛夫和其他几名服务人员因被指控进行革命鼓动而被送上战地军事法庭，并被处以死刑，而判决必须在 11 月 23 日午夜执行。罢工中的电报网络在几个小时内就将所有铁路枢纽联系起来。铁路大军要求向政府发出紧急最后通牒。然后，最后通牒被发出了。在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的同意下，铁路代表大会告诉内阁：如果晚上八点以前死刑判决没有被撤销，所有铁路交通将被中止。

在笔者的记忆中，还生动地保留着那次难忘的执行委员会会议的经过。会议在等待政府答复的同时，也制定了行动的计划。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看着时钟上的指针。各条铁路的代表相继前来，报

告越来越多的铁路相继发出电报表示支持最后通牒。很明显，如果政府不让步，那么一场绝望的斗争将会开始……然后呢？在 8 点 05 分（沙皇为了挽回面子，只推迟了 300 秒），交通大臣通过加急电报通知铁路委员会，表示它将停止执行该判决。第二天，内阁自己在一份政府公告中公开表示投降。在这份公告中，提到政府收到了“废除判决的请求(!)，请求中表示假如不予实现，就打算(!)宣布罢工”。政府没有收到当地军事当局的任何消息，因为“可能是由于国有电报在罢工”。无论如何，“在收到这份电报宣言后”，陆军大臣立即发出命令，责成“暂停执行判决，如果判决的确成立，那就推迟到查清事件真相”。官方公告没有提到，陆军大臣不得不通过铁路工会发送他的命令，因为政府自己的电报正在罢工，无法使用。

然而，这场漂亮的胜利是革命的最后一次胜利。在这以后，革命只看到了失败。很明显，一场针对革命的无情攻击正在准备之中。早在 11 月 14 日，农民联盟的官员就在莫斯科被捕，而理由则是政府颁布了加强安全措施的法令。大约在同一时间，皇村也决定了要逮捕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但是，行政当局推迟了自己这一决定的执行。它还并没有感到完全的信息，它还在试探逮捕的基础，并犹豫不决。皇村阴谋的反对者是司法大臣。他作证指出，代表苏维埃不能被视为秘密结社，因为它的行动是绝对公开的，公布了自己的会议，在报纸上刊登了自己的报告，甚至与行政人员进行了接触。消息灵通的媒体在总结司法大臣观点的时候写道：“政府和行政部门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旨在推翻现存制度的活动；后者甚至经常派出巡逻队到苏维埃的会议现场上维持秩序；彼得堡市行政长官甚至亲自接待了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

廖夫^[6]，知道他是谁，以什么身份出现——所有这些都使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员有充分根据认为自己的活动与政府遵循的政策毫无抵触，因此也不算犯罪。”

但是，司法大臣终究还是找到了克服其法律上顾虑的方法——然后，11月26日，赫鲁斯塔廖夫就在执行委员会所在地被捕了。

关于这次逮捕的意义，我要稍微说下。在10月14日的苏维埃第二次会议上，根据社会民主党组织代表的提议，年轻的律师格奥尔基·诺萨尔（后来以赫鲁斯塔廖夫的名字获得了极大的知名度）被当选为主席。直到他被捕的那天，他都还在当着主席，而且苏维埃实际活动的所有组织线索都集中在他手中。在几个星期内——一方面是街头的激进报刊，一方面是反动的警察报刊，都围绕着这个人物创造了一个历史传奇。就像在早些时候，他们把1月9日看成是格奥尔基·加邦充满热情的谋划与巧惑人心的才能的结果一样，工人代表苏维埃在他们看来也是格奥尔基·诺萨尔巨手上的一枚柔弱的棋子。后面的一个错误，要比前面的一个更加不可饶恕、荒唐。尽管赫鲁斯塔廖夫作为主席做的工作在内容上比加邦的冒险主义活动无疑要丰富得不可估量，但苏维埃主席对事件的进程和最终结果施加的个人影响，要比警察部门的造反牧师获得的影响要小得多。这不是赫鲁斯塔廖夫的错，而是革命的功劳。从一

[6] 格奥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Георг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 Хрусталёв-Носарь，1877—1919），早年即参与学生运动，1903年加入基辅同盟。1905年10月当选为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1月被捕。1906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07年流亡国外，加入了孟什维克。1910年退党，转向工团主义。一战中持护国主义立场，并回国。1915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被拒绝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1918年支持彼得留拉。1919年煽动对抗布尔什维克，被下令逮捕并处决。——中译者注

月到十月，革命迫使无产阶级在一个大型的政治学校进行学习。在工人群众的革命实践中，“英雄”与“群氓”^[7]的概念已不再适用。领袖的人格溶解在组织之中；同时，联合起来的群众本身也形成了一个政治人格。

赫鲁斯塔廖夫作为一个实际上机智、精明能干的人，一个精力充沛、高水平的主席，尽管只是一个平庸的演说家，一个没有任何政治历史和明确政治面貌的易冲动的人物，是为自己在1905年年底要扮演的角色而生的。工人群众虽然有革命情绪和强烈的阶级感官，但总的来说，大部分都没有政党上的明确性。我们上述关于苏维埃本身讲过的话，在这里也都可以放在赫鲁斯塔廖夫身上。过去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党的人（Партийные люди），而党的人的

[7] 这正是民粹党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文章标题（Герой и толпа）。原文又长又臭，这里大概我引用一下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来大概刻画一下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思想：“那时甚至连多数先进的活动家都认为，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即英雄，才是进步的动力，没有个性的、愚昧的人民群众，即群氓，是跟着他们走的……群众只能效法英雄，并且要由英雄来带领。群氓只是盲从的……”当然，这样一种本该只在资产阶级阵营的《乌合之众》中出现的反动世界观，至今还非常盛行。斯大林通过利用这篇文章，以及对历史的各种篡改，成功地树立了一个“不喜个人英雄式崇拜”的英雄形象；“托洛茨基主义者”则尊托洛茨基为“先知”，然后为其头上施加“受害者”的光环，拜倒在冰镐状的“圣物”之下，把他的文字当成《圣经》来处理，就像庸人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断章取义一样；而上面提到的赫鲁斯塔廖夫，后来脱了党，在1917年的时候竟跑去要求工人与士兵代表苏维埃承认他第一届苏维埃主席的身份……最后在1919年，他因为反革命行径被枪毙了，和托洛茨基相比，高下立判；最后，更不用说，现在的大多数左翼，即使谁也不尊，其思想大概也是和米哈伊洛夫斯基相通的。——Uni

[中译者补注1]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哈伊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1842年11月15日—1904年1月28日），俄国社会学家、批评家、文学评论家。早年支持民意党，积极参加民粹派活动。后期鼓吹“英雄”和“群氓”理论，激烈攻击马克思主义。列宁曾严厉批判其错误观点，又肯定其对解放运动的历史功绩。

候选资格会在苏维埃成立之初就给它带来摩擦。此外，由于赫鲁斯塔廖夫存在政治上的不明确性，这使得苏维埃与非无产阶级的大众（Не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мир）更容易地建立关系，特别是与知识分子组织的关系——苏维埃从这些组织获得了大量的物质援助。社会民主党把主席职位委托给一个非党的人士，是指望对苏维埃施加政治控制。他们没有指望错。仅仅过了三到四个星期，他们的影响力和力量有了极大的增长，这一点尤其可以通过赫鲁斯塔廖夫公开宣布加入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事实来判断。

政府希望通过逮捕赫鲁斯塔廖夫达到什么目的？它是不是以为，通过消除苏维埃的主席，就能摧毁该组织？当然，这太愚蠢了——甚至对杜尔诺沃来说也是愚蠢的。然而，我们很难对这一行为的动机做出准确回答，因为，那些在皇村聚集起来讨论革命前途的反动阴谋家，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的动机是什么，而只能采取宪兵式的措施。无论如何，主席在这种条件下被捕，在使这种主席产生的条件下被捕，对苏维埃而言具有巨大的征兆性意义。以下几点，对于任何一个在前一天还在怀疑的人来说，都在主席被逮捕的那一天之内清楚明白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再退却了；决定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冲突与我们的时间间隔，不是几个月或者几周，而是几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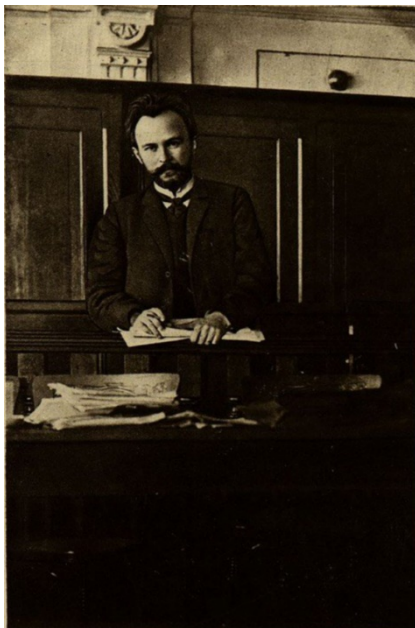
第二十章 苏维埃最后的时日

苏维埃，是做不到在赫鲁斯塔廖夫被捕以后离开公开舞台的——作为工人阶级自由选举出来的议会，它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活动的公开性质。解散自己的组织，就意味着故意向敌人敞开要塞的大门。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过去的那条路——直面冲突。在11月26日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社会革命党代表（切尔诺夫^[1]“本人”）提议发表一项声明，内容是苏维埃将以恐怖袭击来回应政府的每一项镇压措施。我们站出来反对了这个提议：在军事行动开始前的这一短暂时期里，苏维埃必须尽可能地与其它城镇，以及农民联盟、铁路工会、邮电联盟和军队建立密切的联系（早在十一月中旬我们就已经派出了两名代表，一名前往南部，而另一名前往伏尔加河流域）；与此同时，对个别大臣们进行的恐怖袭击将无疑耗尽执行委员会的全部精力和注意力。我们提出将以下决议提交给苏维埃的下一次会议：“11月26日，沙皇政府俘虏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同志。苏维埃将选出临时主席团，并继续为武装起义进行准备。”有三人被选为主席团成员的候选人：执行委员会报告人亚诺夫斯基（Яновский）（本书作者正是以亚诺夫斯基为名在苏维埃进行活动的），现金管理员维坚斯基（斯维尔

[1]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年11月25日—1952年4月15日），生于萨拉托夫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在上中学期间参加激进运动。1892年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于1894年被捕。1899年流亡国外。1901年参与创立社会革命党，并担任党报《革命俄罗斯》编辑。1903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期间回国，并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1908年辞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副主席。1917年5月—7月出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5日—6日任立宪会议主席。内战期间参加了白军的反革命活动，1920年流亡布拉格。1926年脱离社会革命党。1940年流亡美国，1943年死于纽约。——中译者注

奇科夫^[2]) 和奥布霍夫工厂的工人代表兹里德涅夫。

苏维埃的大会在第二天举行，而且一如既往地公开举行。有 302 名代表出席。大会上弥漫着紧张的氛围，许多苏维埃成员希望立即直接回应内阁的游击式突袭。但经过短暂的讨论后，会议一致通过了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并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从候选人中选出了主席团成员。



(赫鲁斯塔廖夫，苏维埃主席)

出席会议的农民联盟最高委员会主席报告了 11 月联盟大会上作出的许多决定：不给政府提供兵源，不缴税，并从国家银行和储蓄所提取存款。执行委员会早在 11 月 23 日的时候通过了决议，建议工人“因政府即将破产”仅接受以黄金为形式的薪水，并从储蓄所提取自己的存款。因此，大会作出了决定，合并这些财政抵制

[2] 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斯维尔奇科夫 (Дмит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Сверчков, 1882 年? 月? 日—1938 年 4 月 21 日)，苏联作家。1899 年加入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 年革命期间任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被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途中逃走，随即转向孟什维克。1908—1909 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10 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苦役。二月革命后获释。1920 年加入俄共 (布)。1937 年被捕。1938 年遇害。1956 年平反。——中译者注

措施，并以苏维埃、农业联盟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名义在向人民发表的宣言中发布这些决定。

之后还会不会有无产阶级议会的大会？这一点还没法确定。大会决定，在苏维埃无法召开的情况下，其职能将会移交给扩大的执行委员会。苏维埃在12月3日遭遇逮捕行动后，其权力在这一决定的基础上被转交给了第二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手中。

随后，大会上宣读了来自芬兰各营有觉悟士兵、波兰社会主义政党以及全俄农民联盟的热烈问候。来自革命农民的代表承诺在决定性的时刻给予兄弟般的支持。在代表和来宾难以形容的热情中，在雷鸣般不断的掌声和呼喊声中，农民联盟的代表和苏维埃主席互相握手。大会一直进行到深夜。最后离开的是值班警察，他们一如既往地遵循市行政长官的命令守在入口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可以从侧面体现这一情况的性质：正是在同一天晚上，一个小警察官根据同一个市行政长官的指示，阻止了以米留可夫为首的资产阶级选民进行的合法的、和平的大会……

大多数彼得堡工厂都支持苏维埃的决议。莫斯科和萨马拉苏维埃、铁路和邮政—电报工会以及许多地方组织通过的决议也对彼得堡的决议表示同情。甚至工会联盟中央局也同意了苏维埃的决定，并向“全国的有生分子”呼吁，要求他们为即将到来的政治罢工和“与人民自由的敌人进行的最后的武装战斗”作准备。

但是，自由派和激进派资产阶级在10月对无产阶级的同情现在已经冷却了。局势变得越来越尖锐，而被自己的不作为激怒的自由派，对苏维埃发出了阴森的牢骚。街上的一般人对政治知之甚少，对苏维埃采取了半善意、半顺从的态度。当他们害怕在旅途中发生铁路罢工时，他就会顺路去苏维埃的办公室了解情况。在这里，他同样也在邮政—电报罢工期间将自己的电报交出去，而如果

办公室认为电报足够重要，他们就会把它发出去。例如，一位 B 枢密官的遗孀，在多次拜访各部委无果后，最终来到苏维埃，以使自己能够就一项重要的家庭事务发出电报。苏维埃的书面命令可以使普通人不必遵守法律。一个雕刻工房只有在收到苏维埃的书面“许可”后，才同意为非法的邮政—电报工会制作印章。北方银行将一张过期的支票记在了苏维埃的账上。海军部的印刷厂就是否应该罢工而向苏维埃征询意见。个人、官员甚至政府都在危险的时刻寻求苏维埃的保护。当利夫兰(Лифляндский)省^[3]宣布戒严时，彼得堡居民中的拉脱维亚人请求苏维埃就沙皇专制的最新暴虐“说点自己的话”。11月30日，卫生保健员联盟联系上了苏维埃。红十字会通过虚假的承诺诱使他们参加了战争，然后将他们放回国，但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回报。对苏维埃进行的逮捕中断了它就这件事与红十字会最高理事会的积极书信往来。苏维埃所在地总是挤满了所有可能出现类型的请愿者请求人、替人请求者、申诉人和蒙冤的人，而他们主要是工人、庸人、店员、农民、士兵、水兵……有些人对苏维埃的力量和方法抱有绝对的幻想。有一位参加过俄土战争的盲人老兵，身上挂满了十字架和奖章，抱怨了自己的悲苦贫困，请求苏维埃“给一号人物(Самый)施压”(也就是给沙皇施压)……申请书和申诉书从全国的偏远地区寄来。波兰一个省的一位县民在十一月罢工之后向苏维埃发了一封感谢电报。波尔塔瓦省的一位老哥萨克向苏维埃抱怨雷普宁^[4]亲王的不公正行为。他是一位办事员，在亲王底下被剥削了28年，然后无辜被解雇。这

[3] 包括今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一部分。——中译者注

[4]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雷普宁亲王(Князь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Репнин, 1834年4月8日—1918年?月?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54年入伍，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1862年因病退役。1880年起任国务委员。1909—1917年任国务院议员。1918年去世。——中译者注

位老人请求苏维埃给雷普宁亲王施压。装有这份新奇的申诉书的信封地址栏上只写着“彼得堡，工人公署”，但却被革命的邮政准确无误地送达。来自明斯克省一个土方工程劳动组合的信使代表向苏维埃询问：某个地主想要以某种股票的方式以低价偿还 3000 卢布的债务。被派来的人问道：“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即想入股，但也害怕：我们听说你们的政府要我们工人只接受真金白银的现钞。”调查得出，此地主的股票几乎毫无价值……苏维埃的消息在其活动接近尾声的时候才开始传到农村。来自农民的请求越来越多。切尔尼戈夫省的农民希望与当地的社会主义组织取得联系，莫吉廖夫省的农民则派出请愿代表，带着几个村庄的判决书，承诺与城市工人和苏维埃共同行动……

一个巨大的活动领域在苏维埃面前展开。到处都是无边无际的政治生荒地，等待着革命的深耕细作。但时不待人。反动派正在疯狂地设下圈套，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打击。执行委员会十分狂热地在巨量的日常工作之间将苏维埃于 11 月 27 日的决议付诸行动。它发布了一份致士兵的呼吁书（见《十一月罢工》一章），并在与革命政党代表的联席会议上批准了帕尔乌斯^[5]提交的宣言的“财政”文本。12 月 2 日，该宣言发表在了彼得堡的八家报纸，其中四家是社会主义报纸，四家是自由派报纸。以下是这份历史性文件的文本。

[5] 亚历山大·洛夫维奇·帕尔乌斯（Александр Львович Парвус），本名伊兹赖尔·拉扎列维奇·盖尔方德（Израиль Лазаревич Гельфанд，1867 年 9 月 8 日—1924 年 12 月 12 日），出身于白俄罗斯一个犹太家庭，在敖德萨长大，少年时即参加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的活动。十九岁时赴瑞士求学，其间逐步转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移居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罗莎·卢森堡的朋友。1900 年初次同列宁见面。1905 年参加俄国革命，失败后被判流放三年，后逃回德国。一战结束后脱离政治活动。他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中译者注

宣言

政府濒临破产。它让国家满目疮痍、尸横遍野。农民饱受苦难和饥饿的折磨，已经筋疲力尽，负担不起苛捐杂税。政府用人民的血汗钱给地主发放贷款。现在，它已经无法摆脱地主抵押的庄园了。工厂和车间处于停滞状态。没有任何工作。贸易普遍停滞。政府把通过向外国借贷获得的资金用于建造铁路、舰队和要塞，并储备武器。现在，外国资金来源已经干涸——国家订单消失了。商人、供应商、承包商、工厂主习惯了用国库的钱来充实自己的钱包，发现自己没有了暴利，正在关闭自己的办公室和工厂。破产接二连三地发生。银行纷纷倒闭。所有的贸易往来都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政府与革命的斗争持续不断地制造浪潮。再也没有人能够确定明天会发生什么。

外国资本正在回国。“纯俄罗斯”的资本也在向外国银行渗透。富人正在出售他们的财产，逃往国外。强盗正在从这个国家滚蛋，并带走了人民的财富。

政府把所有的国家收入都花在了陆军和海军上。不兴教育，不修道路。尽管如此，政府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来继续供养部队。穷困潦倒、饥寒交迫的军队在全国各地不断起义。

铁路在经济上衰败了，大量的铁路被政府毁灭一空。想要恢复铁路的经济，则必须要往里面投资上亿卢布。

政府陆续盗走了储蓄所的资金，并将存款发放给私人银行和工业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是完全空心的。它利用小储蓄者的资本来玩股票交易，使这些资本每天都在承受风险。

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与现有的政府债务和贸易周转要求相比，毫无价值。如果每一笔交易都要使用金币，那么这一储备就会化为乌有。

趁着国家财政不受监管，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借远远超过国家支付能力的贷款。它用这些新贷款来支付旧贷款的利息。

政府年复一年地发布虚假的收入和支出预算书，两者的数据少于实际情况。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抢劫，以便使预算书显示盈余而不是年年赤字。官员们可以毫无节制地窃取国库，而国库即使没有这些窃取也已经耗尽了。

只有推翻专制制度并召开立宪会议，才能阻止这种财政上的破坏。它将严密调查国家财政情况，并制定出详细、清晰、准确并经过认证的国家收入支出（预算）平衡表。

由于担心人民的控制会向全世界揭露政府的在财政上毫无支付能力的事实，它迫使自己不断地推迟召集人民代表。

专制不仅造成了国家的财政破产，也造成了其军事破产。人民代表面临的任务，就只有尽快整理出债务表了。

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贪婪活动，迫使人民战斗到死。数十万公民在这场斗争中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工业、贸易和通信方式的基础悉数被毁。

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推翻政府，剥夺他最后的力量。必须切断其最后的生存来源：财政收入。这不仅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解放是必要的，对国家财政的整顿也是必要的。

因此，我们决定：

拒绝向国库支付土地赎买款项以及其他所有款项。在所有的交易、支付工资和薪金时，要求使用黄金支付，在金额少于5卢布的情况下，要求使用足重的硬通货。

从储蓄所和国家银行中提取存款，要求以黄金来进行所有支付。

专制统治从来没有得到过人民的信任，也没有得到过人民授

予的权力。

目前，政府在自己国家疆域内的行为，就好像它在统治被征服的国家一样。

因此，我们决定，不允许为沙皇政府在明确地、公开地给全体人民带来战争时签订的贷款还债。

工人代表苏维埃
全俄农民联盟最高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及组织委员会
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
波兰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当然，这个宣言本身既不能推翻沙皇专制，也不能扭转其财务状况。只有第一届国家杜马在半年后通过其《维堡宣言》才试图创造这样的奇迹——该宣言呼吁民众“按照英国模式”和平地拒绝缴税。苏维埃的财政宣言只不过是十二月起义的一个序曲。在罢工和街垒战的精神激励下，它在全国找到了强大的回声。前三年，储蓄所在12月的存款比取款多400万卢布，而在1905年的12月，取款就比付款多出了9000万卢布——宣言在仅仅一个月里就从政府的储备金里拿走了9400万卢布！当起义被沙皇匪帮镇压后，储蓄所才再次恢复了其平衡……

* * *

在11月的最后十天里，基辅及基辅县，利夫兰、切尔尼戈夫、萨拉托夫、奔萨和辛比尔斯克省（农潮的主要舞台）都宣布了戒严令。

11月24日，在实行“临时”出版条例的第一天，总督和市行政长官的权力被急剧扩大了。

11月28日，波罗的海地区“临时”总督的职位被设立。11月

29日，地方长官被授权在铁路或邮政—电报发生罢工的情况下，可以自行在其所在的省份宣布非常状态。

12月1日，尼古拉在皇村接见了一个由受惊地主、僧侣和城镇屠杀者匆忙组成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要求无情地惩罚革命凶犯，并同时惩罚那些放任事态、无所作为的达官显贵；他们还不满足于对维特的这种暗示，解释道：“请通过专制吩咐，召回你君主意志的某些执行者。”

尼古拉回答这帮肮脏的农奴商人和雇佣恶棍道：“我肯定接受你们的要求，因为我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真正的俄罗斯男儿，自古以来就为我和祖国奉献的俄罗斯男儿。”在中央发出的信号下，各省行政部门，以农民和小市民的名义向彼得堡的沙皇发出了大量的感谢信。据我们所知，“俄罗斯人民联盟”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它第一批的巨额补贴款，组织了一些集会，分发宣扬屠杀的爱国书籍。

12月2日，印有苏维埃财政宣言的八家报纸被没收并停止出版。同一天，新的苦役条例发布，规定铁路、邮政、电报和电话职员罢工或组建工会都是违法的，最高可判处4年有期徒刑。革命报纸在12月2日公布了它缴获的一项命令。这项命令是沃罗涅日总督根据杜尔诺沃的秘密通令下达的，上面写道：“绝密……立即查明所有反政府和农民运动的头目，并将它们关押在当地监狱，以等待内务大臣的进一步指示进行处理。”政府发布了其第一份威胁性公告：极端政党旨在破坏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向政府宣战，诋毁他们的对手，阻止社会享受新制度带来的好处；他们挑起罢工，以便把工人变成革命的原材料。“工人的流血（政府干的！）无法使他们（革命者！）产生任何良心上的不安。”如果普通的手段

被证明对这些现象无济于事，那么“无疑有必要采取完全特殊的措施。”

特权阶层和受惊有产者的等级利益，官僚的报复性愤怒，被收买者的同意、被愚弄者的沉痛仇恨——所有这些混在一起，形成了一团令人作呕的、血腥肮脏的反动土块。皇村发放黄金，杜尔诺沃的部下编织了一个地下阴谋的铰链，雇佣的杀手磨好了他们的匕首……

而革命的增长势头则是不可阻挡的。新的力量在不断地加入它的主力军——产业无产阶级。在城镇，参加集会的有看院人、看门人、厨师、家政、家庭仆人、地板打蜡工、服务员、澡堂服务员和洗衣女工。出人意料的人物出现在大会和报刊办公室里：“觉悟的”哥萨克列兵，车站宪兵，城镇警察、警察所长，甚至连忏悔过后的密探都来了。社会地震不断地从一些隐秘不为人知的深处抛出一层又一层人，而这些人在和平时期是没人记得住的。小官员、监狱看守、军队文书一个接着一个地在革命报纸的所在地等着发言。

十一月罢工对军队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一股军人集会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国家。军营里充满了造反的精神。在这里，不满情绪通常是以士兵的直接需要为根基产生的，然后迅速发展，并呈现出政治色彩。从11月20日开始，彼得堡（在水兵中）、基辅、叶卡捷琳诺达尔（Екатеринодар）^[6]、伊丽莎白波尔（Елизаветполь）^[7]、普罗斯库洛夫（Проскуров）^[8]、库尔斯克和沃姆扎（Ломжа）^[9]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士兵骚乱。在华沙，禁卫军要求释放他们被逮捕的

[6] 现克拉斯（红）诺达尔。——中译者注

[7] 现阿塞拜疆占贾。——中译者注

[8] 现乌克兰赫梅利尼茨基。——中译者注

[9] 位于现波兰。——中译者注

军官。各方传来的消息表明，起义的热情已经笼罩在整个满洲的俄国军队上空了。11月28日，在伊尔库茨克举行的一场集会上，有奖金4000名卫戍部队士兵参加。在一位士官的主持下，集会决定赞同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在许多城镇，士兵在集会上与工人交心。12月2日和3日，莫斯科的卫戍部队开始了骚乱。在一些甚至连哥萨克都有参加的集会上，人群奏着马赛曲在大街上游行，有一些团强行将军官赶出了岗位……最后，就像城市这口大锅在革命环境下沸腾一样，各省也在熊熊燃烧着农村起义的火焰。11月底到12月初，农业混乱蔓延到许多县：在莫斯科附近的中心地区，沿着伏尔加河，沿着顿河，在波兰王国——这些地区不断地有农民在罢工，在捣毁国有酒铺，在庄园纵火，没收财产和土地。整个科夫诺省都处于立陶宛农民起义的控制之下。从利夫兰也传来了一个又一个警报。地主纷纷逃离自己的庄园，省行政人员也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只要对当时的俄罗斯有一个清晰的印象，就足够使人明白，12月的冲突是多么的不可避免。某些后知后觉的聪明人（普列汉诺夫）说：“应该回避斗争的。”这说的，仿佛只是一盘棋，而不是数以百万计的元素进行的运动！

《新时代报》写道，“工人代表苏维埃并没有垂头丧气，而是继续精神饱满地行动，并以纯粹斯巴达式的语言印刷自己的指示，简明扼要，一目了然。而维特伯爵的政府就完全不是这样了，它更喜欢用多愁善感的姑娘那冗长乏味的语言。”12月3日，维特政府同样也用了一种“简明扼要、一目了然”的语言——它用从各军种抽调的部队团团包围了自由经济协会的大楼，并逮捕了苏维埃。

执行委员会在下午4点召开会议。当日的安排已经被报纸的没收、针对罢工的苦役条例和杜尔诺沃的阴谋电报提前确定好了。

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以党的名义提交了建议：接受专制主义的挑战、立即与全国所有革命组织进行联系、制定开展政治总罢工的日期、动员所有力量和预备队，并在土地运动和士兵骚动的支持下，直面决定性的收场……

铁路工会的代表确信，12月6日召开的铁路代表大会无疑将决定支持罢工。

邮政—电报工会的代表发言支持该党的提议，并希望总行动将会给正在消退的邮政—电报罢工注入新的活力。辩论被一则消息打断了：苏维埃今天将面临逮捕。半小时后，消息被确认了。在这个时候，有上下两排窗户的大礼堂里已经坐满了代表、政党代表、记者和客人。正在二楼开会的执行委员决定派几个执行委员离开现场，以便在逮捕发生的时候保持连续性。^[10]但是，晚了！这栋房子已经被伊兹梅洛夫斯基禁卫团的士兵、哥萨克骑兵、警察和宪兵包围了……脚步声、马刺的叮当声武器碰撞的咯咯声充满了整座房子。从楼下的大厅里传来了愤怒的抗议声浪。主席打开二楼的窗户，弯腰向下面大声喊：“同志们，不要进行抵抗！我们预先宣布，在这里开枪的只有奸细或警察……”几分钟后，士兵们爬上了二楼，并在执行委员会的房间门口摆开了架势。

主席（向警官）说道：“我命令你们关上门且不要打扰我们的工作。”

士兵们留在了过道里，但没有把门关上。

主席：“会议继续。谁想发言？”

办事员（Конторщик）工会代表：“今天，政府通过自己的野蛮欺压行径，巩固了支持总罢工的理由。政府已经预定了总罢

[10] 也就是说，在其他成员遭到逮捕的情况下，离开会场的执行委员可以继续执行委员会的活动。——中译者注

工……无产阶级新的、决定性的行动结果取决于军队。让他们出来保卫祖国吧！”（军官急忙关上了门，发言者提了提嗓门。）“工人兄弟般的呼唤、苦难国家的声音会透过紧闭的大门传到士兵那里！……”

门开了，一个宪兵大尉脸色苍白得像死了一样爬了进来（他害怕子弹），后面跟着两打^[11]警察，他们站到了代表的椅子后面。

主席：“我宣布执行委员会的会议结束。”

楼下传来金属敲击的巨响，响得很整齐，仿佛有十几个铁匠在铁砧钱工作——这是代表在砸碎自己的勃朗宁手枪，以免它落入警察手中。

一场搜查开始了。每个人都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字。经过搜查、做好笔录并标好号码的人被半醉的士兵押走。

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落入了皇村阴谋家的手中。

[11] 一打约合 12 个。——中译者注

第二十一章 十二月

12月4日，莫斯科代表苏维埃同意了《财政宣言》。而在12月6日，在莫斯科军区大骚乱的直接压力下，拥有10万工人作为基础的苏维埃决定与革命政党站在一起，宣布在第二天即12月7日起进行政治总罢工，并努力将其转变为武装暴动。12月5—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有29条铁路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决定同意苏维埃的决议。邮政—电报代表大会也通过了类似的决定。

在彼得堡，罢工于8日开始，次日达到顶点，在12日开始消退。它远不如十一月罢工那样齐心协力，参与的工人不到三分之二。这种犹豫不决可以被解释为：彼得堡工人已经清楚意识到，这并非一场罢工示威，而是生死攸关的斗争。1月9日在群众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面对规模庞大、以禁卫团为骨干的卫戍部队，彼得堡工人没法主动发起革命起义；他们的任务，正如十月罢工表明的那样，是趁全国其他地区起义动摇专制主义的时候，给它以最后一击。各省的重大胜利是彼得堡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基本心理前提。但是，这样的胜利没有到来，退缩代替了犹豫不决。

除了彼得堡的消极态度以外，尼古拉耶夫铁路（彼得堡—莫斯科）的继续运行也致命地影响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在首都普遍占主导地位的观望情绪影响了铁路工会的彼得堡委员会。与此同时，政府紧盯着这条动脉，利用这一耽搁，出动军队占领了这条铁路。部分车间坚持罢工，但电报已经落入了当局手里，而线路则由铁道营直接管理。罢工的工人已经多次尝试阻止交通，但都徒劳无获。12月16日，特维尔工人破坏了部分铁轨，以阻止军队从彼得堡向莫斯科进发。但这已经太晚了：谢苗洛夫禁卫团已经过去了。然而，总的来说，铁路罢工的开展是非常团结的。大多数线路到10号之前就已经开始罢工；其余线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也加入了罢工的

行列。在宣布罢工开始的同时，铁路工会的会议宣布：“我们承诺比政府更快地将部队从满洲送回家……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以便将粮食送到饥饿的农民手里，并补给铁路线上的同志。”这里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遇到了类似的现象，而这些现象正是尚有思考能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应该想想其意义的：在瘫痪国家政权的过程中，总罢工将极其重要的国家职能转交给自己的组织。而且，必须承认，铁路工会总的来说做得非常好。尽管许多地方附近就有政府军，但运送储备物资、纠察队员和革命组织成员的火车还是以惊人的速度和准确率运行着。许多车站是由选举产生的管理员管理。铁路建筑物上飘扬着红旗。第一个罢工的城市是莫斯科。第二天，彼得堡、明斯克、塔甘罗格开始了罢工。紧接着，在大城市中——第十日梯弗里斯^[1]，第十一日维尔纽斯，第十二日哈尔科夫、基辅、西诺夫哥罗德，第十三日敖德萨、里加，第十四日罗兹，第十五日华沙。总共 33 个城镇参与了罢工，与此相比的十月则是有 39 个城镇。

12 月运动的中心是在莫斯科。

12 月初，莫斯科军区的一部分团就已经开始了骚动。尽管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作出了种种的努力来防止各种孤立的爆发，但骚动仍然仿佛像决口的河水。工人当中出现了高声呼吁：“必须帮助士兵，不能贻误战机。”守卫工厂的卫兵也完全受到了工人的影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这讲的：“你们一起义，我们也就跟着起义，并打开军火库！”12 月 4 日，部队成立了士兵代表苏维埃，而这个苏维埃也向工人苏维埃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从其它城镇也传来了模糊但持续的谣言，说军队将加入工人的行动。这就是莫斯科罢工开始时的气氛。

[1] 今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中译者注

第一天大约有 10 万人停止了工作。两名司机试图将火车开出车站，其中一个被杀。城里零零散散的地方发生了小冲突。一队民众纠察队抢光了武器店。从这一天起，在莫斯科街头设立的普通警察岗哨消失了。警察只成群成群地出现。第二天，罢工人数增加到了 15 万。莫斯科的罢工变得具有普遍性，并蔓延到了郊区的工厂。到处都是大规模集会。在远东列车的终点站，人群解除了刚从满洲回来的军官的武装。从一辆铁路货车上，工人取走了几十包子弹。后来，他们又从其它车厢上取走了武器。

12 月 8 日，也就是罢工的第二天，执行委员会作出了决定：“当部队出现的时候，就设法与士兵交谈，用同志式的语言影响他们……暂时避免公开冲突，并只有在部队做出挑战性行为的时候才进行武装抵抗。”大家都明白，军队将一锤定音。关于军区情绪的最微小的鼓舞人心的传言也在口耳相传。一直以来，革命群众都在与莫斯科当局为争取军队进行着不间断的斗争。

例如：一些印刷工人听说一队步兵在《马赛曲》的旋律中沿街行进，便代表去迎接。但为时已晚。军事长官用哥萨克兵和龙骑兵团团包围了这些兴奋的士兵，把他们赶回了军营，然后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就在同一天，一名警官指挥的 500 名哥萨克接到了向示威者开枪的命令。哥萨克拒绝服从，与群众交谈。随后，在一名军士的命令下，他们调转马头，在群众的友好呼喊声中慢慢离开。

上万工人的示威撞见了哥萨克。发生了普遍的慌乱。人群中出现两名女工，带着红旗，扑向哥萨克。她们喊道：“打死我们吧！我们宁死也不交出旗帜！”哥萨克被吓着了。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人群感受到了哥萨克的动摇，向他们施压道：“哥萨克，我们手无寸铁，难道你们会向我们开枪吗？”哥萨克回答道：“你们不向我们开枪，我们就也不向你们开哩。”吃惊而狂怒的军官发疯地

骂人。但是晚了。他的声音被淹没在人群的愤怒呐喊声之中。有人作了简短的演讲。人群在欢呼声中将演讲者抬起来。没几分钟，哥萨克肩头扛着枪，调转马头，飞奔而去。

军队团团包围，对手无寸铁的人群进行了了大屠杀，于是人民的集会结束了。在这之后，城镇弥漫着更加紧张的情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挤上街。谣言四起，不曾断绝。每分每秒都与死神擦肩而过。所有人的脸上显露着幸福的激动，但也掺杂着不安的情绪。高尔基那时在莫斯科，写道：“许多人认为，街垒是革命者开始建造的；这对革命者来说，当然是至上的荣幸，但却是完全不公平的——街垒一开始的建造者，正是普通人，非党的人，事件的要点也在于此。第一批街垒在特维尔街^[2]上，是在欢声笑语中轻而易举地建成的；而在这个快乐的工作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参与——从有声望的、穿着昂贵大衣的老爷，再到女厨子和看院人；而这些人不久以前还是当局的‘坚固支柱’。龙骑兵向街垒齐射，死伤若干人——愤怒的哀嚎、齐声的呐喊在空中回荡，一切都改变了。在齐射过后，普通人放弃了原先的轻松心态，开始认真地建造街垒，希望在杜巴索夫^[3]及其龙骑兵的枪口之下用它来保卫自己的生命。”

工人纠察队（Дружинник），也就是革命组织的军事化武装分队，变得更加活跃了。他们系统性地解除了遇到的每一名警察的武装。就在这里，“举起手来”的要求第一次开始实践，目的是为了

[2] 莫斯科的一条主干路，正对红场，从市中心直走通向特维尔，因此命名。——中译者注

[3]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杜巴索夫（Фё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Дубасов，1845年6月21日—1912年6月1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63年入伍。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92—1897年任驻柏林大使馆海军特工。1893年晋升为海军上将军衔。1897—1898年任太平洋舰队司令。1901—1905年任海军技术委员会主席。1905—1906年任莫斯科总督，在任期间镇压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5—1907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06—1912年任国务院议员。1912年逝世。——中译者注

确保突袭者的安全。谁不举起手，他们就杀死谁。他们不碰士兵一根手指头，以防疏远他们。有那么一次集会甚至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凡是没有指挥者的命令就开火的人，将会被处决。工人在工厂和车间旁鼓动士兵。但到了第三天，罢工开始与军队发生流血冲突。例如，一群龙骑兵在因罢工而陷入黑暗的广场上驱散了一个晚间集会。“兄弟们，别碰我们，我们是一路人！”士兵从旁边经过离开。但过了一刻钟后，他们以更大的人数返回，并向人群发起了攻击。黑暗，恐慌，呐喊，咒骂；一部分人群在一个有轨电车亭里寻找掩护。龙骑兵要求对方投降。遭到了拒绝。他们齐射了几次，打死了一名小学生，打伤了几个人。要么是良心的驱使，要么是害怕报复，龙骑兵飞奔而去。“杀人犯！”人群站在第一批受害者旁边，愤怒地握紧了拳头。“杀人犯！”刹那间，血迹斑斑的亭子化为火海。“杀人犯！”人群为发泄自己的情绪寻找出气筒。在黑暗中，在危险中，他们前进，遇到障碍，继续进逼。枪声再次响起。“杀人犯！”人群开始筑起街垒。他们从未干过这种工作，因此工作进行得很笨拙，且没有条理……在同一片黑暗中，三四十人齐声合唱“你们已英勇牺牲”……又有齐射，又有死伤。相邻的院子变成了急救站，住在附近的居民充当看护士，守在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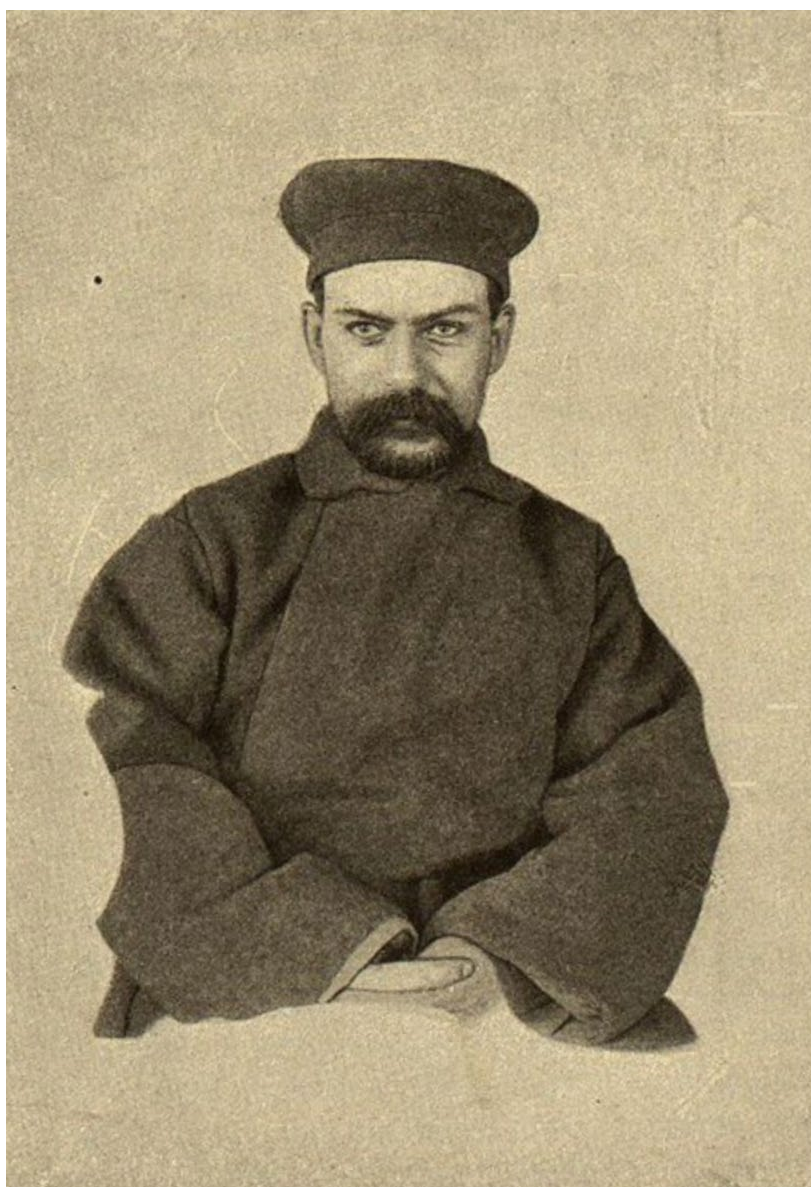
随着军事行动的开始，社会民主党战斗组织在整个莫斯科张贴了一张呼吁书，其中向起义者给出了下列技术指示：

“1. 首要原则：不要成群行动。以三人或四人的小队伍行动，不能过多。但是要尽可能增加这种小组的数量，让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学会快速突击和快速消失。警察在试图调动一百个哥萨克的队伍向上千的人群开火。你们需要让那一百个哥萨克面对的对手变成一两个零星的射手。打一百个人比打一个人更加容易，特别是如果这个人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开火，然后又消失，来无影去无

踪。

2. 除此之外，同志们，不要占领坚固的位置。军队总是会夺回它们，或者干脆用炮火来摧毁它们。让我们的堡垒，变成前后都有入口的院子，以及所有容易射击并容易撤离的地方。即使他们占领了这样的地方，也会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而自己却损失惨重。”

革命者的战术是由形势本身迅速决定的。与此相反的是，政府军在整整五天的时间里，完全地暴露出自己对对手战术的不确定性，并表现出了嗜血的野蛮性、迷茫和混乱的混合状态。



（斯维尔奇科夫，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团成员，身着囚服照）

接下来是一场战斗的例子。有 24 名射手，组成了一个最勇敢

的格鲁吉亚战斗队。三三两两地公开前进。人群提醒他们，有 16 个龙骑兵和其军官正在朝他们的方向前进。战斗队停下来列队，拿起毛瑟枪，准备进行战斗。骑兵部队一出现，战斗队就进行了齐射。军官受了伤，马匹也受了伤，前蹄腾起。骑兵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无法还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战斗队打了近百发子弹。龙骑兵留下了几个死伤者，被战斗队打得仓皇逃窜。人群敦促道：“现在就快走，他们把大炮拉过来了。”确实，大炮很快就出场了。第一轮齐射在人群中造成了数十人死伤，而他们却从未想过会遭受炮击。而在这时，格鲁吉亚人已经在另一个地方对军队展开了另一轮射击……战斗队几乎无懈可击，因为他们披上了普遍同情的铠甲。

下面还有一个例子。一个由 13 人组成的纠察队占据了一栋大楼，他们在 500—600 名士兵的枪林弹雨中坚守了 4 个小时，总共也就有 3 把步枪和 2 门机枪。在用光弹药并给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后，他们毫发无伤地撤退了。而士兵们用炮火摧毁了几个街区，烧毁了一些木质房屋，杀死了一些惊恐的居民……所有这些都只是为了赶走一些革命者……

街垒没有得到防御。这些街垒只是阻碍了部队的——特别是龙骑兵的行动。在街垒区，房屋在火炮的范围之外。部队只有在向整条街开火以后，才会“占领”街垒，以确保它们后面没有任何人。当士兵一离开街垒后，它就被恢复了。杜巴索夫的炮兵是从 12 月 10 日开始系统性射击的。步枪和机枪不知疲倦，扫射一条又一条街道。牺牲者不是按个位数记的，而是以数十人计算。愤怒不安的人群跑来跑去，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士兵们不是向单个革命者开火，而是向名为莫斯科的模糊敌人开火——往它那住着老人和小孩的房屋，它那手无寸铁的街头人群开火……“杀人犯！胆小鬼！你们就是这样来恢复自己在满洲的荣耀的！”

在第一次炮击后，街垒的建设工作变得热火朝天。规模更大了，方法也更加大胆了。人群推倒大水果摊，推倒报刊亭，拆掉商店的招牌，砸碎生铁栏杆，拆掉有轨电车的架空电线。

反动报纸报道说，“他们无视了警方所有门都应该上锁的命令，把许多的房门都拆掉了铰链，用来修建街垒！”到12月11日，整个城市的主要地区都已经被街垒网给覆盖了。整条街都被包裹在有刺铁丝网中。

杜巴索夫宣布，只要遇到成群结队“超过三人以上”，都会进行开火。但龙骑兵也会向落单的人开火。首先他们会进行搜查；如果找不到任何武器，就会放走，然后朝他们背后放枪。他们甚至还会朝看杜巴索夫的公告看呆的人开火。只要有从窗户里有一枪被打出（不少是有奸细开的），房屋就会立即遭受炮火打击。一滩滩的血迹和带着头发的脑浆粘在商店的招牌上面，显示出子弹的路径。许多房屋都被打出了洞。在一栋被毁坏的建筑物外（起义者的可怕公关），有一个装着人肉的盘子，上面写道：“请为受害者捐款！”

两三天后，莫斯科军区的情绪就变得明显不利于起义了。从骚乱之初，军事当局就在军营里采取了一些措施：他们把后备部队、志愿兵和那些不可靠的人免职，并为剩下的人提供了更好的伙食。一开始，只有最可靠的部队被用于镇压。而那些比较可疑的团，其最有政治意识的成员都被留在了军营里。杜巴索夫在第二阶段才把他们派上战场。起初，这些部队不情愿也没有信心。但是，一颗随机的子弹，或者军官在他们的饥饿与疲惫的基础上进行的教唆，可以促使他们采取可怕的、过度残忍的行为。杜巴索夫通过大量的官存伏特加加强了这些影响。龙骑兵从头到尾一直是半醉的。

然而，游击作战既让他们无能狂怒，也让他们疲惫不堪。居民的普遍敌意让部队士气低落。12月13—14日是危机的日子。疲惫

不堪的部队拒绝与他们看不见的、被夸大的敌人作战。在这些天里，发生了几起军官自杀的事件……

杜巴索夫向彼得堡告知，在莫斯科军区的 15000 人中，只有 5000 人可以投入行动，因为剩下的都不可靠；然后还要求了增援。他被告知，彼得堡军区一部分被派到了波罗的海地区，一部分不可靠，而剩下的人他们自己需要用。多亏了从参谋部偷来的文件，这些通信在城镇上广为人知，成为了勇气与希望的有力注脚。但杜巴索夫还是达到了目的。他要求直接与皇村通电话，并宣称自己不能保证“专制制度固若金汤”。命令立即下达，谢苗诺夫禁卫团被派往莫斯科。

12 月 15 日，局势突然变化。谢苗诺夫团到来的希望很快给莫斯科反动团体贴了一剂狗皮膏药。俄罗斯人民联盟从贫民窟里召集来的武装“民兵”出现在街头。政府的活跃力量因临近的城市调来的军队而扩大了。纠察队员筋疲力尽。普通人已经受够了恐惧与不确定感。工人群众的士气开始减退，胜利的希望消失了。商店、办公室、银行、交易所重新开放。街道上的交通开始活跃。报纸开始出版。所有人都觉得，街垒下的生活已经结束了。城里大部分地区的枪声也都平息了。12 月 16 日，随着彼得堡和华沙部队的到来，杜巴索夫已经完全成为了局势的主人。他转守为攻，完全清除了市中心的街垒。苏维埃和党认识到了局势的无望，在这一天作出了 12 月 19 日结束罢工的决定。

在整个起义期间，普雷斯尼亚区，也就是莫斯科的蒙马特区，一直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12 月 10 日，当市中心的枪声已经响起的时候，普雷斯尼亚区依然平静。那里的集会按照自己的作息行动，但已经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了。他们渴望采取行动，并包围住代表。最后，在下午 4 点，他们收到了从市中心来的命令：建造街

垒。普列斯尼亚区开始热闹起来了。在这里，没有出现市中心的那种混乱现象。工人们组织了 10 人小组，选出了小组长，用铁锹、铁棍和斧子武装自己——就像普通的市政工人一样，有条不紊地走到了街上。没有人无所事事。妇女把雪橇、木柴和大门搬到街上。工人们锯砍电报杆和灯柱。整个普列斯尼亚区响起了斧头的声音，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森林在伐木。

普列斯尼亚被军队切断了与城市的联系，被街垒网络牢牢地覆盖着。它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营地。到处都是纠察队员在执勤；晚上，武装哨兵在街垒之间踱步，向路人索要密码。最有热情的是女工姑娘们。她们热爱侦查行动，询问警察，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有用的信息。在普列斯尼亚有多少武装纠察队员？大约 200 人，不可能比这更多了。大约有 80 只步枪或毛瑟枪供他们使用。活跃力量尽管数量如此稀少，但与军队仍不断发生冲突。士兵被解除武装，反抗的人被杀死。工人们恢复了被破坏的街垒。纠察队员严格遵守游击战术：它们两三人一组，从房屋、木材仓库、空车厢向哥萨克和炮兵射击，然后快速转移，再次向士兵倾泻子弹……12 月 12 日，纠察队员从龙骑兵手里缴获了一门炮。他们围在炮边转了一刻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它。一支龙骑兵和哥萨克组成的大部队夺回了炮，解决了他们的困惑。

12 月 13 日晚，普列斯尼亚的纠察队俘虏了 6 名炮兵，并把他们带到了一家工厂。他们被安排在公共餐桌上吃饭。在吃饭期间，有人发表了政治性质的讲话。士兵们带着同情心，专心致志地听着。晚饭后，他们在没有搜查和解除武装的状况下被放了回去——工人不想激怒他们。

12 月 15 日晚，纠察队在街上逮捕了国安单位的领导沃伊洛什尼科夫，搜查了他的公寓，没收了重点监视名单，并缴获了 600 卢

布的国库资金。他被当场判处死刑，在普罗霍罗夫工厂的院子里被枪毙。他平静地听完判决，勇敢地迎接了死亡——死得比活着更高贵。

16日，对普列斯尼亚的炮击尝试开始了。纠察队员以强大的火力回应，迫使炮兵退却。但就在同一天，人们知道了杜巴索夫获得了来自彼得堡和华沙的援军，士气开始下跌。织工开始向乡下逃亡。道路上到处都是背着白色背囊步行的难民。

16日晚，普列斯尼亚被政府军包围在一个铁圈之中。17日早上六点后不久，这些部队就开始了无情的炮击。炮声每分钟多达7次。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中途只有一个小时的喘息时间。许多工厂和住房被毁，陷入火海。炮击是从两边进行的。普列斯尼亚被火与烟雾包围，变成了地狱。房屋与街垒化为火海，妇女和儿童在黑色烟雾中飞奔，空气中弥漫着射击的轰鸣声和劈啪声。火光四射，像白天一样照亮了深夜，从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纠察队直到中午12点前都成功抵抗了步兵，但敌人的连续火力迫使他们停止了战斗行动。从这时起，只有一小群纠察队员主动地、冒着风险带着武器留了下来。

到了18日上午，普列斯尼亚的街垒被清除了。“和平的”居民被允许离开普列斯尼亚，部队甚至大意到没去搜身就放走了人。纠察队员是第一批离开的人，其中有一部分甚至还带着武器。后来，士兵横行霸道、大开杀戒的时候，已经没有一个纠察队员留在普列斯尼亚了。

谢苗诺夫“安抚”部队被派去铁路执行任务，得到了命令：“不要进行逮捕，要毫不留情地行事。”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遭到抵抗。没有人对他们开一枪，但他们却在铁路沿线杀了将近150人，没有调查也不经审判。受伤的人被从医疗车厢上拖下来，然后

被彻底打死。尸体躺在周围，画面惨不忍睹。被彼得堡禁卫军射杀的人中有一位司机乌赫托姆斯基，他在机枪的扫射下，用火车头使工人战斗队逃过了追捕。在被枪毙之前，他平静而自豪地对刽子手留下了遗言：“所有人都得救了，你们追不上他们了。”

莫斯科的起义持续了9天，从12月9日到12月17日。莫斯科起义的战斗人员到底有多少？小到不足为提。有700—800人参加了党的战斗队——其中有500名社会民主党人，250—300名社会革命党人；将近500个配备枪支的铁路工人在车站和沿线行动，将近400名来自印刷工人和店员的志愿射手组成了辅助部队。志愿射手组成的小组出现了不少。说到他们，不得不提到四位从黑山来的志愿者。他们是出色的射手，无所畏惧，不知疲惫，成群结队行动，只杀警察和军官。他们中的两人被杀，第三个人受伤，第四个人的温切斯特步枪被毁。这第四个人获得了新的步枪，然后又一个人开始了自己的危险狩猎。每天早上他会获得50发子弹，但他抱怨太少。他陷入了迷茫，为他失去的同志哭泣，为他们的牺牲进行可怕的报复。

那么，数量如此之少的纠察队员，是怎么在这一个半星期里和成千上万的卫戍部队战斗的呢？这个革命谜题的答案正是人民群众的情绪。整个城市的街道、房屋、栅栏和大门都加入了反对政府士兵的密谋。百万居民在游击队员和正规军之间形成了一道血肉城墙。纠察队员只有几百人，但街垒的建设与维护是由群众进行的。广大群众以积极的同情氛围拱卫着积极革命者，并尽可能地挫败了政府的计划。这数十万产生同情的分子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是小市民、知识分子和工人组成的，并且首要就是工人。除了出卖灵魂的街头虫豸以外，只有最上层的资本家站在政府一边。莫斯科市杜马在起义前两个月还在骄傲地展示自己的激进主义，现在却

坚决地站到了杜巴索夫的背后。不只是十月党人古契科夫，而且还有未来的第二届杜马主席戈洛文^[4]，加入了总督的议事会。

莫斯科起义的牺牲者有多少？确切数字不详，而且永远也无法确定。47家诊所和医院提供的数字显示，有885名伤者和174名死者被记录在案。但那些被杀的人却很少被送到医院；更普遍的情况是，他们的尸体躺在了警察局那里，然后被秘密地运走。在那段时间里，有454人被埋进了公墓。但是，有更多的尸体被列车运出了城。如果我们推测说莫斯科起义死伤人数各1000人，那么差距也不会太大。有86名儿童被杀，其中还包括未断奶的婴儿。如果我们还记得，那1848年三月在柏林发生的，对普鲁士绝对主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打击的起义，死亡人数只有183人的话，莫斯科的数字就会更加显眼……政府从未宣布过任何一方的确切损失数字。一份官方报告说只有“几十名士兵被杀或受伤。”但实际上，却应该有几百人。代价不算太高，因为危在旦夕的是莫斯科，是“俄罗斯的心脏”。

如果我们抛开边界地区（高加索和波罗的海）不计的话，那么对12月的浪潮来说，没有地方能比莫斯科还涨得更高了。不过，街垒、与军队交火、火炮射击也出现在以下城市：哈尔科夫、亚历山德罗夫、下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特维尔……

当各地的起义被破坏以后，围剿队的时代就开始了。就像这一官方名字表明的那样，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击敌人，而是报复战败

[4] 费奥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戈洛文（Фёд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оловин，1868年1月2日—1937年12月10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6年起担任莫斯科地方自治局议员。1904年加入解放社。1904—1907年任莫斯科地方自治局局长。1905年参与创立立宪民主党。1907年任第二届国家杜马主席，同年当选为第三届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主管艺术领域工作。十月革命后曾在全俄援助饥荒委员会工作。此后多次被捕。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被处决。——中译者注

者。在比莫斯科还要早两周爆发起义的波罗的海地区，围剿队被分成了许多小分队，来执行波罗的海的男爵（这是一个由俄国官僚机构最野蛮肮脏的代表组成的种姓）们的嗜血指示。拉脱维亚的工人和农民被枪杀、绞死、鞭打致死、被棍子打，被赶上了绞刑架，在沙皇国歌的旋律中被处决。在两个月里，波罗的海各省有 749 人遭到处决，100 多个农场被烧毁，许多人被用鞭子打死。

就这样，蒙上帝之恩，专制主义垂死挣扎。从 1905 年 1 月 9 日到 1906 年 4 月 27 日第一届国家杜马召开，根据近似但肯定不夸张的数字，沙皇政府杀死了近 14000 人，处决了 1000 多人，打伤了 20000 多人（其中有许多因伤重而死），而被逮捕、流放和监禁的人就有 70000 个。这个代价并不过分，因为下的赌注，是沙皇专制的存亡。

第二十二章 总结

苏维埃的历史就是五十个日日夜夜的历史。苏维埃的成立大会于10月13日举行。12月3日，苏维埃的会议被政府军中止了。

数十人出席了第一次会议；而在11月中下旬，代表人数就增长到了562人，其中包括6名女性。他们代表了147家工厂、34个车间和16个职业工会。代表中的绝大多数是金属工人，有351人。他们在苏维埃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纺织业派出了57名代表，印刷业和纸业派出了32名代表，贸易业职工12名代表，而从办公室和药剂行业则出席了7名代表。苏维埃的“内阁”是执行委员会，成立于10月17日，其中有31人参与：22个代表和9名政党代表（其中6名是从社会民主党的两派来的，3名是从社会革命党来的）

这个机构的实质是什么？苏维埃何以能在俄罗斯无产阶级的历史上、在俄国革命的历史上占据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

苏维埃组织了劳动群众组织，领导了政治罢工和示威，武装了工人，在黑帮的屠刀下保护了居民。但是其他的革命组织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并不是这些因素使苏维埃获得了那集中在他们手中的影响力。苏维埃的影响力秘密在于，它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直接掌控的实际机关成长起来的，而且这个机关在事件中的每一步都是在**为政权而斗争**。互为反面的工人阶级和反动势力都称呼苏维埃为“无产阶级政府”，这恰恰反映了苏维埃实际上是革命政府的胚胎的事实。苏维埃的权力只要得到工人地区革命力量的保证，就能得到实施；只要军事政治君主仍手握大权，苏维埃就依然为政权而斗争。

在苏维埃之前，我们可以发现产业工人之中存在一些革命组织，它们绝大多数由社会民主党领导。但是，那些组织都是**无产阶**

级之中的组织。他们的直接目的是**为影响群众而斗争**。而苏维埃则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的组织**，旨在为**革命的政权**而斗争。

苏维埃成为了全国所有革命力量的焦点，所以它并没有在革命民主自发里中消解；它在过去和未来一直都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有组织的表达。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它采用的方法是由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性质自然决定的：它在生产中的角色，它的数量，它的社会同质性。不仅如此，苏维埃还把其作为所有革命力量的首脑的、为政权进行的斗争，与其对工人群众的阶级自主行动的全面领导连结了起来；它不仅协助专业工会组织，还甚至干预了个别工人与其雇主之间的冲突。正是因为苏维埃这一革命时期的无产阶级民主政府，站在了自己那整个阶级的全部利益的交汇点上，才从一开始就受到了社会民主党的全面的决定性影响。这个政党，现在一下子有了机会，来实现其在马克思主义学校中获取的巨大优势，而且这个党由于能够在巨大的“混沌”之中辨明自己的政治道路，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非党的正式组织——苏维埃转变为自己影响力的有组织的工具。

苏维埃的主要斗争方法是政治总罢工。这种罢工的革命力量在于它可以在资本的头顶上行动，使国家政权去组织化。它造成的“无政府状态”越大、越全面，就越接近于胜利。但只有当无政府状态不是由无政府主义的手段造成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一点。通过同时停工，使生产机构和政权中枢一起瘫痪，使全国各地互相隔离，造成普遍动摇不定的这个阶级，其本身必须要有足够的组织性，以便使其不成为自己造成的无政府状态的第一个牺牲者。罢工越是能让政府真空化，罢工组织则越是不得不去承担政府职能。总罢工的条件，其作为无产阶级斗争方法的条件，同样也是使工人代表苏维埃具有巨大意义的条件。

苏维埃通过罢工的压力，实现了出版自由。它组织了街道巡逻队以保证市民的安全。它在一定程度上接管了邮政、电报和铁路。它以权威的姿态介入了劳资经济冲突。它作出尝试以直接的革命压力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它发动罢工起义，使专制国家的活动瘫痪，把自己的自由民主制度带入了城市劳动居民的生活之中。

1月9日以后，革命表明了它已经掌握了工人群众的意识。6月14日，通过波将金号的起义，革命表明了自己可以转变为一种物质力量。在十月罢工中，它表明了自己可以瓦解敌人，瘫痪其意志，并使其完全屈服。最后，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创建工人苏维埃组织，革命表明了自己善于缔造政权。革命的政权只能依靠积极的革命力量。不管我们如何看待俄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事实已经摆在了我们面前：迄今为止，除了无产阶级之外，没有一个社会阶级显示出自己能够并且准备好成为革命政权的支柱。革命的第一个行动，是无产阶级与君主制的街头交往（Уличное общение）；而革命的第一个重要胜利，是由无产阶级的纯粹阶级武器——政治罢工取得的；最后，无产阶级代表机构就作为革命政权机关的雏形诞生了。在苏维埃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新历史的基础——第一次出现了民主权力。苏维埃，是群众对自己个别部分施加的有组织的权力。这是真正的、不未经伪造的民主，没有上下两院，没有专业的官僚，选民在任何时候可以撤换自己的代表。苏维埃通过其成员，通过工人选出来的代表，直接领导整个无产阶级及其个别团体的所有社会表现，组织其行动，并赋予其口号和旗帜。

根据1897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彼得堡的“自力更生”居民有约82万人，其中包括43.3万工人和仆人。也就是说，在首都，无产阶级已经达到了人口的53%。如果我们把其中的非自力更生分子包含在内的话，由于无产阶级家庭人口不多，那么我们会得到一

个更小的数字——50.8%。无论如何，无产阶级都占彼得堡人口的一半。

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不是首都全部半百万无产阶级人口的官方代表——它在组织上集结了20万人。其中，工厂工人占主要部分。尽管它的政治影响力（包括直接或间接影响）扩展到了更广大的范围，但无产阶级中非常重要的那几层（建筑工人、仆人、杂工、马车夫）却较少甚至完全没有被争取过来。然而，毫无疑问，苏维埃表达了整个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尽管在工厂里也有存在所谓的“黑色百人团”分子，他们的人数也是每时每刻都在减少的。苏维埃的政治统治地位在彼得堡无产阶级群众中只有朋友，没有敌人。唯一的例外可能是那些有特权的奴仆们——对这些官僚机构的高级奴才、大臣的仆夫、股票交易员和名妓来说，保守主义与君主主义就是一种职业病。

在彼得堡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之中，苏维埃的朋友比敌人多得多。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承认苏维埃的政治领导地位，并热忱地支持它迈出的每一步。有文凭的、做官的知识分子，除了那些在办公桌前变得无可救药的大腹便便那部分人以外，都站在苏维埃一边——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苏维埃积极支持邮政—电报罢工，吸引了下层公务员的同情与注意。城市中所有被压迫的、一贫如洗的、诚实的、有生命力的人都自觉地或本能地被吸引到了苏维埃。

反对它的都是些什么货色？资本主义掠夺的代表人，趁着价格上涨搞投机的股票交易商，被罢工“毁”掉的承包商、贩子和出口商，金银供应商，彼得堡杜马安身立命的那帮房东，高级官僚，依靠着国家预算的交际花，肩上点缀着星星的人，高薪公务员，秘密警察——所有这些贪婪的、愚蠢的、放荡的、注定灭亡的人就是苏维埃的反对者。

在苏维埃的大军与敌人之间，存在着一群政治上不确定、犹豫不决或不可靠的分子。小市民中最落后的群体，还没被卷入政治，还没来得及理解苏维埃的作用和意义，还没来得及明确自己对苏维埃的态度。这些手工业老板惊恐万分。在他们心中，小资产阶级对罢工的厌恶和对美好未来的模糊期望在相互抗衡着。

来自知识圈不安分的职业政治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激进记者、充满怀疑论的民主人士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劲儿地对苏维埃指指点点，历数苏维埃的错误，并试图让所有人明白：只要他们骑在这个机构的头上，无产阶级就可以永远幸福了。这些先生们的辩解展现了他们的无能。

总之，苏维埃实际上或潜在地成为了绝大多数居民的机构。如果它那些在首都居民中的敌人没有得到尚存专制的支持，那么这些敌人就不会威胁到它的统治地位。尚存的专制，支撑在庄稼人军队中最落后的分子之上。苏维埃的弱点并非特例。这种弱点存在于任何纯粹城市革命当中。

这五十天是革命力量最为强大的五十天。苏维埃是革命为政权而斗争的机构。苏维埃的阶级性是由城市人口的尖锐阶级分化和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之间的深刻政治矛盾决定的，而这一点，即使是在与专制作斗争的历史限定框架下也是如此。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十月罢工以后便有意地踩下革命的刹车；而小市民又被证明过于微不足道，无法发挥独立作用；无产阶级在城市革命中拥有无可置疑的领导权，它的阶级组织就是它夺取政权的机关。

随着政府士气的逐渐减弱，苏维埃的力量也越来越大。非无产阶级的圈子变得越来越同情它，因为旧的国家政权相比之下显得更加无助、更加迷茫。

大规模政治罢工是苏维埃手中的主要武器。苏维埃因为在无产阶级中的所有团体里建立起了直接的革命联系，并以整个工人阶级的权威与力量支持所有企业的工人，所以才有可能中止国家经济生活。尽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 средств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仍掌握在资本家和政府手中，尽管国家政权仍掌握在官僚机构的手中，但国民生产与通信的实际运行（至少就中断国家经济和生活的正常运行而言）掌握在苏维埃手中。苏维埃正是由于这种在实践中被证明了可以瘫痪经济并将无政府状态引入国家生活的能力，所以才成为了苏维埃。鉴于这些条件，在苏维埃与旧政府之间找到一条和解的路就成了最不可能的乌托邦。然而，如果我们把一切对苏维埃战术的批评的真实内容展示出来，可以认为它们都是从下面这个奇妙的想法出发的：十月以后，苏维埃应该避免一切进攻行动，而应该集中精力，在已从专制手中赢得的土壤上组织群众。

但是，十月胜利的实质是什么？

毋庸置疑，十月运动导致专制主义在“原则上”否定了自己。但它还并没有真正输掉这场战斗，而只是回避了战斗。它没有认真尝试用它的农村军队来对付造反的、罢工的城镇。自然，它不是看在人性的份上才没有展开攻击，而只不过是太受挫败，失去镇定罢了。官僚机构中的自由主义分子在等待机会，在罢工已经开始减弱的时候取得了优势，并发表了十月十七日宣言——“原则上地”弃绝了专制主义。但整个政权的物质组织——官僚等级制度、警察、法院、军队都仍然是君主制神圣而不可分割的财产。在这样的条件下，苏维埃的策略可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它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只要有能力）在生产性无产阶级的支撑下，剥夺专制主义运用其政权的物质机器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苏维埃的活动意味

着“无政府状态”的组织化。它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意味着这一“无政府状态”的巩固。长期的共存是不可能的。未来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是十月半胜利的物质内核。

苏维埃还能做什么呢？难道要对冲突的不可避免视而不见吗？让人相信它是在为宪政制度而组织群众吗？谁会相信呢？当然，既不是专制，也不是工人阶级。

两次杜马的例子后来告诉我们，在反对专制的斗争中，外表的正确性——这一忠诚的空洞形式是多么无用。为了预料到专制国家那“宪政”的虚伪策略，苏维埃不得不“用一种别的发面团来制成自己”，但那时会发生什么呢？就像两次杜马的结局一样——破产。

苏维埃别无退路，只能承认：它没法避免在不久的将来发生的冲突，并且除了准备起义以外，已经没有别的策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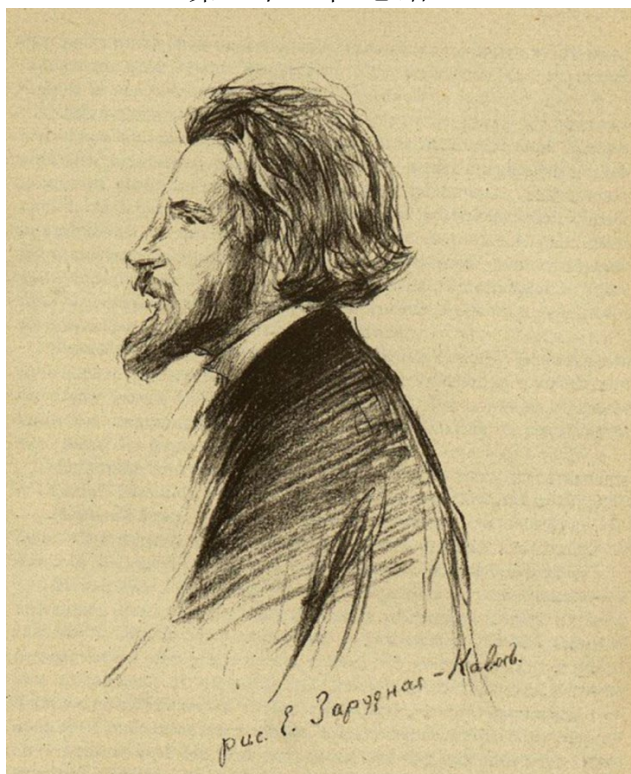
苏维埃，除了巩固和发展那些可以让自己瘫痪掉国家生活、增强自己力量的长处以外，还能做什么准备工作呢？然而，苏维埃巩固和发展这些长处的自然努力不可避免地加速了冲突的到来。

苏维埃越来越注重扩大它对军队和农民的影响。11月，苏维埃呼吁工人积极表达他们与以喀琅施塔得水手为代表的觉醒军队兄弟般的团结。不这么做，就等于拒绝增强苏维埃的力量；而这么做，就是迎面向冲突前进。

也许，还有第三条出路呢？也许，苏维埃可以与自由派一起，向当局那些所谓的“政治家”进行呼吁？也许它可以而且应该在民权与君主特权之间划出一条停战线？但是，谁能保证君主制就会严格遵守停战线呢？谁会在中间当起说和人——哪怕只是一时之间的和呢？自由派？苏维埃的一个代表团在10月18日与维特伯爵会面的时候提议，军队可以撤离首都，以其作为和解的标志。

大臣回答道：“没水没电也比没有军队强。”很明显，政府并没有打算解除武装。那苏维埃还能怎么做呢？它要么退出，把事情交给调解机构——也就是未来的国家杜马，而这正是自由派真正想要的；要么准备武装起来，以便捍卫十月的一切成果，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发动进一步的攻势。现在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调解机构变成了新的革命冲突的舞台。因此，前两届杜马发挥的客观作用，只是为了证实无产阶级据以构建其战术的政治预测的正确性。但我们不需要看得那么远。我们可以问：是什么可以并且应该保证这种“调解机构”（它的命运也不允许它成功调解任何人）的存在？仍然是那个君主制的政治思想？还是它的庄严义务？还是维特伯爵的诚实话语？还是那些在彼得宫城后阶访问的乡绅？又或者是门德尔松的警告声？再或是所谓“事物的自然进程”——自由派把历史所有强加给自己的主动性、智慧和力量上的任务都堆在其肩上的那个“自然进程”？

但是，如果12月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造成其失败的原因难道不在于苏维埃的成分吗？有人说，苏维埃的根本缺陷在于其阶级性质。为了成为“国民”（Национальный）革命的机关，苏维埃应该扩大它的范围，使居民所有阶层的代表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样就可以巩固苏维埃的权威，并增加其力量。事实果真如此吗？



（被告人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阿夫克森齐耶夫^[1]，后来的著名民主反革命活动者）

苏维埃的力量是由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角色决定的。苏维埃的任务不是把自己建设成议会的模仿品，不是组织不同社会群体的平等的利益代表，而是统一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苏维埃手中的主要武器是政治罢工——这是无产阶级特有的方法，是雇佣劳动阶级的特有方法。苏维埃阶级成分的同—性消除了苏维埃

[1] 尼古拉·季米特洛维奇·阿夫克森齐耶夫

（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Авксентьев，1878年11月16日—1943年3月4日），生于奔萨一个公务员家庭。曾就读于莫斯科大学法学院，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1905年参加社会革命党，1907年当选为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1905年革命中曾当选彼得堡工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05年革命失败后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逃往国外。一战爆发后，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当选为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全俄农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于1917年7月—9月担任临时政府的内务部长。1917年10月7日（公历10月20日）—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任俄罗斯共和国临时委员会（临时议会）主席。十月革命后参加白军运动，白军被粉碎后流亡国外。——中译者注

内部的摩擦，赋予它发挥其革命主动性的能力。

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用来扩大苏维埃的组成范围？它可以邀请几个自由派工会的代表；这样一来，苏维埃就会因为吸收了二十来个知识分子而变得更加丰富。他们在苏维埃中的影响力将与工会联盟在革命中发挥的作用成正比——也就是说，会变得无限小。

但是还有哪些社会团体可以派代表出席苏维埃？乡绅大会？贸易—工业组织？

乡绅大会于11月在莫斯科召开，讨论了与维特内阁进行联系的问题，但却丝毫不曾想与工人苏维埃进行联系。

在这大会的会议期间，塞瓦斯托波尔起义爆发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立即使乡绅右转了，因此，米留可夫先生不得不安抚他们，说什么“感谢上帝”，“起义已经被镇压了”。在这些反革命先生们和向起义者致敬并支持起义者的工人代表之间，会有什么样的革命合作形式呢？目前还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一问题。自由主义有一个半真半假的信条——要求军队不干预政治。与此正相反的是，苏维埃竭尽全力地想把军队引向革命政治。还是说，苏维埃也许应该无限信任沙皇的宣言，以至于拱手把军队让给特雷波夫？如果回答“不是”，那么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在与自由派合作的基础上，有什么纲领是可以想象的吗？这些先生们除了能给苏维埃的行动带来系统性的反对、无休止的辩论和内部士气低落以外，还能有什么贡献吗？他们除了建议和指示以外（我们光读一下自由派的报刊就能得到这些东西了），还能给我们什么吗？也许，真正的“政治思想”确实是受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支配的；但是，苏维埃可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政治论战和互相教训的俱乐部。它必须是并且仍然是一个斗争机关。

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的代表能给苏维埃的力量增添些什

么呢？他们怎样才能丰富苏维埃的斗争方法呢？只要回忆一下他们在10月、11月和12月起到的作用，只要回忆一下这些人对解散自己的杜马进行了怎样的抵抗，就足以理解为什么苏维埃可以，也应该保持阶级组织——也就是斗争组织的性质。资产阶级代表可以增加苏维埃人数，但却绝对无法增强其力量。

同样的，我们也拒绝那些纯粹理性主义的、不合历史的指责——它们认为苏维埃不可调和的阶级策略把资产阶级赶回了秩序营帐。劳动者的罢工，显示出自己是革命的强大武器，也让工业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这本身就足以使处于反对派立场的资本把国家秩序和资本主义剥削持续性的口号置于所有自由主义口号之上了。

企业主们下定了决心，要让“光荣的”（他们真是这么叫的）十月罢工变成最后一次罢工——然后就组建了反革命的十月十七日同盟。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他们每个人都能有充分的机会在自己的工厂里，发觉到革命的政治成果与巩固工人反对资本的立场是相辅相成的。某些政治人士还以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的主要罪责就是造成了反动派的最终分裂，并把资本变成了反革命力量。这些批评者想要把无产阶级的阶级动力交给历史支配，而不接受阶级斗争的后果。不言而喻，单方面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必然会引起企业主的激烈反应。但是，如果以为这场运动不存在，资本家与证券资本的维特当局就不会沆瀣一气，那是非常愚蠢的。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革命力量统一起来，将自己置于人民群众之首，并持续威胁“秩序”——这就完全足以使资本和当局媾和了。

诚然，革命在第一阶段表现为自发的零星火花之时，受到了自由派的容忍。他们清楚地看到，革命运动动摇了专制的基础，并迫

使专制与统治阶级达成了立宪协议。他们容忍了罢工和示威，对革命者采取了友好的态度，对革命者的批评也仅限于“温和而谨慎”的范围内。到10月17日以后，当立宪协议的条件被写好，似乎只剩下付诸实施的时候，革命的进一步工作显然破坏了自由派和当局签订这种“合同”的可能性。通过十月罢工团结起来、并在内部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其自身存在的事实都从那时起使自由派回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上。自由主义者抱着这样的念头：“黑鬼”（Нерп）^[2]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现在该乖乖地回到自己的车床边上了。苏维埃正相反，认为主要斗争还在前头。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合作都是不可能的。

十二月来源于十月，就像结论源于前提。12月冲突的结果并不是由孤立的战术错误来解释的。这只能由一项决定性事实来解释，那就是反动派的力学力量大于革命。无产阶级在十二月—一月起义中战败不是由于其战术错误，而是因为一个更真实的数量大小——农民军队刺刀数量之多。

不错，自由派一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火力不足都可以用跑步速度来弥补——它认为在决定时刻撤退是真正勇敢、成熟、深思熟虑并行之有效的战术。这种自由派的逃兵哲学给某些社会民主党本身的文学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后知后觉地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无产阶级在12月的失败是由于它的力量不足，那它的

[2] 此处的英译文为“The Moor has done his work, the Moor may go”，来自席勒的《Die Verschwörung des Fiesco zu Genua》，德语原文为“Der Mohr hat seine Arbeit getan, der Mohr kann gehen”。此处托洛茨基在翻译回俄语版的时候并未续用摩尔人的典故，而是直接使用了黑鬼（Nigger）一词的音译。无论是托洛茨基主观如此更改也好，还是并未有这种意图也罢，这里都讽刺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他们虽然在法律意义否定了黑奴制度，但却用“现代化的奴隶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未曾实际改变的种族地位来给黑人套上新的枷锁。——佐仓绫奈、Uni 注

错误不正是在于，在自身力量不足以胜利的时候，却接受了战斗？让我们这样说吧：如果只有稳操胜券才能进行斗争，那么整个世界就太平了。预先计算力量不可能在现实中把革命冲突的结果确定下来。如果可以的话，阶级斗争早就被阶级记账本给替代了。某些专业工会的记账员不久之前还为此做白日梦呢。但事实证明，即使最完善的会计制度，也不能拿账本中的数据来说服资本家，而基于数字的论证最终还是要通过罢工的论证进行支持。而且，不管事先的这些计算多么精确，每次罢工都会引起一系列新的物质和精神事实，而这些事实都是无法预见的，并且最终会决定斗争的结果。现在请您在心底里把这种工会和其精确计算方式抛到脑后，开始想象：罢工已经扩展到了全国，并赋予其一个巨大的政治目标；把无产阶级和国家政权当作直接敌人摆在对立的两面；用现实的、潜在的或者想象的盟友来包围这两者；再加上双方会无情争夺的冷淡人口阶层；再加上那革命羽翼只有在事件之中才会展开的军队；再加上夸大的希望和夸大的恐惧——两者都是非常真实的事件因素；再加上证券交易所的阵痛和国际关系的所有复杂影响——然后您就得到了一个革命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政党——甚至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政党的主观意志，也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革命中，有一点比在战争中更重要：战斗的每分每秒与其说是由任何一方的计算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敌对双方各自形势决定的。不错，在战争中，军队由于机械性的纪律，有时可以不战而退^[3]；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官也一样会问自己：撤退战术是否会减弱我方的士气？避免今天的战斗是否其实是为今后更加灾

[3] 原文直译为“有时可以在不发生任何交战的情况下带领整个部队撤离战场”。

——中译者注

难性的战斗准备了条件？在这一点上，库罗帕特金^[4]将军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在发展中的革命里，有计划的撤退从一开始就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党在进攻时可能得到群众的支持，不代表它能在进攻中随意地带离群众。不仅仅是党会带领群众，而且群众也会反过来拉着党向前进。这会发生在任何革命中，无论革命组织多么强劲有力。在这种条件下，不战而退意味着党在敌人的炮火下抛弃群众。当然，占据着领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可能会拒绝接受反动派在12月的挑战（按照库罗帕特金的表达方式，就是“撤回到先前准备好的位置”），回到地下状态。但是，这样做只会给政府以可乘之机。在没有遭到任何普遍抵抗的情况下，政府会粉碎公开和半公开的工人组织（这些组织是党自己参与了建立的）。这将会是社会民主党为其令人怀疑的特权付出的代价：这种特权以为，党能够置身于革命之外袖手旁观，滔滔不绝地进行说教，指责革命的错误，并制定出无懈可击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唯一缺点就在于，它们在被制定出来时，为时已晚，沦为废纸。不难想象，这将如何有助于巩固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呵！

没有人可以断言社会民主党人加速了冲突。正好相反，在10月22日，正是由于他们的主动倡议，彼得堡代表苏维埃取消了葬礼性示威，以便不首先尝试利用“新制度”的混乱与摇摆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鼓动和组织工作，来避免引发冲突。当政府过于急切地试图进攻全国，并因此尝试在波兰宣布戒严令的时候，苏维埃保持了纯粹防御性的策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将十一月罢工引向公

[4]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уропаткин，1848年3月29日—1925年1月16日），1864年入伍。1875年参加了浩罕战役。1877—1878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890—1898年任里海军区司令。1898—1904年任陆军部长。日俄战争期间任满洲军司令。一战期间在西线作战。二月革命后被解职并逮捕。十月革命后获释并退休。——中译者注

开冲突，而是相反，把罢工变成了抗议活动，并满足于这一活动对军队和波兰工人产生的巨大道德影响。

但是，如果说党因为意识到需要在组织上做好准备，就在 10 月和 11 月回避了战斗的话，那么在 12 月，这点也就不再适用了。这当然不是说党已经做好这种准备了，而是因为政府那边也别无选择地通过摧毁十月和十一月建立的所有革命组织来开启了战斗。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作出决定再次拒绝战斗，即使它甚至能够从公开的决斗场上带离革命群众，也只是在更不利的条件下为直面起义——完全失去同情的报刊和所有群众组织；沉浸在撤退后不可避免的低落的士气之中。

马克思^[5]说过：“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卡尔·马克思《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三章）

在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著名导言中，他在对立分析军队阶级成分的演变产生的新的胜利的可能性和与起义的军事技术困难（军队的快速铁路运输、现代大炮的破坏力、现代城镇的宽阔街道）时，为严重误解留下了隐患。一方面，恩格斯非常片面地评价了现代技术在革命起义中的意

[5] 实际上这是恩格斯用马克思的名字写的。——原注

义；另一方面，他认为没有必要或者不方便解释一点，那就是只有在军队和人民之间发生直接对抗的时候，军队的阶级成分演变才会具有政治意义。

现在来稍微讲一下这个问题的两面性。^[6]革命的去中心性质使部队必须不断地转移。恩格斯说，由于有了铁路，卫戍部队可以在24小时内增加一倍以上。但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真正的群众起义不可避免地会以铁路的罢工为前提。政府在能够开始转移其武装力量之前，必须先在与罢工人员的无情战斗中夺取铁路线和车辆，组织交通，恢复被破坏的铁轨和被炸毁的桥梁。最好的步枪和最锋利的刺刀都不足以完成这一切；俄国革命的经验表明，即使在这一方面取得最低限度的成功，至少也需要远远超过24小时的时间。此外，在着手转移其武装力量之前，政府必须了解国内的局势。电报对信息的加速作用甚至超过了铁路对运输的加速作用，但是，即便是在这里，起义也会以邮政—电报的罢工作为前提，并且也会制造这种罢工。如果起义不能把邮政—电报职员拉到自己的一边来（这一事实将证明革命运动的软弱！），它还有推倒电报杆、剪断电线的能力。虽然这一点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利的，但革命的主要力量绝不在于一个机械运转的组织，它的损失远远小于政府。毫无疑问，铁路也好，电报也罢，都是现代中央集权国家手中的强大武器。但它们都是双刃剑。而且，如果说社会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依赖于无产阶级的持续劳动，那么，这种依赖性在铁路和邮政—电报事业方面就最能集中体现出来。一旦铁轨和电线拒绝继续工作，政府机器就会被分割成独立的部分，而在这些部分

[6] 不过这里我们应该非常清楚的指出，恩格斯在他的导言中只想到了德国的事务，而我们的这里的描述是基于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个不太具有说服力的注解纯粹是出于审查原因而在德文本中加入的。——列夫·托洛茨基）

之间就不会有任何运输或通讯手段——甚至连最原始的方法也没有了。既然如此，在当局成功地使一个地方军区的部队数量“翻番”之前，事件可以走得很远。

除此之外，起义还使政府面临着军事物资运输的任务。我们已经知道总罢工在这方面造成的困难了；但除此之外，还应该再加上军事物资会被起义者缴获的危险。这一危险越现实，就越能说明革命的去中心性，越能说明被卷入革命的群众之多。我们已经看到过，莫斯科火车站的工人们扣押了正在运往某个遥远展区的武器。类似的行动发生在了许多地方：在库班地区，起义哥萨克拦截了一批步枪的运输队；革命士兵把弹药交给了起义者，等等

当然，一言以蔽之，起义者对政府军的纯粹军事胜利都是不可能的。后者在体力上必然更具优势，而问题始终围绕在士兵的情绪和行为周围。如果街垒两边的大军之间没有阶级上的亲缘关系，以今天的军事技术来看，的确不可能实现革命的胜利。但另一方面，如果以为军队可以以某种和平、一致的方式“站到人民一边”，那将是一种最危险的幻想。统治阶级在面对自己生死的问题时，绝不会因为有关军队阶级构成的理论考虑而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阵地。军队的政治情绪是所有革命的巨大未知数，只有在士兵和人民之间的冲突进程中才能得到确定。军队转入革命营帐是一个道德过程；但它不能仅仅通过道德手段来实现。不同的潮流和情绪在军队中交织在一起：只有少数人是有意识的革命者，而大部分人则在摇摆，等待着来自外部的推动力。只有当这个多数人开始相信人民胜利的可能性时，它才能够放下武器，或者甚至把刺刀指向反动派。但这种信念并不是光靠鼓动就能产生的。只有当士兵们确信人民已经走上街头进行生死攸关的斗争（不是为了示威反对当局，而是为了推翻政府），他们才有可能在心理上“倒戈到人民一边”。

因此，起义在实质上与其说是反对军队的斗争，不如说是争取军队的斗争。起义越是顽强、深远和成功，士兵的情绪就越有可能（实际上不可避免）发生根本变化。就像我们在莫斯科看到的那样，在革命罢工基础上的游击战本身不可能导致胜利。但是，它可能会影响士兵情绪，并且在第一次重大胜利——也就是一部分驻军加入了起义以后，游击战就可以转变为群众性的斗争，而在这种斗争之中，一部分军队在武装和非武装的居民支持下，将与另一部分军队作战，而这部分军队将发现自己正处于普遍仇恨的包围之下。我们在黑海舰队、喀琅施塔得、西伯利亚、库班地区、斯维亚堡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当军队的阶级和道德—政治异质性导致士兵站到人民一边去之前，首先必须意味着军队内部两个对立阵营之间的斗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最现代的军国主义武器——步枪、机枪、要塞炮和装甲舰——不仅政府手里有这类武器，而且也有这类武器在为革命服务。

在1905年1月9日彼得堡血腥星期日得到的经验基础上，某位英国记者阿诺德·怀特^[7]先生得出了一个“天才般的”结论：如果路易十六手上有几门马克沁枪供他使用，那么法国大革命完全不会发生了。认为革命的历史机遇可以用步枪的口径来衡量——这是多么可悲的迷信啊！俄国革命再度表明，并不是步枪、火炮和战舰支配人，归根结底，是人支配着它们。

12月11日，维特—杜尔诺沃内阁（那时应该叫做杜尔诺沃—维特内阁更为贴切）公布了一项选举法。在“‘陆战’海军上将”杜巴索夫在普列斯尼亚的街道上恢复圣安德烈旗的荣誉之时，政府急忙开辟了一条合法途径，以便在有产者的社会与君主制、官僚制

[7] 阿诺德·亨利·怀特（Arnold Henry White，1848年2月1日—1925年2月5日），英国记者、反犹太主义活动家。——中译者注

之间实现和解。从那一刻起，争夺权力的斗争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是革命的，但却在宪政的幌子下继续发展。

在第一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人以人民的领袖自居。由于除城镇无产阶级以外的人民群众仍然处于混乱的反对情绪中，同时也由于选举受到了极左政党的抵制，立宪民主党人发现自己主宰了杜马的局势。他们“代表”了整个国家：自由派地主、自由派商人、律师、医生、公务员、店主、店员，甚至还有一部分农民。虽然立宪民主党的领导权仍像以前一样掌握在地主、教授和律师手中，但是，在农村的利益和需求压力下，所有其他问题都退居次要地位，使该党左转了。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了杜马的解散和《维堡宣言》的发布，它们给自由派闲人带来了许多不眠之夜。

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人数较少，但正如米留可夫承认的那样，他们现在的优势就在于他们不仅得到了不满的普通人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与左边割席的选民的支持——换句话说，他们更自觉地把票投到了反革命的一边去。虽然地主和大资本代表中的主要部分已经跨入了积极反动派的营帐，但城市小市民、商业无产阶级和普通知识分子现在都投票给左派政党了。一部分地主和城市人口的中间阶层则投给立宪民主党。农民和工人的代表则站在他们的更左边。

立宪民主党人对政府的征兵计划投了赞成票，并承诺也对预算投赞成票。他们也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同意国家发起新的举债计划，以弥补国家赤字，并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专制政府的旧债。戈洛文，这个坐在议长席位上的可悲人物，体现了自由派的所有无力与渺小，在杜马解散以后，表达了如此的思想——即政府应该把立宪民主党的行为看作是自己对反对派的胜利。他说得很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认为杜马的解散没有任何基础，但它却还是被解

散了。这证明了一点：存在一种比自由派的政治论点更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即是革命的内在逻辑。

在立宪民主党人主导的杜马与内阁的斗争中，政府越来越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了。它认为这个伪议会并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历史挑战，而是一个必须被无害化的政治对手。政府的对手和权力的追求者就好像是那一小撮律师，而对这一小撮律师来说，政治就像是在高等法院提出诉状一样。他们的政治口才在法律的三段论法和伪古典主义用语之间摇摆不定。在关于战地军事法庭的辩论中，两党面对面地交上了火。莫斯科律师马克拉科夫^[8]——一个自由派眼中的“未来新人”，对战地军事法庭进行了司法上的控诉，同时也对整个政府政策进行了毁灭性的法律批评。

斯托雷平^[9]回答道：“但战地军事法庭本来也不是一个司法机构，它们是斗争的武器。您想证明这一武器是不合乎法律的吗？那么它就是合乎目的的。法律本身并不是一个目的。当国家的存在受到威胁的时候，政府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无视法律，利用其权力的物质武器！”

这一回答不仅包含了国家政变的哲学，同时也包含了人民起

[8] 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马克拉科夫（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Маклаков，1869年5月10日—1957年7月5日），俄国自由派律师和外交官。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1910年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1913年参与了贝利斯案件。1916年参与暗杀拉斯普京。二月革命后任俄国临时政府驻法国大使，同年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支持白军。此后长期流亡法国。二战爆发后支持苏联，一度被纳粹监禁。1957年死于瑞士。——中译者注

[9] 彼得·阿尔卡季耶维奇·斯托雷平（Пётр Аркадьевич Столыпин，1862年4月14日—1911年9月18日），俄罗斯帝国政治家。1902—1903年任格拉德沃州州长。1903—1906年任萨拉托夫省省长。1906—1911年任俄罗斯帝国首相兼内务大臣。在任期间大肆镇压革命活动，1907年发动“六三政变”，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始了“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同时又开展土地改革，推行土地私有制。1911年9月5日在基辅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中译者注

义的哲学，让自由派陷入尴尬的境地。这是前所未闻的坦诚！——自由派政论家如此喊道，然后第一千零一次再度发誓：权利高于权力。

然而，他们的整个政策都是为了让政府相信与这一发誓相反的事实。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退缩。为了避免杜马被解散，他们放弃了自己所有的权利，从而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权力比权利更加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当然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诱惑，继续使用其权力武器，直到最后一刻。

第二届杜马被解散了——作为革命的继承者，十月十七日联盟代表的保守民族自由主义者出现了。如果说立宪民主党人认为自己是革命任务的继承者，那么十月党人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的绥靖政策实际上的继承者了。无论立宪民主党人如何对十月党人自我吹捧，后者都从立宪民主党人自己的经历中得出了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不能从革命中获得支持，那就必须从斯托雷平的宪政主义中获得支持。

第三届杜马向沙皇政府提供了 456535 名新兵，尽管直到现在为止，库罗帕特金和施特塞尔^[10]的机关作出的所有整个改革也仅限于新肩章、新袖章和新军帽。它批准了内务部的预算，而这个内务部把全国 70%的地区交给了把紧急状态法当绞刑架用的暴君，以便在剩下 30%的地区根据“正常”法律执行绞刑。它接受了政府著名的 1906 年 11 月 9 日的命令的所有基本规定，而这是根据第 87 条发布的。这第 87 条的任务就是要从农民中抽出一层坚实

[10] 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施特塞尔（Анато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тессель，1848 年 7 月 10 日—1915 年 1 月 31 日），1866 年入伍。1877—1878 年期间参加了俄土战争。1900—1901 年期间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3—1904 年任旅顺港要塞司令。1904 年在日俄战争中不战而降。1906 年被捕。1908 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十年监禁。1909 年获特赦。1915 年死于文尼察。——中译者注

的有产者，而把其余所有的群众都留给自然选择（生物学意义上的这个词）处理。与征用地主土地为农民用相反，反动派这次是征用村社农民的土地为富农所用。第三届杜马的一个极端反动分子说过：“在十一月九日法罐子里装的易爆气体足以炸毁整个俄罗斯。”

由于贵族和官僚（他们再次成为局势的无限主宰）不可调和的态度，资产阶级政党被逼进了历史的死胡同，他们正在寻找摆脱其目前地位的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方法，而方法正在帝国主义那里。他们在外交事务中寻求对其国内失败的补偿——远东的阿穆尔铁路，波斯和巴尔干。所谓的“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行动，使彼得堡和莫斯科所有的爱国主义破喇叭都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声。而立宪民主党——这个过去在所有资本主义政党中声称最反对旧秩序的党，现在却站在了好战的“新斯拉夫主义”前头——立宪民主党人希望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中找到完成革命未竟事业的方法。这使得他们事实上放弃了没收地主土地和社会制度民主化的任何想法，也就相当于是放弃了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稳定国内市场的任何希望，而把希望转到了外国市场那里去了。为了在这一方向上获得成功，他们需要强大的国家政权；而自由派发现自己不得不积极支持沙皇专制，毕竟它才是政权的真正掌握者。米留可夫那种具有反对派色彩的帝国主义，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装饰品，用来掩盖第三届杜马核心中那专制官僚、野蛮地主和寄生资本主义令人反感的混合物。

这一切可能会产生最意想不到的结果。在对马海峡和奉天平原上葬送了自己力量声誉的那同一个政府，遭受了其冒险主义政策可怕后果的同一个政府，现在却意外地发现自己受到了“民族”代表的爱国主义信任。它毫不费力地获得了 50 万新兵和 5 亿新军事开支，还得到了杜马对其在远东新冒险的支持。不仅如此，从左

从右，从黑色百人团到立宪民主党，所有人都在指责它，指责它的外交政策不够积极。因此，事物的所有逻辑促使政府走上了为恢复其世界地位而战斗的危险道路。谁知道呢？也许，在专制制度的命运最终在彼得堡和华沙的街道上不可逆转地被决定之前，它会先在阿穆尔河畔或黑海沿岸再次受到考验。

附件一 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1]

(公历 1907 年 5 月 25 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摘选)

同志们都知道，我同那种在前一个时期作为我们党的正式哲学的关于我国革命和资产阶级政党在我国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有着根本的分歧。

孟什维克同志们觉得，他们自己的观点是异常复杂的。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他们指责那种关于俄国革命进程的简单化概念。但是，尽管它极端地不成形（这种不成形是复杂的一种形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不成形，孟什维克的观点正在变成一种甚至连米留可夫先生也能理解的非常简单的图式。在不久以前问世的《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是怎样进行的》一书的后记中，这位立宪民主党的思想领袖写道：“至于狭义上的左派团体，即社会主义和革命团体，要同他们搞到一起将是更加困难的。但就是在这里，即使没有一定的正面的理由，也还是有一些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帮助我们接近的很有力的反面理由。他们的目的是对我们进行批判并破坏我们的威信；单是为了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存在和活动。我们知道，不仅对于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而且对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来说，现在正在进行的变革是资产阶级政变，而不是社会主义政变，这是应当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实现的政变……世界上任何社会主义者都不准备去占据该民主派的位置，而如果国家把他们大量地派到杜马去，那当然不是为了在目前实现社会主义，或者是为了亲手实现预备性的‘资产阶级’改革……这样一来，让我们扮演议会主义者的角色，比起他们因担任这个角色而使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来说，对他们要有利得多。”

[1] 根据《托洛茨基言论（上）》（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51—174 页校对。——一中译者注

你们看到，米留可夫立即把我们引到了问题的核心。这段引文包含了孟什维克关于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同社会民主党人相互关系的观点的全部基本内容。“正在进行的变革是资产阶级政变，而不是社会主义政变”——这是第一。资产阶级政变“应当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实现”——这是第二。社会民主党不能亲手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它起的纯粹是反对派的作用：“批判和破坏威信”——这是第三。最后，第四，要使社会主义者有可能继续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就需要我们（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存在和活动”。

如果没有“我们”呢？如果没有能够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呢？那就只好把它臆造出来。孟什维主义得出的正是这个结论。它用自己的想象来创造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特性和历史。

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首先应当为自己提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问题：它可以依靠哪些阶层或阶级？

大资产阶级谈不上是革命的力量，这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某些里昂工业家甚至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也起了反革命的作用，而这次革命却是最广义的民族革命。但是有人对我们说，中等资产阶级，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然而这个小资产阶级是什么呢？

雅各宾派依靠从手工业行会中成长起来的城市民主派。小工匠、帮工和同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小市民组成了革命的无套裤汉大军，即领导政党山岳派的支柱。正是这个经过长期的行会手工业历史学校的密集的城市居民群众，承担了革命政变的全部重担。革命的客观后果是建立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正常”条件。但是历史过程的社会结构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即资产阶级的统治条件是由平民、街头民主派和无套裤汉创造的。他们的恐怖专政为资产阶级

社会清除了旧的垃圾，然后资产阶级推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专政，取得了统治。

我问你们（唉，这可已经不止一次了）：在存在着无产阶级这个反对派的情况下，哪一个社会阶级能够把我们这里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扶植起来，使它掌握政权并使它有可能完成巨大的工作？这是中心问题，而我再次向孟什维克们提出这个问题。

不错，我们有大量的革命农民群众。但是少数派出身的同志知道得不比我差，农民不管如何革命，也不能起独立的、尤其是政治领导的作用。农民无疑可以变成为革命服务的巨大的力量，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庄稼人的政党有能力领导资产阶级政变，能够以自己的主动精神把国家的生产力从古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那他就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城市是现代社会的领导者，也只有它才有能力起资产阶级革命领导者的作用。而我们的有能力领导全民族的城市民主派在什么地方呢？

马尔丁诺夫^[2]同志已经不止一次地拿着放大镜来寻找它了。他

[2] 亚历山大·萨莫伊洛维奇·马尔丁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йлович Мартынов，1865年12月24日—1935年6月5日），本名扫罗·萨莫伊洛维奇·皮克尔（Саул Самуилович Пикер），生于明斯克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884年入读圣彼得堡大学法学院，同年参加民意党（Народной Воля）。1886年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学校开除，并被遣返回原籍。两年后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十年。1899年从流放地回来后，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流亡国外。1903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二大结束后参加孟什维克，成为孟什维克派重要领导人之一，并在190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战爆发后，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5月上旬回国，积极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十月革命后，逐步脱离孟什维克。1918年—1922年在乌克兰当教师。新经济政策公布后，宣布自己完全赞同俄共（布）。1923年，为了同左翼反对派斗争，当权派吸收他参加俄共（布），让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共产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924年进入《共产国际》编辑部。他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革命阶段论”与“四阶级联盟”的主创之一。——中译者注

找到了萨拉托夫的教师、彼得堡的律师和莫斯科的统计学家！他和他的所有“志同道合者”一样，只是不愿意看到，在俄国革命中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占据了十八世纪末手工业半无产阶级民主派无套裤汉曾占据的地盘。同志们，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一项根本事实。

我们的大工业不是从手工业中自然地成长起来的。我们城市的经济史根本不知道行会时期。我们的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欧洲资本的直接逼迫下产生的。它占据的实际上是原始处女地，没有遇到手工业文化的反抗。境外资本通过国债的渠道和私人创业的孔道流入我国。它在自己周围集中了一支工业无产阶级大军，不让手工业得以产生和发展。由于这个过程的结果，在我们这里到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刻，城市中的主要力量是处于极高社会类型的工业无产阶级。这是不容辩驳的事实，这一事实必须作为我们全部革命策略结论的基础。

如果少数派出身的那些同志相信革命能够胜利，或者哪怕仅仅承认有这种胜利的可能性，那么他们就不能否认，除了无产阶级，我们这里就已经没有革命政权的历史竞争者了。正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城市民主派领导了革命的民族一样，无产阶级这个我们唯一的城市革命民主派，必须在农民群众中找到支柱并掌握政权，——一旦革命取得胜利。直接依靠无产阶级并通过它依靠革命农民政府还不是社会主义专政。我现在不去谈无产阶级政府以后的前途。也许无产阶级注定要失败，如同雅各宾民主派的失败一样，会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扫清地盘。我只想肯定一点：如果我们这里的革命运动像普列汉诺夫预言的那样，作为工人运动而取得了胜利，那么革命的胜利在我们这里只可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要么根本不可能胜利。

我完全有决心坚持这个结论。如果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

之间的社会矛盾使无产阶级不能领导后者，无产阶级本身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那就必须得出结论：我们的革命是注定根本不能胜利的。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自然结局必然是自由资产阶级同旧政权的妥协。这是决不能否认其可能性的一种结局。但是很清楚，这是由于革命内部软弱而造成的革命失败道路上的结局。

实际上，孟什维克的整个分析——最主要的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及其同农民可能有的关系的评价——必然使他们走上革命悲观主义的道路。但是他们顽强地要离开这条道路，依靠……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加强革命的乐观主义。他们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就是由此而来的。对于他们来说，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象征，而资产阶级民主派就是革命政权的天然竞争者。马尔丁诺夫同志从这个观点出发创立了一整套立宪民主党的历史哲学。要知道，立宪民主党人在革命平静的时期是右倾的，而当革命趋于高涨时则向左转了。因此，他们对革命的未来保有竞争权。然而，我必须断定，马尔丁诺夫描绘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历史是带有偏见的、迎合某种道德的历史。马尔丁诺夫提醒我们说，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人曾经签名表示同情罢工工人。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但是在这种空洞的同情之下掩盖着的是什么东西呢？是在街头恐怖面前表现出来的最庸俗的资产阶级的恐惧心理。革命运动刚一发展起来，立宪民主党人就被完全清扫出政治舞台了。米留可夫在我已经引证过的那本小册子里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这种被清扫的原因：

“当10月17日以后在俄国第一次出现自由政治集会的时候，其情绪自然是左的……甚至像立宪民主党这样一个在当时刚成立几个月并准备进行议会斗争的政党，在1905年的最后几个月要发表讲话完全不可能的。现在责备党在那时没有通过举行群众大会来

抗议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和‘布朗基^[3]主义’旧病的那些人，根本不懂得或不记得参加群众大会的民主派大众当时的情绪。”

（《选举是怎样进行的》第 91、92 页。）^[4]你们看，米留可夫先生对我真是过誉了，把革命最高涨的时期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是引文的有趣之点并不在这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确定一点：在 10 月和 11 月间立宪民主党人唯一可以进行的工作，就是同革命的“幻想”即实际上同群众的革命运动进行斗争……而如果说他们并没有完成这一工作，则只是因为害怕人民集会上的民主派大众。而这是在他们党度成立蜜月的时候！而这是在我们的革命处于最高潮的时刻！

马尔丁诺夫同志回忆了立宪民主党人向罢工工人表示的无关痛痒的敬意。但是，作为一个有偏见的历史学家，他忘了提一提立宪民主党人领导的 11 月乡绅大会。这次代表大会讨论了他们参加人民运动的问题吗？没有，它商讨了同维特内阁妥协的问题。当塞瓦斯托波尔起义的消息传来时，代表大会立即坚决地右倾了——是右倾，而不是左倾。只是当米留可夫先生说了“谢天谢地，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了”这番话以后，立宪民主党的地方自治派才重新走上立宪的轨道。你们可以看到，对马尔丁诺夫的总提纲要作极大的限制才行。

其次的一个情况是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杜马中的所作所为。

[3]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 Blanqui，1805 年 2 月 8 日—1881 年 1 月 1 日），法国革命家，他参加了从 1830 年直到巴黎公社的所有起义，并曾在狱中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他七十六年的人生中，有三十三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鼓吹通过由经过精挑细选、训练有素的阴谋家组成的小集团发动武装起义进行革命的理论，并反对马克思的群众行动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朗基的革命活动和英勇献身精神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对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给予原则性的批评。——中译者注

[4] 这里在原文上和第十四章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中译者注

不用说，这是自由派政党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但是怎样来解释立宪民主党人的这种兴旺景象呢？我们对抵制策略的评价可以不同。但是对我们大家来说毫无疑问的一点应当是，恰恰是这种策略人为地因而也是暂时地把民主派的广大阶层推到了立宪民主党人一边，把许多激进分子推入立宪民主党代表团的怀抱，从而把立宪民主党变成了“全国”反对派的机关；立宪民主党人的这一特殊的情况一直持续到维堡宣言的发表，这也就是那个马尔丁诺夫援引过的宣言。但是第二届杜马的选举就已迫使立宪民主党人采取他们所固有的同“革命幻想”进行斗争的立场了。立宪民主党的历史编纂学家阿列克塞·斯米尔诺夫先生是这样描绘在立宪民主党人最有影响的城市里的选举运动的：“在城市选民中没有拥护政府的人……因此会上斗争的中心就转到另一方面——人民自由党和左派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争论。”（《选举是怎样进行的》第90页）

第一届选举中反对派的混乱，在第二届选举中让位于按革命民主主义路线的分化。立宪民主党人动员自己的选民反对民主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口号。这是最基本的事实。立宪民主党人的社会基础变得更狭小和更缺乏民主性了。而这已经不是偶然的、暂时的、瞬息的情况了。它标志着自由派和革命民主派之间真正严重的分裂。米留可夫对第二届选举的这种结果看得非常清楚。这位立宪民主党领袖指出第一届杜马立宪民主党人拥有多数——“也许是因为没有竞争者”，——而在第二届选举中他们丧失了这个多数，然后他说：“然而现在我们在国内有很大一部分人追随我们，他们表示拥护我们的策略，反对革命的策略。”（《选举是怎样进行的》第286页）

少数派出身的同志不能不希望这样明确地评价正在发生的事

情。你们是否认为，往后事情会发展成另一个样子？立宪民主党人会把民主派重新集合在自己的旗帜下，并变得革命一些？你们是否认为，情况恰好相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将使民主派彻底脱离自由派并把后者抛入反动阵营？第二届杜马中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整个策略难道不是正在导致这一点吗？难道你们自己的策略，你们在杜马的言行，你们在报刊和集会上的揭露不正在导致这一点吗？你们相信立宪民主党人还会振作和崛起有什么根据呢？是根据政治发展的事实？不，是根据你们的图式！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你们需要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你们如饥似渴地寻找他们，但除了立宪民主党人以外一无所获。于是你们就靠他们发扬惊人的乐观主义精神，你们替他们乔装打扮，你们想使他们起一种他们不想起、不能起、将来也不会起的历史作用。

对于我提出来的根本问题——我已多次提过了——，我没有听到回答。你们缺乏革命的预见。你们的政策缺乏远大的前景。

因此，你们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可以用代表大会应当永志不忘的随机应变几个字来表示。无产阶级不是为争取影响人民群众而进行着不断的斗争，他们不是用把劳动者和被压迫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成为他们的报信人和领袖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来监督自己的策略步骤，——他们实行随机应变的政策。他们在原则上正在失去为了长远的胜利成果而不顾暂时利益的可能性，——他们凭经验掂斤估两，他们施展其随机应变的商业—政治巧计。普列汉诺夫同志问：“我为什么要对金发女人比对黑发女人更喜欢呢？”那么我得承认，既然说的是金发女人和黑发女人，这无疑属于德国人所说的私事（德语词，Privatsache）的范围，即由个人自由处理的范围。我想，甚至以在原则性问题上铁面无情著称的阿列克辛斯基同志也不会要求代表大会在这一方面确立“思想的统

列夫·托洛茨基《1905》第一部分
一”，以作为行动统一的前提。（掌声）[5]

[5] 摘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全文。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出版，1909年，295页。——《托洛茨基言论》译者注

附件二 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

附件二 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

——论孟什维克的俄国革命理论

(A. Tscherewanin. Das Proletariat und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Stuttgart,
1908. Verlag Dietz)

每一个善良的欧洲人（不单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俄国是个出乎意外的国家。原因很简单，当你不知道原因时，总是觉得结果是出乎意外的。十八世纪的法国旅行家们曾说过，在俄国，大街要靠一堆堆篝火来御寒。二十世纪的欧洲社会主义者当然不相信这一点，但是他们却都认为俄国的气候严寒，致使社会民主党在那里发展不起来。而相反地，有一位法国小说家，不知是欧仁·苏^[1]，还是大仲马，硬要自己的主人公在俄国酸果蔓的阴影（sous l'ombre d'une kljukwa）下喝茶。当然，每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现在知道，围着茶炊坐在酸果蔓下面几乎像骆驼穿过针眼一样困难。但是，俄国革命天翻地覆，出乎意料地迫使很多西方社会主义者改变了对俄国的看法——俄国的气候原本需要人们在街头生火御寒，现在竟能让北极的低矮植被变为热带的高大的猴面包树。正因为如此，在沙皇制度武力镇压了第一次革命浪潮之后，很多人便急忙从酸果蔓的阴影下面转到了悲观失望的阴影之下。

所幸，在俄国革命的冲击下，西方社会主义者迫切需要弄清俄国社会真相。而我很难决定哪种事物更有价值——是这种思想上的兴趣还是第三届国家杜马？须知第三届国家杜马同样是革命的赠礼。它至少像一条死狗由于落潮而被遗弃在浅滩上，可以说是大海的“赠礼”一样。

在此，必须向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致以诚挚的谢意。为顺应革

[1] 欧仁·苏（Eugène Sue，1804年1月26日—1857年8月3日），原名玛丽—若瑟夫·苏（Marie-Joseph Sue），法国作家。——中译者注

命的诉求，该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三本著作^[2]。但是必须说，它们的价值显然参差不齐。马斯洛夫^[3]的书对俄国土地关系作了颇有价值的研究。这本著作的科学价值之大，使人不仅可以原谅作者这部著作形式上的极端不完善，而且甚至还可以原谅他对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进行的荒谬绝伦的修改。帕日特诺夫^[4]的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独立的学术著作。它虽然提供了相当多的说明俄国工人状况的材料，其中有工厂、矿山、住宅、医院方面的材料，也有一些工会方面的材料，但是没有国家的社会机体方面的材料。作者也没有给自己提出后者的任务。因此，他的著作并不有助于理解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角色。

不久前出版的切列万宁小册子的德译本想阐明这个大问题。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本书。

—

切列万宁的出发点是阐明革命的普遍原因。他认为革命是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抗拒的需要与国家和法律的农奴制形式之

[2] 彼得·马斯洛夫《俄国农业问题》、帕日特洛夫《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切列万宁《无产阶级和俄国革命》。——作者注

[3] 彼得·巴甫洛维奇·马斯洛夫（Пётр Павлович Маслов，1867年7月15日—1946年6月4日），苏联农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1887年起参加马克思主义运动。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8年以后是取消派。1910年在卡普里学校讲课。1913年回国。一战中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在临时政府工作。十月革命后回到西伯利亚，参加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工作，后辞职，退出政治活动。在大学任教。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1年被驱逐出莫斯科。1946年逝世。——中译者注

[4] 康斯坦丁·阿列克谢耶维奇·帕日特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Пажитнов，1879年3月13日—1964年8月2日），苏联经济学家。1898年起参加学生运动。后参加了1905年革命，革命失败后脱离革命运动。1908年起先后在圣彼得堡和哈尔科夫市杜马工作。1917—1923年任彼得格勒合作研究所所长。1931年起先后在供应人民委员会、公共卫生人民委员会、轻工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36年进入苏联科学院工作。1964年在莫斯科逝世。——中译者注

间冲突的产物。他写道：“经济发展的铁律最终导致所有的居民阶层，除了封建贵族以外，都不得不与政府敌对。”（第 10 页）

在这个反对派力量和革命力量的集团里，“无产阶级无疑起了核心作用”（同上）。但是它本身只有加入整个反对派才具有意义。无产阶级在为新的资产阶级社会争取解放的共同斗争的历史范围内，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就，是因为得到了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支持。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它以自己的革命行动支持了资产阶级反对派。反之，无产阶级每当因为自己的行动欠温和（也可以说，因历史地过早行动）使自己与资产阶级民主派隔离起来，就会遭到失败并阻碍革命的发展。这就是切列万宁的历史观的实质^[5]。他在自己的这本小册子里满篇都在不厌其烦地同夸大革命力量和过高估计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进行斗争。

他分析了 1905 年 1 月 9 日的大惨案，得出结论说：“托洛茨基写到：1 月 9 日工人们到冬宫去不是请求，而是要求，他这样说是错误的。”（第 27 页）他指责党组织过高估计了 1905 年 2 月彼得堡无产阶级在施德洛夫斯基参议员的委员会问题上表现出的成熟性，当时当选的群众代表要求公开的法律保障，而由于没有得到这样的保障，他们就退了出来；工人们因为自己的代表被捕，举行了罢工。他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十月大罢工，同时如此表述自己的结论：“我们已经弄清了十月罢工的参加者以及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完全肯定，无产阶级不是单独地，也不是全靠自己的力量沉重地（也许是致命地）打击了专制制度。”（第 56 页）10 月 17 日宣言颁布之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都渴望回到安定的局

[5] 费·唐恩不久前在《新时代》杂志第 2 期上发表的文章里也表达了这个观点。但是他在立论的勇气上，至少在对待过去的事情上，是赶不上切列万宁的。——作者注

面。因此，无产阶级发动革命起义乃是“疯狂之举”。本来应该让无产阶级专注于杜马选举。切列万宁对一些人进行了攻击，因为这些人指出，目前杜马只有口头承诺，至于选举的方式和时间，以及是否进行普遍选举，还不得而知。他援引了我在颁布宣言那天写的文章说：“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上，刚刚获得的胜利被完全不正确地贬低了。宣言一发表，他们就立即写道：‘虽然有了宪法，但专制制度还没垮掉。我们有了一切，但我们一无所有。’”

形势越来越糟。无产阶级非但不支持提出在杜马选举中实行普选权要求的乡绅大会，反而突然同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宣布决裂，去迎合新的“可疑的同盟者”：农民和军队。以革命方式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以十一月罢工来回应波兰的戒严。这就更是错上加错了，这条道路导致十二月份不可挽回的败局。而这种败局再加上社会民主党以后的错误，就为第一届杜马的破产和以后反革命的得势做好铺垫。

切列万宁的历史观就是这样。德译者为了缓和一下切列万宁的指责和揭发的劲头，真是煞费了苦心。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切列万宁的著作也仍然更像是一份关于无产阶级反对“现实的、正确的策略”的革命罪行的起诉书，而不像是真实描绘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

切列万宁以形式主义的演绎代替了对社会关系的唯物主义分析：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一旦胜利，无产阶级就应当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应当协助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它应当协助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所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思想是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策略不相容的；无产阶级的实际策略，势必引导它去为争取国家政权而斗争，因而是错误的。

这种华而不实的逻辑结构（在经院哲学家那里被称作“连锁法”），忽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内部力量及其阶级结构**这个主要问题。我们知道，胜利了的无套裤汉的恐怖专政为资产阶级统治做好了准备。这个经典案例，发生在城市居民主要由手工业—商业市民组成、并受雅各宾派领导的时代。目前俄国城市居民的主要群众是工业无产阶级。仅凭这一类比，我们可以考虑到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历史形势：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夺取革命政权，“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胜利。革命是否会因此而不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呢？又是又不是。这不取决于形式上的定义，而取决于形势的继续发展。如果各个资产阶级的联盟（包括被无产阶级解放的农民的联盟）抛弃了无产阶级，那么革命将保持其狭隘的资产阶级性质。而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并善于不择手段地取得政治领导权，以打破俄国革命的民族界限，那么俄国革命就能够揭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关于俄国革命将走到哪个**阶段**的问题，自然只能给以相对的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单纯规定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等于根本没有谈其内部发展的形式，而且这无论如何也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应当使自己的策略去适应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行为，把它看作是**国家政权的唯一合法的追求者**。

二

首先，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政治派别是什么呢？当人们谈到这个名称时，心里总是把在革命过程中的自由派同人民群众，即首先同农民等同起来。但在实际中（问题的根子也就在这里）这两者并不等同，而且也不可能等同。

立宪民主党近两年来在自由派圈子里居领导地位，这个党是在1905年由地方自治立宪党人同盟和“解放社”合并而成的。乡绅的自由主义一方面表现了大农业主不满政府骇人听闻的工业保

护关税政策，另一方面表现了较为先进的土地占有者的反对派立场，因为俄国土地关系中的野蛮状态妨碍了他们把自己的经济纳入资本主义轨道。解放社联合了一些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位处“体面的”社会地位，享受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也不愿走上革命道路。这之中许多的先生都上过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预科学校。地方自治派这个反对派身上总是带有怯懦虚弱的印记，而当至尊的贵胄在1894年把它的政治愿望叫做“无意义的幻想”时，他只是道出了痛苦的真理。另一方面，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因为享有特权并在物质上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国家、依赖于国家庇护的大资本或自由派的注册地产，也无力发展成多少有点威力的政治反对派。因此，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立宪民主党结合了地方自治工作者（软弱无力的反对派）和各方面都软弱无力的有学位的知识分子。1905年底，地主被农村的骚动吓坏了，急剧改变了立场，转而支持旧制度，这充分暴露了农业自由派的真面目。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得不含泪离开地主的庄园（在这里他们实质上只是个养子），到他历史的故乡，即到城市中去寻找归宿。如果总结一下三次选举运动，那就可以看出，彼得堡和莫斯科以及那里有选举资格的居民都是立宪民主党的支柱。然而，俄国的自由派却未能摆脱无足轻重的状态，只要看看他们那可怜的举止，情况也就清楚了。为什么？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过火行为，而有其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

第三等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社会基础和欧洲革命的动力，其核心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商人和知识分子。十九世纪下半叶是小资产阶级完全衰落的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扼杀了西方的手工业民主派，并且不让它在东方形成。

欧洲资本在俄国碰到了农村家庭手工业者，它不让他们脱离农民而变成手工业者，就立即用工厂来摧残他们。在这里，它把我

们旧的古老城市，其中包括莫斯科这个“大村庄”，变成了最新工业的集中点。无产阶级没有经历过手工业时期，没有行会的传统和偏见，一瞬间就成了大量集中的阶级。在一切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大的和最大的资本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去了中小资本的立足点。没有可能把彼得堡或者莫斯科同 1848 年的柏林或者维也纳相比，更不用说同 1789 年的巴黎相比。而 1789 年的巴黎，还不能设想铁路、电报并把拥有三百名工人的工场看作最大企业。但是极其值得注意的是，俄国工业就其**集中的程度**而言，不仅能同欧洲国家相媲美，而且远远地把它们抛到了后边。下面这个小统计表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人数状况	德意志帝国 1895 年统计数据 ^[6]		奥地利 1902 年统计 ^[7]		俄国 1902 年统计 ^[8]	
	企业数	工人数	企业数	工人数	企业数	工人数
51—1000	18,698	2,595,336	6,334	993,000	6,334	1,202,800
≥1000	255	448,731	115	179,876	458	1,155,000

50 名工人以下的企业我们没有计算在内，因为在俄国对这类企业的统计是很不完全的。但是这两行数字表明，从生产集中的角度看，俄国的工业大大地超过了奥地利。虽然大中企业（51—1000 名工人）的总数碰巧完全一样（6334 个），但是俄国大型企业（1000 名工人以上）的数量却比奥地利多 3 倍。如果我们不仅把落后的奥地利，而且把像德国和比利时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拿来比较，结果也是一样。德国 255 个大型企业工人人数略少于 50 万人；俄国 458 个大型企业的工人人数为 100 多万人。把俄国各种类型的工商业企业带来的利润加以对比，这个问题也就清楚了。

利润额	企业数	利润总额（百万卢
-----	-----	----------

[6] 《德意志帝国的手工业和商业》第 42 页。——作者注

[7] 《奥地利统计手册》1907 年维也纳版第 229 页。——作者注

[8] 波列查耶夫《俄国工人人数和成员统计》圣彼得堡版第 46 页和以后各页。——作者注

		布)
1000—2000 卢布	37,000—44.5%	56—8.6%
>50000 卢布	1,400—1.7%	291—45.0%

换句话说，在全部企业中近一半企业所获得的利润还不到总利润的 1/10，可是全部剩余价值几乎有一半都落到了 1/60 的企业手中。

这几个小小的数字足以雄辩地证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得过晚。这个特点使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家和工人这两极之间的矛盾极其尖锐化。无论是在社会经济中，在城市居民的成分中，还是在革命斗争的经济中，工人的地位，相当于在西欧相应的时代从行会和同业公会中出来的手工业—商业民主派所处的那种地位。我们没有那种曾与年轻的、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并肩冲击封建制度的巴士底狱的壮实的小市民阶层。

不错，在政治方面，小资产阶级不管在哪里始终是极不定形的，但是在它最顺利的历史时期它曾展现过巨大的政治积极性。而在俄国，姗姗来迟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悬在阶级矛盾的深渊之上，身受地主的传统和教授偏见的束缚，诞生于社会主义的诅咒声之中，根本不敢想着去影响工人，无法越过无产阶级并在同地主利益的斗争中去掌握农民。这样，这个不幸的、断了脊梁的民主派变成了立宪民主党。甚至，即便不醉心于民族自豪感，也可以做出如下论断：俄国自由派的短促的命运就其暴露出来的内在劣根性和极端迟钝来说，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是史无前例的。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没有一次旧的革命像迄今为止的俄国革命那样耗费了如此大量的群众的精力，却提供了微小的客观成果。我们无论从哪种观点看待事变，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微不足道和革命的“无所成就”之间的内在联系都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联系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绝不会使我们得出悲观的结论。俄国革命的“无所成就”只不过是暂

时反映了其深刻的社会性质。我们的革命就其直接的、它所引起的任务而言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由于工商业居民的激烈的阶级分化，没有一个能把自己的社会威望和政治经验同人民群众的革命毅力结合起来的、率领人民群众的资产阶级。被压迫的工农群众若要独立行事，就应当在无情的冲突和惨重的失败的严酷教训中，为了自己的胜利而创造政治前提和组织前提。他们别无选择。

三

俄国无产阶级在夺取手工业民主派的工业职能的同时，也夺取了它的任务，其中包括对农民的政治领导。夺取的是它的任务，而不是它的方法和手段。

官方社会组织的整个编制：中小学、大学、市政局、报刊、剧院，都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服务的。从下列事实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优势：甚至我们患佝偻病的自由派在他们采取力所能及的行动如通过决议、请愿和竞选的时候，就自动组织起来并掌握现成的机构。除了生产过程本身赋予无产阶级的那种联系之外，无产阶级没有从资产阶级社会得到任何文化—政治遗产。它不得不在这个基础上在革命战斗的硝烟中创建政治组织。它出色地克服了这种困难。它的革命力量高度集中的时期——1905年年底，同时也是创建工人代表苏维埃这种出色的阶级组织的时期。然而，这只是任务的一小部分，工人不仅应当战胜自己的无组织性，而且应当战胜自己敌人的有组织的力量。

总罢工是无产阶级特有的革命斗争方法。俄国无产阶级尽管人数相对较少，但还是使国家政权的集中化机器和国家大量高度集中的生产力依赖于自己。这就使它的罢工有了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1905年10月专制制度不得不举手投降。但是很快就清楚了，总罢工仅仅只是提出了革命的问题，而并没有解决革命的问题。

题。

革命首先是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而罢工，就像分析所提示的和事变所表明的那样，是对现政权施加压力的一种革命手段。顺便说说，从来不越出钦赐宪法一步的立宪民主党自由派，正是因此而赞成把总罢工当作一种斗争手段，诚然，只有事后的一刹那间，无产阶级认识到罢工的局限性，感到必然也有必要越出它的界限。

由于城市领导农村、工业领导农业，并且新型的俄国工业没有有力而壮实的小资产阶级（对于这种小资产阶级来说，工人只不过是辅助部队），所以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主力并面临着夺取国家政权的问题。经院哲学家们只是通过刊印马克思的书的那张纸看待世界，然后就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他们可以引用随便多少“原文”来证明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不适时”。而现实的俄国工人阶级，在纯阶级组织的领导下在1905年年底投入了同专制制度的单独决斗，而大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则充当了这一方和另一方的决斗副手。此时的无产阶级随着自己的全部革命发展碰到了夺取国家政权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军队两者的对峙已经不可避免了。对峙的结局取决于军队的行动，而军队的行动则取决于它的成分。

工人在国内的政治作用比他们的数量要大得多。事变证明了这一点，以后第二届杜马的选举也体现了这点。工人还把自己的阶级优越性（技术训练，文化修养，团结行动的能力）带到兵营里去。

在军队的一切革命运动中，工兵部队中技术熟练的士兵或炮兵发挥主要作用。他们的故乡是城市，是工厂区。在舰队起义中，居首要地位的是轮机小队。无产者即使占全体舰员的少数，倘若掌握了机器——装甲舰的心脏，也就掌握了全体舰员。但是建立在普遍义务兵役制基础上的军队，自然表现出农民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军队会自然而然地克服庄稼汉的生产分散性，而把它的主要缺

陷——政治上的消极性，变为自己的主要优点。无产阶级在 1905 年的一系列斗争中，有时忽视农村的消极性，有时又依靠它的自发的不满情绪。但是，当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成为当前现实的要务时，穿军装的庄稼汉——俄国步兵的中坚力量，掌握着解决问题的决定性因素。1905 年 12 月俄国无产阶级遭到失败不是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是由于更实际的因素：农民军队的人数。

四

通过这个简要的分析，我们大可不必详细谈论切列万宁的起诉书个别论点。切列万宁没有透过个别步骤、声明以及策略“错误”，从无产阶级的社会联系和它在革命中的发展去认识**无产阶级本身**。如果他拒绝 1 月 9 日工人上街不是请求而是要求这一毫无疑问的思想，那么这是因为事变的外表掩盖了实质。如果说他那样尽心地强调知识分子在十月罢工中的重大作用，那么他这样做丝毫也没有降低下列事实的意义：无产阶级的革命发动才使左翼民主派从地方自治派的尾巴变成了革命的暂时的辅助部队，强迫他们接受了纯粹无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即总罢工，并使他们依附于纯粹的无产阶级的组织——代表苏维埃。

在切列万宁看来，宣言颁布之后，无产阶级应集中精力搞杜马选举。但是要知道当时不存在任何选举。选举的日期和性质谁也不知道。而且一般地说，是否进行选举也没有任何保证。

在 10 月，在颁布宣言的同时，我们遭到了全俄性的大摧残。怎么能令人相信不会用第二次大摧残来代替杜马呢？在这种情况下，以自己的进攻冲决了旧警察堤坝的无产阶级能干些什么呢？只能干它实际上已干了的那些事。当然，它夺取了新的阵地：摧毁了书报检查机关，创办了革命的报刊，夺取了集会自由，保护居民免受那些穿礼服的和衣衫褴褛的流氓无赖的迫害，建立了战斗的

工会，团结在自己的阶级代表机关的周围，同革命的农民和军队建立了联系，他竭力在这些地方掘壕固守。当自由派那帮人嘟哝着什么军队应当置身于“政治之外”时，社会民主党却在军营里进行不倦的鼓动工作。它做得对不对呢？

虽然地方自治派十一月代表大会（事后切列万宁建议支持它）一听到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尔起义的风声就急急忙忙地向右转，只是在获悉起义已经被镇压之后神经才重新镇定下来，代表苏维埃却正好相反，热情洋溢地向起义者表示敬意。它做得对不对呢？究竟应当通过什么方式并且到哪儿去寻求胜利的保证：是在地方自治派、自由派的安心中呢，还是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与军队的联欢之中呢？

自然，由工人展开的没收土地的纲领把地主推向右转。然而它却把农民推向左转。自然，强有力的经济斗争把资本家抛进了维护秩序的阵营。然而它却唤起了倍受折磨和愚昧无知的工人投身于政治生活。自然，军队中的鼓动加速了同政府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是究竟该怎么办呢？是把在自由的蜜月里帮助了蹂躏者并枪杀了工人民兵的士兵置于特雷波夫的绝对指挥之下吗？切列万宁自己也感到，除了已经做过的以外，不能再做什么了。

他在结束他的分析时说：“策略从根本上就是不正确的。”并立即补充说：“即使假定说，当时它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策略。那也无关大局，并且丝毫也改变不了最终的客观结论——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从根本上就是不正确的。”（第92页）切列万宁创立他的策略就像斯宾诺莎创立伦理学一样，用的是几何学的方法。他自己也认为在现实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运用他的策略的，这自然也就说明，为什么有他那样想法的人在革命中无所建树。然而，对于缺点只在于不能运用的这种“现实的”策略能说些

什么呢？对于它，我们可以借路德的话来说：“神学是性命攸关的事情，不应当只是按照理性的法则去思索关于神的事情……”

任何技艺，不管是为家庭生活服务的还是为世俗事务服务的，如果变成一种思辨方式并且不能付诸实践，这就表明它是不可救药的和毫无用处的（ist verloren und taugt nichts）。”

附件三 我们的意见分歧

——1905年，反动和革命的前途^[1]

1854年，拉萨尔在世界极端反动时期给马克思的信中写到：“至于现今的消沉无法靠理论来克服，在这一点上你完全正确。我甚至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任何时候都没有单靠理论战胜过消沉。也就是说，靠理论克服这种消沉虽然产生过信徒和宗派或不成功的实际运动，但从未引起过现实的世界运动或普遍的群众性的思想运动。群众只有受实际事态的沸腾力量的吸引，才在实际和精神两方面同时投身于运动的洪流。”

机会主义不理解这一点。如果说，机会主义的主要心理特点是不善于等待，这可能是奇谈怪论。但确实是如此。同盟的和敌对的社会力量由于它们的相互对抗和影响，在政治上造成一种死寂的状态；经济发展的分子活动在加剧矛盾的同时，不仅不打破政治平衡，相反，却暂时加强了这种平衡，似乎使之永世长存了。此时，机会主义由于不耐烦而苦恼，在自己的周围寻找“新的”途经和手段，以便立即实现那个历史还不能使之实现的东西。它被一片埋怨自身力量不够和不可靠的声音弄得苦恼不堪并开始寻找“盟友”。

[1] 本文载于波兰《社会民主党评论》（Przegląd social-demokratyczny）杂志。当时是俄国极端反动的时期，是工人运动几乎死一般的暂时沉寂和孟什维克叛变性的抛弃革命及其方法的时期。

本文对当时布尔什维主义在关于革命的性质和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的问题上的正式立场，也提出了批评。

对孟什维主义的批评至今还有它的意义；俄国孟什维主义对它在1903—1905年时期，也就是实际形成的时期所犯的致命的错误，现在正自食其果；世界孟什维主义现在正在重复俄国孟什维主义的基本错误。

对当时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批评，现在只具有历史意义。过去的分歧早已消除了。（Uni：并未！参见第14条注解。）

在本书第一版中，这一章有一些空白，因为当时我们手头既无完整的俄文手稿，又无登载该文的波兰杂志。在本版中，空白已按波兰文本补齐。——作者注

它迫不及待地扑向自由主义的粪堆。恳求它，呼吁它，为它发明了专门的行动公式。但后者只是向它发出政治腐烂的臭气作为回答。于是，机会主义开始从粪堆里啄出几颗民主的珍珠。它需要盟友。它东奔西跑，在十字街头抓住了他们的后襟。它向“自己人”呼吁，劝导他们对潜在的盟友采取十分客气的态度。“掌握分寸，多掌握分寸，尽可能多掌握分寸！”它患了一种特殊的疾病，对自由主义的谨慎癖，分寸狂。于是，它在狂乱中给自己的政党带来侮辱与创伤。

机会主义想要弄清那些尚未成熟的关系。它想立即“成功”。当反对派盟友帮不了忙时，它就跑到政府那里去劝说、请求、威胁……最后它在政府中给自己找到一个职位（内阁主义^[2]），但这无非证明，不仅“靠理论的途经”，而且靠行政，都是无法超越历史的。

机会主义不善于等待。正因为这样，它总觉得大事变出乎它的意料。这些事件突然袭击它，打倒它，使它像木片一样在漩涡中打转，然后冲走它，叫它一会儿撞在这个岸边，一会儿又撞在那个岸边……它企图抗拒，但徒劳无益。这时，它便听天由命了，装出心满意足的样子，挥动手臂，表示在游泳——而喊得比谁都响……一旦飓风疾驰而过，它便爬到岸上，厌恶地抖抖身子，诉说头痛骨酸，并在浑身不舒服的状态中不惜对革命的“幻想家”使用严厉的字眼……

—

莫斯科的不无名气的孟什维克切列万宁在不久前出版的《目前状况和可能的未来》一书中写道：“在 11 月和 12 月（1905）获

[2] 内阁主义又称米勒兰主义，因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于 1899 年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中译者注

得胜利的甚至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而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策略。”（第 200 页）孟什维克策略的半官方哲学家马尔丁诺夫在最近一号《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3]上，也提到“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幻想理论……这个理论在我们十月的日子里，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时期，取得了短暂的胜利”（第 4—5 号第 17 页）。造成月份上的不同的说法的原因只是马尔丁诺夫把日历搞错了，他把苏维埃的“十月的日子”理解为 10 月、11 月和 12 月的日子：众所周知，哲学家在提及重大的历史时期时，很容易把月份弄错。然而作为“幻想理论”的基础是什么呢？切列万宁回答说：“是打算把俄国从半野蛮状态直接引上社会主义的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显然轻率的观点。”（第 177 页）切列万宁用几页的篇幅毫不费力地揭露了这种打算的轻率。什么是俄国无产阶级？充其量就是 27.6% 的人口。但是，应当从革命的算盘上去掉农业工人，因为他们愚昧和落后；去掉仆人和短工，因为他们分散。这就剩下 320 万人的工商业无产阶级。“总之，总人口的 5%—11%，这就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打算用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并且他们还天真地以为他们实际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第 179 页）切列万宁的胜利是毋庸置疑地。糟糕的只是他效法那些报纸上的骗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来描绘自己的论敌，这些人尽量把不断革命这个魔鬼描绘得面目狰狞。

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提出问题：能否把俄国“直接引上社会主义”。这样提问要有十分特殊构造的头脑才行。

我们问的是俄国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俄国正在进行的革命的**阶级进程（Динамика）**。

[3]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是孟什维克的国外机关报，1908—1911 年在日内瓦、巴黎出版。——中译者注

这些设问足以表明，应该如何**书写**处于革命后不舒服状态中的机会主义者的历史。但是，更有意思的问题也许是他们是怎样**制造**历史的。可惜，我们对切列万宁在这方面的情况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在革命事变中的作用。但是关于他的一些志同道合者的观点（也许还有活动），我们手头是有文据可查的。他们之中有人写道：“你们问，我们在**立宪会议**上将要求什么？我们明确而肯定地回答：我们要求的将不是‘社会化’，而是社会主义；不是平均适用土地，而是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诚然，“庸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反驳说，我们这里“在最近的将来社会主义革命在技术上是是不可能的”。然而，作者得意洋洋地驳倒了他们的意见并断言：“只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目前敢于提出不断革命的口号，只有这一个党会引导群众取得最后的和决定性的胜利。”这是谁写的？是著名的孟什维克。不错，我们听马尔丁诺夫说过，在“十月的日子里”，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观点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是，后来也是他告诉我们：“孟什维克发出了警告的声音，他们没有那么快地（？）冲昏头脑，他们有时顶住自发势力，继续顽强地（顽强地！）恪守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誓言。”（《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4—5号第16页）毫无疑问，无论怎样赞扬这种勇敢精神都不为过。但是……但是上面援引的那篇把不断革命思想庸俗化的文章毕竟是孟什维克写的（见《开端报》第7号和第11号社论）。这个被革命严重地冲昏了头脑的孟什维克也许是“不可靠的”、“不地道的”孟什维克？啊，不！这是孟什维克的彼得，是它的基石。这就是马尔丁诺夫同志。

在这里，机会主义政治生理学演绎得像教科书那样。如果在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如此丧失其前提的人现在凶狠地反对不知悔改的人的“轻率”和反对……革命本身的疯狂，难道有什么

奇怪吗？

二

社会民主党诞生于革命之中，并阔步走向革命。它在所谓和平发展时代的全部策略归根到底是积蓄力量，这些力量只有在公开的革命斗争时期才充分发挥作用。“正常的”、“和平的”时代，是统治阶级强迫无产阶级接受它的法律和它的政治抵抗形式（法庭，受监视的政治集会，议会制度）的时代。革命的时代——这是无产阶级为其政治愤懑找到了一种其革命本性得以充分表现的形式（集会自由，新闻自由，总罢工，起义……）的时代。“但是在革命目标好像快要实现的革命狂热（！）中，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是很难开辟道路的……”（切列万宁，第 209 页）。“革命狂热”妨碍了社会民主党策略的运用。革命狂热，这是多么美妙的术语啊！全部问题原来在于，“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要求同立宪民主党“暂时统一力量”，而革命的疯狂行为妨碍了这一救命的行动……

我们的三位经典作家，警惕地站在瞭望台上（一位较年轻的在柏林，两位最强有力的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伦敦），全神贯注地环视着政治地平线，指出每一个可以证明革命迫近的现象。当你重读这些经典作家的书信，从字里行间听到像外喷射的革命熔岩的滚滚轰鸣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憎恨严酷的历史辩证法。因为，它为了自己转瞬即逝的目的，使那些理论上、心理上平庸的说教者也搞起马克思主义来了，而这些人却把自己策略上的“理智”同革命狂热对立起来！

拉萨尔 1859 年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在革命中群众的本能通常比知识分子的明智正确得多……正是由于群众素来缺乏教育，他们才不致碰上明智的做法的暗礁……”拉萨尔接着说，“归根到底，只有依靠群众和他们充满激情的自我牺牲才能进行

革命。但正是由于群众‘愚昧无知’和缺乏教育，所以他们完全不了解可能主义。同时，因为任何不发达的头脑只承认极端，只知道“是”和“否”，而不知道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所以他们只对极端、整体和直接的东西感兴趣。这最后必定造成一种情况：在那些（明智的、聪明的）革命的统计员面前本应是跟随自己的朋友，而不应是上当受骗的敌人，但最后却相反，在他们面前只有敌人而根本没有拥护其原则的人。因此，似乎是最高的理智实际上却是最无理智。”

拉萨尔有充分的权利把无教养的群众的革命本能同革命统计员的“明智的、聪明的”策略对立起来。对他来说，朴素的本能当然不是最后的标准。最高的标准是有的，这就是“完全认识历史规律和各民族的人民运动”。他作出结论说：“只有现实的**英明**才能自然超越现实的**明智**并凌驾于它之上。”在拉萨尔那里蒙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薄纱的现实的英明，在马克思那里就是唯物辩证法。它的全部力量在于，它不是把自己的“理智的策略”同群众的实际运动对立起来，而是使运动定形、净化，并综合运动。正因为革命从社会的基本面上揭去了神秘的外罩并使阶级同阶级在广阔的国家舞台上发生冲突，马克思主义政治家觉得自己在革命中如鱼得水。那个不可能实现的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或者更糟糕，那个本身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咎于“革命狂热”并有意识地一直等待这种状态消逝，即等待群众的革命精力消耗殆尽或将来被机械地镇压下去的“孟什维克的理智的策略”又是什么呢？

三

普列汉诺夫头一个以可悲的勇气把革命事变看作是一系列的错误。他在 20 年内不倦地捍卫唯物辩证法，反对一切形式的专事说教的教条主义和唯理论的空想主义，而在以后的实际革命政治

中却成了真正的教条主义者——空想主义者。对于我们来说，他是一个生动形象的经典反面教材。你们不要指望能在他革命时代的所有作品中找到最主要的东西，如阶级关系的内在结构和群众革命发展的内部逻辑。普列汉诺夫用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异曲同工的空洞的三段论式来代替了这些东西，其大前提是：**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而结论说：**对立宪民主党人应当讲究分寸**。在事变这部巨著的页边既没有写下理论分析，也没有写下革命政策，而是些惹人厌烦的专事说教的注释。这种批评的最高成就是寓有教育意义的结论；如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形而上学者，那么，我们在1905年底的策略就会全然不同了。十分奇怪的是，普列汉诺夫根本没有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在25年中宣传了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却仅仅促进了革命的“形而上学者”的政党的建立，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形而上学者”又怎么能够把工人群众引上邪路，并居然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处于唱独角戏的说教者的地位？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普列汉诺夫没有掌握在革命行动中践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秘密，或者“形而上学者”在革命条件下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拥有某种不容置辩的优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所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推行普列汉诺夫的策略，事情也丝毫不会有所改善，因为他们反正会被非马克思主义出身的“形而上学者”排挤掉。普列汉诺夫小心翼翼地回避这个不可避免的抉择。但是切列万宁这个普列汉诺夫式的专事说教的诚实的桑科^[4]抓住了牛的犄角，或者更接近塞万提斯的说法，抓住了驴的耳朵，并勇敢的宣布：**在革命狂热的条件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策略是无立足之地的！**

[4] 桑科是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人物，是吉珂德的仆从。——中译者注

切列万宁不得不作出这一结论，因为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被他的老实小心翼翼地回避的人物：完整论述革命的进程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当普列汉诺夫明智地仅限于对个别步骤和个别现象作游击战式的批评而不顾事态的内部发展时，切列万宁扪心自问：历史如果按照“真正的孟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发展，会呈现出怎样的形式呢？他在小册子《革命中的无产阶级》（1907年莫斯科版）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本小册子是用短浅的目光写出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勇敢的文献。但是，当他纠正了一切错误并按“孟什维克”的方式来安排全部事件，使得这些事件不断地推动革命走向胜利的时候，他扪心自问：为什么历史仍然误入歧途？于是他用《目前状况和可能的未来》这本小册子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本小册子又一次可贵地证明：目光短浅的坚定不移的勇敢甚至也能够揭示一点真理，虽然不能经常……从头开始。

切列万宁说：“革命一败涂地，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无产阶级的某种错误是**根本不行的**。”他认为：“很明显，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错误，而在于某种更深刻的原因。”（第174页）大资产阶级重新同沙皇制度和贵族结成联盟，在革命的命运中起了致命的作用。在这些力量沆瀣一气并形成**一个反革命整体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起了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回顾过去，现在可以说，这也是它的**不可避免的作用**”（第175页，黑体都是我用的）。在头一本小册子中，他跟着普列汉诺夫，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社会民主党的布朗基主义。现在他的诚实的短浅目光起来反对这一点了，于是他说：“让我们设想一下，无产阶级（如果）一直处于真正的孟什维克领导之下，并且（如果）按孟什维克的方式行动^[5]，那时，无产阶级的策

[5] 请注意这种思想方法：不是孟什维克表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无产阶级按孟什维克的方式行事。而最好是这么说：假定历史按切列万宁的方式发展……—

略就会有所改善，但它的基本诉求不会改变，而这些诉求必然导致它的失败。”（第 176 页）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不能够把孟什维克的自我限制用到自己身上的。它在展开阶级斗争时，必然把资产阶级推到反动阵营去。策略上的错误只“加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可悲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无产阶级的可悲的作用”是由它的阶级利益的实质决定的。结论是可耻的，它意味着向那些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患了自由主义呆小病的一切责难彻底投降。然而在这个可耻的政治结论中却反映出了一点点历史真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是不行的，这不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思想上的毛病，而是由于资产阶级“民族”的深刻分化。俄国无产阶级处于他那轮廓分明的社会形态之下，处于他那种觉悟水平上，只有在他自身利益的旗帜下才能释放自己的革命能量。但是，对他的利益，甚至对眼前利益所抱的激进主义，必然把资产阶级推向右转。

切列万宁懂得这一点。但是他说，失败的原因就在这里。很好。但是，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社会民主党还能作什么呢？打算用诸如普列汉诺夫的代数公式（Формула а la Плеханов）去蒙骗资产阶级吗？束手坐待无产阶级遭受不可避免的惨败吗？或者相反，承认想同资产阶级长期合作是徒劳的，从而去挖掘无产阶级的全部阶级力量，激起农民群众的极大的社会兴趣，向无产阶级的和农民的军队呼吁，把自己的策略建立在这上面，在这条道路上寻求胜利？胜利是否可能，第一，这无法预言，而第二，不管胜利的可能性是大是小，这无论如何是革命政党能走的唯一道路，除非它认为立即自杀比失败的一种可能性要好。

切列万宁只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时才探索到的这个革命的内

部逻辑，早在决定性的革命事件开始之前，被他斥责为“轻率”的人就已经看清楚了。

我们在 1905 年 7 月写道：“**现在**对资产阶级的主动性和决心可能抱的希望比 1848 年更小了。一方面障碍大得多，另一方面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分化也严重得多。民族和世界资产阶级的共同缄默抵制，给多灾多难的解放过程设置了极大的障碍。他们力图不让它超出有产者同旧制度的代表达成契约的范围，为的是镇压人民群众。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主义策略确实只有在同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发展。对这一点应当看得十分清楚。不是虚假的民族‘统一’反对民族敌人（沙皇制度），而是深刻发展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道路就是这样……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能够推动资产阶级前进，但**只有**阶级斗争能够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无产阶级虽然顶着压力克服了资产阶级的保守性，但在一定时刻，当事变完全按部就班地展开的时候，仍旧会像碰到直接的障碍那样，碰到这种保守性。能够战胜这一障碍的阶级，将来一定能做到这一点，从而也一定能承担起领导的作用，——如果总的说来俄国会涅槃重生为民主国家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就会出现‘第四等级’的统治。不言而喻，无产阶级会像当时资产阶级那样依靠农民和小市民来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们领导农村，把它吸引到运动中来，使它关心自己的各项计划的成就。但是，领导者必然依旧是无产阶级本身。这不是‘农民和无产阶级联合专政’，这是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它的活动当然不会限于一国的范围。它将立即被自身状况的逻辑抛向国际舞台。”^[6]

[6] 拉萨尔《在〈陪审法庭上的演说〉的序言》，铁锤出版社版。某些说法有意含糊其词，这是因为该文是为“立宪前”时期的合法出版物写的，即 1905 年 7 月写的。
——作者注

四

党的各个不同派别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分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它们都指望大获全胜，即通过革命夺得国家政权。切列万宁现在用算盘大致算了一下革命的力量和反动的力量，在进行结算时得出一个结论：“革命的任何成就都会包含着未来的不可避免的失败的萌芽。”（第 198 页）他用什么资料来计算的呢？罢工的盛行，农民骚动的性质和形式，三届杜马选举的数字。因此，斗争的进程和结局，他不是直接从经济关系中得出的，而是从革命斗争的形式和插曲中得出的。使他得出俄国革命注定毫无希望的结论的，不是经济特征，也不是对各阶级的统计，而是对这些阶级的现实斗争，对它们的冲突，对使它们力量的公开配合的研究。当然，切列万宁的“研究”是拙劣的。但是，即使为了让切列万宁能够着手进行拙劣的研究，必须有席卷全国的罢工，爆发起义，庄稼汉捣毁几个省，最后，进行国家杜马选举。不然怎么办呢？怎样都不行，比方说，任何波斯的切列万宁不可能把沙皇制度（受国内事态的影响而巩固）同英国自由党政府的联盟将对波斯革命必然产生的作用预先告诉自己的同胞。如果竟然出现了这样的预言家，并且他打算根据自己的推算阻止人民群众参加最终会导致他们失败的一系列起义，那么波斯的革命者最好是劝这位聪明人暂时呆在疯人院里。[7]

革命在切列万宁结算它的借方和贷方之前就在俄国开展起来了。对我们来说，革命是一个我们必须在上面表演的现成的舞台。我们没有创造事变，但我们应当使自己的策略适应它们。既然我们

[7] 正如任何事后诸葛亮也不能因为最终会导致霍梅尼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反对波斯人民走上反对沙阿的革命道路，或者也不能因为苏联将来会成为堕落工人国家而反对俄国工人阶级进行十月革命一样。——Uni

参加了斗争，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指望取得胜利。但是，革命是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作为革命政党，我们的任务是向群众揭示夺取国家政权的必要性。

五

“孟什维克”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整个说来一向是不明确的。他们同布尔什维克一起都说“把革命进行到底”，但双方都是纯形式主义地把这理解为实现我们的“最低纲领”，然后应当开始一个在民主环境下的“正常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时代。不过，“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前提是革命的社会力量掌握沙皇制度和国家政权。是哪些社会力量呢？孟什维克回答说：**资产阶级民主派**。布尔什维克回答说：**无产阶级和农民**。

但是，孟什维克说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是什么呢？这不是某种实际存在的和可以感触到的社会力量的名称，这是新闻记者用演绎法和类推法创造出来的超历史的范畴。因为革命应当进行“到底”，因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在法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是民主派革命者——雅各宾派，所以俄国革命只能把政权交给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他们毫不动摇地规定了革命的代数公式，然后竭力赋予世上不存在的算术意义。他们指责别人夸大无产阶级的力量，自己却对“协会联合会”^[8]和立宪民主党寄予无限的希望……马尔托夫满怀希望地欢迎“人民社会党人”^[9]，马尔丁诺夫则抱住库尔斯克的国

[8] “协会联合会”是俄国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组织，于1905年5月在14个协会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大会要求在普选制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1906年底解散。——中译者注

[9] “人民社会党”是1906年成立的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由社会革命党的右翼分裂出来的社会革命党人组成，提出不超出君主立宪制范围的温和的民主要求。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中译者注

民教师的大腿。孟什维克懂得，在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居民、动力、知识、社会生活和政治经验日益集中在城市，在那里农民无法领导革命。历史不能把解放资产阶级民族的任务托付给庄稼汉。农民由于分散，政治上落后，特别是因为受到深刻的内部矛盾的分化（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没有摆脱这些矛盾的出路），只能从背后沉重打击一下旧制度：一方面通过引起混乱和惊惶的农村的自发起义，另一方面，通过把不满情绪传给军队。但是，在资本主义城市里，在新历史的发源地，应当有一个坚定的政党，它依靠城市的革命群众并善于利用农民起义和军队的不满情绪，无情地打击敌人，把敌人从一切阵地上赶出去，然后夺取国家政权。孟什维克找不到这样的政党，所以他们的抽象的“把革命进行到底”实际上变成了仍相当（*quand meme*）于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当中最彻底的人士下结论说，对孟什维主义的异样的策略来说革命气候是太无情了。

孟什维主义的矛盾是历史本身的矛盾的曲折的反映。历史使国家面临着巨大的革命化任务，却事先在全世界范围内用大工业的铁扫帚扫除了作为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与“民粹派”相反，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不承认我们的“独特性”，以至于会在原则上把俄国和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等同起来。这离最荒谬的结论只有一步之遥。

当唐恩^[10]仿效马尔丁诺夫，抱怨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是“我们的最大的不幸”的时候，我们只能同情地耸耸肩。这些人真的懂得他们为什么而悲伤吗？让我们设法对他们讲清楚这一

[10] “人民社会党”是1906年成立的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由社会革命党的右翼分裂出来的社会革命党人组成，提出不超出君主立宪制范围的温和的民主要求。1917年二月革命后支持临时政府。——中译者注

点：他们伤心的原因是，大资本占领了国际经济的地盘；它不容许在俄国形成有力的手工业的和商业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中的突出作用已转到现代无产阶级身上。孟什维克不明白，资产阶级民主派软弱的社会原因同时也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和影响的源泉。相反，他们认为这是软化革命的基本因素。我们且不说，从国际社会民主党这个世界社会主义变革的政党的角度来看，这种思想是多么可怜。对我来说，我们革命的条件像现有的这个样子就足够了。哭诉不能使第三等级起死回生。只能得出结论：只有农民群众服从作为革命领导者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

六

布尔什维克说，完全正确！我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农民必须同舟共济，共同斗争。列宁在《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11]第2期上说，但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12]。其活动的内容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内使经济和政治关系民主化。列宁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和无产阶级与农民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专政之间规定了原则性的区别。他觉得这种逻辑上的、纯粹形式主义的推论完全能解决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工人阶级统治之间的物质层面的矛盾。他说，我们如果认为自己能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会遭到政治上的破产。但是既然无产阶级和农民共同执政，确认其专政具有“民主主义性质”，那么一切都得救了。从1904年起，列宁孜孜不倦地重复这一思想，但是

[11] 《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是在罗莎·卢森堡参与下出版的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杂志。1902—1904年、1908—1910年在克拉科夫出版。——中译者注

[12]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第36页。——中译者注

这种思想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正确一些。

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因此政权对无产阶级来说会是个极大的不幸。孟什维克是这样说的。列宁回答说，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认识到进行的只是民主革命，这也许是对的。换句话说，在列宁看来，解决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客观条件的矛盾的出路在于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自我限制，并且由于理论上认识到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的变革是资产阶级变革，这种自我限制是必然会出现的。列宁把客观矛盾转到无产阶级的认识中去，用一种不是来源于宗教信仰而是来源于“科学”公式的阶级禁欲主义来解决它。只要清楚地想象一下这种设计，就足以了解它那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性质了。

在另一个地方我已详尽地指出^[13]，在“民主专政”的第二天这种准马克思主义的禁欲主义牧歌（quasi）就会烟消云散。无产阶级无论在何种理论标志下执掌政权，它不能不马上即第一天就面临失业问题。在这一点上，解释社会主义专政和民主专政之间的区别未必能帮他多大的忙。执政的无产阶级必须立即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共工程等等）由国家开支来保障失业者的生活。这种做法本身立刻会引起强大的经济斗争高潮及一整段罢工的历史：这一切在1905年年底已经初现端倪了。而资本家将会以当时回答8小时工作日的要求那样来回答它：关闭工厂。他们在大门锁上一把大锁，并对自己说：“我们的财产不会遇到危险，因为已经规定，现在无产阶级搞的不是社会主义专政，而是民主专政。”面对着关闭的工厂，工人政府能做些什么呢？它必须打开工厂，并由国家开支来回复生产。但是这难道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吗？当然是！你们难道能提出别的道路吗？

[13] 《我们的革命》，第249—259页。——作者注

可能会有人反驳说，你们描绘的是无限制的工人专政。其实，这里讲的却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专政。好吧，就把这种反驳也考虑在内。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无产阶级是如何违背其理论家们的善良意愿，在实践中消除那种本应把他限制在民主专政范围内的逻辑界限的。现在有人建议用合作的庄稼汉给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自我限制加上一个客观的反社会主义的“保证”。如果想以此说明，和社会民主党共同执政的农民政党不会允许用国家开支负担失业者和罢工者，也不会允许打开资本家关闭的工厂供国家生产，那么这就是说，就在第一天，即远在完成“联盟”任务之前，我们就会看到无产阶级与革命政府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可能以农民政党制服工人告终，也可能是以前者被排除出政权之外而结束。这两种情况都和联合“民主”专政很少有共同之处。全部不幸在于，布尔什维克只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到革命胜利的时刻：此后斗争就暂时消融于“民主”合作之中。而只有在最终建立共和制之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以纯粹的形式重新进行，——这一次是在直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形式下进行了。孟什维克从“**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这种抽象概念出发，认定无产阶级的全部策略迁就自由资产阶级的行动，直到自由资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为止。而布尔什维克则从“**民主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专政**”这种同样空洞抽象的概念出发，认定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要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束缚自我。不错，两者之间在这一问题有着天壤之别：孟什维主义的反革命一面现在已经暴露无遗，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反革命特性，只有在革命胜利时才会具有极大的危险性^[14]。当

[14] 对本版的附注。大家知道，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同志领导下，在1917年春天，即在夺取政权以前，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完成了（不是没有内部斗争地）自己思想上的重新武装。——作者注（Uni：然而，这种危险性还是在俄国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中被老“布尔什维克们”打列宁主义牌——详见《不断

然，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经常谈论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前者在对待自由资产阶级的态度上，后者在对待农民的态度上），这一点丝毫也没有改变下列事实，即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只要在事态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都被阶级斗争的后果吓倒，而想用自己形而上学的建制来使斗争严守秩序。

七

革命胜利后，只能让那些能依靠城市的武装人民即无产阶级民兵的政党来执掌政权。社会民主党执掌政权后就处于最深刻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不能用“只是民主专政”的天真幌子来克服。工人政府的“自我限制”不是别的，而是为了实现共和国而出卖失业者、罢工者，以至全体无产阶级的利益。革命政权面临着种种客观的社会主义任务，但是如果要解决这些任务，就会在一定阶段上与国家的经济落后状况发生冲突。在民族革命的范围内没有摆脱这种矛盾的出路。工人政府一开始就面临下列任务：联合西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力量。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它的暂时的革命统治才会揭开社会主义专政的序幕。因此不断革命对俄国无产阶级来说是阶级自卫的要求。如果工人政党缺乏足够的主动性去实行革命的进攻的政策，并且打算转向有限的、只有民族的和民主的专政，那么欧洲联合起来的反动势力将会毫不迟延地向它表明，执掌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必须把全部政权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天平上去。

革命论》第五章，以及在别的“民主专制”上打马列牌地彻底发生了。）

附件四 为政权而斗争^[1]

我们面前有一张论纲领和策略的传单，题目是《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致俄国同志们的一封信》。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有帕·阿克雪里罗德^[2]、阿斯特罗夫^[3]、亚·马尔丁诺夫、尔·马尔托夫^[4]和

[1] 摘自巴黎的《我们的言论报》，1915年10月17日的那期。我们之所以选择把这一篇写在1905年之后很久的文章收录进来，是因为这篇文章简明扼要地讲述了第一场革命（1905）到第二场革命（1917）这一过渡期的情况。——原注

[2] 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1850年8月25日—1928年4月16日），早年受巴枯宁影响参与革命运动。1879年加入土地平分社。1883年参与劳动解放社。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孟什维克取消派领导人，主张取消秘密党，建立合法的“工人代表大会”。1912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海外书记处成员。一战爆发时持护国主义立场，支持协约国。二月革命后回国，主张与参战国进行和谈。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主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使团团团长。十月革命前出访国外，后公开支持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1928年死于柏林。——中译者注

[3] 伊萨克·谢尔盖耶维奇·阿斯特罗夫（Исаак Сергеевич Астров，1876年？月？日—1922年4月22日），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革命失败后转向取消主义。1912年被捕并被流放到纳里姆，随后流亡瑞士。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派，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1918年8月当选为孟什维克中央委员。后反对十月革命，多次被捕。1921年被流放到哈尔科夫，在那里成为乌克兰孟什维克领导人。1922年被流放到土耳其斯坦，在转运至萨拉托夫监狱途中死于斑疹伤寒。——中译者注

[4] 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谢·谢姆柯夫斯基^[5]。

这封“信”极其精练地概述了革命问题。当传单的作者们的话题从战争造成的局势转到政治前途和策略结论的时候，分析方式就不再精准无误了；连术语也变得模糊不清，社会的定义也变得含混了。

初看起来，在俄国的对外关系方面流行着两种情绪，第一种情绪是关心国防（从罗曼诺夫到普列汉诺夫^[6]的每一个人都尤为关心这一点），第二种情绪则是普遍的不满（从反政府的官僚分子的捣乱行为到街头爆发的叛乱）。这两种流行的情绪也造成一种关于将来人民革命^[7]的幻觉，以为这种革命会从国防事业中产生。但是这两种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关于“人民革命”问题的提法的含糊性，即使这个提法形式上是同“国防”事业对立的（像在马尔托夫等人那里一样）。

战争本身以及战争的失败，既没有引起革命的问题，也没有形成解决这个问题的革命力量。我们的历史完全不是从华沙向巴伐

[5] 谢苗·尤里耶维奇·谢姆柯夫斯基（Семён Юльевич Семковский，1882年3月4日—1937年3月9日），苏联科学家、哲学家。原姓布隆施泰因（Бронштейн），是托洛茨基的表弟。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07年流亡奥地利。1908年起担任维也纳《真理报》编委会委员。二月革命后加入孟什维克国际派。1917年8月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中央委员。1917年9月任全俄民主会议议员。1918—1920年期间在基辅大学任教。1920年退党，在哈尔科夫大学任教。1936年被捕。1937年遇害，后获平反。——中译者注

[6] 虽说不在本书的讲述范围内，但读者注意并警惕一点：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俄国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按当时的称呼）运动的其中一位开创者”，在本文作出之际已经彻底的滑向护国主义一侧了，并且，在接下来的“本书后传”《俄国革命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左翼。——Uni

[7] 值得一提的是，在各国历史上，“人民”不止一次地起到了消解阶级话术、模糊阶级意识的作用。——Uni

利亚大公投降开始的。无论是革命的矛盾还是各种社会力量，仍然和我们在 1905 年头一次碰到的相同，不过最近十年来的事件使它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异。战争只是以机械的直观性暴露出政府客观上的软弱无能。同时，战争也扰乱了社会意识，似乎“所有的人”都沾染了反击兴登堡^[8]的愿望和敌视六三体制^[9]的情绪。但是，正如组织“人民战争”的工作一开始就碰上了沙皇的警察，从而表明俄国的六三体制是事实，而“人民战争”是虚构的一样，进行“群众革命”的工作也一开始就碰上了社会主义警察普列汉诺夫。如果普列汉诺夫后面不是站着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即一般说来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民族民主派和民族自由派的话，的确可以把普列汉诺夫和他的所有追随者都看成是虚构的。

[8] 保尔·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年10月2日—1934年8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参加过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普法战争后在总参谋部工作，1911年退役。一战爆发后重新入伍，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在坦嫩贝格（Tannenberg）战役和马祖里湖（Masurian Lakes）战役中大败俄军，1914年11月初被任命为东线德军总司令（Ober-Ost），11月底被晋升为陆军元帅，1916年8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十一月革命爆发后，兴登堡劝说威廉二世退位。1925年被右翼政党推选为总统候选人，在4月里当选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最终使纳粹党上台。1934年病逝。——中译者注

[9] 即序言中提到的“六三沙皇制”。——中译者注



（图为卢卡宁，彼得堡苏维埃代表之一，同时也是革命过程的参与者。）

这封“信”当然不能无视用阶级来分解民族，这个应该用革命的手段从战争的种种后果和现政权下拯救自己的民族。“民族主义者和十月党人、进步党人、立宪民主党人、企业家、甚至还有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都异口同声地说，官僚制度没有能力保卫国家，他们要求为国防事业而动员一切社会力量……”这封信完全正确地作出了关于这种立场具有反革命性质的结论，因为这种立场的前提是“同俄国目前的统治者——官僚、贵族和将军们联合起来保卫国家”。这封信也正确地指出，反革命立场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爱国派”的特点，但我们还可以补充说，社会主义爱国派也有这个特点，这是这封信根本没有提到的。

由此必然得出结论：社会民主党不单是最彻底的革命政党，而且是国内唯一的革命政党；和它同时存在的要么是那些不那么坚

决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集团，要么就是一些不革命的政党。^[10]换句话说，尽管的确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从革命角度提出任务的社会民主党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却是十分孤立的。我们必须最清楚地认识到这第一个结论。

当然，政党还不算阶级。政党的立场和它所依靠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之间可能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以后可能发展为深刻的矛盾。在人民群众的情绪的影响下，政党本身的行为可能会改变。这是无可争辩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谋划时就更不应该依靠像政党的口号和策略步骤这样一些比较不稳定和比较不可靠的因素，而应该依靠比较稳定的历史因素，比如民族的社会结构，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和其发展的趋势。

然而这封“信”的作者们却完全回避这些问题。对于在 1915 年的俄国什么是“人民革命”这个问题，他们只告诉我们说，它“应当”由无产阶级和民主派来完成。什么是无产阶级，这我们知道。但是什么是“民主派”呢？是政党吗？从以上所说可以看出来：不是。那么是“人民群众”吗？什么样的“人民群众”呢？显然，是小工商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只能是这些人。

我们在若干篇题为《战争危机和政治展望》的文章中，对这些社会力量可能具有的革命意义作了一般的估计。根据上次革命的经验，我们探讨了 1905 年的力量对比情况在最近十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有利于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呢，还是对它不利呢？在讨论革命的前途和无产阶级的策略时，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心问题：1905 年以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强大了呢，还是更加衰落了昵？我们以前所有的争论都围绕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命

[10] 原文直译为：“和它同时存在的不单是一些不那么坚决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集团，还有一些不革命的政党。”——中译者注

运问题。如果有人至今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他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我们给过这个问题的回答：**由于不存在真正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俄国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的时代，也像民族战争的时代一样，已经过去了（至少对欧洲来说是如此）。民族革命和民族战争之间是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的。我们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不仅是一种殖民掠夺的体系，而且也是一定的内政制度。它不是使资产阶级民族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民族对立起来。

手工业和商业的小资产阶级在1905年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最近十年来，这个阶层的社会意义已经无可争辩地变得更小了，因为我国资本主义对付中间阶级的手法比老牌的经济上发达的国家要残酷得多和剧烈得多。

知识分子在数量上无疑是增长了。他们在经济方面的作用也增长了。但同时，他们以前那种虚伪的“独立性”也最终消失了：知识分子在组织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舆论方面的作用，决定着他们的社会意义。他们同资本主义的物质联系使得他们充满了帝国主义倾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封信说：“甚至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也要求为国防事业而动员一切社会力量。”这是完全不对的。**不是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而是全体激进知识分子。**本来应该说，不仅是全体激进知识分子，而且还有相当大一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我们夸张知识分子的特性未必会扩大“民主派”的队伍。

总之，工商业资产阶级进一步没落了，知识分子放弃了革命的立场。城市民主派还谈不上是革命因素。剩下的是农民。但是据我们所知，不论是阿克雪里罗德还是马尔托夫，都从来没有对农民的独立的革命作用给予过分的希望。他们是否认为，最近十年来在农

民不断分化的过程中这种作用已经增强了呢？这样的假定既明显地违背理论见解，又明显地违背一切历史经验。

然而这封信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民主派”呢？所谓“人民革命”又是什么意思呢？

立宪会议的口号需要以革命形势为前提。存在这种形势吗？存在。但这丝毫不是在说：仿佛俄国终于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个民主派现在准备并且能够对沙皇制度进行清算。相反，如果说当前的战争十分明显地表明了什么的话，那恰恰是表明了国内缺乏革命民主派。

六三体制的俄国企图在帝国主义的道路上解决国内的革命问题。这种企图遭到了明显的破产。这并不是说，对六三体制负有全责或者一部分责任的政党会走革命的道路，而是意味着：军事上的惨败而暴露出来的革命问题（这个问题将驱使统治者进一步走帝国主义的道路），将使这个国家里唯一革命的阶级倍加重要。

六三体制集团动摇了。它的内部有倾轧和斗争。这并不意味着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在自己面前提出了政权的革命问题，并且准备冲击官僚制度和团结的贵族。但是这意味着政府抵抗革命冲击的力量在一定时期内无疑是削弱了。

君主制度和官僚制度信誉扫地了。这不是说它们不经战斗就会交出政权。杜马的解散和最近内阁的更迭，向一切需要证明的人说明：这种情况离我们还很远。但是官僚制度的不稳定的政局（这种不稳定还将进一步发展），会大大有助于社会民主党人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动员。

城市和农村的下层人民将越来越贫困，越来越受欺骗，越来越不满，越来越顽强。这并不意味着会有一支独立的革命民主派的力量起来同无产阶级并肩进行活动。这支力量既没有社会基础，也没

有领导成员。但是这无疑意味着，下层人民中间深刻不满的气氛会有助于工人阶级实行革命的冲击。无产阶级越是不等待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出现，越是不迁就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被动性和局限性，就越是坚决地和不妥协地进行斗争，它打算走“到底”即夺取政权的决心就越是让大家看得清楚，也就是说，在决定性的时刻它就越有可能把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没收土地之类的口号当然无济于事。对于关系着国家政权的成败的军队说来情况尤其如此。只有当军队群众深信革命的阶级不单在表示不满和举行示威，而是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并且有可能夺得政权时，军队的大多数才会倒向革命的阶级。

国内存在着一个客观的革命问题——国家政权问题。战争和败北使得这个问题更加尖锐了。统治者越来越趋于瓦解。城乡群众的不满情绪正在增长。而能够利用这种形势的革命因素只有无产阶级。而现在的无产阶级和 1905 年比较起来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信”里有一句话似乎接近全部问题的这个中心点。这句话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应当“在推翻六三君主制的全民斗争中带头”。我们刚才已经指出“全民”斗争可能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上面所引的“带头”一词不应当简单地理解为进步的工人们不弄清楚后果究竟如何，就比谁都慷慨地流血，而应当理解为他们应该在政治方面领导整场斗争（这场斗争首先将是无产阶级本身的斗争），那么很明显，这个斗争的胜利一定会使政权落到领导斗争的阶级手上，即落到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手上。

因此，这不单是关于“革命临时政府”^[11]（这是空洞的形式，历史进程将用某种内容来充实它）的问题，而是关于革命的工人政府的问题，是关于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

[11] 原文直译为“临时的革命政府”。——中译者注

全民立宪会议、共和国、八小时工作日、没收地主的土地——所有这些都是口号，它们将和立即停止战争、民族自决权和欧洲联邦等口号一起在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中起巨大的作用。但是革命首先是政权的问题——不是国家的**形式**问题（立宪会议，共和国，联邦），而是政权的**社会内容**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直接准备为夺取政权而斗争，那么立宪会议或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在目前条件下便会完全失去直接的革命意义。因为如果无产阶级不从君主制手中夺取政权，那就谁也夺取不了。

革命进程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这是特殊问题。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国内和国际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能够延缓发展或加快发展，保证革命的胜利或再一次导致失败。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无产阶级都必须看清楚自己的道路，并且自觉地走这条道路。首先它必须摆脱幻想。**无产阶级在它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最坏的幻想始终就是指望别人。**^[12]

[12] 这里的着重点是中译者加上的。——Uni

附件五 论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答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波克罗夫斯基)

一

波克罗夫斯基在《红色处女地》杂志（Красная новь）的第三期（1922年5—6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我的书《1905》。这篇文章向我们证实（哎，还是个反面教材！），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应用于活生生的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以至于像波克罗夫斯基同志这样知识渊博的人也容易把历史变成陈词滥调。

波克罗夫斯基同志的文章中所谓的“疑惑”是从其标题开始的。真够瞧的：《俄国专制主义“逆社会发展而存在”，这是真的吗？》这句“逆社会发展而存在”被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放进了引号里。所以，看起来就好像是我断言了专制主义总是“逆社会发展而存在”，而把指出这一说法有违常理的有益而不太困难的任务留给了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实际上，这是在错误地引用我的观点。我认为，沙皇专制在完全背离社会的发展需求的情况下，由于其组织力量、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微不足道和对无产阶级的日益恐惧而继续存在。就同样的历史辩证法精神而言，我们完全有权利说（就像我们在共产国际宣言里面说过的一样）：今天的资本主义不仅违背历史发展的要求，而且也无视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

此外，波克罗夫斯基同志虽说承认了出版我的这本书在整体上是有益的，但他极力反对重新发行其介绍性章节《俄国社会发展和沙皇制度》。他说，这样的内容在1908—1909年间对极度不了解俄国历史的外国公众来说，是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对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却没有任何用处，因为他们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接着指出，在我的这一开篇章节中，我

提出了自由主义的、“米留可夫”（原文如此！）的观点，认为沙皇专制是一个绝对自足的国家组织，与剥削阶级并没有联系。“（托洛茨基的）这种简图，首先**不属于我们**，其次在客观上不正确。”而为与这种不正确的、“不属于我们的”简图作斗争，则需要有“不比我们同宗教偏见作斗争时少的精力”（!!!）。真糟糕，不是吗？但是，如果在这书的德文版中，我确实阐述了这种畸形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话（顺带一提，当时没有一个德国马克思主义书评家提过这一点），那么这些观点对于 1908—1909 年的外国公众，哪怕他们是多么的“极度不了解”，又怎么可能是“有用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呢？除非我们相信那句流行的谚语——“对俄罗斯人健康的東西对德国人是有害的”，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波克罗夫斯基给我扣的“自由派”帽子，在 12 年前竟对德国工人是如此有利。然而，即便如我，罪莫大焉，以至承认了我国历史发展具有非常独特的性质，也没法认同这句谚语。那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就更不应该认同它了，因为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他否认这种独特性的存在。

波克罗夫斯基声称，我的错误理论“过去就有过一个别名，叫普列汉诺夫，这个普列汉诺夫踏上了同样的道路，（而且还走得更远）……”（第 146 页），这就使混乱更加混乱了。还能更糟糕吗？尽管这篇文章没有准确指出我往哪里走，但从这个“普列汉诺夫（在自由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就足以让读者准备好我们耳熟能详的结论，即必须与我就俄国历史的看法作斗争，以“不比我们同宗教偏见作斗争时少的精力”作斗争。哎，简直是噩梦一场啊！但这也仅仅就是一场梦罢了，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经进入了理论性的、甚至年代学的幻想领域。故事似乎是这样的：首先，普列汉诺夫沾染上了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理论（为了和立宪民主党人联

盟)；然后我紧随其后，在 1908—1909 年间为德国人发展了同样的自由主义理论；但是这实际上并不有害，甚至是有利的（嘻，德国人这是活该！）；但是，由于我现在开始向波克罗夫斯基亲自负责的工人青年推销普列汉诺夫式的观点了，所以他就很快把我和主教吉洪^[1]相提并论，并宣称要和我进行“同样”积极的斗争了。

全是一团乱麻，最混乱的莫过于时序方面的问题。我论俄国历史发展特点的介绍性章节根本就不是为了德国人写的，它第一次是以俄语出现在 1907 年彼得堡出版的《我们的革命》（第 224 页）中。这篇文章的准备工作是在 1905 年和 1906 年（在监狱里）进行的。写这一章的直接目的在于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口号提供历史和理论依据，因为它既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也反对工农民主政府的口号。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这里并没有什么普列汉诺夫的“立宪民主”癖。在我 1906 年为马克思的《巴黎公社》作的序言中，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公社的经验对俄国工人阶级具有意义，因为俄国工人阶级作为其之前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直接面临着夺取政权的问题^[2]。这种思路在许多同志中，或者更准确地

[1] 圣吉洪（Тихон：1865 年 1 月 31 日（儒略历 1 月 19 日）—1925 年 4 月 7 日），俗名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别拉文（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Беллавин），在苏联初期（1917 年到 1925 年）担任俄罗斯正教会第 11 任莫斯科牧首。——中译者注

[2] 这个序言是这样写的：“社会民主主义应该是而且希望成为客观发展的自觉表现。但是，由于在革命的某一时刻，阶级斗争的客观发展使（俄国）无产阶级面临着选择：是从国家政权中取得权利与义务，还是放弃其阶级地位。社会民主党人选择了夺取国家政权作为其接下来的直接任务。在这样做的时候，它决不会忽视更深层次的发展过程，即生产的增长和集中化过程。但它说，由于阶级斗争的逻辑，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的脚步，在资产阶级‘完成’它的经济使命（它几乎没有开始着手实现其政治使命）之前，就把无产阶级推向专政，这只能意味着历史把重大困难的任务放在了无产阶级的肩上。也许，无产阶级甚至会被斗争所累，在任务的重压下倒下，可能。但它不能因为害怕阶级瓦解或整个国家陷入野蛮状态，而去拒绝这些任务。”这就是我们在 16 年前从俄国的“历史发展特点”中得出的结论。而波克罗夫斯基在迟到了 15 年

说，在绝大多数同志中引起了极大的理论愤慨。被激怒的同志里不仅有孟什维克，还有加米涅夫同志和罗日科夫^[3]同志（那时是个布尔什维克）。他们的观点可以被概括为：资产阶级必须在无产阶级之前提前取得政治领导权；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必须充当无产阶级的长期历史学校的角色；只要试图跳过这一阶段，就是在搞冒险主义；如果西方的工人阶级还没有夺取政权，那俄国的无产阶级又怎么能够给自己设下这样的任务，诸如此类。从那种靠历史的陈词滥调和形式上的类比来满足自己，并把历史时代转化为僵化的社会类别（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专制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组成的逻辑序列的虚假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工人阶级在俄国夺取政权的口号必然会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奇妙否定。然而，任何对1903—1905年间表现出来的社会力量进行的评估，都有力地指证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是非常活跃的。这是不是特殊性呢？它是否预示着整个俄国的发展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呢？怎么这样的任务就落到了俄国无产阶级——这一（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所谓的）欧洲最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身上了呢？俄国的落后性又包括什么呢？仅仅在于俄国慢了一步，重复欧洲国家的历史吗？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提“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提法吗？然而，正

以后又来了，他担心我们的观点意味着……对阶级斗争的否定。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作者注

[3]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日科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Рожков，1868年10月24日—1927年2月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8年被捕及流放，直到二月革命才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一战期间倒向孟什维克，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二月革命后支持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统一。十月革命时持反对立场，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1921、1922年两度被捕。1922年退出孟什维克，在列宁的干预下免于被驱逐出境。此后从事教学活动。1926年任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1927年逝世。——中译者注

是这现在的这个政权（使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提醒我们的批评者）被无产阶级夺得了。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实质在于，俄国发展那无可争议、不可辩驳的滞后性，在西方高等文化的影响和压力下，不是导致了西欧历史进程的简单重复，而是产生了需要独立研究的一些根本上的特殊性。问题正是这样提出来的。我们正是这样提出了问题，尽管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将其称为“非己的”。

在那几年后（1914年），普列汉诺夫提出的关于俄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这非常接近上面提到的《我们的革命》中的那一章节提出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完全正确地否定了教条式西欧主义和民粹派斯拉夫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提纲，把俄国的“特殊存在”还原为真实的、物质决定的历史发展特殊性。声称普列汉诺夫是从这点得出，或者可以从这点得出任何妥协性的结论（比如与立宪民主党人结盟等等），都是完全错误的。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幻性，无疑反映了俄国历史发展非常重要的特点。但是，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考虑到所有现有历史条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现了。不错，普列汉诺夫没有下过这样的结论。但他也没有从他的另一个毫无疑问正确的命题——“俄国革命将作为工人运动获得胜利，或者根本不胜利”——中得出任何结论。如果我们把普列汉诺夫用于反对民粹派还有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和其立宪民主痴和护国主义立场混为一谈的话，那么普列汉诺夫就一无所有了。但实际上普列汉诺夫留下了很多东西，现在向他学习一下也无妨……

每个国家的历史生活都建立在其生产之上；这一生产产生阶级和阶级集团；国家是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组成的；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关——这些概念在1905年对我和我的反对者都并不是秘密。在这些界限内，俄罗斯历史与法国、英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

都服从着同样的规律。这并没有触及到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沙皇专制是有产者、剥削阶级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其他任何国家组织都没有区别，但这完全不意味着俄罗斯的专制权力（君主、官僚、军队以及其他压迫机关）与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同法国、德国或英国是一样的。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国政治形势的独特性质最终导致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各阶级与国家政权之间力量关系的特殊性打下的基础。当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或者罗日科夫同志民粹派或自由派争论，指证沙皇专制的组织与政策都是由经济发展和有产阶级的利益决定时，他们基本上是对的。但是当波克罗夫斯基同志试图用同样的论点来反对我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说到点子上。

波克罗夫斯基同志的思想被僵化的社会类别之网束缚着，他用这些社会类别来替代活生生的历史力量。他用某种绝对的独立性来代替相对的事物——统治阶级专制在历史上有条件的、由一定社会范围限制的独立性，从而把沙皇专制变成了一个没有内容的单纯形式。然后，他在把对沙皇专制的这种看法归结于我，写道：“但是，这与我们呼吁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为权力而斗争又有什么关联呢？我们怎么能够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得它未曾拥有过的东西呢？”诸如此类。对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来说，问题是这样的：要么资产阶级掌握了**所有**权力，要么它**根本**就没有过权力。如果它没有权力，那我们说的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得”权力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从资产阶级手中获得了权力，我们又怎么能够说它没有过这个权力呢？这样提出的问题既不历史，也不唯物，更不辩证。即使是从纯粹逻辑的角度来看，也是不合适的。即使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权力，无产阶级也可以为了使权力不落入资产阶级手中而争夺权力。但是，这样成型的抉择当然并没有出现过。资产阶级并未

完全拥有过权力，而只是投身于权力。这种投身并不完全。事件的发展，或者说军事上的失败和来自下层群众的压力，拉大了专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裂缝。君主制就掉进了这个裂缝了。资产阶级在1917年3月尝试过完全并立即地掌握权力，但工人阶级在农民军队的支持下，于1917年10月把权力夺过来了。这样一来，我们**迟滞**的历史发展在欧洲帝国主义血气方刚的条件下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当我们的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到足以把沙皇专制推下神坛的时候，无产阶级就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力量了。

但是对我们来说算中心议题的问题，对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来说并不存在。他在对维珀的书评（同一期《红色处女地》）中写道：

“把16世纪的莫斯科罗斯置于当时欧洲总体关系的背景下进行描绘，是一项极度诱人的任务。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能够驳斥至今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圈子里都盛行的，关于俄罗斯专制统治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之所谓‘原始性’的偏见。”再如：“把这一专制在其真正的历史联系下作为商业—资本主义欧洲的一个方面表现出来……这项任务不仅对历史学家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对于读者大众来说也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意义的；没有比这更激进的手段来终结俄国历史进程之‘独特性’的传说了。”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是在挖苦我们！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直言不讳地否认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原始性和落后性，并把俄国历史进程的独特性归为一种“传说”。全部问题在于，波克罗夫斯基同志正如罗日科夫一样，完全地被他们“俄国在十六世纪的贸易发展相对广泛”的发现给催眠了。很难理解，为什么波克罗夫斯基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很多人可能都以为，贸易是经济生活的基础，也是它无懈可击的衡量标准。德国经济学家卡尔·毕歇尔^[4]在20年前试

[4] 卡尔·威廉·毕歇尔（Karl Wilhelm Bücher，1847年2月16日—1930年11月

图将贸易（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渠道）视为整体经济发展的标准。司徒卢威当然就急于把这一“发现”移植到俄国经济“科学”之中。毕歇尔的理论，受到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应当的反驳。我们是在生产中找经济发展的标准，即技术和社会劳动体制，而把产品从生产者送到消费者手中的渠道，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次要现象，而其根源同样应该在生产中寻找。

尽管从毕歇尔—司徒卢威标准的角度来看可能是荒谬的，但16世纪俄罗斯贸易规模的（至少在空间意义上）激增，恰恰是由于俄罗斯经济极端的原始性和落后性。西欧城市是手工业行会和贸易公会的城市。相比之下，我们的城市首先是行政—军事的城市，这也就是说，它是消费中心而非生产中心。西方的手工业行会生活是在一个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形成的，当时加工业的所有基本过程都已经脱胎于农业，并转变为独立的行当，形成了自己的组织，自己的中心——城镇，自己最初、有限（区域性）但稳定的市场。因此，中世纪的城镇是建立在经济分化程度相对更高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分化则产生了合乎规则的中心（城镇）与其农村—地方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我国经济的落后性首先就表现在手工业未能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是保留了家庭工匠手工业的形式。在这一点上，我们比欧洲更接近印度，正如我们的中世纪城镇比欧洲更接近亚洲，而我们的专制制度则介于欧洲的绝对主义和亚洲的独裁制度之间，有许多特点接近于后者一样。

鉴于我国地广人稀（这一落后标准足够客观了吧？），产品交换给商业资本的中间角色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这种空间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西方比我们具有更高的发展水平，有自己各种各样的复杂需求，给我们送来了自己的商人和自己的商品，并以此，在

12日），德国经济学家，欧洲新闻学奠基人。——中译者注

俄国极其原始的、在许多方面是野蛮的经济基础上，推动了我国的商品交换向前发展。看不到我们历史发展的这一最大特点，就意味着没有看到我们的整个历史。

我的西伯利亚雇主（在他那里，我在账本上记了两个多月的“普特”和“俄尺”），亚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切尔尼赫，凭借着其贸易业务，实际上近乎无限地控制了基廉斯克县的经济生活——这是在二十世纪初，而不是在十六世纪！亚科夫·安德烈耶维奇在通古斯人那里收购毛皮，在偏远地区的牧师那里收购教堂土地，从伊尔比特和下城省运来棉花，而主要供应的则是伏特加（在这个时期的伊尔库茨克省还没有实行伏特加垄断）。他目不识丁，可却是个百万富翁（按当时的价值计算，而不是现在的）。他作为贸易资本的代表进行的独裁是不容争辩的：他甚至还用上了“我的小通古斯民”这样的词。基廉斯克市，就像韦尔霍连斯克、下伊利姆斯克一样，是不同级别的县警、互相依赖的富农、各种芝麻官和数量可怜的个体手工业者居住的地方。我从未见过那里有过任何作为城市经济生活基础的有组织的手工业，没看到行会，没看到行会庆祝活动，也没看到过公会，尽管亚科夫·安德烈耶维奇被正式列为“第二公会”的成员。说真的，这个真实的西伯利亚生活片段，比波克罗夫斯基在这个问题上说过的话更能够让我们理解俄国发展的特殊性。这确实是事实。亚科夫·安德烈耶维奇的贸易活动，从勒拿河中游及其东部支流一直延伸到下新城，甚至到莫斯科。很少有欧洲大陆的公司能够在自己的贸易地图上标出如此的距离。然而，这位贸易独裁者，或者用恰尔东人的称呼来说，“十字国王”，是我国经济落后、野蛮、原始、人口稀少、农民村落零散、春秋两季在各县，乡，村庄之间两月无法通行的泥泞土路、普遍文盲等现象最完美、最有说服力的表现。切尔尼赫是如何在这种西伯利亚

（勒拿河中游）的野蛮基础上获得如此强大的贸易实力的？是因为西方和“露西娅”（Рассея）^[5]还有“莫斯科”正在把西伯利亚拖向一场奇怪的联姻——一场原始的游牧经济与华沙制造的闹钟进行的联姻。

二

行会式的手工业给中世纪城市文化打下了基础，并传播到农村。中世纪的科学、经院哲学、宗教改革都是在这种手工业一行会式的根基上成长起来的。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东西。当然，我们这里还是有萌芽、征兆、迹象的，本来西方存在的也不是迹象，而是在手工业一行会基础上的有力形式。在这个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是中世纪欧洲城镇，它与教会和封建领主斗争，而君主就借此挑战封建领主。正是这个城镇，通过制造火枪，为常备军提供了前提。是否可以说（这也许与国家的阶级理论相矛盾？），随着城镇的发展及其与封建领主的对立加剧，西欧的君主变得越来越独立于第一等级了呢？归根结底，皇室政权当然还是继续压迫着劳动群众，首当其冲的就是农奴。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地主合流的国家政权，同与他们脱离关系，建立自己的官僚机器并以此获得了空前的国家权力，还是有区别的；换句话说，前者在同那种保卫剥削者权力而反对剥削着的同时，成为（就像皇权、官僚、常备军那样）同其他主导力量并列的独立（当然，不是绝对而是相对的）力量，并为之首要的那种力量，还是有区别的。

哪怕有与西欧的城镇有一点相似的俄国手工业一行会城镇在哪里？它们同封建主的斗争在哪里？难道这种斗争在我们这里，为俄国专制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吗？由于我们城镇的性质，我们没

[5] 即俄罗斯的某种民间称呼，如今连俄罗斯人也无法解释其来源。这里采用和式汉字拼法。——中译者注

有发生过这样的斗争，同时也没有发生过宗教改革。这是不是独特性呢？我们的手工业仍然停留在家庭工匠手工业阶段，也就是说，它们从未跟农民农业脱离过关系。我们的宗教改革，没有城镇的领导，仍然停留在农村教派的阶段。原始性与落后性在这里哭天抢地，但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却装瞎。而沙皇专制也是作为一个独立（同样，这里只是相对的，保持在活生生的历史力量斗争范围内，而这种历史力量则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国家组织出现的，不是由于强大的城镇和强大的封建主进行斗争，而是由于我们城镇的工业普遍营养不良，以及我们封建主的营养不良。

波兰就其社会结构而言，介于俄国和西方之间，就像俄罗斯介于亚洲和欧洲之间一样。波兰城镇比俄国城镇更熟悉行会手工业。但它们的发展还不足以帮助皇权折断封建主的双翅。贵族仍然直接掌控国家政权，导致了国家软弱无力，直至灭亡。在没有“独特性”的地方，就没有历史，而只有某种伪唯物主义的几何学。不去研究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经济发展这一物质，而只是注意到一些东西外在的迹象，并把它套进现成的公式里……这种原始的调查方法足以对抗自由派和民粹派的偏见，甚至更不用说斯拉夫主义了（“在祖国母亲那块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存在”），但是它却完全不足以理解俄国历史发展的真正路径。

上述的关于沙皇专制的内容，同样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因此我很难理解波克罗夫斯基同志为什么只对着谈到沙皇专制的那第一章发泄怨气。俄国资本主义没有经历手工业、制造车间和工厂三阶段，这是因为欧洲资本，首先贸易资本，然后是金融和工业资本，在大多数俄国手工业还没有脱胎于农业的时候，就被注入了这个国家。因此，在俄国，新型资本主义工业出现在一个完全原始的经济环境之中。比方说，一个比利时或者美国工厂，周围

全是土路以及用稻草和木头建造的村庄，而这些村庄每年都会被烧毁……这就是最原始的一端和最新、最欧洲的另一端。因此，西欧资本在俄国经济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因此，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软弱无力。因此，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击败俄国资产阶级。因此，当欧洲资产阶级介入我们的事业，包括前工业主试图通过劳合一乔治、巴尔杜等人与我们在热亚那和海牙谈判的时候，困难也就接踵而来。

而我们的无产阶级呢？它上过中世纪学徒兄弟会的学校吗？具备行会的古老传统吗？答案都是完全否定的。他们被直接从耕地上扯了下来，被扔进了工厂的熔炉。我记得有位老兄，柯罗特科夫，一位来自尼古拉耶夫的家具工，在 1897 年写了一首《无产阶级进行曲》，开头是这样起的：“我们是阿尔法（ α ）和欧米伽（ ω ），我们是起点和终点……”正是如此！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都在那里，而中间的字母却不见踪影。因此，这里没有保守的传统，没有无产阶级内部的种姓，有的是革命的新鲜感。这些以及其他各种原因，造就了十月，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政府。但也因此出现了文盲，出现了落后性，缺乏组织经验，缺乏系统化的工作，缺乏文化和技术教育。我们在经济文化建设中的每一步都感受到了所有这些不足。

欧洲的共产主义必须克服一个不可比拟的保守环境——有国外的，有国内的，也有无产阶级内部的环境；但它一旦取得胜利，就将拥有无限强大的主客观资源来建设一个新社会。这不是一种独特性呢？在 1922 年夏天还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这的确是相当“独特”了。但这无疑也是我们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第一次掌握权力，肩负巨大的任务，缺乏文化力量，每个人都得以一当百地做事，无暇思考。这也就是为什么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在讨论新

的、高度复杂的问题时，会提出一些旧的论点——这些论点在别的背景和别的逻辑层面上是有价值的，但一旦被赋予了绝对正确的公式性质，就跑到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去了。

我已经指出过，我们的整个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以下环境的影响：我们不断地在西部边境与那些比我们更发达、更有组织、在武器技术上更好的国家产生冲突。落后社会更直接、更有力地受到那些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武装起来的敌邻的考验。在这种压力下，专制国家进行了自我重组，首先建立了射击团，然后建立了骑兵和步兵。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在这方面指出：“在这里，我们似乎应该说，根本利益不是军事的，也就是说不是政治的，而是经济的——莫斯科专制制度在迎合某个阶级的阶级利益。”在这里把军事和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对立起来是什么意思？很难理解。国家在维护其经济利益的时候，总是具有政治目标和任务的性质。而当它们必须通过非外交手段而是武力手段得到维护的时候，这项任务就具备了军事性质。

波克罗夫斯基同志试图证明，在16世纪主导专制制度的政策的利益，是贸易资本的利益。在我看来，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对这一问题的叙述滑稽可笑。但我们希望在别的场合再讨论这一更狭隘、更专业的问题。这里只需指出，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在构建十六世纪的贸易资本主义的俄国时，犯了德国教授爱德华·迈耶^[6]的错误——他在古代社会里发现了资本主义。迈耶无疑正确地注意到了一点，即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把希腊和罗马的经济结构看成是一系列自成一体的自然经济细胞（Oikos）的观点（洛贝尔图斯^[7]等人的

[6] 爱德华·迈耶（Eduard Meyer，1855年1月25日—1930年8月31日），德国古代史学家。——中译者注

[7] 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Johann Karl Rodbertus，1805年8月12日—1875年12月6日），德国经济学家。——中译者注

观点), 在模式上过于简化了。爱德华·迈耶表明, 这些基本细胞通过相当发达的商品交换相互联系, 同样也与其他国家联系。同时, 在某些领域和部门, 也存在大规模生产。迈耶利用现代经济关系和概念, 回溯性地构建了古希腊—古罗马的资本主义。他的错误在于没有意识到各种类型的经济(Oikos, 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量的差异, 更别说质的差异了。我们重申, 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基本上重蹈了他的覆辙。但现在的问题不在这儿。让我们假定, 贸易资本的利益在十六世纪专制的政策中确实占据主导地位, 而专制制度本身就是“贸易资本专政”。那么也就是说, 为了商业目的, 同样也是为了回应特定阶级的经济利益, 专制跟波斯、土耳其、波罗的海国家、波兰, 以及更遥远的西方国家产生了冲突。这一冲突接受了军事性质。谁打谁, 在这里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波克罗夫斯基同志认为我断定专制只是为了“保卫”俄国不受境外攻击, 这毫无道理)。正是在这些**军事**冲突之中(这当然意味着产生了源自**经济利益的政治**任务), 俄罗斯国家与建立在更发达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上的西方民族军事组织产生了碰撞。因此, 俄国资本在诞生后就立即与西方更发达、更强大的资本产生了碰撞, 并落入了对方的支配之下。因此, 俄国工人阶级一诞生就发现自己已经配备了由西欧无产阶级的经验制造的现成武器: 马克思主义理论、职业工会、政党。任何只用**俄国**有产阶级的利益来解释我国专制制度的性质和政策的人, 都忘记了除了更落后、更贫穷、更无知的俄国剥削者以外, 还存在着更富有、更强大的欧洲剥削者。俄国有产阶级与敌对或半敌对的欧洲有产阶级发生了冲突。这些冲突都是通过国家组织的中介实现的。这一组织就是专制。如果没有欧洲的城镇、欧洲的火药(毕竟不是我们发明的)、欧洲的证券交易所, 俄国专制制度的整个结构和历史都会有所不同。在其存

在的最后时期，专制不仅是俄国有产阶级的机关，同时也是欧洲证券交易所赖以剥削俄国的组织。这一双重角色又使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这一独立性的鲜明例子，就是法国证券交易所在1905年为了支持俄国专制制度，违背了俄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意志向专制提供了贷款。

在现实中，有这样一个小小的事实，可以完全推翻波克罗夫斯基同志的历史概念。这一事实，就是上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以及沙皇专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从波克罗夫斯基同志的角度来看，一切都很简单：沙皇专制，是进入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统治国家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沙皇专制与法国的共和议会制、英国的帝国议会制等等也没有什么不同。这点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问题最普遍的处理范围内——在与社会爱国主义以及和平主义偏见作斗争时，以及防御与攻击的标准等范围内，这点是正确的。但是在评估俄国、英国、德国等每个国家在战争中的各自角色时，在评估每个国家在战争中经历的内部变化时，在评估每个国家面前展开的革命前景时，在评估我们因此应该采取的策略时，这样提显然是不够的（也因此**不正确**）。

别看沙皇专制已经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就暴露了自己的破产，但资产阶级还是因为害怕无产阶级而和它握手言和了。沙皇专制的独立性在其最放肆的时候，如拉斯普京时代，也绝不违背国家的阶级理论，而是可以被它解释。但正是这一理论，不应当被机械地运用，而应该是辩证地运用。但这还不够：沙皇专制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被粉碎了。为什么？因为它的生产基础太薄弱了（“原始性”）。在军事技术方面，沙皇专制试图向最先进的样板看齐。在这一点上，它得到了来自更富有且更开明的盟友的各方面帮助。也多亏于此，沙皇专制拥有了最为完善的战争工具。但它没有，

也不可能有复制这些工具的手段，也没有铁路或水路能以足够快的速度运输这些工具（以及大量的人力）。换句话说，沙皇专制在国际冲突中维护俄国有产者利益时，是在比其敌人或盟友更原始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的。

在战争期间，沙皇专制无情地剥削了这一基础，也就是说，它吸收的国民财富和国民收入，比它强大的敌人和盟友要高得多。战时的债务系统和俄国的彻底破产，分别从不同方面佐证了这一事实。还是说，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对这些事实有所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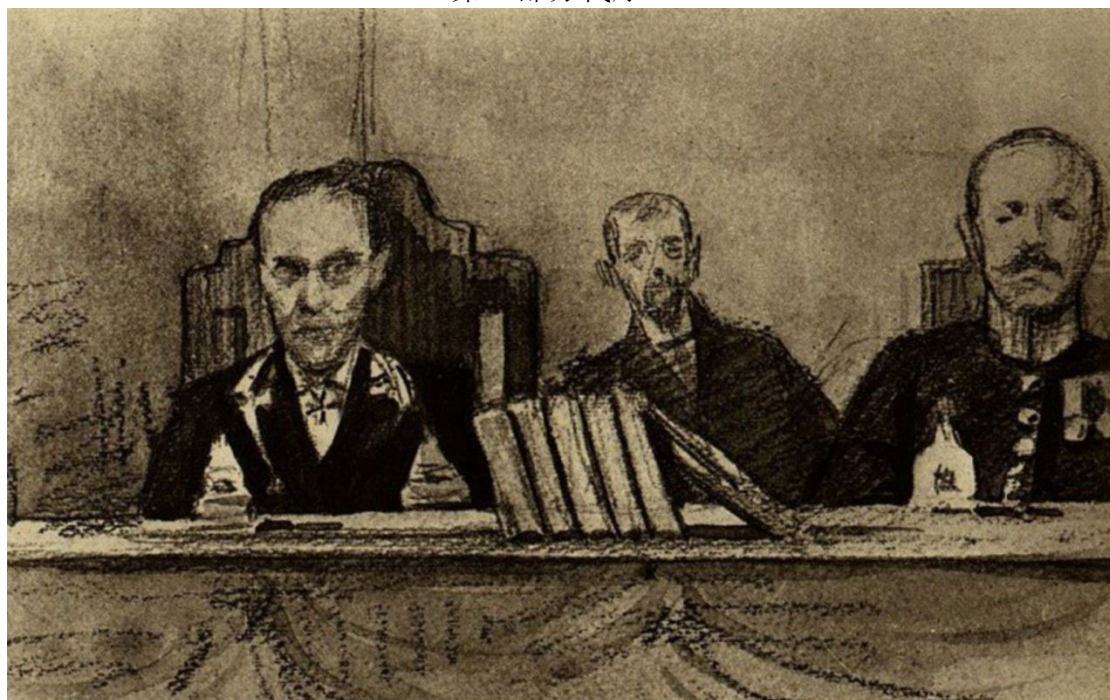
所有这些情形，都直接注定了十月革命以及无产阶级的胜利，及其接踵而来的困境。这些情形完全不能用波克罗夫斯基同志的老生常谈来解释，他说，不存在超阶级的国家，说剥削阶级通过国家政权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在这里才只说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就想让我们和他一样不继续把“克思主义”说出来了。^[8]

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在拒绝了我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后，并没有为无产阶级得出拒斥（后知后觉？）阶级斗争结论，而是说他们应该夺取国家政权并为把它抓稳而斗争。但也正是这些独特性，在夺取政权后，引起了巨大的国际及国内一经济（Внутренне-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困难。对这些独特性的理解是新一代无产阶级在困难面前不被动、不怀疑的最好保险。同时，关于历史发展的陈词滥调对任何人都没有教益。

1922年6月28日

[8] 原文直译为“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在这里才只说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字母，就想让我们和他一样不继续说完这个词”。——中译者注

《1905》 第二部分



（法庭。前排左起第一位为法庭代表枢密官克拉申宁尼科夫；第二位为贵族代表古杜维奇伯爵^[1]）

第二部分代序

在斯德哥尔摩社会民主党代会上，一些有趣的统计数据被公布了出来，这些数据说明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条件：

参与大会的一百四十名代表，总共在监狱里度过了一百三十八年零三个半月；

在流放地里度过了一百四十八年零六个半月；

十八人逃过一次狱，四人逃过两次；

二十三人从流放地逃过一次，五人逃过两次，一人逃过三次。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百四十名代表在社会民主主义活动中总共度过了九百四十二年，那么我们就发现，在监狱及流亡中度过

[1]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古杜维奇（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удович，1866年12月13日—1945年5月12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88—1899年期间服役于俄军。1903—1908年任圣彼得堡省贵族领袖。1905年参与创立十月党，并当选为十月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兼彼得堡市议会十月党党团主席。1905—1908年任俄罗斯汽车协会主席。1908年起任国务委员。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中译者注

的时间约占工作参与时间的三分之一。但是，这一数字（九百四十二年）实际上太过乐观了，因为这只意味着这些代表的政治活动只是在这样长的时间段里进行的，完全不意味着这九百四十二年都被政治工作彻底填满。更有可能的是，在地下条件下，**直接的、实际的政治活动**只占去了这段时间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一。与此相反的是，流放地和监狱的在留时间与数字所示完全一致：代表在监狱中度过了五万个日日夜夜，在国内偏远、野蛮地区度过的时间就更久了。

也许，我们可以补充一些来自个人过往的统计数据。这几句话的作者在尼古拉耶夫镇的工人圈子里活动了十个月后，于1898年1月第一次被捕，在监狱里待了两年半，然后，在服完四年流放总刑期中的两年后，逃出西伯利亚。作者第二次是在1905年12月3日，身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员被捕的。苏维埃的活动持续了七个星期。那些因参与苏维埃活动而被判刑的人在监狱里坐了五十七个星期的牢，之后被送到鄂比多尔斯克“永久定居”……每个具有十年左右党龄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能够提供或多或少关于自己的类似信息。

《歌达年鉴》带着法学家迂腐习气式的无意识幽默，将十月十七日以后踩在我们头顶上的那个乱成一锅粥的国家，称作为“**专制沙皇下的君主立宪制**”，丝毫没有改变我们的地位。我们获得了五十天的自由，而我们也充分享受了这些自由。在这些尤其美好的日子里，沙皇专制意识到了我们早就意识到的事情：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然后就是可怕的报复之月。十月十七日以后，沙皇专制用杜马代替了杜马，就像蟒蛇蜕了皮，但无论它碰巧穿上了什么样的皮，也改变不了作为大蟒蛇的本性……那些在过去两年里经常呼吁我们立足于法律之上的老实人和自由派伪君子，就像是玛丽·安

托瓦内特对饥饿的农民说“何不食蛋糕”。有啥了不起，我们对蛋糕有一种生理上的反感。有啥了不起，我们的肺贪得无厌地渴望着呼吸彼得保罗要塞单人牢房里的空气！有啥了不起，我们不能也不想把狱卒从我们的日子里没收的无尽时间用在别处。

我们迷恋地下工作，就像落水人迷恋海底一样。但是，直说吧，我们别无他路，专制主义也一样。我们对这点的清楚认识允许我们保持乐观，即便地下状态无情地勒紧我们的喉咙也一样。它绞杀不了我们，而我们很确信这一点。我们将在所有人中生存下来。当现在的土地亲王、他的仆人和他仆人之仆人的事业尸骨成灰时，当没有人能够为现今的政党和其活动找到安葬之地时——到那时，我们为之服务的事业将会获得整个世界，到那时，我们的党，今天在地下挣扎喘息的党，就会溶解在人类之中，而这人类将在历史上第一次掌握自己的命运。

整个历史就是一台为我们的理想服务的巨大机器。它以野蛮的缓慢和麻木。不仁的残酷在运作着，但它确在运作着。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但是，当它的胃口吞噬了我们的心中之血作为燃料时，我们还是要用竭尽全力向其呼喊：

“要做，便快一点！”

奥格里比（赫尔辛福斯^[2]附近）

1907年4月8（21）日

[2] “赫尔辛福斯”是瑞典语“Helsingfors”的音译，即赫尔辛基（Helsinki）。——一中译者注

第一章 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诉讼程序

12月3日，随着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被捕，反革命阴谋的时代开始了。彼得堡的十二月罢工和全国各地的十二月起义是革命为保存它在10月夺得的战利品而作出的英勇努力。这个时候，工人群众的领导权转移到第二届苏维埃那里去了，而它则是由第一届苏维埃的残余人员和新选出的代表组成的。第一届苏维埃的将近300名成员被分别关押在彼得堡的三个监狱里。他们未来的命运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未知数，这点，不仅对他们来说如此，对执政官僚来说也是如此。消息灵通的报刊肯定地说，司法大臣坚决地驳斥了为审判工人代表诉诸法庭的可能性。如果他们那些完全公开的行动算得上是犯罪的话，那么在司法大臣看来，那些不仅纵容苏维埃，还与他们建立起了直接联系的高级行政人员也完全是犯了罪。大臣互相拌嘴，宪兵进行审讯，代表坐在自己的单人牢房里。在12月和1月的围剿中，人们有理由认为，苏维埃会被军事法庭的绞刑架终结。四月底，在第一届杜马初期，工人代表和全国人民一样，在等待着大赦的到来。因此，苏维埃成员的命运在死刑与无罪释放之间摇摆不定。

最后，这一摇摆遇到了自己的反作用力。杜马，或者更确切地说，反杜马的戈列梅金^[1]内阁把苏维埃的案子交给最高法院同各级

[1] 伊万·洛吉诺维奇·戈列梅金（Иван Логгинович Горемыкин，1839年10月27日—1917年12月11日），出身于小贵族家庭。1860—1866年任波兰王国农民事务委员。1866—1869年任普洛克州副州长。1869—1873年任凯尔采州副州长。1873年起在内务部工作。1882年起在参议院工作。1894年起担任参议员。1895—1899年任内务大臣。1899年起担任国务院议员。1906年4—7月、1914—1916年任大臣会议主席。1910—1914年任国务卿。二月革命后被捕，后因年龄原因获释。1917年12月11日在土匪抢劫中被杀死。——中译者注

代表^[2]一起进行审查。苏维埃案件的起诉书是一个宪兵式检察官粗制滥造的渣滓玩意，作为那个伟大时代的文件，是很有趣的。它脸上反映了革命，就像警察局院子里的一滩脏水反射了阳光一样。苏维埃成员被指控为武装起义做准备，指控的依据有两条，其中一条最高刑期为8年，另一条则为12年。笔者在一篇短文^[3]中分析过这一指控的法律依据——或者说，这一指控的绝对不成立性。这篇文章从预审羁押所发出，被寄到了第一届杜马里的社会民主党党团，以期在上面提出关于苏维埃审判的质问。质问未能被提出，因为第一届杜马被解散了，而社会民主党党团发现自己也受到了指控。

审判曾被定在6月20日以公开方式举行。抗议集会的浪潮席卷了彼得堡的所有工厂和车间。如果检方试图把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说成是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群众的一群阴谋家的话；如果自由派在12月的事件后日复一日地发表陈词滥调，苏维埃“幼稚的革命方法”在群众眼中早已失去光彩，而他们只想在新的“宪政”法律下过日子的话，那么，彼得堡工人的六月集会和决议就是对这些警察与自由派的诽谤和愚蠢的最佳驳斥。这些工人在自己的工

[2] 这里面有七个人：四个皇家法官；彼得堡县贵族代表右派十月党人古杜维奇伯爵；彼得堡杜马代表特洛伊尼茨基，一个因贪污而被解雇的前总督，黑色百人团成员；最后是彼得堡省一个乡的代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一个“进步主义者”。——原注

[中译者补注 1]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特洛伊尼茨基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ройницкий, 1847年9月12日—1919年10月21日)，出身于世袭贵族家庭。1868年进入俄罗斯帝国内务部工作。1876—1888年任辛比尔斯克副省长。1886年起任国务委员。1886—1892年任托博尔斯克总督。1898—1917年任彼得堡市杜马议员。1900—1910年任彼得堡市政府委员。1903—1917年任公共教育大臣会议委员。1906—1917年任枢密院议员。1919年死于彼得格勒。

[3] 请看接下来一章《苏维埃与检察机关》——原注

厂里高呼与监狱中代表的团结，要求自己作为革命事件的积极参与者接受审判，声明苏维埃只是他们意志的执行者，并发誓要把苏维埃的工作进行到底！

法院的院子和临近的街道被转变成一个军营。彼得堡的所有警察力量都被动员起来了。尽管有这样庞大的准备工作，审判还是没有进行。最高法院院长用一些正式的借口，不顾控方与辩方的意愿，甚至如后来知道的那样违背了内阁的意志，将听证会延迟了三个月后——也就是9月19日。这是一个微妙的政治举措。在六月底，形势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立宪民主党内阁出现的可能性就和专制主义的恢复可能性一样高。然而，苏维埃的审判要求院长在高度政治确定性的情况下才能开庭。因此，这位先生别无选择，只能多给历史三个月的思考时间。唉，可惜的是，没过几天，这位圆滑的法官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岗位了！大方向的定夺完全归于彼得宫城的狼巢虎穴，而那里提出了“坚决并无情”的要求。

审判于9月19日开始，持续了一个月；这是第一届杜马最尖锐的时期，是战地军事法庭的蜜月期。然而，尽管如此，法庭对许多（如果不是所有）问题进行的审查都是以一种自由的方式进行的；但如果我们能在其背后窥见官僚运作的阴谋诡计的话，那这一自由就完全无法被理解了。很显然，这就是斯托雷平内阁抵御维特伯爵攻击的方式。这一算计是完全正确的：审判揭示得越多，就能越生动地再现政府在1905年底的屈辱形象。维特的纵容，维特的两面阴谋，维特对彼得宫城的虚假保证，维特在革命面前笨拙的阿谀奉承——所有这些就是高层官僚利益集团想要从苏维埃的审判中提取的东西。被告能做的只有利用有利的形势达到政治目的，并最大限度地扩大审判框架罢了。

被传唤的证人近 400 人，其中有超过 200 人出庭作证^[4]。工人、工厂主、宪兵、工程师、佣人、普通人、记者、邮政电报官员、警察局长、中学生、杜马代表、贵族、参议院、流氓、工人代表、教授和士兵在这整个月里，就像阅兵一样，在法庭面前，在检察官、辩护人和被告人（特别是被告人）提问的交锋下，坐在法庭的长椅上，一行一行、一笔一笔地重现了工人苏维埃活动时代一系列事件的丰富画面。

在法庭前，经过的是全俄十月大罢工，埋葬了布雷金的杜马；接下来通过的方阵是十一月彼得堡罢工示威，这是无产阶级对欺压在喀琅施塔得水手头上的战地军事法庭和对波兰受到的暴行进行的崇高而雄伟的抗议；紧随其后的，是彼得堡工人为八小时工作制进行的英勇斗争；最后入场的，则是长期受苦的邮政—电报奴隶在苏维埃领导下进行的起义。在法庭上首次公开的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向全国揭示了无产阶级代表机构在组织援助失业者、解决劳资冲突，以及领导不断进行的经济罢工方面完成的巨量日常工作。

这场审判的速记记录可以写满好几卷书，但它们至今未能得到出版。只有俄国的政治条件发生了变化，这些宝贵的历史文件才能重见天日。如果一位德国法官和一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审判期间进行了旁听，那么他们会同样地感到震惊。夸张的严格和完全的任性在这里缝合成了一个怪异的整体，都从不同方面说明了一点：十月罢工的遗产在政府领域里仍旧存在着异常混乱的局面。法院大楼处于戒严状态，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军营。在相邻的街道上，在院子里，在大门口，有着几连几连的士兵和哥萨克。沿着连接监狱和法庭的地下走廊，在法院大楼的每个房间里，在被告的背

[4] 许多的证人在审判期间要不是下落不明，就是在西伯利亚。——原注

后，在所有的角落里——甚至可能在烟囱里，都站满了拔出马刀的宪兵。他们的目的是在被告和外界（包括近 100—120 人的听众）之间形成一道人墙。但是，三四十件律师燕尾服不断地刺穿这堵蓝色的墙。报纸、信件、糖果和鲜花不断出现在被告席上。无穷无尽的鲜花！纽扣孔上有花，手上有花，腿上有花，最后，连长椅上都有花。院长不敢破坏这芬芳扑鼻的混乱。最后，甚至连宪兵队的军官和法院的官员都沉浸在了这一普遍“扰乱军心”的气氛中，开始向被告传递鲜花。



（长椅上的辩护人）

然后就是工人证人！他们成群聚集在证人室里，而当法院官员打开法庭的门时，革命歌声的回响就会传到厅长的座位上。这些工人证人给人们留下了多么独特的印象啊！他们带来了郊区工厂的革命气氛，无视法庭仪式的神秘庄严，这一神圣的藐视，以至于脸黄的像羊皮纸似的厅长只能无奈的摊开双手，而来自“体面”社会的证人和自由派记者则报以羡慕和尊重的目光，就像弱者看像强者时用的目光那样。

审判的第一天就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在 52 名被告中，庭长只点到了 51 人的名字。他跳过了特尔—姆克尔赤坚茨的名字

(Тэр-Мкрчтянца)。

“被告特尔—姆克尔赤坚茨在哪里？”辩护律师索科洛夫问道。

“他的名字已经从被告名单上被剔掉了。”

“为什么？”

“他……他……已经被处决了。”

是的，在6月20号至9月19号的等待期间，被保释的特尔—姆克尔赤坚茨在喀琅施塔得要塞的墙边被处决，因为他是军事起义的参与者。

被告人、证人、辩护人、听众——全部都起立默哀，以纪念死去的受害者。警察与宪兵军官在完全混乱的状态下，同其他人一道起立。

证人被分成二三十人的小组带进来宣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还穿着工服，没来得及洗手，拿着帽子。他们稍微瞥了法官一眼，然后寻找被告，充满活力地打量了两侧我们的长椅，然后大声喊道：“你们好，同志们！”仿佛他们是来向执行委员会了解会议进展的。审判长急忙点名，请证人宣誓。一位老牧师站在一个可移动的祭坛上，摊开了他的全部行当。但证人并没有动身。审判长重复了他的要求。

“不，我们不宣誓！”几个嗓门齐声开口，“我们不信这玩意。”

“但你们不是东正教徒吗？”

“警察的名单上是那么写的，但我们完全不信这玩意……”

“既然如此，神父，您可以走了，今天不需要您的服务。”

除了警官以外，只有路德宗的工人和天主教工人接受了在东正教神父处宣誓。那些“东正教”工人都拒绝宣誓，而只是承诺自

己会说实话。

每一批人都在重复着这个过程。只不过，有时如果证人成分有所变化，也会带来新的、意想不到的因素。

庭长对下一批证人说道：“宣誓的人走到牧师那去。不宣誓的人，请站在后面！”

一位个子不高的宪兵老头子从人群中走出来，似乎是在某个工厂任职的，潇洒地走向了便携式祭坛。工人们交头接耳，用靴子敲打着后退了几步。在他们和老宪兵一旁的，还有一位证人 O。他是彼得堡的著名律师、房东、自由派和杜马成员。

“您要宣誓吗，证人 O？”庭长对他说道。

“我……我……自行……宣誓……”

“那您就走到神父面前去。”

证人犹豫不决，面部扭曲，向便携式祭坛走去。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没有任何人。在他面前站着的则是一位穿着宪兵制服的小老头。

“举手宣誓！”

老宪兵高高地举起三个手指，越过头顶。律师 O 刚稍微把手举起来，环顾四周，就又放下来了。

庭长带着恼怒的声音问道：“证人 O，您到底还宣不宣誓？”

“为什么不呢？我当然宣誓。”

这位自由派证人振作了起来，把手举得几乎跟宪兵一样高。他和宪兵一起跟着神父重复了那句幼稚的宣誓词。这幅画如果是画家画出来，那么看上去会多么不自然！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这个法庭小插曲的深刻社会象征意义。工人证人与被告交换了讽刺的目光，而那些来自“体面”社会的人士都发窘地互使眼色，庭长狡诈的脸上公开地幸灾乐祸。法庭上充斥着紧张的沉默。



（审判工人代表苏维埃期间的警官证人）

有一次是对蒂森豪森伯爵，也就是对彼得堡杜马议员进行了询问。他出席了苏维埃代表提出过要求的那场杜马会议。

一位辩护律师问道，“那么，证人先生，您对建立武装城市民兵的要求曾抱过什么态度？”

伯爵回答：“我认为这个问题和案件无关。”

庭长裁定道：“在我进行审查的框架内，律师的问题是合法的。”

“那这样的话，我就应该说，我当时对武装民兵的想法同情过，但从那时起，我已经完全改变了主意……”

哦，过去的一年里，他们之中有多少人在这个问题和许多其他问题上，改变了主意啊！自由派报刊在表达他们对被告个人的“完全同情”的同时，却找不到足够有力的话来否定他们的策略。激进派报纸带着遗憾的笑容谈到了苏维埃的“幻想”。只有工人毫无保留地保持了忠诚。

许多工厂通过被传唤的证人向法庭提交了他们的集体声明书。

被告人坚持认为，这些声明书应该附在卷宗上，并在应该在开庭期间宣读。

一份随机选取的这种声明书中写道：“我们，在下面签了名的奥布霍夫工厂工人，确信政府打算把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审判变成对正义的嘲弄，并对政府打算把苏维埃说成是一小撮追求与工人阶级格格不入的目标的阴谋家而深感震惊。我们，奥布霍夫工厂工人，特此声明，苏维埃绝不是由一小撮阴谋家组成的集团，而是彼得堡全体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我们抗议政府对苏维埃的所作所为，尤其抗议对我们的同志提出的指控，他们只是在苏维埃内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在此向政府宣告，如果我们的同志，我们都尊敬的 P.A.兹利德涅夫有罪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是有罪的，我们用我们的签名作证。”

该决议附着几张纸，上面有 2000 多个签名。这些纸又脏又皱，因为它们在整个工厂的所有车间里传来传去。奥布霍夫的决议绝不是措辞最尖锐的。还有一些庭长拒绝公开发表的决议，因为它们对政府和法院的语气“极其不妥”。

在这些提交到法庭上的决议上，总共有几万人的签名。许多证人在离开法庭后直接落入了警察手中，为他们的证词提供了很好的注解。检察院一心想要找到的阴谋家，被英勇的无名群众完全隐藏起来了。最后，履行可耻职责而又不得不保持外表正确性的检察官，不得不在自己的指控发言中承认两个事实：第一，无产阶级在一定的政治发展水平上，“倾向于”社会主义；第二，在苏维埃活动期间，工人群众的情绪是革命的。

检方还不得不交出另一个重要阵地。“准备武装起义”当然是整个审查的轴心。

“苏维埃有没有呼吁武装起义？”

“事实上，没有。苏维埃做的只是想让大家相信，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证人回答道。

“苏维埃要求召开立宪会议。谁来创建它？”

“人民自己！”

“怎么做到？”

“当然是用武力。友善什么也办不到。”

“那也就是说苏维埃为了起义的确武装了工人？”

“不，那是为了自卫。”

庭长讽刺地耸了耸肩。但最后，证人和被告的证词迫使法庭接受了这一“矛盾”。工人直接出于自卫的目的而武装自己。但它们的武装同时也是为了起义的目的而生的，因为国家政权正是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作者在法庭上正是针对这一点做了发言。^[5]

我们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著名的《罗普奇恩^[6]之信》之后，把审判推到了高潮。

被告和辩护律师说道：

“法官先生们！你们似乎不相信我们的指证，不相信我们说‘国家机关在准备和组织大屠杀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也许证人在这次审判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说服你们？也许你们已经忘记了前内务部副大臣乌鲁索夫亲王在国家杜马上作出的揭发？也许你们已经被宪兵将军伊万诺夫说服了，他在宣誓后告诉你们，说关于

[5] 我们在接下来的第三章里将会根据法庭上的简录重制这篇演讲。——原注

[6]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罗普奇恩（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опухин，1864年？月？日—1928年3月1日），出身于检察官家庭。1902—1905年任俄罗斯帝国警察局代理局长兼国务委员。1905年任爱沙尼亚总督，后因同情革命运动而被解职。1908年参与揭破了安插在社会革命党内的奸细阿泽夫的身份。1909年被捕并被判处5年苦役，后改判流放到米努辛斯克。十月革命后未受冲击。1920年在苏维埃政府同意下移居法国。1928年在巴黎逝世。

大屠杀的说法只是武装群众的借口。也许你们相信证人斯塔特科夫斯基，一个保卫局的官员，在宣誓后说自己在彼得堡没有看到过一则大屠杀的传单。那就请看看这个吧！这是前警察厅长罗普奇恩给内务大臣斯托雷平^[7]的信的认证副本。根据维特伯爵的特别指示而亲自进行的调查中，罗普奇恩指出：斯塔特科夫斯基没有见过的那种传单，正是在斯塔特科夫斯基任职的保卫局印刷厂印刷的；这些传单是由保卫局的密探和君主主义政党成员在全俄罗斯散发的；警察部门和黑色百人团存在着组织上的密切联系；特雷波夫将军在苏维埃时期领导着这个犯罪组织，身为宫廷卫长，权高位重，亲自向沙皇汇报警察的活动，并在所有大臣的控制之外，为自己的屠杀活动的而调度了大量国家资金。

“法官先生们，这还没完呢！有许多的‘黑色百人团’传单——你们的预审调查档案里面是有这些传单的！——指控苏维埃成员侵吞属于工人的钱财。宪兵将军伊万诺夫根据这些传单中的信息在彼得堡的工厂和车间中进行了特别调查，当然，没有任何结果。我们革命者已经习惯了当局的这种方法。但是，即便是我们没有把宪兵队理想化，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部门会走多远。现在我们知道了，那些指控苏维埃侵占工人资金的公告是由伊万诺夫将军所属的那支宪兵部队创作并秘密印刷的。我们也在这一事实上得到了罗普奇恩先生的证明。法官先生们！这是一封由信的作者正式签名副本。我们要求这份宝贵的文件在法庭上被完整地宣读出来。此外，我们还要求传唤现任五品文官——国家顾问罗普奇恩作为证人，在这次审判中作证。

[7] 在戈列梅金内阁，斯托雷平任内务大臣。——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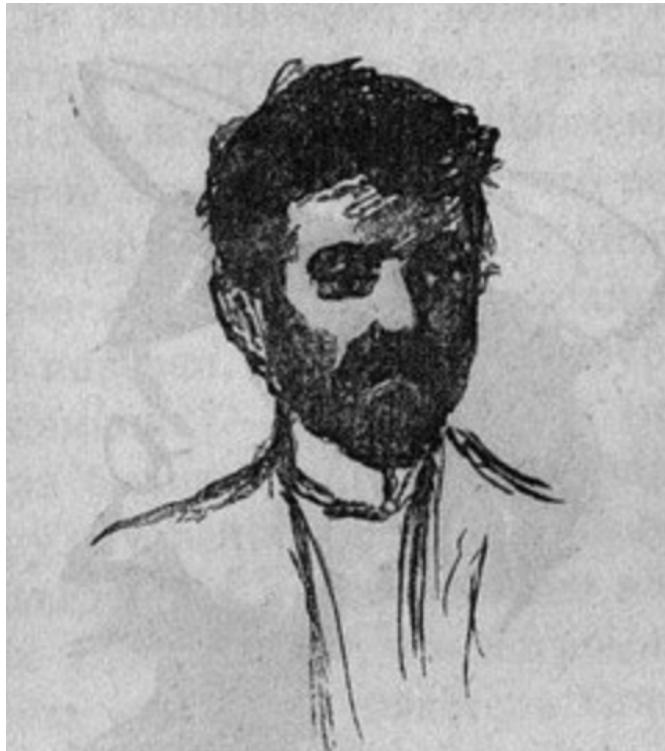


（某位屠杀大师巴拉奇，法庭上的证人）

这一声明不啻于雷击。审判接近尾声。正当庭长开始以为已经渡过了苦海且快要到达一个安静的避风港时，他突然就又被扔进了汹涌的公海。

罗普奇恩的信暗示了特雷波夫提交给沙皇的秘密报告的性质。谁知道这位已经背离了自己作为警察的过去的前警察局长，在被告的盘问下会如何发展这些暗示呢？法庭在神圣的恐惧之中，在进一步揭露的可能性面前退缩了。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庭长决定拒绝这封信，也拒绝传唤罗普奇恩作为证人。

被告人随后声明，他们在法庭上已经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做了，并断然坚持要回到自己的单人牢房里。我们被带离了法庭。我们的辩护律师也同时退场。在被告、辩护人和听众都不在场的情况下，检察官发表了他那干巴巴的、“正确的”指控性发言。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法庭上，法官宣布了自己的判决。苏维埃被认为没有出于叛乱目的而向工人提供武器的罪行。然而，包括笔者在内的 15 名被告都被剥夺了所有政治权利，并被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两人被判处短期监禁，其余的人被无罪释放。



（波格丹·克努尼扬茨·拉丁，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布尔什维克代表）

对代表苏维埃的审判给全国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肯定地说，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彼得堡无产阶级革命议会的这一审判的鼓动作用。

对代表苏维埃的审判因此了一个值得在此提及的事件。

11月2日，也就是判决书以最终形式公布的那一天，《新时代报》刊登了刚从国外回来的维特伯爵就这一审判写的信。在这封信中，伯爵为自己辩护，在右派官僚的攻击下自卫。他不仅拒绝承认自己是俄国革命的罪魁祸首（这一点倒没错），而且还坚决否认自己与苏维埃有过任何私底下的勾结。他充满自信地将证人与被告的指证说成是“为自我辩护而编造的”，显然，他没意料到从监狱的围墙后面会出现回击。但伯爵错了。

以下是我们在11月5日的《同志报》（Товарищ）上发表的被告集体答复：“我们对自己的政治面貌与维特伯爵的政治面貌之间的区别具有非常充分的了解，因此，我们没法向前首相解释那些

迫使我们这些无产阶级的代表在政治活动中的每个阶段都要**讲真话**的原因。但我们认为，在此提及公诉人先生的讲话内容并无不妥。这个专业的指控人，一位在本质上敌视我们的政府的官员，承认了我们的声明和讲话为他进行诉讼（是诉讼，而不是辩护！）提供了需要的所有材料，并称我们在法庭上的证词是真实且充满诚意的。

真实与诚意是维特伯爵的政敌，以至于连他的职业崇拜者都曾未将此类品格赋予他。”

然后，集体回复出示了文件证据，以表明维特伯爵的矢口抵赖是冒失的^[8]，并在最后总结了对彼得堡无产阶级革命议会进行的审判。

我们的信写道：“不管维特伯爵的辟谣行为有什么目的和动机，也不管它看起来多么不严谨，但它都是非常及时的。它是苏维埃在世时面前站着的国家政权之画的最后一笔。我们在这里冒昧地用几句话来讨论一下这幅画。

维特伯爵强调过这样一项事实，即是他把我们交到了正义的审判手中。正如我们在上面说过的，这一历史性壮举的日期是1905年12月3日。此后，我们落入了保卫局之手，然后又被宪兵队转送到了法庭前。

保卫局的两位官员作为证人出现在审判中。对于去年秋天是否有在彼得堡准备过大屠杀的问题，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并说自己没有看到过一张呼吁进行屠杀的传单。然而，活跃的五品文官——前警察署长罗普奇恩却证明，当时正是保卫局印制了那些大屠杀的传单。这就是那维特伯爵把我们交与的“正义审判”

[8] 维特后来不得不承认他与苏维埃有过接触，但他“解释”说，他选择把苏维埃的代表仅仅看作是“工人的代表”。——原注

的第一阶段。

此外，调查过苏维埃案件的宪兵军官也出庭了。根据他们自己的证词，他们对代表涉嫌侵占某些钱财一案的调查是以匿名的黑色百人团传单为根据的，而公诉人则称这些传单为“诽谤和撒谎”。然后呢？五等文官罗普奇恩证明，这些诽谤与撒谎的传单正是在那进行调查的宪兵局印制的。这就是正义审判的第二阶段。

而在十个月后，当我们出现在法庭的时候，后者允许了我们讲出所有在审判开始前就已经知道的东西。但只要我们尝试表明并指出，在苏维埃活动期间，没有任何的当局政权，它最活跃的机关已经变成了反革命团体，不仅藐视成文法，同样也蔑视所有人类道德法则，担任最重要职务的政府人员组成了中心化的全俄屠杀组织，正是工人代表苏维埃实质上执行了民防任务——当我们为了表明并指出所有这些事实，要求把由于我们的审判而被公开的罗普奇恩的信放在卷宗里并传唤罗普奇恩作为证人的时候，法庭无视正义的要求，试图封死我们的嘴。这就是正义审判的第三阶段。

最后，当案件结束、法庭宣布判决时，维特伯爵出场了，试图抹黑自己的政治对手。显然，他以为这些对手最终已经被征服了。维特伯爵就像那些声称自己从未见过大屠杀传单的保卫局官员一样，断言自己从未与工人代表苏维埃打过任何交道。同样的坚决，同样的真实性！

我们冷静地回忆了我们经历的官方审判的这四个阶段。政权的代表剥夺了我们的“一切权利”，并流放我们。但是他们不能剥夺我们获得无产阶级和所有可敬的同胞信任的权利。就像在我们国民生活的其他问题上一样，最后的话将会被人民表达出来。我们满怀信心地向人民的良知发出呼吁。

1906年11月4日

第二章 苏维埃与检察机关

对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审判只是革命与彼得宫城阴谋家政府斗争的一个插曲。本来也没有人，甚至哪怕是检察机关中的警察代表，会相信对苏维埃成员的审判是一种合法合规的行为，会相信审判是以法律当局独立的主动性而开始和进行的，会相信它是在法律的“内在要求”下进行的。所有人都清楚，逮捕苏维埃不是法律行为，而是军事政治行为，是那被人民排斥并侮辱的政权发动的血腥战役的一个瞬间。

我们在此并不讨论为何当局在处理工人代表的时候，选择了一个相对更复杂的方法——让他们在各等级代表参与下在高等法院接受审判。他们本可以在其他方法中找到一些同样有效但更简单的方法。除了采取丰富的行政措施之外，还能诉诸军事法庭，或者甚至使用的确没有写在法律教科书上的那种法庭——但它有过许多成功例子了。在这种法庭上，被告会被要求后退几步，并转过身去。当被告遵守这一程序时，就会有一排步枪齐射来作为判决，不允许上诉，也不允许撤销原判。

不过事实上，政府没有用这种方法来处理被其代理人挑选出来的 52 人，而是组织了一次司法审判。而且这不是单纯地审判 52 个人，而是审判工人代表苏维埃。它因此迫使我们批判它采取的法律立场。

起诉书中写到，列举的 52 人被指控“加入了一个协会……据知，该协会的根本目的是蓄意推翻俄国基本法律规定的体制，并以民主共和国取而代之……”这就是整个起诉书的实质，对应的是刑法第 101、102 条。

因此，起诉书将工人代表苏维埃描述为根据事先确立的政治目标组织起来的革命“协会”，描述这样一种组织：其每个成员通

过加入该组织，赞同一个明确的、事先列出的政治纲领。对苏维埃的这种定义与起诉书本身描述的“该协会”的产生过程有很大矛盾。在第一页中，我们可以读到，未来苏维埃的发起人呼吁“选举工人委员会的代表，以使工人运动具有组织度、统一性和力量”并成为“彼得堡工人需求在其他公众中的代言人”。起诉书还继续写道，“实际上，一些工厂立即就开始了代表的选举。”那在苏维埃草创的过程中，它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压根就没有过。此外，它也不可能有，因为苏维埃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并不是在一群持有相同政治观点的人（就像政党或阴谋组织那样）的基础上成立的，而是作为一个选举代表机构（就像杜马或地方自治会那样）出现的。毫无疑问，从苏维埃的创立条件来看，起诉书列举的人和其他苏维埃成员一样，都没有加入一个据他们所说的旨在蓄意推翻俄国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阴谋组织，而是一个代表机构，其活动方向都是由其成员随后的合作来决定的。

如果苏维埃真的是如刑法第 101、102 条所言的组织，那么它的界限在哪里呢？代表并不是像一个协会的成员一样按自己的意愿加入苏维埃的，而是被推选人派到苏维埃的。此外，选举人团永远也不会被拆散。它一直存在于工厂，而代表的行为对它负责。它也通过自己的代表以最坚决的方式影响苏维埃的活动方向。所有的最为重要的问题——罢工、为八小时工作日进行的斗争、武装工人的倡议都不是从苏维埃产生的，而是来自那些最先进的工厂。工人选举人举行会议，通过决议，代表则把这些决议带到苏维埃。因此，苏维埃的组织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是彼得堡绝大多数工人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基础是选举人团的集合，在某种意义上，苏维埃同这些选举人团的关系就和执行委员会与苏维埃的关系一样。在起诉书的一处，它明确承认了这一点。它写道：“工人

委员会^[1]达到普遍武装的意图……是由**构成工人委员会各个独立组织**的决定与决议表达出来的”；起诉书继续引用了印刷工人会议的**有关决定**。但是，如果按照检方的意见，印刷工人工会“**参与了苏维埃的构成**”（或者更确切地说，参与了苏维埃**组织的构成**）那么很明显，这个工会的每个成员都是“旨在蓄意推翻现有体制”的协会成员。但还不止是印刷工人工会呢，每个工厂的工人，每个车间的工人，通过往苏维埃派代表，从而加入了彼得堡无产阶级的组织。如果检察机关打算按照刑法第 101、102 条的确切含义和精神全面而一致地进行指控的话，那么实际上有不少于二十万名彼得堡工人应该出现在法庭的长凳上。这也是工人自己的观点，他们在 6 月份通过的那些要求接受审判的措辞激烈的决议就是明证。这种要求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示威，同时也是在提醒检方负有的基本法律义务。

但是，法律义务是检方最不感兴趣的东西。它知道当局想要通过制造数十个牺牲者，来为自己的“胜利”画上句号。因此，它通过一系列的互相矛盾和粗暴的诡辩来限制被告的数量。

1. 它无视苏维埃**经过选举**的性质，而坚持将其看作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同盟。

2. 由于苏维埃的人数总数——五六百人实在是塞不下那属于“操纵工人群众的阴谋家”的长椅上，检察机关便人为地把执行委员会分离出来。它故意忽略了执行委员会的选举性质，忽略了其成员的流动性与可变性，并且忽视文件证据，把实际上是由苏维埃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归咎于执行委员会。

3. 在苏维埃的成员中，除了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以外，检方只将那些“积极地，并（？）亲身参与苏维埃”的代表诉诸法庭。这

[1] 苏维埃在早期有时会被如此称呼。——原注

样的选择纯粹是随机的。《刑法》不仅惩处“积极亲身参与”，而且惩处以任何方式参与犯罪组织的行为。参与的**性质**只决定了处罚的**程度**。

但检方的标准在哪里？个人参与“以暴力国家政变为目的”的协会的证明，在检方眼里有哪些呢？检查出入证，参加罢工工人纠察队（Пикет），甚至只是承认自己是苏维埃成员，都算是证明。例如，在对被告克拉辛^[2]、卢卡宁（Луканин）、伊万诺夫和马尔洛托夫（Марлотов）的指控中，检方的根据只有“承认了自己参加苏维埃”，并从这一承认中莫名其妙地推断出他们“积极亲身参与”苏维埃。

4. 如果我们再加上少数因12月3日在苏维埃做客而**完全偶然**被捕的“**异族人**”，考虑到他们和苏维埃没有任何关联，也没有在苏维埃的任何会议上开过口，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检察机关挑选被告的方式是多么的具有随机性。

5. 但这还不是全部。12月3日以后，新成员补充了残余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也被重建，《消息报》继续发行（第8期是在苏维埃被逮捕后的某天出版的），而这个被重建的苏维埃发出了十二月罢工的号召。不久后，新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被逮捕。然后呢？新苏维埃尽管只是继续了旧苏维埃的工作，斗争的目的和方法也完全没有变化，但由于某种原因，新苏维埃的案件并未诉诸司法手

[2]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1870年7月15日—1926年11月2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中译者注

段——新苏维埃是被行政手段迫害的。

苏维埃具有法律基础吗？不，它未曾也不可能具有法律基础，因为这样的基础**不存在**。

工人代表苏维埃就算它想，也不可能在十月十七日宣言的基础上成立，因为它是在宣言之前成立的；苏维埃是由产生了宣言的革命运动建立的。

整个起诉书都建立在过去一年里法律的粗糙继承性之上。检察机关的根据是一个环谬的假设——《刑法》的所有条款一直有效，一直没有被更换，也一直没有被废除（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事实上的）。

事实上，在当局的默许下，有大量的条款被革命的双手撕掉了。

乡绅大会有法律基础吗？所有的宴会和示威都符合法典规定？报刊遵守了审查制度？知识分子的各种联盟难道不是在所谓“秘密”的情况下成立却没受处罚的吗？

不过让我们还是坚持苏维埃本身的命运吧。假设刑法的101和102条仍然有效，检察机关认为苏维埃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是犯罪组织，也因此把加入苏维埃的行为看作是一种犯罪。那么，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怎么解释政权的最高代表与一个旨在通过革命建立共和国的犯罪组织进行谈判的事实呢？从法律的连续性来看，维特伯爵与苏维埃的谈判也是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

从维特伯爵的例子来看，检方捍卫不存在的法律基础的行为是多么的不合理。

起诉书在引用派遣代表到维特处要求释放在喀山大教堂外的街头集会上被捕的三名苏维埃成员相关辩论时，说与维特的这一交涉是“**争取释放被捕者的合法尝试**”。

因此，检方认为，维特伯爵作为国家政权的最高代表，与一个

旨在推翻维特要维护的国家秩序的革命协会进行谈判是“合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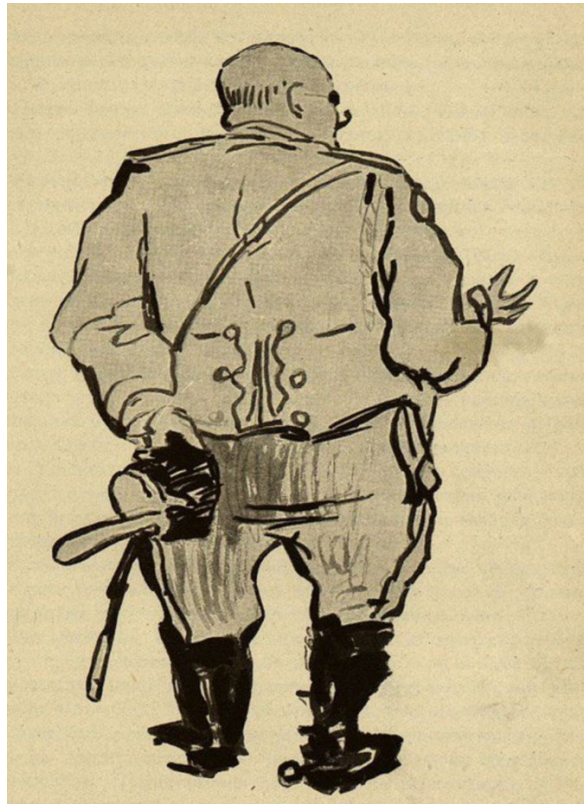
这一“合法尝试”的结果如何？

起诉书完全正确地指出了大臣委员会主席“在与市行政教官交涉时，下令释放被捕者”。这也就是说，国家政权满足了犯罪团伙的要求，而这个团伙的成员按照第 101 和 102 条不应该站在首相面前，而应该在牢房里。

“合法性”去哪儿了？10 月 18 日在喀山大教堂外的街头集会合法吗？显然不是，因为领导这场集会的苏维埃成员被逮捕了。一个反政府协会往政府派代表团合法吗？检方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几百名罪犯的要求下释放三名罪犯合法吗？好像“合法性”不是教人释放被捕的人，而是教人逮捕那些仍然逍遥法外的同伙吧？还是说维特伯爵大赦了罪犯？但谁又给了他大赦的权利？

工人代表苏维埃并没有法律基础，但在政府当局同样也没有这一法律基础。法律基础并不存在。

10 月和 11 月让广大群众行动起来，揭示了许多深刻的利益，穿凿了许多组织和新的政治联合形式。旧制度通过其庄严的十月十七日宣言清算了自己。但新制度仍未存在。与宣言明显相悖的旧法律仍未得到废除。但事实上这些法律也时时刻刻都在被违反。新的现象，新的生活，在专制的“合法性”中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当局不仅容忍了数以千计的违法行为，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公开庇护他们。此外，十月十七日宣言不仅在逻辑上废除了一系列现存法律，同时也清算了专制主义的立法机构。



（宪兵将军伊万诺夫，“初步调查”了苏维埃的案件，在法庭上作证。）

新的社会生活形式被创立了，并超越了任何法律定义的范围。苏维埃就是这些形式中的一种。

第 101 条中的定义与苏维埃的真实面貌之间存在着滑稽般的不适应，这是因为苏维埃这种机构在旧俄罗斯的法律中完全没有被考虑过。它是在残破不堪的合法性外衣被撕裂，革命人民践踏其掉落的碎片时出现的。苏维埃并不是因为法律上正当，而是因为现实必须性出现的。

当第一次战斗结束，执政反动派开始坐大的时候，他们援引那些事实上已经被废除的法律，就像街头斗殴的人会掷出手边的第一颗石头一样。刑法第 101 条正是他们侥幸捡起来的石头。而最高法院，通过处罚无知的宪兵和与其勾结的检察机关列出的人士，扮演了弹弓的角色。

关于政党的官方代表参与苏维埃决定的问题，最能清楚地揭露出检察当局在法律上的毫无希望。

任何与苏维埃有过关联的人都知道，政党代表无论是在苏维埃还是在执行委员会里都没有行使过投票权；他们参加辩论，但不参加投票。这是由于苏维埃是根据工人按企业和行业选派代表为原则组织的，而不是根据党派团体组织的。政党代表可以向苏维埃提供自己的政治经验和知识，而且也是这么做的，但却不能投票做决定，否则就违反了代表工人群众的原则。可以这么说，他们是苏维埃成员中的政治专家。

这个铁证本可以毫无困难地得到证实，但却给侦查和检察当局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具有纯粹的法律性质。如果苏维埃是一个事先具有某些确定目标的犯罪组织，如果被指控的人是这个犯罪团伙的成员，并且必须以这种身份出庭的话，那么如何处理那些仅仅只有建议权，只有权宣传自己的观点，却不能投票，也就是说并不代表这个犯罪组织集体意志的直接方向的被告呢？正如专家在法庭上的发言可能会对判决产生重要影响，却不会使专家需要对该判决负责一样，政党代表的发言无论对苏维埃的有多大影响，都不能使他们因此负法律责任。他们告诉苏维埃：这是我们的劝说，这是我们政党的意见，但最终取决于你们。当然，政党代表并不打算以此论点来躲避检方的指控。毕竟，检方并不是在保卫任何“条款”，任何“法律”，而是在保卫特定种姓的利益。既然政党代表通过自己的工作对这一种性的打击不亚于苏维埃的任何其他成员，那么自然而然，政府的报复就会以最高法院判决的形式出现，对政党代表和工厂车间代表判同种惩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说可以通过事实及其法律意义的粗暴歪曲，就能将代表定性为犯罪团伙的成员的话，那么可以说对政党代表的适用第 101 条，则鲜明体现了法律荒谬绝伦之处。至少，这是人的逻辑可以告诉我们的，而法

律的逻辑除了将人类的普遍逻辑应用于特定领域的现象以外，就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了。

苏维埃党代表的地位问题给检方带来的第二个困难是政治性的。摆在宪兵将军伊万诺夫和副检察官巴尔茨^[3]或他们背后的人面前的任务很简单：他们必须把苏维埃打成阴谋组织，而这个阴谋组织在一小撮精力充沛的革命者的压力下，控制着被恐吓的群众。苏维埃的一切都在否定着这种雅各宾—警察式（якобинско-полицейский）的幻想：苏维埃的成分，苏维埃活动的公开性质，它讨论和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最后，党代表没有投票权。而侦查机关是怎么做的呢？如果事实对它不利，它就通过行政手段来处理事实。宪兵队很容易在会议记录、计票，甚至在自己密探的证词中发现政党代表在苏维埃只有协商权。宪兵队知道这点，但由于这一事实会给国家的考虑和诡计添麻烦，所以它故意在这一点上误导检方。尽管政党代表在苏维埃中的法定地位的问题很重要，宪兵队在审讯时有计划地、完全故意地回避了这一问题。这些好学不倦的宪兵队极其想知道个别执行委员会成员坐过哪个位置，怎样进进出出的，但却丝毫不想知道 70 名社会民主党人、35 名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总计 105 人的政党代表在诸如总罢工、八小时工作制等问题上是否具有投票权。他们不向被告和证人提出某些问题，完全是为了避免确定某些事实。^[4]这一点非常显而易见，也毋庸置疑。

[3]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尔茨（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льц, 1871 年 1 月 19 日—1931 年？月？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03—1906 年任下诺夫哥罗德法院检察官。1906—1909 年任圣彼得堡法院副检察官。1909—1915 年任喀山法院检察官。1912 年起担任国务委员。1915—1916 年任司法部第二司司长。1916—1917 年任内务副大臣。1917 年任参议员兼战争部滥用职权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1931 年去世。

[4] 起诉书只有一处提过这个问题：根据拉斯托尔古耶夫的说法“据说政党代表在投票的时候没有投票权。”但检方没有花任何精力弄清楚这件事，或者更确切地说——故意没这么做。——原注

我们在上面提到过，侦查机关如此误导了检察机关。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检察机关以其代表身份出席过审讯，或者至少在口供上签过字。因此，他们一直都有满足自己对真相兴趣的机会。只要他们有这种兴趣就行。但他们当然没有这种兴趣。检方不仅掩盖了预审的“失误”，而且实际上利用了这些失误得出了它知道是错误的那些结论。

这点在起诉书中涉及苏维埃武装工人的部分最为草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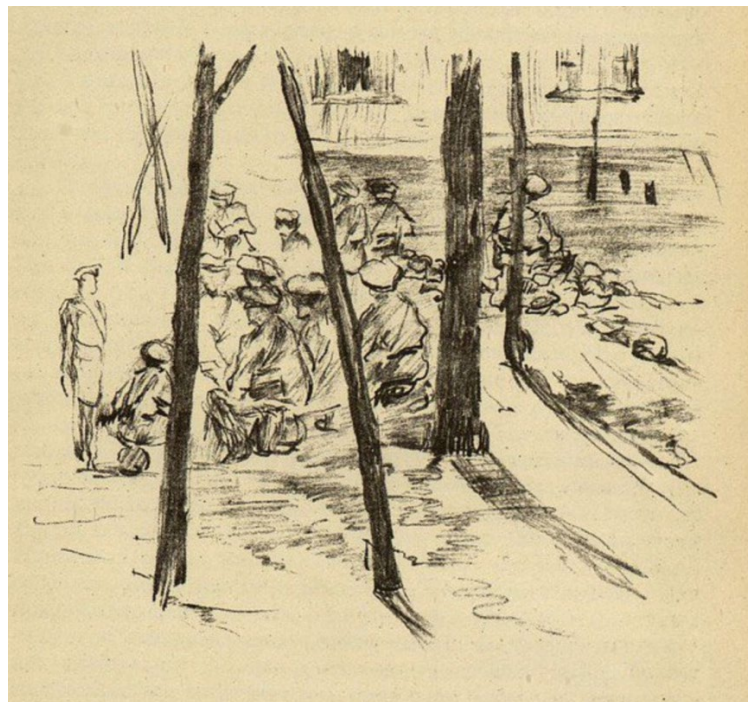
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讨论武装起义的问题，也不打算讨论苏维埃对它的态度。我们在别的文章里已经讨论过这个主题了。在这里，我们只需说，武装起义作为一种革命思想，鼓舞着群众，指导着他们的选举组织，而且与检察—警察眼中的武装起义“思想”不同，就像“工人代表苏维埃”和第 101 条设想的协会没有共同点一样。但是，当局对苏维埃的意义和精神毫无希望的不解，对政治思想进行的无助混淆，与他们想把指控建立在一个简单的、机械物品的愿望成正比。这个机械，就是勃朗宁手枪。

尽管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宪兵的审问在这个问题可以提供给检察官的材料非常少，但起诉书的作者却大胆得引人注目地试图证明执行委员会是为了武装起义而大规模武装工人。我们不得不引用起诉书的相关段落，并对其各部分进行分析。

检方是如此论断的：“看来，执行委员会**上述所有**关于武装彼得堡工人的**意图**都是在同一时期（即 11 月下旬）实际实行的。这是因为，根据波格丹诺夫烟草厂的代表格里高利·莱福金的证词，在 11 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上，（谁？）决定了建立武装的十人队和百人队以协助示威。而恰恰在同一时间，代表尼古拉·涅姆佐夫指出了工人缺乏武器以及在集合起来（在哪里？）的人中已经开始为武装而募款的情况。”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在 11 月中旬，执行委

员会实施了“所有”武装无产阶级的意图。证据在哪？有两个无可争辩的证据。首先，格里高利·莱福金指证说，就是大概在这段时间（看来应该是苏维埃）决定了组建武装的十人队和百人队。苏维埃在十一月中旬**完成**了所有的武装意图，而且正是在这个时候它表达了……建立十人队和百人队的**意图**（或者说达成了决定），这难道还不够明显吗？但是苏维埃真的达成过这项决定吗？没有这样的事。在这里，起诉书援引的不是苏维埃那没存在过的决定，而是在同一起诉书第 17 页中引用过的苏维埃成员（我本人）的讲话。

因此，作为实施了“意图”的证据，检方援引了一向决议。这决议，哪怕真的被通过了，也只是这类“意图”的其中之一。



（在法院的院子里）

彼得堡工人在 11 月中旬进行武装的第二个证据是尼古拉·涅姆佐夫提供的，他“**恰恰在同一时间(!)**，指出了工人缺乏武器”。不错，这里并不容易理解，为什么涅姆佐夫关于**缺乏**武器的说法能够证明武器的**存在**。而在这之后，他还是又补了一句“在集合起来

的人中已经开始为武装而募款了。”用于武装的钱完全是由工人进行募捐，这一点毋庸置疑。让我们假设，他们，特别是在检方说到的那个场合，进行了募捐。但是这里有一点就完全不能理解了：由此是如何得出结论“执行委员会上述所有关于**武装彼得堡工人**的意图都是在同一时期实际实行的”？此外，尼古拉·涅姆佐夫是向谁说明缺乏武器？显然，是向苏维埃的会议或是执行委员会说明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断，用于武装工人的资金是从数十或者数百个代表之中收集的；但这一不可信的说法却足以证明群众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武装起来了。

因此，武装工人的行为已经被证明了；剩下的就是要揭露它的目的了。以下就是起诉书关于这个问题的内容：“根据代表亚历山大·希什金的证词，武装是以大屠杀可能发生为借口进行的，但是，按照他的说法，屠杀只是一个托辞，据说，实际上为1月9日的武装起义做准备。”起诉书继续写道，“**实际上**，根据奥德涅尔工厂代表米哈伊尔·哈哈列夫的证词，早在10月，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就已经开始分发武器了，而他，哈哈耶夫，则领到了一支勃朗宁枪，‘以防黑色百人团的侵害’。然而，除了上述所有的苏维埃决定以外，格奥尔基·诺萨尔的某些文件的内容否定了分发武器防御性目的。这些文件中包含了一些苏维埃决议的原件，但没有注明起草日期，其中包含了对武装和组建战斗队和军队的呼吁，‘准备随时打击正在蹂躏俄国的黑色百人团政府’。”

暂时先到这里停一停。抵抗黑色百人团只是一个借口；而11月中旬苏维埃进行的普遍武装真正目的是为了在1月9日举行武装起义。不错，这一“真正目的”，不仅被武装起来的人不知道，而且武装别人的人也不知道，所以，要不是存在有亚历克谢·希什金的这么一份证词，就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工人群众的组织已经

确定了武装起义的明确日期了。还有一个证据能证明执行委员会在11月中旬为1月的起义武装群众的事实，就像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是在**10月**哈哈列夫从赫鲁斯塔廖夫那里领取勃朗宁枪“以防黑色百人团的侵害”。

但是，按检查机关的意思，在诺萨那里发现的一些文件进一步否定了这一武装的防御性目的。例如，在一些决议原件（？）中，苏维埃呼吁进行武装以“打击正在蹂躏俄国的黑色百人团政府”。工人代表苏维埃让群众看见进行武装的必要性和起义的不可避免性，这是很多决定中都反映了的；谁也不能否认这点，检察机关也不需要证明这点。它要证明的是，执行委员会在11月中旬实施了武装群众的“所有意图”，而且这种实际上已经存在的武装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武装起义；为了证明这一点，检方又拿一个决议来举证。这个决议与其他决议不同，无法确定日期，甚至连苏维埃是否曾通过它都不知道。最后，恰恰是这个可疑的决议反驳了武装的防御性质，恰恰是它明确无误地提到了要**打击**正在蹂躏俄国的黑色百人团政府。

但是，检方在勃朗宁问题上的不幸还未就此结束。检方为了反驳武装的防御性质，继续写道：“此外，在诺萨的文件中有一章不明人士写的纸条，指证赫鲁斯塔廖夫答应在11月13日的会议后以内部价格发放几把勃朗宁左轮手枪或者史密斯威森左轮手枪。纸条的作者住在科尔皮诺，他要求把承诺过的武器交给他。”

要理解为什么这个“住在科尔皮诺”的纸条作者不能“以内部价格”拿到左轮手枪**以期自卫**，而不是武装起义，就和其他问题一样，是非常困难的。另一张要求给予左轮手枪的纸条具有同样的意义。

最后，检方关于彼得堡工人武装问题的这些资料被证明完全

是少得可怜的。起诉书中控诉道，“在诺萨的文件中发现，获取武器的费用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因为**（！）在他的所有文件中，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和一张单独的纸，上面记录了向工人分发各种型号的左轮手枪和子弹的情况。**根据**这些记录，只有 64 只左轮手枪被分发了出去。”

显然，这六十四支左轮手枪作为执行委员会实现了为一月武装起义做武装准备的“所有意图”的证据，是令检方尴尬的。因此，它迈出了大胆的一步：如果不能证明这些左轮手枪**是被**买来的，那就得证明它们**可能**是被买来的。起诉书以此为目标，在指出了 64 支左轮手枪这样一个可怜的数字之前，附上了一个财政性质的愿景。在证明了卧铺车厢工厂协会为武器募集了资金之后，起诉书写道：“这种认购提供了获得武器的机会，因为工人代表苏维埃可以在需要时获得大量武器，因为它可以支配大量的资金……执行委员会的总入账达 30063 卢布 52 戈比。”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小品文特有的语气和方式。这种小品文甚至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迹象作证。首先引用某些纸条和决议的“原件”，以便在之后用一个大胆而简单的猜想来否定这些证据；执行委员会有很多钱，因此，它有很多武器。

我们如果用检方的方法推导结论的话，那么就可以说：保卫局有很多钱，因此，屠杀者手里有很多武器。但是，这样的结论只在表面上与起诉书里作出的结论相似，因为苏维埃的每一个戈比都在账上，这使得我们能够轻易地把检方的大胆猜测当作纯粹的无稽之谈。而相对而言，保卫局的资金流出则属于一个完全神秘的领域，长期以来等待着刑事调查。

为了一劳永逸地终结起诉机关关于武装问题的观点和结论，我们将尝试用严格的逻辑形式来展示它们：

论题

大约在 11 月中旬，执行委员会以武装起义为目的武装了彼得堡无产阶级。

证据

A. 苏维埃的一位成员在 11 月 6 日的会议上主张把工人组织为十人队和百人队。

B. 11 月中旬，尼古拉·涅姆佐夫提到了武器缺乏的问题。

C. 亚历克谢·希什金知道，起义的日期被确定在 1 月 9 日。

D. “早在 10 月”，哈哈列夫就收到了左轮手枪，用于在黑色百人团面前自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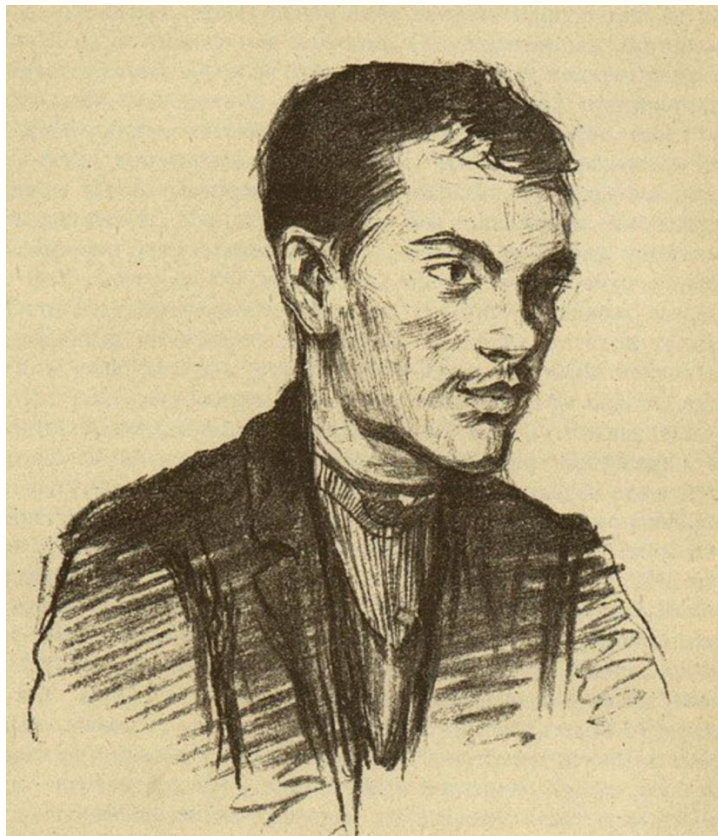
E. 在一项不知日期的决议里，提到了武器的必要性。

F. 一个“住在科尔皮诺”的不知名人士要求以“内部价格”获得左轮手枪。

G. 虽然只分发了 64 支左轮手枪，但苏维埃有钱，而由于钱是一般等价物，所以可以用来折算成左轮手枪的支数。

中学逻辑课本甚至都不屑于把这些结论作为初级诡辩的例子使用。它们太粗糙了，以至于是在侮辱常人的智识！

正是在这些材料和这种法律结构的基础上，最高法院不得不作出自己的有罪裁决。



（工人克拉辛，苏维埃案件的被告人之一）

第三章 我在法庭上的发言^[1]

（1907年10月4—17日）

各位法官，各等级的代表！

本法庭的审查对象，同预先审查的对象一样，主要是关于武装起义的问题。在工人代表苏维埃存在的50天里，它没有做这件事。无论这个问题在特别审判庭眼中多么的奇怪，它也没在苏维埃的任何一个会议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的任何一次会议都没有提出或讨论过武装起义的问题；不仅如此，任何一次会议都没有提出或讨论过立宪会议、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总罢工，以及它作为革命斗争方法的原则性意义的独立问题。这几年来，首先是在革命报刊，然后是在集会和聚会上围绕这些根本问题进行了辩论，而工人

[1] 译者部分参考了伊萨克·多伊彻的《武装的先知》（王国龙译，施用勤校）的译文。——中译者注

代表苏维埃却完全未曾研究过这些问题。之后我会解释这意味着什么，并评定工人代表苏维埃对武装起义的态度。但首先，在讨论这一法庭眼中的核心问题之前，我将冒昧地提请法庭注意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更加普遍，但又没那么尖锐，即苏维埃工人代表苏维埃普遍使用暴力的问题。苏维埃是否认为，在一定情况下采用暴力和高压手段是正当的呢？对于用这样概括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将回答：**是！**我和检方同样明白，在任何“正常”运作的国家里，无论其形式如何，暴力与镇压的垄断权都属于政府当局。这是它“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它对自己的这一权利采取了最容易吃醋的关心态度，时刻警惕着任何个人团体侵犯其暴力垄断权。国家组织就是以这种方式来为自己的生存作斗争。只要对现代社会有具体的了解，只要对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合作体系（比如像俄罗斯这样巨大的国家）有具体的了解，就会立即明白，鉴于现代社会制度被矛盾撕裂，镇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称我们是“国家主义者”，因为我们承认国家的历史必然性，也因此承认国家暴力的不可避免性。政治总罢工的实质是使政府机构瘫痪，因此，在政治总罢工造成的情况下，早已过时的、罢工直接反对的那旧政府的暴力已经证明自己完全无能为力。即使采用唯一能用的野蛮手段也不可能持续控制公共秩序。同时，罢工已使千千万万的工人从走出工厂，冲上街头，已唤醒他们投身到公共政治生活中去。谁能领导群众，谁能使群众队伍遵守纪律？旧政权的哪一个机关？警察吗？宪兵吗？我找到的答案只有一个：除工人代表苏维埃外，谁也不能！指挥这支巨大的自发力量的苏维埃，承担着把内部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预防过火的行为并减少斗争中不可避免的牺牲者，使其尽可能地少的直接任务。既然如此，苏维埃在那场创建它的政治罢

工中就成为了革命群众的自治机关——一个**权力机关**。它以其全体的意志来统治部分。它是一个民主的政权，人们自愿服从它。但是，由于苏维埃是绝大多数人的有组织权力，它就不可避免地被迫对那些把无政府状态带入其统一队伍的人采取镇压措施。苏维埃作为一个新的历史性政权作为旧机器在道德上、政治上和技术上完全破产时的唯一政权，作为“个人不受侵犯”和“公共秩序”这些词在其最佳意义上的唯一保障，它认为自己有权以武力对抗这些人。完全建立在血腥镇压基础上的旧政权之代表，无权对苏维埃的暴力手段提出道德上的愤慨。检察官在这个法庭上代表的历史政权，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有组织暴力。由苏维埃作为其前身的新政权，是多数人有组织的意志，要求少数人守秩序。在这种区别中，苏维埃以为之生存的革命权利，是一种超越任何法律或道德怀疑的权利。

苏维埃承认自己有权进行镇压。但在什么情况下镇压，以什么程度进行镇压？关于这点，你们已经听过上百人的证词了。在采取镇压之前，苏维埃以**话语**劝服。这就是它的真正方法，而苏维埃不知疲倦地使用它。通过革命鼓动，言语的武器，苏维埃不断地使一批又一批群众站起来，服从自己的权威。如果它遇到了无产阶级内部无知或堕落的群体进行抵抗，它就会对自己说，用武力使其无害的时候还远得很。正如你们从证人的证词中看到的那样，它还会寻求其他方法。它呼吁工厂行政人员理智，号召他们停工，通过那些同情总罢工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对无知工人施加影响。它向工人派出代表，以把他们从劳作中“带出来”，只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才会使用武力来威胁工贼。但它使用过武力吗？法官先生们，你们在预审材料中并没有看到任何这样的例子，而且在法庭调查期间，尽管做了种种努力，也没能成功把它们找出来。即使我们认真对待

那些在法庭上出现过的“暴力”例子，它们也都是喜剧性的，而不是悲剧性的，（比如，某某人进入了别人的公寓里而没有摘下帽子，又比如某某人在双方同意下逮捕了某某人……）我们只要把某人忘记摘下的**帽子**，和旧政权经常错误“摘下”的上百颗**头颅**相比，工人代表苏维埃暴力的真实面目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而我们不曾是别的样子，也不需要成为别的样子。我们有责任以真实面貌重建当时的事件，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这些被告都积极地参加了这次的审判。

让我提出另一个对本庭来说很重要的问题——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行动和声明是否具有法律基础，是否多少以十月十七（30）日宣言为基础？苏维埃关于立宪会议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对十月宣言又是何种态度？我直截了当地说吧，我们当时根本没在意过这个问题，但它现在无疑对这个法庭具有很大的意义。法官先生们，我们在这里已经听过了证人卢奇宁（Лучинин）的证言。我个人认为，他的证词非常有意思，而且其中有一些一针见血的深刻结论。他提到，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其口号、原则及政治理念方面是共和制的，实际上直接、具体地落实了沙皇专制在十月十七号宣言原则上宣布的那些自由，而那些把它带到世上的人却实际上反对这些自由。是的，各位法官，各等级的代表！我们，革命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实际上实施并落实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人身不受侵犯——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十月罢工的压力下被许诺给俄国人民的東西。与此相反的是，旧政权的机器只能通过把人民的这些合法成果撕成碎片来回光返照。法官先生们，这些是不容置疑的客观现实，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不能就此争议，因为它是无可争议的。

但是，如果有人问我，或者问我的同志们，我们是否**主观地**依靠了十月十七日宣言，那么我们将明确的回答“不”。为什么？因

为我们深信（而且我们没有错），十月十七日宣言没有创造任何法律基础，没有给任何新法律提供基础，因为我们深信，法官先生们，新的法律制度不是宣言创造出来的，而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真正改组的产物。我们因为采用了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一唯一正确的观点，所以认为自己有权利对十月十七日宣言的内在力量不抱任何信心。我们公开声明过这点。但我不认为，我们作为党的人（Люди партий），作为革命者的主观态度可以使法庭决定我们身为国家公民对宣言的客观态度，决定我们对现存国家体制的成型基础的态度。因为法庭，只要它还是法庭，就**必须**把宣言看作是自己的法律基础，否则它就必须停止存在。我们知道，在意大利，存在着一个在国家君主立宪的基础上运作的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党。就其性质而言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在所有文明国家都合法且进行着斗争，而它们就自身存在而言也是主张共和体制的。扪心自问一下：十月十七日宣言是否容纳了我们俄国社会主义一共和主义者？这个问题是法庭必须作出决定的。法院必须说明，当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立宪宣言只是一份永远不会被自愿兑现的赤裸裸的承诺清单时，是正确的吗？在对这些书面保证进行革命式的批评时，是正确的吗？在呼吁人民为完全的、真正的自由进行公开的斗争时，是正确的吗？还是说，我们不正确？那么就请法院告诉我们，十月十七日宣言提供的是实际的法律基础，而在这个法律基础上，我们共和主义者是合法有权利的；尽管我们有自己的观念和意见，也是“合法地”行动的。现在就让十月十七日宣言通过法庭的裁决对我们宣布：“你们总是否认我的现实性，可是我对你们、对全国来说都是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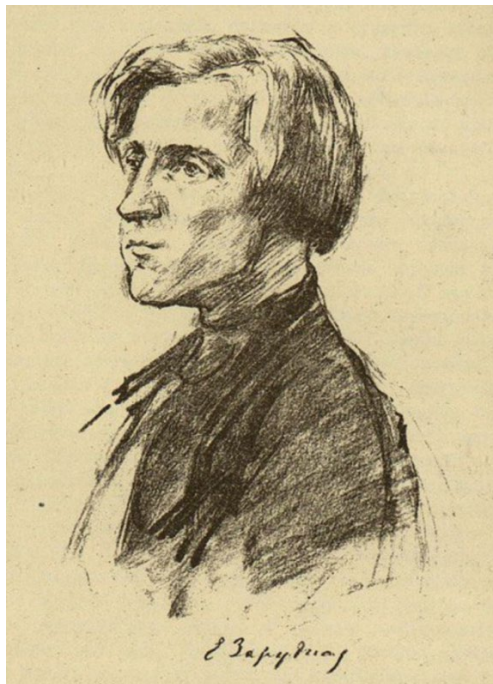
我已经说过，工人代表苏维埃从未在自己的会议上提出过立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国的问题；然而，正如你们在工人证人的讲话中

得知的那样，它对这些口号的态度是明确的。是的，还能怎么样呢？苏维埃本来也不是在空地上出现的。它是在俄国无产阶级经历了1月9（22）日事件的，通过枢密官施德洛夫斯基的委员会，经历了漫长的整个俄国专制学校之后出现的。早在苏维埃存在之前，对制宪会议的要求、对普遍选举权的要求、对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就已经连同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成为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核心口号。这就是为什么苏维埃从来就没有机会把这些问题作为原则问题提出来：它只是把这些问题作为一向存在的决定融入自己的决议中了。起义思想的实质也是如此。

起义是什么，法官先生们？不是宫廷政变，不是军事阴谋，而是工人群众的暴动^[2]！本庭庭长向一位证人提出了以下问题：他是否认为政治罢工是一种起义？我不记得他是怎么回答的了，但我相信并肯定，政治罢工——尽管代表先生们可能有疑问，——实质上就是一种起义。这不是一个悖论！尽管从起诉书的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一个悖论。我重复一遍：我对起义的概念，（我将在下面证明这一点）与警方和检方构建的这个词的含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说，政治罢工是一种起义。的确，什么是政治总罢工呢？它与经济罢工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工人都会停止工作。在其他方面，两者并不相像。经济罢工有一个明确的狭隘目标，即通过使个别企业主暂时脱离竞争行列来对其意志施加影响。它中断工厂的工作，是为了在该工厂的范围内实现某些变化。政治罢工在性质上与此有者深远的区别。它不会对个别企业主施加压力，通常不提出任何具体的经济要求；它的要求越过自己大力打击的那雇主和消费者的头顶，针对国家政权。那么，政治罢工是如何影响政权的呢？它瘫痪了政权的生命机能。一个现代国家，即使如俄

[2] 起义和暴动在俄语里可以是同一个词。——中译者注

罗斯一般落后，也依赖于中心化的经济有机体。这种有机体以铁路作骨架，以电报作神经系统，连接成一个整体。就算电报、铁路和所有其他现代技术成就不会服务于俄国专制主义的经济或文化目的，这些东西也会对它的镇压活动更加重要。为了把部队从国家的一端送到另一端，为了统一并指挥行政机关针对动乱的斗争，铁路和电报是不可替代的工具。那么政治罢工做了什么？它瘫痪了国家的经济机器，破坏了行政机器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孤立政府，并使其无力化。另一方面，它在政治上把工厂和车间的工人群众联合起来，并以这工人大军与国家政权对抗。法官先生们，起义的本质在此。把无产阶级群众团结在一个单独的革命抗议活动中，进而使其与国家政权对立，就像敌人对敌人那样——法官先生们，这就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理解的“暴动”，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在没有苏维埃的情况下自发地爆发的十月罢工中，我们看到了两个敌对方之间的此类革命冲突。十月罢工发生在工人代表苏维埃之前，本身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罢工造成了国家的“无政府状态”，而这一无政府状态的结果就是十月十七日宣言。我希望检方不要否认这一点，就像最保守的政治家和政论家，包括半官方的《新时代报》都没有否认这一点一样。《新时代报》是很渴望把革命产生的十月十七日宣言和一系列其他同类或反面的宣言一起画上大叉的。就在几天前，《新时代报》写道，十月十七日宣言是政治罢工给政府制造的**恐慌**的结果。但是，如果说这个宣言是整个现行制度的基础，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法官先生们，我们现在的国家制度是建立在恐慌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一恐慌的基础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罢工。因此，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总罢工不仅仅是停止工作那么简单。



（杂工谢利韦斯特罗夫，苏维埃案件的被告之一）

我说过，政治罢工一旦不再是示威的时候，实质上就变成了起义；更确切地说：它成为了无产阶级起义的主要、最普遍的方法。主要，但不是全部。政治罢工的方法有着自己的天然局限。这点，在工人们听从苏维埃号召于10月21日（11月3日）中午12点复工的时候，就变得很明显了。

十月十七日宣言遇到了不信任票；群众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政府将无法落实承诺过的自由。无产阶级看到了决定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并本能地转向苏维埃，作为其革命力量的中心。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在从恐慌中恢复过来后，开始重建其半毁的机器，整顿其军团。结果就是，在十月冲突后，出现了两个政权：新的、人民的、以群众为基础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政权，和旧的、官方的、以军队为基础的政权。这两种力量不可能并存：一种力量的巩固就会使另一个有灭亡的危险。

依赖其刺刀的专制，自然要给以苏维埃为中心的人民力量的巨大团结过程带来最大的动乱、混沌和解体。另一方面，苏维埃是建立在工人群众的信任、纪律、积极和一致的基础上的，不可能不

明白这一点：政权的军队和所有物质武器仍然掌握在那到 10 月 17 日为止沾满鲜血的手中，给人民的自由、公民的权利和个人不受侵犯带来了怎样可怕的威胁。于是，这两个权力机关之间开始了争夺对军队的影响力的艰巨之战——这是日益壮大的人民起义的第二个阶段。在无产阶级反对专制制度的大罢工基础上，出现了争取军队到自己一侧的强烈意图，与士兵交兄弟，抓住他们的心。从这一意图中自然会出现对士兵的革命呼吁，因为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他们身上的。11 月的第二次罢工使工厂和军营之间团结的有力并辉煌的展示。当然，假设军队已经站到了人民一边，就不会需要起义了。但是，我们会认为军队会和平地转到革命的队伍中去吗？不，我们不这么认为！专制不会坐视军队摆脱自己那腐朽的影响，成为人民的朋友。在失去一切之前，专制将主动发起进攻。彼得堡的工人意识到这一点了吗？意识到了。无产阶级、苏维埃相信两个政权的公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相信，对此毫不怀疑，知道，清楚地知道，决定命运的时刻迟早会到来……

当然，假如社会力量的组织过程没有被反革命的任何武装攻击打断，它就会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领导下继续沿着它已经进入的道路前进，而旧制度则会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被消灭。因为，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工人是如何团结在苏维埃周围，看到了不断吸收农民群众的农民联盟是如何向苏维埃派出自己的代表，看到了铁路和邮政—电报工会是如何与苏维埃团结起来的；我们看到了自由职业者的组织工会联盟是如何被吸引到苏维埃身边的；我们看到了工厂管理人员对苏维埃抱的态度有多么宽容、多么近乎友善的。仿佛整个民族都在作出英勇的努力，试图从自己的深处产生政权机关，以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为新制度创造真正的、不可置疑的基础。如果旧的国家政权没有干预这种有机的努力，如果它

没有把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带入国民生活，如果这种组织力量的过程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结果就会是一个新的、重生的俄国，非暴力，不流血。

但问题是，我们从来也没有一刻相信解放进程会如此一帆风顺。我们太了解什么是旧政权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相信，尽管宣言看起来像是要与过去进行决裂，但旧的政府机器不会自愿退出，不会把政权交给人民，也不会交出它的任何一个重要阵地；我们预见到并公开地警告了人民：专制主义会做出更多忙乱的尝试，仍然紧握权力不松手，甚至重新获得那些它已经庄严地放弃了的东西。法官先生们，这就是为什么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起义——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在人民反对军事警察秩序的斗争过程中，它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是历史的必然。在10月和11月，这一思想在所有的会议与集会中占主导地位，支配者所有的革命报刊，注满了整个政治气氛，并以非此即彼的方式，在代表苏维埃的每个成员意识中结晶；这就是为什么它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苏维埃决议的一部分，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需要讨论它。

我们从十月罢工继承的紧张形势如下：一个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群众革命组织，不是建立在那不存在的权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确实存在的力量上。而武装起来的反革命等待复仇时机。如果可以允许我这样说的话，这种形势就是起义的代数公式。新的事件只是把新的数值代入了这个代数公式。与检查官作出的肤浅结论相反，武装起义的思想不仅仅能够在11月27日（也就是在我们逮捕的一周前）的苏维埃决定中找到清楚而又明晰的表达，还能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活动初期的决议中，在那些取消葬礼性示威的决议中，在后来宣布结束十一月罢工的决议中，在其他许多谈到与政府发生武装冲突的决定中，在谈到最后的攻击或者说是最后的

战斗是斗争的不可避免的的时刻的决定中，都可以找到——虽然形式上不同，但本质上一样的武装起义思想就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所有决定。

但是苏维埃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这些决定的？它是否认为，武装起义是一项可以在地下准备，然后以现成的面貌被带到大街上的事业？它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起义行为？执行委员会是否发展出了一种街头斗争的技术？

当然不！而这不得不让起诉书的作者走进死胡同。当他面对着为数不多的数十把左轮手枪时，他陷入了迷惑不解，在他眼中，这些手枪是武装起义的唯一真正舞台道具。但他的观点只是刑法的观点，而刑法知道阴谋团体，却无法理解群众组织的观念；刑法知道图谋与叛乱，却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革命。

这一审判依据的法律概念比革命运动的演化落后了几十年。现代俄国工人运动与刑法典解释的阴谋概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个刑法典，自生活在烧炭党时代的斯佩兰斯基^[3]起就没有变过。这就是为什么，试图把苏维埃的行动放到 100 和 101 条的狭隘框架从法律逻辑上看是完全无望的。

[3]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斯佩兰斯基伯爵

（Граф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перанский，1772 年 1 月 12 日—1839 年 2 月 23 日），俄国政治改革家。出身于牧师家庭。1795 年起进入俄罗斯帝国内务部工作。1797 年进入总检察长办公厅工作。1799 年起任国务委员。1808—1809 年任司法部副大臣。1809—1811 年任芬兰事务委员会国务卿。1810 年加入共济会。1810—1812 年任国务院国务秘书。1812 年被解职并被流放到彼尔姆。1814 年被流放到下诺夫哥罗德。1816—1819 年任奔萨总督。1819—1821 年任西伯利亚总督。1821—1825 年任国务院法律司委员。

1825 年参与审判十二月党人，持同情态度。1826—1833 年期间参与编纂《俄罗斯帝国法律全集》。1835—1837 年担任亚历山大皇太子（即亚历山大二世）的法律和政治学教师。1838—1839 年任国务院法律司司长。1839 年被封为伯爵，同年 2 月 23 日去世。

——中译者注

尽管如此，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尽管如此，我们确实在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法官先生，群众的起义是制造不出来的，而是自发的。它是社会关系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在纸上策划的产物。群众起义不能制造，只可预见。由于种种原因，公开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那些原因既不取决于我们，也不取决于沙皇制度。公开冲突一天一天在迫近。对我们来说，准备公开冲突就是要尽一切可能把这场冲突的牺牲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是否认为，为了这个目的，首先需要储备武器，制定军事行动计划，为起义的参加者规划位置，把城市氛围若干个区——换句话说，做所有的军事当局在预估“混乱”的时候会做的事情，把彼得堡分为若干个区，为每个区分配一个上校，然后给他们配备一定数量的机枪、弹药和人？不，我们不是这样理解自己的作用的。为不可避免的起义做准备……法官先生，而我们，不曾像检方想的和表达的那样**准备过起义**，我们使自己**对起义有准备**——这点对我们来说，首先就是要启发人民意识，向他们解释公开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给予他们的一切都将再次被夺走，只有武力才能捍卫权利；工人群众的强大组织是必要的；必须挺起胸膛直面敌人，必须将斗争进行到底，没有别的路可走。这就是我们说的“对起义有准备”。

我们认为，在什么条件下，起义会给我们带来胜利呢？军队的同情！最首要的，就是必须把军队拉到我们一边。要迫使士兵认识到自己正在扮演的可耻角色，说服他们与友好的人民合作，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为自己设定的首要任务。我已经说过，十一月罢工是对受到死刑威胁的水兵直接的、兄弟般的同情产生的无私冲动，同样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它把军队的同情心和注意力引向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检察官本该首先在那里调查武装起义的准备

工作。但是，展示同情和进行抗议当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那时和现在认为，是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期待军队站到革命的一侧？为此需要些什么？机枪和步枪？当然，工人群众如果有了机关枪和步枪，那么就掌握了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消除起义的不可避免性。摇摆的军队会在武装起来的人民脚边放下武器。但是群众不曾有过，也不可能拥有大量的武器。这是否意味着群众注定要失败？不！不管武器多么重要，法官先生们，主要的力量不在于武器。不，不在于武器！**不是群众有杀人的能耐，而是他们有准备赴死的伟大决心**——瞧吧，法官先生们，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正是这，保证人民起义最终胜利。

当被派到大街上镇压人群的士兵与其面对面，并发现这人群，这人民在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以前不会离开时，发现这人群准备好面对成山的尸体时；当他们看到并确信人民认真地投入战斗，并战斗到最后一刻时，士兵的心，就会像在所有革命中出现过的那样，不可避免地动摇，因为他们将不得不怀疑他们服务的秩序的坚固性，不得不相信人民会得到胜利。

人们习惯于把起义与街垒联系起来。即使抛开街垒在起义中过于有代表性这点不谈，我们也不应当忘记，街垒看上去是起义的纯粹机械因素，却首先发挥的是**道德上的**作用。因为在所有革命中，街垒并不起堡垒在正规战争中起物理障碍的作用——街垒是为起义服务的，通过为军队的调动制造临时障碍，使其与人民密切接触。在这里，在街垒边，士兵可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诚挚勇敢的话语，兄弟般的呼吁，人民良知的呼声——士兵与公民在革命热情气氛中这样接触，其结果就是旧军队纪律的绳索突然绷断、溶解、消失。正是且只有这一点，保证了人民起义的胜利。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看来，人民起义并不是在他们被机枪和步枪武装之

时准备好（因为以这一点来算，它永远也不会准备好），而是在它准备好在公开的巷战中死去之时准备好。

但是，旧政权当然看到了这种伟大感情的增长，这种为祖国利益的名义牺牲的能力，为后代的幸福牺牲自己的生命；看到了群众被这种与它格格不入的、它不熟知的、与它敌对的热情感染，这一被包围的政权无法让自己静静地看着人民的道德重生在自己眼前完成。对沙皇政府来说，被动地等待，就意味着注定使自身不复存在。这点是清晰的。那么它能够做什么呢？他用自己最后的力量和一切手段来与人民的政治自决做斗争。无知的军队和黑色百人团，警探和卖身投靠的报刊对此同样适用。唆使人们彼此对立，在街道洒满鲜血，抢劫、强奸、纵火、制造恐慌、撒谎、欺骗、诽谤……这就是旧的、罪恶的旧政权能够做的事情。它做了所有的事情，而且直到今天也还在做这些事情。如果公开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那肯定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死敌力图使其更快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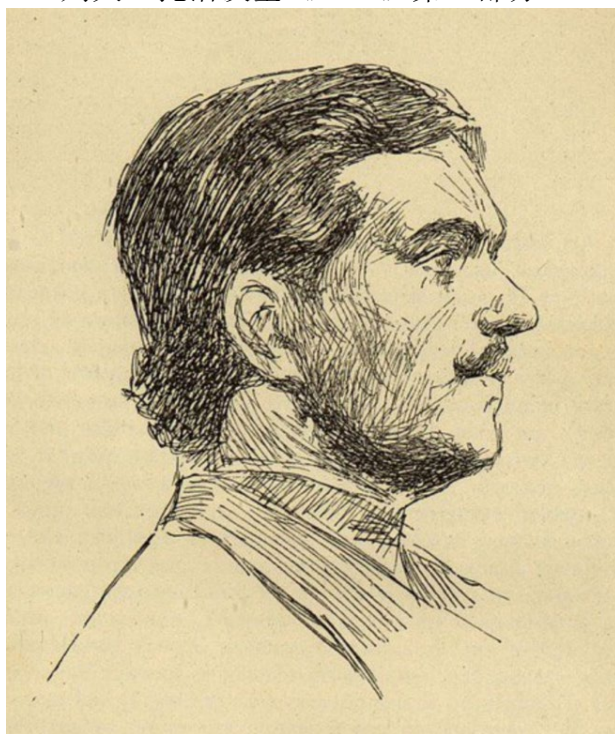
你们在这里已经多次听到，工人在 10 月和 11 月武装起来反对黑色百人团。如果人们对这个法庭外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就会无法理解，在一个革命国家里，在一个绝大多数居民都支持解放理念的国家里，在一个人民群众公开表示做好准备战斗到底的国家里，几十万工人为什么会武装自己，与弱小到只占人口微不足道部分的黑色百人团作斗争。难道这些各阶层的社会渣滓、社会败类真的有那么危险吗？当然不是！如果只有黑色百人团这样可怜的匪帮挡在了人民的道路上，那任务可就简单多了。但是，我们不仅从证人布拉姆松律师那里，而且也从上百名工人证人那里听到了大量的证词，说明黑色百人团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支持——如果不是全部支持，也是它很大的一部分支持；说明在那些一无所有、不留活口——不留白发老人、不留无力自卫的妇女、不留孩子的流氓匪

帮背后，站着的是政府的特务，他们无疑是用国家预算的资金来组织和武装黑色百人团的。

最后，难道我们在本次庭审之前，不知道这些吗？难道我们不曾读过报纸吗？难道我们没有听到过目击者的报告，没有收过信，没有亲眼看到过吗？难道我们不知道乌鲁索夫亲王那令人震惊的披露吗？检方对这一切并不相信，因为他不能相信。否则，他就必须转而去控告他现在保护的那些人，而且必须承认，俄国公民用左轮手枪武装自己反抗警察是自卫行动。但法庭相信当局的屠杀活动还是不相信，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对这个法庭来说，只要我们相信这点，在我们的号召下武装起来的数十万工人对此深信不疑，就足够了。我们毫不怀疑：流氓匪帮的门面背后是统治集团的强有力的拳头。法官先生，就是此刻，我们也能看见这双邪恶的拳头。

法官先生，检察当局要你们承认，工人代表苏维埃武装工人是直接地为反对现存“政体”而进行斗争。如果明确问我：“是这样的吗？”我会回答说：“是的！”是的，我承认这一指控。但只有一个条件，我不知道检方和法庭是否同意这个条件。

我倒要请教：检方所说的“政体”确切涵义究竟是什么？难道我们当真都在某种政体下生活吗？这个政府早已用自己的军事—警察—黑色百人团机器和全国人民决裂了。我们身边的，不是国民的政权，而是一架进行大屠杀的自动机器。对这架把我们国家肉体活生生地剁成碎块的政府机器，我找不出任何别的名称来形容。要是你们告诉我杀人、放火、强奸……，要是你们告诉我在特维尔、罗斯托夫、库尔斯克、谢德尔策……发生的一切，要是你们告诉我基什涅夫、敖德萨、比亚威斯托克是俄罗斯帝国政体的代表，那么——是的，那么我就同检方一起承认：我们在10月和11月里是在直接武装自己，来反对这个俄罗斯帝国的政体。



(工人菲利波夫，其中一名被告)

第四章 往
第四章 往^[1]
(信件摘录)

1907年1月3日。我们在羁押解送监狱里度过了最后的两三个小时。我承认，当我离开了自己在“预审院”的那个牢房，我有些心神不宁。我早就适应了那个“小船舱”，在那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知道，在羁押解送监狱里我们将被安排在集体牢房——还有比这更令人厌倦的吗？而之后便是充斥着泥土和脏乱的流放之旅。我对此心知肚明。谁知道我们何时才能到达目的地？谁能告诉我们何时返程？依旧蹲在第462号牢房里读书、写作、等待不是更好吗？如您所知，对我而言，从一间公寓搬到另一间公寓是一种精神激励。而从一个监狱搬到另一个监狱则糟上百倍。新的管理人员，新的冲突，新的暴力——要用这些来建立不太令人难以忍受的关系。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长官的更迭——从彼得堡羁押解送监狱的管理人员开始，到西伯利亚村庄的地方守卫为止。我已经经历过一次这样的“旅行”了，现在又要来一次，我已经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了。

我们尚未获悉通知，就突然地被押送到了这个地方。在收监室，他们给我们换上囚衣。我们怀着学生式的好奇心换上了衣服。大家穿上了灰裤和灰色厚呢上衣，戴上灰帽，然后相互看着对方，就显得有些挺有趣。然而，上衣背后经典的“苦役犯标志”却不见踪影。我们被允许存起自己的内衣和鞋子。然后，我们这一大群人穿着新衣裳，兴奋地涌入了牢房……

[1] 本文是讲出逃西伯利亚经历的小册子《往返记》(旧译《杜洛斯基之脱逃》)的第一章。译者在翻译本章和接下来一章时，参考了托洛茨基《我的生平》(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十五章的部分内容。本文当中的信件是托洛茨基写给妻子娜塔莉娅·伊万诺夫娜·谢多娃(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на Седова)的。——中译者注

抛开关于羁押解送监狱的令人不悦的谣言不谈，狱卒的态度似乎还可以，在某些方面还算体贴。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接到过命令——态度要严正，不可惹出事情来。

出发的确切日期仍然不为人所知，遥遥无期。显然，他们害怕示威，害怕我们尝试中途逃跑。他们畏惧，所以在采取必要措施。但是，在当前的条件下，任何这样的尝试都是毫无意义的。

1月10日。这封信是我在火车上写的……所以请原谅我的糟糕的字迹……现在是上午9点。

凌晨3点30分，总看守喊醒了我们，并通知我们会在早上6点钟出发。没想到……为了这个不约而至的时间点，我们居然等了这么久。

随后的一切事情都一如既往。我们慌乱地收拾了行装。然后我们下车，与女人们和孩子们进了收监室。在这里我们“接受”了押送，行李被匆匆地检查了一遍。昏昏欲睡的看守把我们的钱交给了一位军官。然后我们被送上了押囚马车。在全副武装的押送队的陪同下，我们随之被送往尼古拉耶夫斯基站。我们不知道自己将会到哪里去。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押送队是今天被特意从莫斯科调来的。显然，他们不信任彼得堡的军队。军官全程都很和蔼，但无论我们提什么问题，他都完全不想理睬。他说，负责人是一位宪兵队上校，负责发布所有的指示，而他则是军官，奉命带我们到火车站。他就说了这些话。当然，可能是因为政府实际上就这么谨慎，但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军官们耍了点人际交往的小伎俩。

我们行进了大约一个小时，但我们还是不知道火车是开往莫斯科还是沃洛格达。士兵也不清楚——我们觉得他们没在说谎。

我们全程坐在独立的第三等车厢里，甚是舒服，每个人都有卧铺。另一个车厢专门用来装我们的行李。押送队的士兵告诉我们，

装行李的车厢还搭载了十名宪兵和他们的上校。这些人陪着我们。

我们安顿下来，觉得自己并不大关心火车会沿着哪条路往前开：他们会把我们带到那里的，不是沿着这条路就是沿着那条路……

显然，我们在往沃洛格达走。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是根据火车站的名字判断出来的。这意味着四天后我们将会到达秋明。

所有人都活跃起来了。经历了十三个月的牢狱生活之后，我们感到旅途充满了快乐和惬意。确实，虽然窗户隔绝了车厢内外，但窗外就是自由、生活和运动……什么时候我们能沿着原路返回呢？告别了，我亲爱的朋友。

1月11日。如果说押送队的军官既体贴又客气，那么士兵就更是如此了：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读过我们的审判报告，非常同情我们。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直到最后一刻，士兵们压根儿都不知道他们押送的是谁，要去哪儿。他们突然从莫斯科带到彼得堡的预防措施，曾一度让他们以为他们要把我们送到什利谢利堡的刑场。在羁押解送监狱的收监室，我注意到他们似乎很是焦躁不安，甚至是反常的乐于助人。他们大概是心存愧疚吧……当他们得知我们是“工人代表”且只被判处流放时，他们该多么高兴啊！

押送宪兵室超级押送队，从来不在我们的车厢里露面。他们负责外部的警戒——在火车站里围住车厢，在车厢门口严密戒备，但他们多半都注视着押送队的士兵。至少，士兵们自己如此认为。

电报传来指示，说要给我们提供食物以及用于洗漱和饮用的水。我们认为，这段旅程真的太舒服了。无论我们经过哪一座火车站，火车站小卖部的经理都对我们展现出极好的态度，甚至还会让押送队代他问一下我们是否需要三十只牡蛎！听到这话，我们笑了，但多少还是拒绝了牡蛎。

1月12日。我们一直都离您越来越远。

从第一天起，我们分成了几个“家庭”小组，并且由于车厢拥挤，每一个小组不得不和其他人分开。只有我们的博士（费特，一位社会革命党人）不属于任何一个组。他卷起袖子，显得非常活跃和不知疲倦，似乎指挥着我们。

如您所知，这个车厢里有四个孩子陪着我们。但他们表现得很安分，以至于让人忘却了他们的存在。脆弱的友谊，让他们团结起来面对押送队的士兵。骨瘦如柴的士兵无微不至地对待他们……

……“他们”确实是在保卫我们啊！在每一个车站，车厢会被宪兵团团围住。在更大的车站，车厢则也会被警察围住。宪兵们除了带了来复枪以外，还带着左轮手枪，用来恐吓那些由于意外或者好奇心而接近车厢的人。这些天，保卫措施主要是针对两类人：一种是重要“罪犯”，另一种是著名的大臣老爷。

他们已经采取了谨慎的措施来对待我们。我们意识到这跟羁押解送监狱里的情况截然不同。一方面是无比森严的戒备，另一方面却是法律框架内的高规格待遇。这反映了斯托雷平的宪政精神。但毫无疑问，这个狡猾的制度迟早都得垮掉。唯一的问题在于，两者之中谁最先垮掉？是森严的戒备，还是高规格的待遇？

我们到了维亚特卡。火车停下。我们从维亚特卡的官僚那里得到了这般接待！我想，您大概已经目睹了这一切。半个连队的士兵在车厢的任意边上排列成队。不过一会儿，当地的警察背着来复枪赶来了。军官、警察巡官和警察队长等等都来了。站在车厢旁边的照例还是宪兵。一句话，这就是个阅兵。戈尔恰科夫亲王^[2]——当

[2]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戈尔恰科夫亲王（Князь Серг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Горчаков，1861年4月27日—1927年6月3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88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学院。1898—1900年任阿尔汉格尔斯克副省长。1903—1904年任奥洛涅茨副省长。1904—1906年任赫尔松副省长。1906—1909年任维亚特卡总督。1909—1915

地的蓬巴杜，似乎与彼得堡的指示有着特别的联系。我们人群感到被冒犯，因为这里根本没有炮兵部队。确实很难想象比这更为荒谬和懦弱的事情了。“强”权展现了一幅滑稽可笑的图画。我们有理由感到自豪：“死去”的苏维埃显然还能吓到他们。

又懦弱又愚蠢——他们如此频繁地翻脸不认人。为了掩盖住不可能被掩盖的行进路线（显然是因为这个，因为别的原因说不通），我们被禁止在火车上写信。这些命令基于彼得堡的“指示”，来自无形的上校。但我们每一个都在第一天就开始写信，希望它们会被发出。而且我们没有错。“指示”忽视了一个事实：当局已经没有忠诚的仆人了，但我们的朋友遍布四方。

1月16日。我在下述的这些条件下写了这封信：我们停在了离秋明 20 俄里的村庄。此时正是夜晚，我住在一间农家小屋里。屋子里天花板很低，房间脏乱。整层楼拥挤不堪，全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员，连一片儿空地都没有。

没人睡得着，大家有说有笑……我们三个人抢一个长椅，然后我赢了。我的生活总是很幸运。我们在秋明待了三天。我们被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士兵接待了（到现在为止我们早就习惯了）。骑在马背上的人（“猎骑兵”）让马儿跳起来，吓走街头的顽固分子。我们不得不从火车站步行到监狱。

我们受到的待遇一如既往的非常体贴，几乎体贴地过头了。但同时，警戒措施一直都收得越来越紧了，几乎上升到了一种迷信行为。

例如，通过电话，我们可以获取来自当地所有商店的商品，同时我们不能在监狱的院子里舒活筋骨。前者是超规格的特权，后者

年任卡卢加总督。1915—1917 年任国务委员。二月革命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18 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托博尔斯克。1927 年死于托博尔斯克。——中译者注

则是违法行为。在秋明，我们坐在马拉雪橇上前进，我们的 14 个狱友的身边则围着 52 个押送队士兵，不包括他们的长官、警察巡官和警察队长。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情。包括士兵、长官、巡官和队长在内的所有人都震惊了。但这些都是“命令”。我们现在正前往托博尔斯克，并且行进速度极慢。比如今天我们只行进了 20 俄里，下午 1 点钟到这里。为什么不继续前进呢？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这是命令！为了防止我们逃跑，他们不想让我们夜间行进。这样做倒还有一点意义。彼得堡当局几乎不信任地方政府的主动性，所以按里程给我们规划路线。警察部的效率太低了！所以现在每天行进三四个小时，然后休息二十个小时。按这个速度，我们能在大约十天内到达托博尔斯克（250 俄里），大致日期是 1 月 25 日或 26 日。我们不知道，或者说没人告诉我们要在那里停多久，然后又要去哪里。

押送队由四十个雪橇组成。前面的雪橇搭载着行李。然后我们“代表”则是成对的。每一个雪橇都由一匹马拉着。我们后面的一排雪橇只载着士兵。军官和警察巡官则坐在有盖的雪橇里，处于押送队的前面。我们以步行的速度前进。离秋明若干俄里，我们被二三十个武装的“轻装步兵”押送着。过了一会儿，考虑到这些前所未闻和措施是彼得堡命令的结果，有人断定他们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来把我们带到最偏远的地方。毕竟，这次配备着极大规模的押送队可不仅仅是少数笔杆子心血来潮的结果……这可能意味着严重的困难就在前方……

现在大家都睡着了。在厨房隔壁——门虚掩着——士兵在站岗。哨兵在窗户外面来回走动。星夜璀璨，明月当空，积雪遍地，天空湛蓝。多么奇怪的景象——我们分散地躺在地板上熟睡，而士兵却在门窗旁边彻夜不眠……但是，毕竟我上次就经历了这一切，

记忆犹新……而且，由于克雷斯蒂监狱对我来说似乎是敖德萨监狱的复制品，两者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所以这次行程无非是延续了伊尔库茨克省的第一次旅程（中途偶尔会被打断几次）……

在秋明的监狱，政治犯很多，尤其是“行政的”流放人员。锻炼时，他们聚集在我们的窗户外面唱歌，甚至打出了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革命万岁！”。合唱还可以。显然，他们长期保持着团结，有许多实践的机会……这幅景象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你喜欢的话，还很令人感动。我们通过狭小的通风窗，用了几句话向他们打招呼。在同一座监狱，刑事犯给了我们一份很长的散文式的、富有韵律的请愿书，请求我们“辨认来自彼得堡的革命者”然后帮助他们。我们曾想给一些急需的政治犯塞些钱，里面有很多人衣衫褴褛，但管理方断然决然地拒绝了。“指示”禁止“代表”与其他政治犯之间发生任何联系。甚至用用不着见面的货币方式也不行？是的。多么有“远见”啊！

我们没法在秋明发电报，因为没人必须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现在是几点钟。太蠢了吧！就好像我们在阅兵却不知道行进路线似的。

1月18日，波克罗夫斯科耶。我是在旅程的第三次停止时写下这封信的。我们以每小时不到6俄里的速度行进，行程时间不超过四五天。所幸，霜冻还不是很严重——零下20，25或30度（列氏温标^[3]）。三周前气温一度下降到零下52度。想象一下，我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和小孩子们一起行进的！

还剩一个星期，就到托博尔斯克了。没有报纸，没有信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新闻。

[3] 列氏度为列奥缪尔发明的温标列氏温标（R）的单位，用于热学中温度测定，符号为° Re。列氏温标（Re）与摄氏温标（C）换算：1Re=0.8C。——中译者注

我虽然是在这里写信，但不知这些信能否到达目的地，因为我们被禁止沿途寄信。所以我们只能找机会偷偷寄信，但不一定凑效。但是这些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都已穿得很暖了。在受够了单人牢房的污浊空气后，我们畅快地呼吸着这寒冷的空气。您应该清楚，人类的生理机制不是为单人牢房的条件而被设计出来的。

海涅在 1843 年的《巴黎书简》中写道：“在这个群体性国家，单独监禁——一种宾夕法尼亚式方法——被看作是一种闻所未闻的残酷行为，而法国人民太宽宏大量了，不同意为了自身的公共安全而付出这样的代价。因此，我相信，即使议院同意，这种可怕的、反人道和反自然的单独监禁制度也不会确立下来，而且，感谢上帝，为建造必要的场所花费的数百万美元，是浪费钱。人民曾经愤怒地粉碎了贵族的巴士底狱，以后也将以同样的愤怒来粉碎这些资产阶级新骑士的城堡。无论后者的外表多么严峻和可怕，它都是一个明亮的亭子，与那些小的、静寂的美国洞穴相比，它是一个快乐的亭子。而这些洞穴只能由一个头脑昏聩的虔诚主义者发明出来，只能被一个在自己的财产面前战战兢兢的无情商人采纳使用。”

这些都说得对。但是，我还是更喜欢独处。

五六年来，西伯利亚仿佛都没什么变化，但同时又有所变化。不但西伯利亚的士兵变了（看！他们的变化挺大的！），并且西伯利亚的农民（“切尔顿”）也变了！他们每个人都议论政事，都想知道什么时候“变天”^[4]。我们车夫的一个十三岁的小孩（他说他有十五岁），他在赶车的时候，一路高声喊道：“起来，工人们，站起来，去斗争！快来，饥饿者，去战斗！”^[5]士兵就喝止他，并恐吓他要

[4] 原文直译为“每个人都谈政治，都想知道‘这’什么时候终结”。——中译者注

[5] 这里很接近《工人马赛曲》的副歌。——中译者注

报告长官。但显然士兵是很同情他的。可是这小孩知道他们都站在自己这一边，所以仍然在他们的默许之下喊着工人们“站起来”。

我们的第一个停留地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农家小屋，我就是在那里给你写了信。此后的两处停留地则是政府设立的，但照样破烂不堪，不过让人稍微舒服一点。屋中有区别男女的房间，还有厨房。我们睡在分层木板床上。我们的卫生条件必然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在行程中着实最令人不快。

到了我们停留的地方，农民们就带给我们牛奶、凝乳、乳猪肉、堆料面包（“shangy”）以及其它食物。按命令，他们本来是进不来的。“命令”要求外人不得同囚犯来往，但押送兵除了让农民进来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来保障我们的食物供应。

我们的头子费特来维持秩序。我们全体囚犯、军官、士兵、警察、售卖食物的农妇，都称他为“博士”。他似乎从不知疲倦。打包、购物、做饭、教我们唱歌等等，他都做得来。其他人轮流帮助他，他们彼此相似，几乎什么都做不了……此时他正在做饭，人群气氛活跃。“博士需要刀子……”“博士需要一些黄油……”“看，朋友，你介意把这些厨房垃圾带出去吗？”……博士会说：“啊，你不吃鱼吗？我给你炸一块鱼饼吧，我也不吃鱼……”吃完饭后，茶被端到了分层床旁边。我们的女士负责端茶——这也奉费特博士之命的。

1月23日。我在到托博尔斯克之前的倒数第二个车站给您写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旅站，又新，又宽敞，又干净。经过最后的泥泞，我们的身心都在调养身心。我们离托博尔斯克有60俄里远。您也许知道，我们这些天来是多么梦想着一个“真正的”监狱，在那里我们可以好好地洗漱和休息。这里只住着一位政治犯村民，曾在敖德萨开过酒铺，因在士兵中进行宣传而被定罪。他经常带着杂

货到车站来找我们，给我们讲托博尔斯克省的生活状况。大多数流亡者，还有定居者和“行政人员”，都住在托博尔斯克周围距离100—150俄里的村庄里。然而，在别列佐夫县也有流亡者。那里的生活无比艰难，需求更紧。从各地逃出来的人数不胜数。几乎没有监视，也不可能。搜查主要在秋明市（铁路的起点），在铁路沿线普遍抓捕逃犯。但被抓到的人占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

昨天我们无意中在一份秋明的旧报纸上看到了两封未送达的电报——给我和S.（一名羁押解送监狱的囚犯）。就在我们在秋明的时候，电报来了。行政机关没有接收这些电报，这也是他们的阴谋之一，不过他们和我们一样不清楚这样做的意义何在。他们在路上非常小心地押解着我们。上尉折磨着士兵们，让他们连夜超负荷值班——不仅在车站，而且在全村巡逻。不过可以看到，随着我们被向北，“体制”正在解冻：我们被押送进入商店，成群结队地在村子里走动，有时还拜访当地的流放犯。士兵庇护我们——我们对上尉的反对态度使他们感到非常亲近。处于最两难地位的是军士，他们算是军官和士兵之间的联络人。

“不，先生们，”他曾当着士兵的面对我们说，“军士今非昔比了……”

“现在还有人惦记着旧时光……”人群中有个士兵说道，“只要揪住他们的尾巴，就能让他们再好好思考一下。”

大家都笑了。那位军士也笑了，但笑容里夹杂着不悦。

1月26日，托博尔斯克监狱。在托博尔斯克之前的两站地，县警长的助理来迎接我们——一方面是为了加强警戒，另一方面是为了提高礼遇。哨兵们全副武装。商店停止营业。住在另一侧的家庭被提供了加盖的帐篷。软硬兼施！在到达镇子前大约十俄里处，两名流亡者乘马车出来迎接我们。军官一看到他们，就立即“采取”

了措施：他沿着我们的马车前进，命令士兵们下马（此前他们坐着雪橇）。就这样，我们走了 10 多俄里。士兵们当着面咒骂长官，在路的两侧步行，肩上扛着枪。

但在这里得打断一下：刚刚被叫到办公室的博士告诉我们，我们都会被送到奥布多尔斯克村；这意味着我们要在军事押送队的带领下每天走四五十俄里。到奥布多尔斯科耶有 1200 多俄里的雪路。这意味着，即使在最理想的条件下，哪怕一直都有马，还不会因疾病耽误时间，我们也得在路上走一个多月。到流放地以后，我们每月将获得 1 卢布 80 戈比的津贴。

现在，带着年幼的孩子出行一整个月是特别困难的。他们说，在别列佐夫和奥布多尔斯克之间将不得不靠驯鹿前进。这对在我们之中与家人一起来的人来说是特别令人不快的消息。当地行政机关发誓说，是彼得堡规定每天 40 俄里而不是 100 俄里——荒谬之极，就像我们旅途中的所有其他细节一样。当地办公室里的“聪明人”想出了一切办法来防止我们逃跑。有一说一，他们规定的十项措施中，有九项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些“自愿跟随”丈夫流亡的妻子们要求在托博尔斯克停留的三天里被放出监狱。州长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说这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完全违法。当地舆论有些不安，正在写抗议书。但抗议有什么用呢？因为每次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对不起，我们要服从彼得堡的指示。”

因此，报纸上最险恶的谣言也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我们的流放地是该省的最北端。奇怪的是，在判决书中体现出来的“平等”也影响了流放地的选择：我们所有人都被发往同一个目的地。

托博尔斯克这里的人对奥布多尔斯克的印象，就和您对彼得堡的印象，模糊不清。他们只知道那是北极圈内的一个村庄。问题是：他们是否要在奥布多尔斯克安置士兵，专门看管我们？这倒是

合乎逻辑。还有，是否有组织逃跑的可能性，还是说我们不得不待在北极圈内，等待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整个政治环境的变化？我们有理由担心，我们要是被放出来，一个技术问题就会上升成为一个政治问题。那么好吧，我们将在奥布多尔斯克等待。我们也会工作。请继续给我们寄书和报纸，报纸和书。谁知道事态将会如何发展下去？什么时候能够证明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也许我们不得不在奥布多尔斯克度过的这一年，将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最后一场革命的呼吸空间，以让我们填补知识上的空白，并进一步磨练自己的武器。您会不会认为这样的想法太玄学了？亲爱的朋友，当一个人在被押送到奥布多尔斯克时，搞一点儿玄学也无妨。

1月29日。我们离开托博尔斯克已经有两天了……一名军士指挥着30名士兵，而这30名士兵就组成了押送我们的队伍。我们在星期一早上乘坐巨大的三套车离开。但在第二次停顿后，拉动每架雪橇的马匹数量从三匹减少到了两匹。那是一个奇妙且美丽的早晨，天空澄朗，四周洒满阳光，满地雪霜。林海茫茫，素裹银装。如梦如幻，宛若仙境。骏马飞驰——这是西伯利亚人惯有的节奏。当我们离开小镇时（监狱在最郊区），一群当地的流亡者，有四五十人，站在那里等着我们；有许多问候、手势，试图和我们交头接耳……但我们被迅速赶走了。这里的人已经编造了关于我们的谣言：有人说是五位将军和两位省长被流放，有人说是一位伯爵和他的家人，还有人说我们是国家杜马的成员。而我们昨晚在其家中停留的那个女人问博士。“你们也是政治家吗？”“是的，我们是政治家。”“那么您肯定是所有政治家的首领了吧！”

今晚我们住在一个又大又干净的房间里，房间的墙壁上贴着纸，桌子上铺着布，地板上刷了漆，有大窗户，还有两盏灯。在受够了之前那些肮脏的环境后，这一切都非常令人愉快。但我们不得

不睡在地板上，因为房间里有九个人。他们在托博尔斯克更换了我们的押送，秋明的押送有多么友好客气，托博尔斯克的押送就有多么粗鲁刻薄。这是因为没有军官；士兵们觉得自己要对可能出现的一切错误负责。但我必须补充一点：仅仅两天之后，他们就大大“解冻”了，我们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这在如此漫长的旅途中远远不是一个简单的细节。

从托博尔斯克开始，几乎每个村庄都有政治流亡者，其中大部分是“农业者”（因暴乱而流亡的农民）、士兵、工人，只有少量的知识分子。有些是“行政流放者”，少数是“定居流放者”，即被判处在此定居的流亡者。在我们经过的两个村庄中，“政治家”合作办了个作坊，赚了一点儿钱。总的来说，我们还没有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这是因为这些地方生活成本非常低廉：“政治家”每月向农民支付6卢布的食宿费，这是当地流亡者组织规定的最低标准。每月花10卢布就能过上“小康生活”。越往北走，生活成本就越高昂，工作也越难找。

我们遇到过一些曾经住在奥布多尔斯基的同志。他们都称赞这个地方。这个村子很大，有1000多名居民和12家商店。房屋都是按照城镇模式建造的，很容易让人找到好的住所。这地方多山，非常美丽，气候非常宜人。我们中的工人可以找到工作。通过授课也可以赚到一些钱。生活成本确实很高，但收入也不低。这个无可比拟的地方只有一个缺点：它几乎完全与世界隔绝。它离铁路有一千五百俄里，离最近的电报局有八百俄里。邮件每周送达两次。但在春秋两季路况不好时，邮件会完全送不过来了，持续时间为六周至两个月。假如今天在彼得堡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那么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当地的警察仍然会在奥布多尔斯基称王称霸！奥布多尔斯基离托博尔斯基的公路如此之远，而且还是一个巨大地

区的独立中心，所以才会有如此相对地有活力。

流亡者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很长时间。他们不停地在全省各地奔走。奥布河上的定期蒸汽船会免费运送政治犯。付费乘客不得不挤在角落里，而政治犯则占据了整艘船最好的位置。亲爱的朋友，这可能会让您感到惊讶，但这就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大家都习惯了，以至于我们的农民车夫听说我们要去奥布多尔斯克时，就告诉我们：“不要紧，不会太久的，明年春天你还会坐汽船回来的……”但我们这些苏维埃人究竟是以什么目的被安排到奥布多尔斯克的呢？目前，那边已经得到指示，要给我们提供最好的雪橇和途中最好的住所。

奥布多尔斯克！地球上一个微不足道的点……也许我们将不得不在几年里适应奥布多尔斯克的条件。即使是我的宿命论心情也不能保证完全的心安。我咬紧牙关，渴望着电灯的明亮，火车的噪音，和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新鲜报纸的味道。

2月1日。尤罗夫斯科耶。今天的情况和昨天完全一样。我们走了50多俄里。有一名士兵与我的雪橇相伴而行。他用满洲的战争故事来让我不烦闷。押送我们的是西伯利亚团的人，该团在战后几乎完全重新组建。在所有的团中，这个团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它的一部分驻扎在秋明，另一部分驻扎在托博尔斯克。正如我以前告诉您的那样，秋明的士兵对我们的态度非常好，托博尔斯克的士兵则比较粗暴；在他们中间有一大群人“自觉”拥护黑色百人团。该团由波兰人、乌克兰人和西伯利亚人组成。西伯利亚本地人是最无知的分子。但即使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出色的家伙……仅仅两天之后，我们的新押送队就开始对我们软化了——这个细节并非微不足道，因为这些战士现在掌控着我们的生死。

我的押送兵对“中国女人”充满了热情。“她们都是一群美丽

的娘们。中国男人身材矮小，无法与真正的男人相比，但中国女人却很美，白皙而丰满……”

“那么，”我们的雪橇车夫，一位退伍军人问道，“我们的士兵有没有和中国女孩‘厮混’过？”“没有……都不让我们接近……他们先带走中国女人，然后再放军队进来。不过，我们的一些人在高粱地里抓到过一个中国女人，折腾了一番。其中一个士兵把他的帽子落在了那里。于是中国人把这顶帽子带过来，给我们的指挥官看。他把整个团的人排成一排，问道：‘这谁的帽子？’没有人出声，丢了帽子总比惹上麻烦好，明白吗？最后这一切都不了了之。但中国女人很可爱……”

我们乘坐三套（Тройка）雪橇离开了托博尔斯克，但自从第二次停靠后，雪橇就变成由两匹马拉着，因为道路一直在变窄。

在我们换马的村子里，已经有雪橇套上马具在等待。换马是在村外，在田野中间进行的。通常，所有居民都会出来看我们。一些生动的场景发生了。女人们牵着马的缰绳，男人们在“博士”的指示下照看我们的行李，孩子们在我们周围吵吵嚷嚷地跑着。昨天，一些“政治家”想在我们换马的时候给我们拍照，在乡政府大楼外等着我们，但我们被驱赶着疾驰而过，他们没有机会下手。今天，当我们进入现在过夜的村庄时，当地的“政治家”打着红色的旗帜迎接我们。他们有十四个人，包括十来个格鲁吉亚人。士兵们一看到红色旗帜就惊慌失措，拔出刺刀，威胁要开枪。最后他们成功地夺取了红色旗帜，并逼退了“示威者”。在我们的押送队中，有一小队士兵围绕着一个上等兵。他是一个旧礼仪派教徒。这个人是一个特别低级和残忍的野蛮人。没有什么能比欺负一个男车夫、吓唬一个鞑靼女人或用枪托打马还能他高兴的了。一张砖红色的脸，永远半开的嘴，没有血色的牙龈，以及不眨眼的眼睛，使他看起来像

个白痴。这个上等兵与负责押送的军士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他认为军士对待我们不够粗暴。当涉及到抢夺红旗或推回一个离我们的雪橇有点太近的政治人物时，上等兵和他的小帮派总是先到场。我们都必须控制自己，以避免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一旦发生麻烦，我们很难指望军士，他在这个上等兵面前怕得要死。

2月2日，晚上。德米安斯科耶。尽管，迎接我们的红旗昨天在尤罗夫斯科耶被部队夺走了，但今天早上，当我们离开村庄时，有一根挂着新旗帜的长杆插在雪堆里。这一次没有人去碰它；士兵们刚刚坐上他们的雪橇，没有人愿意再出来。就这样，我们走过它身旁的列队。再往前走，在离村子几百步远的地方，在道路向河边倾斜的地方，我们看到雪坡上写着一排大字：“革命万岁！”我的车夫，一个18岁左右的家伙，读到这句话时，突然大笑起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革命万岁？”我问他。“不，我不知道。”他想了一会儿后说，“我只知道人们一直在喊这些话，‘革命万岁！’”但你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他知道的比他准备说出来的要多。总的来说，当地的农民，特别是年轻人，对“政治犯”的态度非常好。

下午1点，我们到达了要过夜的大村庄——德米安斯科耶。一大群流亡者来迎接我们（这里有60多名流亡者）。这在我们押送队中的一部分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上等兵立即把他的信徒聚集在他周围，以防万一。幸运的是，没有出现任何麻烦。很明显，他们已经在这里紧张地等待我们很长时间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被选出来负责接待我们。当地的“公社”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和舒适的住处。但我们不被允许去那里，只能暂时待在一个农民家里；而晚餐被带到了这里。与政治犯们见面是非常困难的——他们每次只能带着晚餐的一部分、三三两两地进去看我们几分钟。除此之外，我们在士兵的陪同下，轮流光顾当地的商店，在路上还能和在街上等

了一整天的同志们交流几句。其中一个女流亡者打扮成农妇，来向我们推销牛奶；她演得非常好，但房子的主人看来把她交给了士兵，他们立即强迫她离开。上等兵正在执勤的时候我们运气更差。我记得我们在乌斯季库特（在勒拿河边）的小聚居地是如何为每一批新的流亡者的通过做准备的：我们试着煮白菜汤，做饺子，总之我们无非是重复了今天德米扬斯科耶人为我们做的事情。一旦一大批流亡者经过沿途的某个小殖民地，那么这个小殖民地就会郑重其事地对待他们，因为这里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听到家里的消息。

2月4日，晚上8点，契嘉林帐。我们的随行警官应我们的要求，向托博尔斯克管理部门询问是否可以加快行程的节奏。显然，托博尔斯克向彼得堡请示了这件事，结果警官收到了一份电报，享有了在这方面的行动自由。假设我们从现在起每天走七十多俄里，那么就有可能在2月18到20日间到达奥布多尔斯克。当然这只是一种估计。

我们在一个叫契嘉林帐的小村子里停留。但实际上，这里的房子不是蒙古包，而是农民的小屋。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汉特人^[6]。汉特人非常明显是外族人。然而，他们的言行举止和生活方式与农民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比西伯利亚的农民更能喝酒。他们每天都喝酒，从清晨开始喝，到中午就已经醉了。

一位当地的流亡者 N，是一位教师，给我们讲一些新奇的事情。听说有不知名的人要经过他们的村庄，而且这些人到处受到隆重的接待，汉特人就会变得非常害怕，不喝酒，甚至把他们的酒藏起来。所以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清醒的。然而，到了晚上，除非我弄错了，我们的汉特主人醉醺醺地回家了。

[6] 汉特人，旧称奥斯加克人，是居住在西西伯利亚的土著民族。——中译者注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渔村，很难买到肉。这位老师组织了一支由流亡者和当地农民组成的渔民队伍。他买了渔网，亲自监督捕鱼作业，并将捕获到的鱼带到托博尔斯克出售。去年夏天，这个团队的每个成员都赚了 100 多卢布。每个人都尽量使自己适应环境……不错，N 自己也靠着捕鱼填满了自己的腰包。

2月6日，萨马罗沃。我们昨天走了六十五俄里，今天走了七十三俄里，明天我们还得走这么远。农业区现在就在我们身后；这里的农民，不管是汉特人还是俄罗斯人，都只从事捕鱼活动。

托博尔斯克省的“政治犯”定居率是非常惊人的。实际上，没有一个偏远的小村庄不存在流亡者。我们停下来过夜的房子的主人告诉我们，不久前这里还没有流亡者；十月十七日宣言后，他们开始大量涌入。“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涌入这个地方”，宪政时代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就是这样！在许多地方，“政治家”“从事”与原住民相同的职业：他们收集和清理杉木果，捕鱼，采集浆果，打猎。更有进取心的人组织了合作工场、捕鱼团体、消费品商店。农民对流亡者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例如，在萨马罗沃——一个大的贸易村——农民免费给“政治家”提供了一整间房子，并给第一个到达的人赠送了一头小牛和两袋面粉。有一个既定的传统，即商店卖给流亡者的价格要比卖给农民的便宜。这里的一些流亡者住在公社里，有自己的房子，屋顶上一直飘着一面红旗。请尝试在巴黎、柏林或日内瓦升起红旗吧！

我想顺便讲讲我观察到的目前流亡者的普遍状况。

自 90 年代以来，西伯利亚监狱的政治人口的社会构成逐渐变得更加民主。这一事实已经被指出了几十次，甚至几百次。工人在“政治家”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终于超过了革命知识分子的人数，他们曾经习惯于把彼得保罗要塞、克里斯蒂和科雷马监狱视为他

们私人的和世袭的“垄断财产”，类似于“遗赠的遗产”。在本世纪初，我仍然看到人民意志党和人民权利党的成员，当他们看到来自维尔纽斯的扫烟囱人或来自明斯克的饲料商与最新的囚犯队伍一起到达时，他们几乎是以一种冒犯人的方式耸耸肩。但当时的流亡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革命组织的成员，其政治和道德水平很高。几乎所有的流亡者，可能除了来自犹太区的工人，都被宪兵队审讯的筛子筛过了。而且，不管这个筛子有多粗，它一般都会保留最先进的工人。这有利于把流亡人口保持在一定的水平。

在我国历史上的“宪政”时期，流亡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现在它不再是一个组织的问题，而是一个自发的、群众的运动的问题。宪兵队的审讯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大规模的街头围捕。群众中最不起眼的人现在不仅有资格被流放，甚至还可能吃枪子儿。在镇压了一系列人民运动之后，便进入了一个“游击”行动的时期，为了革命的目的或仅仅在革命的借口下以最大限度的冒险做普通的暴徒行为。凡是不能被绞死的人都被政府送到了西伯利亚。不难理解，如此巨大的“斗殴”涉及到许多人，而他们只是稍微触碰了一下革命，或者是无辜的旁观者，更不用说还有许多来自大城市黑社会的冒险家。您可以想象这会如何影响流亡者的总体水平。

还有一个因素导致了同样的发展方向：逃亡。很明显，哪种人会逃跑？最积极、最自觉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党和工作在等着他们。成功的比例可以通过以下事实来判断：在托博尔斯克省的某个地方，450名流亡者中只留下了大约100人。只有那些懒惰的人留下来。因此，剩下的大部分流亡者都是在灰色地带的、政治上不明确的人，或者是偶然的观众。少数活跃的人，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设法离开，有时被置于困难的境地，因为所有的“政治家”在道义

上都受到相互担保制度约束。

二月八日，卡里姆克林斯基帐。昨天我们走了七十五俄里，今天走了九十里。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了留宿地，很早就上床睡觉了。

今晚我们在汉特人村庄的一个脏兮兮的小屋里过夜。烟在雾缭绕的幽黯的厨房中，押送我们的士兵打着寒颤，在昏醉的汉特人间来回踱步。隔壁传来了羊叫声……村中刚庆祝过婚礼。这正是汉特人结婚的时候，所以所有的汉特人都酩酊大醉。他们要是醉了，就时不时走到我们这儿来……

有一个萨拉托夫的瘦弱的老人前来探望我们。他也是喝高了。他以前在政府做官，也被流放了。他与另外几个同伴从别列佐夫到这里来买肉，然后再转卖出去。他们都是搞政治的。

我们很难在这里为接下来的行程作准备。我在之前的信中曾告诉您说我们的队伍是由 22 个雪橇组成的，这 22 个雪橇又是由大约五十匹马拉着的。这二十二。但几乎没哪一个村庄有这么多马的，所以要跑遍各个村庄去征用马匹。在几个站上，据说拉车的马是从百俄里外的地方征过来的。但是两站间的距离在这一带却很短，通常不过 10—15 俄里而已。于是汉特人不得从百里外去征集马匹，带着两位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员行进了 10 俄里！还有，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到达，所以许多带着马来的人不得不等待两周甚至更久的时间。上一次发生这种事，那都是省长跑到这地方视察的时候了……

我曾经听人说过地方的农民通常都很同情“政治家”，而对我们似乎更是如此。在别洛戈里我们找到了一个例子。别洛戈里是居于别列佐夫区的一个小村（我们是已走的这么远了）。一组农民为我们预备好食品及茶，他们并筹了六卢布捐给我们。我们当然不想

收他们的钱，但却很愿意与他们一起饮茶。然而，我们的押送兵不准我们聚在一起。实际上，普通的士兵是统一的，但上等兵却小题大做，还说要让全村都知道这件事，甚至还去吓唬普通兵。所以我们连茶都没有喝，只好离开了。几乎全村的人都送我们出来。由此可知，农民是对我们极具好感。

2月9日，康定斯基村。我们又走了100俄里。再过两天，我们将到达别列佐夫，也就是11号。我今天累极了；我们在连续九、十个小时的行程中都没有吃东西。我们一直在沿着鄂毕河行进。右岸是丘陵和树林，左岸很低。河道很宽，天朗气清，温暖舒适。道路两边的小杉树像信标一样笔直地立在雪地里。我们的车夫大多是汉特人。雪橇由两三匹马拉着，一前一后，因为我们越往前走，路就越窄。车夫们都手持带着长柄长鞭。车队在很远的地方展开。其中一个车夫不时高喊，使马匹飞奔起来，掀起厚厚的雪尘云。这种速度让人喘不过气来。雪橇几乎叠在一起，以至于一匹马的嘴会突然出现在你的肩膀后面，对着你的脸呼吸。然后，其中一架雪橇翻倒了，或者马具的某些部分断裂或脱落了。整个车队都停了下来。路途遥远，令人昏昏欲睡。空气非常平稳。车夫们彼此大呼小叫。然后马匹再次动脚，很快我们就再次飞奔起来。频繁的停顿大大降低了我们的速度，也使车夫无法达到最高速度。我们的速度大约为每小时15俄里，而这里的正常速度应该是18至20俄里，甚至25俄里……

在西伯利亚，快速旅行是正常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必要的，因为距离总是很远。但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行程，即使在勒拿河边也是如此。

我们到达了一个车站。在村子外面，套好的雪橇和新的马匹正在等待；我们的雪橇中只有两架是留给有孩子的家庭的，是去别列

佐夫的“直通车”。我们迅速换好衣服，继续上路。这里的车夫坐的方式很特别。一块木板钉在雪橇的前端——在这个地方被称为“坐板”。车夫坐在坐板上，也就是那块光秃秃的木板上，他的脚悬在雪橇的侧面。当马匹奔跑时，雪橇时不时左右倾斜。车夫就用他的身体来平衡它，像游艇一样向侧面倾斜，有时还用脚从地上推开……

2月12日，别列佐夫狱中。五六天前（当时我没有写，以免引起您不必要的担心）我们经过了一个盛行斑疹伤寒病的地区。现在那些地方已经被我们远远抛在后面了。在我向您提到的契嘉林帐，60间房子里就有30间有斑疹伤寒病例。其他许多村庄也是如此。死亡病例很多。几乎每一个车夫都失去过亲戚。我们加快行程的和改变原定计划，其直接原因就在于斑疹伤寒：地方警察以必须尽快通过危险地区为由向当局发电报请示。

这几天来，我们径直向北走，每天行程大概90—100俄里。也就是说，我们每天大概能走一个纬度的距离。走这么快，就非常能让我们感受到文化的落后（如果能用这个词来形容这里的文化的话）。我们每天向前行进一个纬度的距离，进入寒荒之地。这让人感觉仿佛是登上高山——越往高处爬，就越能感受到不同海拔地区的差异……最初是俄国富农，然后是俄罗斯化的汉特人因为互通婚，已经失去了蒙古人的大部分特征了。然后，当我们经过了耕地以后，又遇上了汉特渔人和汉特猎人。他们头发蓬松，身材短小结实，讲着半生不熟的俄语。马匹越来越少，并且在这里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所以还远远比不过狗的价值路越来越差，要么就是太窄，要么就极其粗糙……我但是根据警佐的说法，“路上”的汉特人比生活在鄂毕河沿岸的居民的文化程度要高。

这地方的人对我们抱着模糊、困惑的态度，就像看到了长官缩

起来了那样。今天有一人问我们说：“你们的将军在哪里？我想见见他……我从来没有见过将军。”

今天，一个汉特人正在给我们的雪橇配马，一匹很弱小的马。另一个人见着了，说道：“把那匹好一点的马带过来。你以为他们是谁，警察？”但还有一个相反的情况，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句话才是对的。当时一个汉特人对我们说：“这乘客都不是大人物……”

昨天晚上，我们到了别列佐夫。您简直没法想象这里的“镇”的情况。这恰如维罗霍列纳克、基连斯克一样，有 1000 名人口的村镇，并有一个警察署及税务机关。据人说，这地方便是奥斯特曼及缅什科夫的坟墓，但这话未必是正确的。当地的智者还指出了缅什科夫在其家中吃饭的老太太。

我们立即被押到监狱。在那里，当地全部的驻兵，大概有五十人，排着队迎接我们进牢房。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清扫了牢房，并提前把所有的囚犯都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一个牢房有一张盖着桌布的大桌子，几把餐椅，一张牌桌，两个插好烛的烛台，一盏厨房用的油灯。这可真是太体贴了，太让我感动了……

我们在这里休息了几天，然后继续行进……

是的，我们还要前进……但我完全不知道去往何方。

第五章 返

在我们马拉雪橇旅行的第一段时间，每到一個宿营地我就向回望，惊恐地发现我们离铁路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奥布多尔斯克对于我们而言不是最终的目的地，对我也不例外。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逃跑的事情。我有返程的护照和路费，它们被我巧妙地藏进了靴底。但是规模庞大的护卫队和警觉的监管制度让沿途逃跑变得极为困难。然而，不得不说，逃跑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当然不是集体逃跑，而是独自逃跑。我们虽然有一些绝非不符合实际的计划，但是一想到逃跑之后留下来的人会是什么下场，我们就被吓住了。护卫队的士兵，尤其是军士，有责任把流放者送到指定的地点去。去年有个托博尔斯基的军士因为纵容被判行政流放的学生逃跑，所以进了惩戒营。自此以后，托博尔斯基的护卫队就戒备起来了，在流放途中对待犯人的态度也恶劣得多了。他们与犯人之间仿佛达成了一個不成文的协议：不要在路上逃跑。我们没人觉得这个协议有绝对的约束力，但它还是瓦解了我们的决心，让我们就这样把一个又一个宿营地抛在身后。快到终点的时候，我们已经行进了数百俄里，怠惰也滋长起来了。我也不再向回望了，而是向前看，“在当地”努力，又担心自己不能及时收到书籍和报纸。总之，我就准备好长期待在那儿了……在别廖佐夫^[1]，这种心态立马就烟消云散了。

“有办法逃出这个地方吗？”

“在春天的时候会比较容易。”

“那么现在呢？”

[1] 别廖佐夫是别廖佐沃的旧称。别廖佐沃是俄罗斯联邦汉特—曼西自治州的市区和行政中心。——中译者注

“这就难了，不过也不是完全办不到。但是之前没人这样干过。”

所有人都告诉我们，在春季逃离这个地方轻而易举，因为一小撮警察完全不可能管得住一大群流放者。然而，要看管住在同一个地方、受到特别关注的十五名流放者还是有可能的……现在就跑会好得多。

但要这么做的话，首先就必须待在别廖佐夫。行进到奥布多尔斯克就意味着返程需要额外增加 480 俄里。我告诉县警察局长我累了、病了，不能也不愿意马上出发，局长跟医生商量了一下，让我在别廖佐夫休息几天。我被送进了医院，此时我还没有任何明确的计划。

在医院，我享受到了相对的自由。医生建议我尽可能多走路，然后我就借着散步的机会去弄清楚附近的方位。

沿原路（大托博尔斯克公路）返回似乎是最简单的，但这条路看起来很不安全。确实，许多可靠的农民居住在这条路的两旁，可以暗地里把我从一个村庄送到另一个村庄，但还是非常有可能遭遇不测。整个行政机构都是沿路布局的。两个昼夜之内——紧急的时候还可以更快——就可以从别廖佐夫到达最近的电报站，然后就可以发电报警告警察，让他们在通往托博尔斯克的整条路上严加戒备。我最终没有采用这个方案。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坐着驯鹿雪橇翻越乌拉尔山，然后经伊日马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在那里等着坐第一班轮船出国。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路很安全，只经过偏僻的地方。但是待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又有多安全呢？对此，我手头完全没有任何情报，短时间内也无从获取这些信息。

第三种计划似乎最可行。先是坐驯鹿雪橇到达乌拉尔的矿厂

区，在博格斯洛夫斯克工厂乘坐窄轨火车，沿着铁路到库什瓦，也就是窄轨铁路和彼尔姆线交汇的地方。从那里就可以去彼尔姆、维亚特卡、沃洛格达、彼得堡、赫尔辛福斯……

沿着索西瓦河或者沃古尔卡河，是有可能乘坐驯鹿雪橇从别廖佐夫直达工厂区的。出了别廖佐夫立刻就是一片荒凉，方圆上千俄里之内都没有警察，也没有一个俄罗斯人的村落，只有汉特人的帐篷零星散布在大地上，自然也不可能有电报，而且一路上连一匹马都没有——一路只适合驯鹿雪橇走。我只需要赢过别廖佐夫行政当局一段时间就够了，之后他们哪怕沿着我走的同一个方向追，也不可能赶得上我。

有些人警告我说，这趟旅途充满了艰难险阻。有的地方方圆一百俄里内都没有人烟。汉特人，这一地区仅有的居民，遭受了传染病的猛烈侵袭：梅毒没有绝迹，斑疹伤寒症也经常造访。没人能帮忙。就在这个冬天，多布罗沃利斯基，一位来自别廖佐夫的商人，在靠着索西瓦河路上的欧尔维帐篷发了高烧，他无助地在病床上辗转了两周，最后年纪轻轻就死掉了……如果驯鹿死了而且找不到别的驯鹿来接替怎么办呢？如果遇上暴风雪了呢？暴风雪有时候会持续好几个昼夜，要是在沿途撞上它就必死无疑了。与此同时，二月正是暴风雪的月份。而且，现在真有能去工厂区的路吗？那边的人员交通很少，如果汉特人这几天都没有在这些地方之间来往，很多地方的道路痕迹就会被雪完全盖住，也就是说，很容易迷路。这些就是我所受的警告。

不必去否认这些危险。当然，如果从自然环境安全和“舒适”的角度来说，托博尔斯克的公路有很多优点。但正是因为这样，它在警察追捕这方面就要危险得多。我决定沿着索西瓦河出发——事后证明我没有理由后悔做出这个选择。

我还需要找一个能带着我去乌拉尔工厂区的人，而这是最困难的一件事。^[2]

“等等，我能帮您一把，”在和我促膝长谈、深思熟虑之后，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一个年轻的“自由派”商人（我一直在与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商谈）对我说道，“有一个名叫尼基福的科米人^[3]，住在离城镇大约四十俄里的地方……他真的是一只老狐狸……他就像有两个脑袋一样，什么事都办得成。”

“他不喝酒吗？”我预见性地问了一下。

“怎么会不喝——当然喝了，而且这里谁不喝啊？他就因为喝酒把自己糟蹋了。他是个娴熟的猎人，以前靠着剥黑貂皮赚得盆满钵满……但别担心，如果他同意帮忙，上帝保佑，他会节制一下的。我到他那儿去一趟吧。他真的就是只老狐狸……如果他都没法运您，就没人能运您了……”

我和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一起制定了协议的条款。我给三头驯鹿付钱，选最好的那种。雪橇的钱也由我来付。如果尼基福把我安全送到目的地，驯鹿和雪橇就归他了，并且我还会额外付给他五十卢布的现金。

那天晚上我收到回复，尼基福接受了这个提议。他出发前往离他家约 50 俄里的一处帐篷，并且会在第二天午饭前带着三头最好的驯鹿回来。我们应该能在第二天晚上离开。到那时，我必须储备

[2] 以下对逃亡的描述有很大的改动，为了确保帮助我的人的安全，所有使用的名字都是虚构的。——原注

中译者转引自托洛茨基《我的生平》注释：在拙著《1905》中，逃跑这段故意用改头换面的方式叙述。因为在那时如实描写，会使沙皇警察找到我的同谋者的线索。

[3] 科米人（Коми），旧称泽梁人（зыряне），是俄罗斯少数民族之一，其传统区域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东北部的维切格达河、伯朝拉河及卡马河流域。——中译者注

好一切必要的物资：买到上好的鹿皮靴和鹿皮袜、鹿皮外套或者大衣，^{[4][5]}以及十天左右的食物。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主动提出负责这一切。

“我跟您讲啊，”他向我保证，“尼基福会把您带到那里的。他肯定做得到！”

“是啊，如果他不酗酒的话。”我半信半疑地补充道。

“不必担心，上帝保佑，他不会酗酒的……他只担心在山里会找不到路：他已经八年都没走过那条路了。也许就不得不沿着河边走到肖明斯克帐篷去，那条路就远多了。”

情况是这样，别廖佐夫与肖明斯克帐篷之间有两条路。第一条是笔直的“山路”，在好几处地方会直接穿过沃古尔卡河并经过维日普尔蒂姆帐篷。第二条路要沿着索西瓦河走，穿过沙伊坦帐篷、马列耶夫帐篷以及其他定居点。山路只有一半距离，但它很偏僻，连汉特人也很少过这里，而且有时候路会完全被雪给抹掉。

不过，结果我们没法在第二天离开了。尼基福没有带着驯鹿出现，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显得很是窘迫。

“您没给他买驯鹿的钱？”我问道。

“您在说什么呢！我又不是小孩了。我刚给了他五卢布当定金，而且还是当着他老婆的面。您再等等吧，今天我再去他那儿一趟……”

我至少要延期 24 个小时才能离开。局长在任何一天都有可能要求我启程去奥布多尔斯克。这个开头很不好！

[4] Чижь: 驯鹿皮长袜，里面是毛皮；Кисы: 驯鹿皮靴子，外面是毛皮。——原注

[5] “Малица”是一件驯鹿皮大衣，毛皮向内穿；在特别寒冷的天气里，上面会穿上大衣“Гусь”（毛皮在外面）。——原注

第三天，也就是2月18日，我终于离开了。

那天早上，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到医院来看望我。一等到病房里没有旁人的方便时刻，他便坚决地对我说：

“今晚11点您要悄悄地到我这儿来，午夜时分您就离开。我一家老小今晚都要去看演出，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您在我家乔装打扮再吃顿晚饭，然后我骑马送您去林子里。尼基福会在那里等着我们。他会走山路送您：他说昨天有两条汉特人的雪橇压出了一条路。

“这是最终决定吗？”我带着疑惑问道。

“毫无疑问是最终决定了！”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来回踱步，等着夜晚来临。晚上8点，我去了那个举办演出的军营。我下定决心，告诉自己这么做会更好。军营的房间里人满为患。天花板上挂着三盏大灯，左右两旁燃着蜡烛，用刺刀固定在墙上。三位音乐家挤在舞台上，前排坐满了主管人员，在他们的后面商人和政治犯混杂着坐在一起。坐在后排的是些更平常的人——商店店员、小市民和年轻人。士兵站在两侧的墙边。契诃夫的《熊》已经开始演出了，又高又胖且和善的医生助理安东·伊万诺维奇负责扮演“熊”。医生的妻子饰演美丽的女邻居。医生本人则是提词员，在小房间里压低声音说话。然后精心绘制的帷幕落下，全场鼓掌。

在幕间休息期间，政治犯聚在一块儿，相互交换最新消息。“他们说家属代表不能留在别廖佐夫，局长对此深表遗憾。”“顺便提一下，局长说从这里逃出去是不可能的。”有人反驳道：“得了吧，他是在夸大其词。能把人送到这里，也就说明能往回去。”

三位音乐家停止演奏，帷幕升起来了。下一场则是契诃夫的《一位做不了主的悲剧人物》（Трагик поневоле），这部剧讲了一

个每天都要在乡下别墅里忙来忙去的一家之主。军医士中的一个医院看管人扮演这个一家之主，他穿着茧绸上衣，戴着草帽——这可是在二月份的北极圈。这位乡村丈夫的戏剧落下帷幕的时候，我借口说神经痛，向朋友们告辞了。

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在等着我。

“您正好还有足够的时间吃晚饭和换装。我已经通知尼基福在瞭望台十二点敲钟的时候赶去会合地点。”

* * *

约莫午夜，我们就出去到了院子里。离开了明亮的房间后，外面漆黑一片。一片朦胧中，我能看到一架一匹马拉的大雪橇。我在雪橇里躺下，匆匆忙忙地在身下摊开我的鹿皮大衣。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用一大捆干草盖着我，又在上面用绳子把它捆了起来，这样看上去就像是在运货物。干草都冻硬了，里面还夹着雪。我呼出来的气很快就让雪稍微化了一点，雪水落在我的脸庞上。我忘了把手套掏出来，而在绳索底下连稍微动一下都很困难，所以双手也在冰冷的干草里挨了冻。瞭望台的钟响了十二下，雪橇便开始行进。我们从大门出去，马儿在街道上急跑起来。

我想：“终于开始了！”此时，双手和脸上冰冷的感觉只让我感到愉悦，因为这真真切切地证明自己确实已经在路上了。马儿载着我们快跑了二十分钟，然后停了下来。我头顶传来一声尖锐的哨响，这显然是尼基塔的暗号。不远处马上传来了回应的哨声，然后就是些模糊的声音。“这是谁在说话啊？”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上。尼基塔显然和我一样担心，因为他没给我松绑，反倒自个儿小声嘀咕。

“那是谁啊？”我在稻草堆里小声问道。

“鬼晓得他和谁搞在一起。”尼基塔回复道。

“他醉了吗？”

“就是这样，他神志不清。”

此时，说话的那些人从树林里走到了路上。

“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没事的，不要担心，”我听见一个人在说，“让那主体儿放心……他是我的朋友，还有那老人则是我父亲……这些人，没事的没事的……”

尼基塔嘟囔着给我松了绑。一个穿着鹿皮大衣的高大汉子站在我面前，没戴帽子。他有着明亮的棕红色头发，脸上带着醉意却又显得狡黠，看着很像乌克兰人。一个年轻小伙安静地站在一边，一个老人则从林子里出来，摇摇晃晃地抓着雪橇来到路上，显然是酩酊大醉了。

“不要担心，先生，不要担心，”那个红头发的人（我猜是尼基福）说道，“这些是我的人，我给他们做担保。尼基福虽然喝酒，但可没把头脑喝坏……您放心就是。这么雄壮的牲口（他指着那些驯鹿），怎么会不能把您送到……米哈伊尔·叶戈里奇大叔说：你走山路吧，不久前有两架汉特人的雪橇刚走过……我也觉得走山路好……河那边每个人都认得我……我就请了米哈伊尔·叶戈里奇过来吃饺子……他是——条——好——汉……”

“停，别说了，尼基福·伊万诺维奇，快把行李放上去，”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抬高了嗓门儿。

尼基福便匆匆开始忙活。不到五分钟，一切准备就绪，我坐上了新雪橇。

尼基塔责备道：“诶，真是的，尼基福·伊万诺维奇。你不该把这些人带过来的，我跟你说过……喂，你们要当心了，”他又对那两人说道，“你们要说不知道！”

“不知道……”年轻的男人答道。

那个老人则只是虚弱地在空中摇了下手指。我亲切地与尼基塔作别。

“驾！”

尼基福豪迈地吆喝一声，驯鹿猛地往前一拉，我们就上路了。驯鹿精神饱满地奔跑着，舌头垂向一边，哧哧地喘着气。路狭得很，动物们挤在一堆，奔跑的时候却可以互不干扰，这让我不禁感到惊奇。

“要老实说，”尼基福转过头来对我讲，“再没有比这更好的驯鹿了。这些雄鹿（б ы к 指雄性动物）都是精挑细选的：那一群鹿里总共有七百头，这些就是最好的。老米海一开始连听都不肯听，说不会卖掉这几头鹿。但是后来他喝光了一瓶酒，然后说：‘拿去吧。’结果到了交鹿的时候，他哭起来了，说：‘你要知道这领头的（尼基福说时指着那最前面的鹿）是无价之宝啊。倘若你平安归来，我要用相同的价钱向你买还的。’你看，这鹿有多么好！价钱自然也着实不低，但实话说是物有所值。单是那领路的，花了二十五卢布呢。只能向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叔叔打白条借钱。叔叔直截了当的对我说：‘尼基福，你是个傻子。’结果他又说：‘尼基福，你真傻啊。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你是要运这个主体儿呢？’”

“什么角色？”我打断了他的话。

“比如，您就是角色。”

此后我还有许多机会去知道“角色”（субъект）在我车夫的字典中是个惯用词。

我们这样走了不到十俄里，尼基福忽然喝停了驯鹿。

“我们要在这里拐弯，向前走大约五俄里，去一处帐篷……那里面有给我准备的鹿皮大衣。我只穿一件外套能去哪里？肯定会冻坏的。……尼基塔·谢拉皮奥尼奇给我留了字条，能让我去取大

衣。”

这个荒唐的情况令我慌张起来，因为这帐篷距别列佐夫不过十俄里地！听了尼基福支支吾吾的回答，我意识到他本来是应当昨天去拿大衣的，但他这两天却只顾着喝酒了。

“随您的便，”我对他说。“但我不会跟着您一起去拿大衣。鬼知道是什么情况！您该早点预备好的……您要是觉得冷，可以在鹿皮外套外面套上我的皮袄——我现在只拿它来当垫子。并且，我们到目的地的时候，我再把我身上这件羊皮衣给你，它可比鹿皮大衣还要暖和。”

“嗯，好吧，”尼基福很快同意了，说道，“只要不挨冻，谁还要鹿皮大衣呢？咯咯！”他对着驯鹿喝了一声，继续说道：“我们就算不用竿子抽这些壮小伙，它们也会自己跑的。咯咯！”

但是他精神充沛的状态没有持续很久。他不胜酒力，萎靡不振，在雪橇上左摇右晃，竟昏睡了过去。我好几次去喊醒他。他振作起来，用长棍去推那些驯鹿，小声嘀咕道：“没关系，这些小伙会自己走的……”——然后他又睡去了。驯鹿几乎是在慢慢踱步了，只有我的呵斥还多少鼓励着它们往前进。就这么过了两小时，我也禁不住睡了过去，但是几分钟后，我感觉驯鹿停下来了，就醒了过来。刚醒的时候我还以为一切都完了……“尼基福！”我一边拼尽全力大声喊，一边扯他的肩膀。但他只是含糊地答了一些不连贯的话：“我能做什么？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好想睡觉……”

我的状况确实非常糟糕，因为我们离别廖佐夫还不过三四十俄里，在这种距离停留完全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我觉得这是个很糟的玩笑，得“采取措施”了。

“尼基福，”我喊着，从他醉醺醺的头上把风帽扯下来，让他觉得头冷。“您要是再不好好坐下来赶鹿，我就把您扔进雪地里自

已走了。”

不知道是我的这些话还是寒气让他稍微清醒了点。他睡觉的时候手里的竿子掉了下去，他踉踉跄跄、抓耳挠腮，在雪橇里找到了一把斧子。他用斧斫了一棵小松树，削去枝叶。有了新竿子，我们于是再继续行进。

我决定要严厉地管束尼基福。

“您知道您在干什么吗？”我尽可能威严地质问他。“您把这当儿戏？如果他们那帮人赶上来，您以为他们还会夸奖我们是吗？”

“我难道不知道吗？”尼基福回复道，越来越清醒。“这是哪里的话！……唯一的问题就是那第三头鹿不太行。第一头挺好，再找不到更好的了，第二头也很好……只有这第三头，……说实话，真的是屁用都没有……”

天快亮了，温度骤降。我在羊皮衣外裹了一层大衣（Г у с ь），所以觉得颇为温暖，但是尼基福的情形却越来越差。他酒意全无，寒冷的空气早就钻进了他的鹿皮外套，使这可怜人浑身打颤。

“您还是穿上这皮袄吧？”我向他建议道。

“不，现在已经晚了。我首先要自己暖和起来，然后才能暖衣服。”

一个小时过后，路边出现了一些帐篷——三四个原木搭的简陋屋子。

“我进去待五分钟，问一下路，稍微暖一下身子……”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十五分钟。一个裹着皮大衣的人走了过来，在我的雪橇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又走开了。天色稍稍亮了一点，森林和破烂的帐篷在我眼里映照出某种不祥的光芒。

“这件事最后会怎么收场呢？”我在自问。“我能够和这醉汉

走得很远吗？按现在这个速度，那帮人想赶上我们并不难。天知道尼基福喝醉之后会口无遮拦说些什么，要是有人报告到别廖佐夫去，那我就完蛋了。他们即便追不上我们，也可以发电报告知窄轨支线的各个火车站。还有必要继续前进吗？”我迷惘地问自己……

大概半个小时过去了，尼基福还是没回来。我必须去找他，但是忽然想起我根本没注意到他走进了哪个帐篷。我走到离路边最近的一个帐篷，从窗子往里面瞧了一眼。角落里的炉火烧得正旺。地板上放着小锅，冒着蒸汽。木板床上坐着一群人，其中尼基福坐在中间，手里拿着瓶子。我拼尽全力敲打窗子和墙。过了一分钟，尼基福出来了，身上穿着我的皮袄。这件皮袄从他的鹿皮外套下面露出来两俄寸。

“快赶路！”我厉声吼道。

“马上，马上，”他非常顺从地答道，“现在不要紧了，我暖和了，我们走吧。我们夜里赶路，这样就不会发现我们。只不过那第三头鹿没什么用，我们也许给它卸套，不要它了……”

这样，我们又继续赶路。

* * *

此时大概到了早上5点钟。皓月高悬，寒气凛冽，我在空气中都能感受到黎明将至。我早就在鹿皮衣外边穿上了羊皮袄，里面十分温暖。尼基福的骑行姿势里似乎能感受到他的信心与活力，驯鹿也走得很顺利，而我则平静地打起盹来。我不时醒过来看着眼前的景象，感受不到什么变化。显然，我们是在几乎不长树木的沼泽地里行进。矮小枯萎的松树和桦树从雪下边耸立出来，狭窄的道路蜿蜒向前，只能勉强看见一长条痕迹。驯鹿不知疲倦，按着精准的节奏奔跑，宛若一台自动化的机器，而它们响亮的呼吸声则让人想起小发动机的噪声。尼基福摘掉了他的白色风帽，光着脑袋坐着。鹿

的白毛飞散在他毛茸茸的红褐色脑袋上，仿佛让他的头顶结了霜。“我们确实是在继续前进，”我想道，胸中升起一股温暖的喜悦，“一天甚至两天内，他们可能都没发现我不见了……我们是在继续前进呢……”然后我又睡了一会儿。

大约到了清晨 9 点钟的时候，尼基福喝停了鹿。有一顶游牧帐篷（Чум）几乎就挨在路边，这是个用鹿皮搭的大窝棚，像是个截短的圆锥。帐幕近旁停着一辆套好驯鹿的雪橇，旁边堆着砍好的木柴，绳子上挂着新剥下的鹿皮，一个破破烂烂、生着巨角的鹿头就随意丢在地上。有两个穿着鹿皮衣服和鞋子的小孩，正在和小狗一起玩。

“这游牧帐篷是哪来的？”尼基福惊讶起来。“我以为只有到了维日普尔蒂姆帐篷才能看到人迹。”于是他就去询问。原来这些汉特人是从二百俄里外的居住地到这里，为了获取毛皮来捕灰鼠的。我拿了器皿和一些粮食，我们就从盖着鹿皮的小洞钻进了帐篷，希望在这里吃早餐，并且喝一点茶。

“派西！^[6]”尼基福对主人们寒暄问好。

“派西，派西！”回答的声音从各处投来。

地上放着成堆的毛皮，里边还有人影在蠕动。昨天他们痛饮了，所以今天所有人看着都有点宿醉。帐篷的中央燃着篝火，烟雾悠然地顺着帐篷顶预留的大窟窿飘散出去。我们往火里投了几根木柴，把茶壶挂在上面。尼基福说着一口非常流利的汉特语，同主人们谈笑风生。一个抱着孩子的母亲，袒胸露乳，显然是刚在哺乳，起身往火边靠了靠。她看上去很不像样子，就像死了一样。我给了她一

[6] 这个是一个汉特语词汇。根据俄罗斯联邦汉特—曼西斯克（Ханты-Мансийск）2014 年出版的《汉特语—俄语词典》，“пайы”为副词，有“顺利”（ровно）、“平稳”（гладко）的意思。汉特语与芬兰语、爱沙尼亚语同属乌拉尔语系的芬兰—乌戈尔语族，是濒危语言。——中译者注

些糖果。另两个人立马就站起来走向我们。“他们来讨伏特加喝的。”尼基福给我翻译了他们的话。我给了他们一些烈酒，酒精浓度高达95%的那种。他们喝了下去，皱着脸，又吐在了地上。甚至那袒胸露乳的母亲也把自己那份喝光了。“老人想再要点。”尼基福一边向我解释，一边给那头秃的、面颊磨得通红的汉特老人端了第二杯酒。他接着说：“我拿四卢布雇这老人，让他带着我们去肖明斯克帐篷。他驾着三匹鹿先走，为我们开路。我们的驯鹿跟着他的雪橇跑会更快活些。”

我们喝饱了茶，并吃了点东西。我送了主人们一些烟卷做告别礼物。然后我们把所有行李载在老人的雪橇上，各自入座，便重新上道了。艳阳高照，道路穿越森林，空气中有种明快和喜悦的氛围。在我们的前面，汉特人驱着他那三头怀了孕的白色牝鹿。他手上拿着一根很大的长棍，上面那头镶着角制的小钉头，下面这头则是磨尖了的金属帽。尼基福也给自己找了根新棍子了。牝鹿拽着老人的轻便雪橇飞快前进，我们的牡鹿则追赶起来，一步也没有落下。

“为什么那老人不遮脑袋？”我看到汉特人的秃头暴露在寒冷的空气里，感到很惊讶，就询问尼基福。

“因为这样的话，酒气消散得快一点呢，”尼基福回答。果然，过了半个小时，老人停下他的牝鹿来向我们讨酒喝了。

“我们得请请他呢，”尼基福这么做了决定，同时也让自己喝一杯。“您看，他把他的鹿都套上绳子了。”

“是这样吗？”

“他本来打算上别廖佐夫买酒去。我心想，他可别在那边说什么多余的话……所以我就雇用了他，这样我们的事情就更稳妥了。现在他如果进城去，也得要两天了。我可不害怕。他们能问我个啥？他们会问：‘是你为他赶路的么？’我可以回答：‘我怎么知道自己

运了谁呢？你是警察，我是车夫。你领取你的俸禄，我有我自己的收入。你的职责是管人，我的职责是载人。’我这样说，可对么？”

“对！”

今天是 2 月 19 日，明天国家杜马就要开会了。大赦！“大赦乃是国家杜马之头等要务。”也许是吧……但最好还是先往西边走个几十经度再期待大赦。像尼基福所说的，“这样我们的事情会更稳妥。

* * *

绕过了维日普尔蒂姆帐篷以后，我们在路上找到一个口袋，里面看来是装着烤好的面包。这袋子有一普特还多那么重。尼基福不顾我的坚决抗议，坚持把面包袋装载到雪橇上。后来，我趁着他醉醺醺地睡着的时候，悄悄把这捡来的东西扔在了路上。这玩意只会给驯鹿增加负担。

尼基福醒过来后，发现那个袋子和他从老人帐篷里拿到的棍子都不见了。

这些驯鹿可真是奇异的动物呢！它们既不饥饿，也不困倦。它们在我们出发前的二十四个小时之内就什么都没吃，而我们现在走了快一昼夜，中途也没给它们喂食。据尼基福说，它们现在是“走起劲了”。它们以平稳的步伐不知疲倦地走着，每小时行进八到十俄里。每行十到十五俄里，我们就停两三分钟，让鹿休息一下、有时间大小便，然后再继续上道。这个区间就叫做“鹿程”。在这一带地方，测算距离不用“俄里”，而是用“鹿程”。五鹿程对应六七十俄里。

我们在到达肖明斯克帐篷（即我们与老人以及他的牝鹿分别的地方）的时候，至少已经走过了十个鹿程。这个距离已经不短了。

大概晚上 9 点钟的时候，天色完全昏暗下来了，我们自出发

以来第一次见到了数辆雪橇。尼基福想不停下雪橇，直接错开它们，但是失败了。因为道路非常狭窄，如果稍微往一边转向，雪就会直没过驯鹿的腹部。那些雪橇停下了，有一个车夫走近我们，直盯着尼基福看，呼着他的名字问道：“你在给谁赶路啊？路很远吗？”

“不远……”尼基福答道，“我是给一个商人赶车，从奥布多尔斯克来的。”

这次相遇让他不安起来。

“见鬼了，竟然能碰上他！我整整五年都没见到他了，他居然还认识我，真该死。他们是利亚平河的科米人，从离这里一百俄里的河边到别廖佐夫去买货物和伏特加。明天夜里，他们就进城了。”

“我倒是没什么，”我说到，“因为现在已经追不上我们了。但就是您回去之后会不会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我就说：我是个车夫，我的工作就是赶车，管他是商人还是‘政治犯’，身份又没写在那老兄的额头上。你是警察，你负责看管，我是车夫，我负责拉人。我说得对吗”

“对啊……”

夜幕降临了，一片深沉黑暗。月亮要到快破晓的时候才升起来。尽管一片漆黑，驯鹿仍然坚定地迈步，沿着路向前走。我们在路上一个人也没碰见。凌晨1点钟，我们才忽然进到了——一团明亮的光点，然后停了下来。路边有堆篝火明亮地燃烧着，火边坐着一大一小的两个人影。小锅里烧着水，那个汉特小孩把茶砖放在手套上切下一点来，然后把茶投到沸水里。

我们走进篝火的光亮里，我们的雪橇和鹿立马就消失在了黑暗中。篝火边响起了我听不懂的陌生话语。尼基福从孩子手上取过茶碗，舀了一碗雪，把它放进沸水里浸了一下，然后又从篝火底下

舀雪，再把它浸在锅里。他看起来就像是在这篝火上调制某种遗落在黑夜和荒蛮深处的魔药。之后他端起碗，一饮而尽。

我们的驯鹿显然是开始困倦了。我们每次停下来时，驯鹿就躺在地上，相互依靠着，狼吞虎咽地嚼着雪块。

* * *

大概凌晨两点钟，我们到达肖明斯克帐篷。我们决定让驯鹿在这里休息一下，并且让它们吃点东西。所谓的帐篷（Юрты），并不是游牧人的歇脚地，而是原木盖的永久住房。但是这里的帐篷与我们在托博尔斯克公路上住过的却大不相同。那个实际上就是农民的小屋，分为两个房间，有俄式的火炉，还有茶炊和椅子——只不过比普通西伯利亚农民的小屋要破败脏乱一些。这里的帐篷则只有一个“房间”，没有火炉，只有原始的炉灶，也没有家具。屋门很矮，窗户上面装的不是玻璃而是冰块。但是，当我脱下鹿皮大衣、羊皮袄和鹿皮鞋子的时候，我已觉得非常满意了。一个年老的汉特妇人，就把我这些脱下的衣物和鞋子挂在炉火旁烤干。我几乎一天一夜都没吃过东西了。

我坐在铺着鹿皮的板床上，啃着尼基塔给我的冰凉的牛犊肉和半解冻的面包，等着茶水烧开，这感觉舒服极了。我喝了一杯白兰地，脑子稍微有点发昏，感觉我们的行程仿佛已经结束了……一个留着长辫子（辫子上结着红色的呢绒发带）的年轻汉特人从一张板床上起身，出门去喂我们的驯鹿。

“他用什么东西去喂呢？”我问尼基福。

“苔藓。他把鹿放到有苔藓的地方，鹿就会自己从雪下面找到苔藓。它们会挖个洞，卧在里面，直到吃饱为止。驯鹿的食量不太大。”

“它们不吃面包吗？”

“它们除了苔藓，什么都不吃，除非刚生下来的第一天就开始让它适应烤面包。但这种情况很少见。”

老妇人往火堆里添了些柴，然后唤醒了一个年轻的汉特女人。她脸上盖着一块方巾，让我看不到她的脸。她起身走到室外去，显然是去给她的丈夫，也就是被尼基福用两卢布雇来护送我们去欧尔维的那个小伙帮忙了。汉特的男人相当懒散，他们的活都是让女人做的。这还不止是家务方面：有时候还能看见汉特女人扛着枪去打猎，靠剥灰鼠和黑貂皮为生。托博尔斯克的一个林业官员曾经跟我讲过这些惊人之事，汉特男人有多么懒散以及他们对妻子的态度。他当时必须要去考察托博尔斯克县的荒地，也就是所谓的“迷雾”（туманы）。他雇用了汉特男人作向导，每天给他们付3卢布。他说，每个汉特小伙后面都跟着他老婆，随他一起进“迷雾”去，单身或是丧偶的就带自己的姐妹或者母亲。女人拿着路上用到的所有东西：斧子、小锅、装干粮的口袋，男子则只在腰带上插了一把刀。他们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女人要把休息的地方打扫干净，从丈夫手里接过腰带——解下它是为了减轻负担——然后再生篝火烧茶。男人就坐在那儿，抽着烟斗等着……

茶煮好了，我迫不及待地把茶碗拿到嘴边。但水散发着难以忍受的鱼腥味。我往茶碗里放了两勺浓缩蔓越莓汁，这才压住了鱼腥味。

“您不觉得腥吗”我问尼基福。

“有鱼腥味不要紧的，鱼刚从渔网里捞出来，跳到手上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生吃——再找不到更美味的东西了……”

年轻的汉特女人又回到房间，仍然半掩着脸，站在火炉边整理她的衣物，显出一种神妙的无拘无束。她的丈夫跟在她后边进来，经过尼基福，向我推销他的皮货——五十张灰鼠毛皮。

“我跟他说是奥布多尔斯克的商人，所以他就来推销灰鼠皮了。”尼基福解释道。

“告诉他，我是在回程的路上造访他们的，现在带这些皮回去没用。”

我们喝了很多茶，抽了一会儿烟。驯鹿在补充营养的时候，尼基福便躺在木板床上小睡。我也困得要死，想躺下来睡觉，但担心自己一觉睡到天亮。所以，我拿出了笔记本和铅笔，坐在火炉边开始略记头 24 个小时的旅行印象。一切都简简单单、平安顺遂。甚至有点太简单了！……凌晨 4 点，我唤醒了两位车夫，然后我们便离开了肖明斯克帐篷。

“我看到汉特的男人和他们的女人都结着发辫，上面又缠发带，又绑发环；想必他们编辫子的次数一年也不超过一次吧？”

尼基福回复道：“辫子？他们经常扎辫子的。他们醉酒后，老是抓着对方的辫子比气力。他们喝啊喝，然后就互相紧紧抓着头发。之后力气小一点的人就会说‘放开我’，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放了他。然后他们又聚在一起喝酒。他们没必要对彼此发火，干这事的时候他们心里就没有怒气。”

我们一出肖明斯克帐篷，就进了索西瓦河。路有时候顺着河流，有时候穿越森林。刺骨的寒风猛烈地刮着，让我很难在本子上做笔记。现在我们在开阔地上行进，穿过小桦树林和河床。道路简直烂得要命。大风就在我们眼前把雪橇留在身后的狭长痕迹完全盖住了。第三头驯鹿经常会踏空，从踩实的路上滑出去，雪没过它的肚皮还深，它只能拼命地跳跃好几次，重新爬回到路上，把中间的驯鹿挤开，领头鹿也被挤到一边。我们在河流或者结冰的沼泽上行进时，不得不以步行速度前进。最糟糕的是，我们的领头鹿，那头无可匹敌的驯鹿，已经瘸了。它拖着左后腿，继续老实地沿着这

条恶劣的道路奔跑，只有它低垂的头和伸向地面、贪婪地舔舐路上积雪的舌头才显示出它已经过分努力了。突然，路面陡降，我们被夹在两面高达 1.5 俄尺^[7]的雪墙之间。驯鹿挤在了一起，看起来仿佛是外面的两头鹿夹着中间的那头鹿。我注意到领头鹿的前腿流血了。

“我还是稍微懂点兽医，”尼基福解释道，“我在您睡着的时候给它放过血。”

他喝住了驯鹿，从腰带里拔出一把刀（我们把这种刀叫做芬兰刀）夹在牙齿之间，走近那头虚弱的牲口，久久地摸着它的伤腿。

“真搞不懂这是什么怪现象，”他困惑地说着，开始用刀在蹄子上方一点的地方挖。这头牲口在手术期间躺在地上，蜷缩着腿，一声不吭，然后悲伤地舔着自己伤腿上的血迹。在白雪的映衬下，地上的血迹清晰可见，给这个停驻之地作了标记。我坚持要把汉特人的驯鹿拴在我们的雪橇上，而我们的驯鹿则拉着他的轻型雪橇。我们把可怜的瘸子领头鹿绑在了后面。

离开肖明斯克帐篷后，我们大概行进了五个小时。还需要走相同的时长就能到欧尔维了，也就是唯一能换驯鹿的地方，那里有个很有钱的汉特驯鹿商，名叫谢苗·潘秋。但他会同意让自己的鹿走长途吗？我跟尼基福讨论了一下。我对他说，“也许我们必须要从谢苗那里买六匹鹿？”“那又如何？”尼基福带点挑衅意味地说道，“那我们就买呗！”我的旅行方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和菲利亚·福格的环球之旅^[8]曾经对我的影响一样。如果各位记得的话，菲利亚·福格买了大象和蒸汽船，燃料短缺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

[7] 俄尺阿尔申是早期用于俄国及土耳其的长度单位，约等于 71 厘米（28 英寸）。——中译者注

[8] 这里是指法国作家儒略·凡尔纳的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小说的主人公是福格。——中译者注

木制工具都扔进了机器的添料口。尼基福醉的时候（也就是几乎每时每刻），一想到新的困难和开销，就会兴奋起来。他完全把自己看成是和我一伙的了，狡猾地对我眨眼，并说：“这一路是得花钱……可我们不在意……我们才不在乎那些钱。鹿？鹿要是死了，我们就买新的。要我心疼鹿——永远都不会：只要它们还耐得住，我们就驾着它们跑。嚯嚯！赶到目的地去才是正事。我说得对吧？……”

“对啊！”

“如果尼基福都没法把你带到那里，那就没人做得到了。我的叔叔米哈伊尔·奥西波维奇（是条好汉！）对我说：‘尼基福，你是要运这个主体吗？那就运吧。从我的那群驯鹿里挑六头鹿去，运他吧。你白拿就是。’有个上等兵苏斯利科夫说：‘你要带他一程？那我给你五卢布吧。’”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要运您走。”

“就为了这个？他和这事有什么关系呢？”

“看在上帝的份上，他支持我这么做。他爱他的弟兄，会全力维护他们。就因为，我们这么说吧，您是为了谁才受苦的？是为了世间大众和穷苦人。‘收下这五卢布吧，尼基福，’他说道，‘带他走，我祝福你们，责任算在我头上。’”

进入森林后，路况一下子就变好了：路旁边的树可以挡住积雪。艳阳高照，森林一片寂静。我觉得很暖和，于是脱下了大衣，只穿着一件羊皮袄。肖明斯克的汉特人和我们的鹿一直落在后面，所以我们不得不等他。四面八方都是松树，它们枝干高大，直到最顶上都不分叉，呈现出亮黄色，像蜡烛那样直。我们就像是在一个景色秀丽的老公园里穿行，这里静谧无声，只是偶尔有对柳雷鸟飞起来

——它不动的时候简直和小雪墩融为一体——扇着翅膀去往森林深处。然后松树忽然就消失了，道路向着河岸的方向陡然下降。我们的雪橇翻倒了，整理好行李之后我们穿过索西瓦河，然后又在开阔地上行进。只有零星几棵矮小的桦树从雪地里伸出来。我们肯定是进沼泽了。

“我们走了多少俄里？”我问尼基福。

“肯定得走了 300 俄里吧，大概。谁知道啊？哪个本地人会拿俄里来算距离？除了大天使米迦勒^[9]以外，没人算得出来……很早以前就有件事讲我们这儿的俄里：有个婆娘想拿手杖测，结果她甩手不干了……不过这没事儿，再过个三天我们就到工厂区了，只要这天气再保持一阵。有的时候啊，哦哟……我有次在利亚平河附近撞上暴风雪，三个昼夜才走了五俄里……但愿别这样！……”

我们到了小欧尔维。三四个简陋的帐篷里只有一个有人居住。二十多年前这些屋子里想必是住满了人。汉特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绝种……再行进十俄里，我们就到大欧尔维了。我们会在那里碰到谢苗·潘秋？我们能在他那儿弄到驯鹿吗？我们的驯鹿实在是没办法再往前走了……

* * *

麻烦来了！我们在欧尔维一个男人也没碰见。他们和驯鹿都呆在游牧帐篷那边，离这里要走两个鹿程。我们不得不往回走好几俄里，之后再调转方向。早知道我们就该在小欧尔维停一会儿，打听一下那儿的状况，就能节省下几个小时。女人们用我们瘸掉的领头鹿去换一头新鹿，同时我则是在近乎绝望的心境中等待着。和别的地方一样，欧尔维的女人也是一副宿醉的样子。当我把食物铺开的

[9] “米迦勒”是《圣经》提到过的一个天使的名字，是上帝指定的伊甸园守护者。——中译者注

时候，她们都过来向我讨酒。我借着尼基福的翻译向她们说话。尼基福能够同等流利地说俄语、科米语和两种汉特方言——上汉特语和下汉特语，它们几乎不相通。此地的汉特人一句俄语也不会说。不过，俄语的脏话已经完全融入汉特语了，这种脏话以及国营的伏特加，便是国家主导的俄罗斯化政策对当地最不容置疑的文化贡献。在这个地区，包围在汉特语陌生的音节当中，他们连“你好”这么一个俄语词都不知道，突然，一个豪放的故国词汇就闪了出来，字正腔圆、没有半点口音，就像明亮的流星划过天际。我不时请这些汉特人抽卷烟，但他们只是尊敬却又满不在乎地吸着。他们的嘴巴已经在烈酒中磨练起来了，对于我这区区几根烟完全没什么反应。甚至连尼基福这样喜好一切文明产品的人，也坦白地说我这烟卷算不得什么。他这么说明自己的评判：“别拿燕麦去喂马。”

我们朝着游牧帐篷行进。周围太荒凉了！驯鹿踏着雪堆慢慢向前，在原始密林的树枝间磕磕绊绊。而车夫竟然还能判断出道路，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对道路具有特别的感觉，就像驯鹿行进的感觉一样：虽然它们头上有犄角，却仍能令人惊奇地穿梭在松树丛和云杉林里。我们在欧尔维得到的那头新的领头鹿长着很大的分叉鹿角，至少有五六拃长。路上每走一步都会被树枝挡住，而这鹿好像眼看着就要被它们挂住角了，却总能在最后关头稍稍摆下脑袋，连枝干上的一根松针也不会碰到。我目不转睛地观察了它们好一阵，看着它们的机动动作，在我看来，比起我们那滔滔不绝只知道说教的头脑里的一切本能反应，它们简直是充满了无穷的神秘。

* * *

连这里也遇到麻烦了！管事的老人同他的一个雇工一起去夏季营帐了——一些驯鹿被他留在那里。这里的人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等着，但也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出现。而他不在的话，他

的儿子，一个长着兔唇的年轻人，并不打算同我们商谈价钱。我们不得不等着。尼基福放我们的驯鹿去啃苔藓，为了让我们的鹿不会混进当地的鹿群里面，他用刀在鹿的背上刻了好几次，在皮毛上留下了自己姓名的首字母。然后他趁着闲暇修了修我们的雪橇，这雪橇已经在路上颠得快散架了。我感到绝望，在空地上徘徊游荡，然后进了帐篷。一个三四岁的全裸的小男孩坐在一个年轻汉特女人的膝盖上，这母亲正在给他穿衣服。在这种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里，他们是怎么带着孩子还能住在这样的窝棚里的？“晚上其实还好，”尼基福解释道，“可以钻进毛皮里睡觉。我自己也不止一次是在帐篷里过冬的。汉特人晚上会脱个精光，裹在鹿皮大衣里睡。这样睡觉没什么问题，就是起床很困难。你呼出来的水汽会让整件衣服变得特别硬，简直要拿斧子才砍得动……所以起床就很糟糕了。”年轻的母亲用自己大衣的下摆裹住小男孩，让他贴在自己的胸膛上。在这里，孩子一直到五六岁都还在吃母乳。

我在炉子上烧水。尼基福转瞬之间就从我的匣子里把茶叶倒到自己的手掌上（天哪，这样的手掌！），然后把茶叶倒进茶壶。我没胆责备他，结果现在只能喝在他手掌上呆过的茶了。他的手接触过很多东西，却很久没接触过肥皂了……

汉特女人给孩子哺完母乳，便给他洗澡，用轻薄的木屑把他擦干，然后给他穿上衣服，放他出帐篷去了。她对孩子表现出的那种柔情让我很是惊讶。现在，她又坐下来忙活了：用鹿的筋当线，把鹿皮缝成一件大衣。她的手艺不仅很扎实，而且毫无疑问，也非常优雅。整个外套边缘点缀着各种用黑白色的鹿皮小块制成的图案，每处针脚都缝上了红色的小花条布。家里每个人穿的皮梅靴（ПИМЫ）、大衣和外套都是让女人来做的。这要付出多少劳动啊！

长子患了病，已经在帐篷的角落里躺了两年了。他四处寻药，

大量吞服，然后在这屋顶露天的帐篷角落里过冬。这病人有着一副不同寻常的聪明面孔：痛苦在他脸上打下了印记，就像是思考留下的痕迹……我想起来，一个月以前，就是在这里，在这些欧尔维的汉特人跟前，来买皮货的年轻别廖佐夫商人多布罗沃利斯基死掉了。他在这儿躺了好几天，发着高烧，一个能帮忙的人也没有……

我们等待着的老潘秋拥有大概 500 头驯鹿。他腰缠万贯，在附近一带很出名。驯鹿在这里意味着一切——食品、衣物、交通都离不开它。几年前，一头驯鹿卖 6—8 卢布，现在价格涨到了 10—15 卢布。尼基福解释说这是因为疫情不断袭扰，使得驯鹿被大批消灭了。

* * *

暮色更加浓郁，显然没人会在天黑之前为我们抓驯鹿了，但我不愿放弃最后的希望。我苦苦等待着老人，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可能都没有哪个人像我这样等待着他。他最终带着雇工一起回来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主人走进帐篷，彬彬有礼地跟我们打招呼，然后坐在火炉旁。他的脸展现着智慧和威严，让我吃了一惊。显然，他拥有的这五百头驯鹿让他从头到脚都散发着王者的气息。

“您快跟他讲吧，”我轻轻推了一下尼基福，“干嘛浪费时间？”

“您等等，现在还不行，他们要坐下吃晚饭。”

雇工走了进来，他是个肩膀宽大的魁梧汉子。他用浓厚的鼻音跟我们打招呼，在角落里脱下他湿漉漉的鞋子，然后挪到火炉旁边。他这张脸太可怕了！鼻子完全从这张不幸的脸庞上消失了，上唇高高翻起，嘴巴总是半张着，露出一排粗大的洁白牙齿。我被吓到了，赶忙把脸转过去。“也许是时候给他们敬烈酒了？”我问尼基福。尼基福在喝酒的事情上特别权威，我得尊重他的意见。

“正是时候了！”尼基福回答道。

我拿出了瓶子。老人的儿媳妇在他回来了之后就一直遮着脸，她用火炉点燃了一片桦树皮，然后用它照明，在箱子里找出一个金属酒盅。尼基福用他的衬衣下摆擦了擦酒盅，然后往里面倒酒，直到酒快要溢出来。第一份酒要献给老人。尼基福向老人解释说这是烈酒，老人威严地点了点头，安静地把这一大盅 95 度的烈酒喝干了，脸上的肌肉没有丝毫颤抖。他那个唇裂的儿子也喝了。他用尽最后一点力量才喝完，皱着他那张可怜的脸，在篝火上吐酒吐了很长时间。之后雇工也喝了，然后他一直左右晃着脑袋。再之后是给病人倒酒。病人喝不完，把酒盅递了回来。尼基福把剩余的酒泼进火里，向主人们展现酒的品质——酒精上燃起了明亮的火焰。

“塔克。^[10]”老人泰然自若地说道。

“塔克！”他儿子重复道，唾沫星子从他的兔唇里飞了出来。

“萨卡塔克！^[11]”雇工重申了一遍。

然后尼基福喝了一些，也觉得这酒太烈了。我们往酒里面兑了一些茶，尼基福便用手指塞住瓶口，摇了摇酒瓶。所有人又喝了一轮，然后再往酒里兑一次茶水，接着再喝一轮。最后，尼基福转入正题，开始讲我们找他有什么事。

“萨卡霍扎^[12]！”老人说。

“霍扎，萨卡霍扎！”大家齐声重复道。

“他们在说什么啊？”我迫不及待地问道。

“他们的意思是很远……到工厂去的话，他要价三十卢布。”

[10] 根据《汉特语—俄语词典》，“так”这个词有三个意思：坚固耐用的；坚硬的；尖锐的。——中译者注

[11] 根据《汉特语—俄语词典》，这个词组应该对应“сог так”，意思为“很烈”。——中译者注

[12] 这个词（хýва）有两个意思：远的；去远方。“萨卡霍扎”（сог хýва）意思为“很远”。——中译者注

“如果是到尼亚克辛沃利，得付多少钱？”

尼基福稍稍牢骚了几句，显然是有点不满（后来我才知道原因），但还是把我的问题翻译给了老人，然后回复道：“去尼亚克辛沃利的话，十三卢布，去工厂则要三十卢布。”

“那什么时候抓驯鹿呢？”

“得等到刚破晓的时候了。”

“现在是无论如何都不行吗？”

尼基福带着讥讽的模样翻译了我的问题。所有人都笑了，摇了摇头，表示不行。我知道必须得待在这儿过夜了，只得费力地从帐篷里钻出去透气。一片寂静，空气温和。我在空地上闲逛了半个小时，然后在雪橇里躺下睡觉。

穿上羊皮袄和鹿皮大衣以后，我就像是躺在一个用皮毛搭成的熊窝里面。行将熄灭的炉光照映了帐篷顶上的那一片天空。四周安静极了，空中繁星璀璨，树木一动不动我的呼吸让鹿皮返潮了，皮毛的味道让我感到有点闷，但它令我欣慰地温暖着我的身体。夜晚的静谧让我困意渐浓，但我入睡时也坚定地想着要天刚破晓就去把男人们叫起来，以便尽早离开。白白浪费了这么多时间！简直是灾难！

* * *

我有好几次不安地醒过来，但周围还是一片漆黑。一过凌晨四点钟，一部分天空明亮起来的时候，我便悄悄进到帐篷里，在一堆身子里摸到尼基福，然后把他推醒。他把整个帐篷的人都叫了起来。显然，寒冬时节的森林生活在这些人身上留下了后遗症：他们醒来后就一直咳嗽，咳出痰来然后往地上吐。我实在是受不了这种场面，就钻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帐篷的入口边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孩，他往脏兮兮的双手上吐口水，然后又把口水抹在脏兮兮的脸

上。做完这些之后，他用几簇木屑勤勤恳恳地擦干自己的脸和手。

很快，那个没有鼻子的雇工和兔唇的小儿子踩着狗拉的滑雪板出去了，他们去把驯鹿赶到帐篷这边来。但是过了整整半个小时，第一群鹿才从森林里走出来。“八成是受惊了，”尼基福向我解释说，“整个鹿群很快就会到这了。”

结果情况并非如此。两个小时过去了，才聚起了足够多的鹿。它们在帐篷周围安静地徘徊，用口鼻刨着雪，聚成小群，卧在地上。此时，太阳已高升到树梢，照耀着搭着帐篷的白雪皑皑的空地。驯鹿的外形有大有小，有黑有白，有的有犄角，有的没犄角。他们的身影鲜明地映在雪地上，构成了一幅异常优美的景象，玄妙而离奇，令人无法忘怀。驯鹿被狗护卫着，这种毛茸茸的小动物一看到那有五十头的一群驯鹿离帐篷有些距离，便猛扑过去，驯鹿则受了惊吓，发疯似的往后跑，退到空地上来。但这幅美景也不能驱散我对被浪费的时间的痛惜。今天，2月20日，是国家杜马开会的日子，对我来说则是个不幸的日子。我焦躁不安，神经质一般地等着整群驯鹿过来。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但是离整群鹿都聚过来还早得很。我们足足浪费了一个昼夜。显然，没法在11点到12点之前离开这里了，而且从这里到欧尔维还要走20—30俄里的烂路。如果一切按最坏的情况发展，警察今天就能赶上我。假设，警察在我离开的第二天发现我不见了，并且从尼基福无数酒友中的其中一个那里打听到了我们走的路线，那么他们可能在19日晚上就派出追捕队了。我们刚走了300俄里，这么些距离一昼夜或者一个半昼夜就能走完这么说，我们刚好留给敌人足够的时间来抓我们。这一耽搁可能非常要命。我开始数落尼基福了。我昨天就说必须要马上去老人那儿一趟，而不是在帐篷干等。兴许给他额外添几个卢布作报酬的话，我们是可以夜里就走的。当然，要是我自己就能说

汉特语，我就把一切都处理好了。但是我不会说，所以要跟着尼基福走……诸如此类。……尼基福苦着脸，看着我身旁的地方。

“他们要是不愿意，又能拿他怎么办呢？而且他们的鹿都被喂肥了、宠坏了——晚上可怎么抓到它？不过，没关系，”他转身面向我说道，“我们会到那里的！”

“会到吗？”

“会到的！”

我也忽然开始相信“没关系”，相信“我们会到那里的”。况且，整个空地上现在聚满了驯鹿，而两个汉特人也乘着滑雪板从森林里现出了身影。

* * *

“现在就要抓鹿了。”尼基福说道。

我看到汉特人手里拿上套索。老人缓缓地把绳子绕在自己的左胳膊上。之后他们一直大声喊着什么，显然是在商谈拟定行动计划、选择第一个牺牲者。尼基福也参加了谋划。他惊起某群驯鹿，把它们赶到老人和儿子之间宽阔的空地上，雇工则站在远一点的地方。受惊的鹿成群结队地飞奔起来，汇成一条头和角的溪流，汉特人则目光锐利地注视着这条河流中的某个点。“开始！”老人扔出套索，失望地摇了摇头。“开始！”年轻的汉特人也没能命中。但那个没鼻子的雇工站立在鹿群中间的开阔地面上，看起来自然而然地充满了信心，这很快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扔出套索，而从他手的动作就很明显能看出他没有失手。驯鹿们急忙往一边躲闪，想要避开套索，但有头脖子上挂着圆木的大白鹿跳了两三次也没能摆脱，开始在原地打转：套索缠住了它的脖子和角。尼基福解释说，被抓的驯鹿就是最狡猾的，它把整个鹿群搅得不安宁，还在最必要的时候引着其他鹿跑开。现在这头白色的反抗分子被绑起来了，事

情就进展得更顺利一些。汉特人再次拿起了套索，把它绕在左胳膊上，然后再聚在一起大声交谈，制定新的行动计划。**我也沉浸在狩猎的这份无私的激情中。**我从尼基福那里知道，他们现在打算从那儿把那头头上长着短角的肥壮牝鹿抓过来，于是我也加入了这场军事行动。我们从两个方向把鹿群往一边赶，三条套索已经在前进方向上严阵以待。但这牝鹿明显知道有陷阱等着它，迅速地扑向一边，要不是有狗堵住它，它就完全消失在林子里了。我们不得不再一次包抄它们，结果这次的胜利者又是雇工，他抓准时机，把绳圈套在了这狡猾牝鹿的脖子上。“这头鹿没有生育能力，没有幼崽，”尼基福解释道，“所以它工作起来很有劲。”

捕猎虽然拖了很长时间，但很有意思。在抓到牝鹿以后，我们只用了两次套索就很快抓到了一头像真正的公牛那么壮的大驯鹿。然后是休息时间，因为我们想要的那群鹿从附近逃走，钻到森林里去了。雇工和小儿子又踩着滑雪板进了森林，我们大概等了他们半个小时。狩猎接近尾声的时候情况变好了，经过通力合作，我们成功抓到十三头驯鹿——其中七头归我和尼基福在路上用，另外六头归那位主人。大约 11 点的时候，我们终于乘着四架三套鹿的雪橇从游牧帐篷离开，朝着欧尔维的方向进发。雇工会陪着我们一直行进到工厂区。第七头，也就是拿来预备用的那头鹿则被绑在了他的雪橇后面。

* * *

那头瘸了腿的牡鹿在我们去游牧帐篷的时候被留在了欧尔维。它身体没法好转了，悲惨地卧在雪地里，不用套索就能徒手抓住它。尼基福又给它放血——和之前那次一样毫无意义。汉特人肯定地说，这鹿的腿关节一定是脱臼了。尼基福困惑地站在它旁边，然后以八卢布的价格把它卖给了当地的一户主人做肉吃。

主人就那么用绳子把这可怜的鹿给拖走了。驯鹿的命运就这么悲惨地结束了，它“在世间处处遭遇不平等”。我很好奇的是，尼基福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就把鹿给卖了，按我们的约定，只有当他把我安全送到目的地之后，驯鹿才会变成他的财产。我实在不忍心把这头为我立下汗马功劳的鹿卖到屠刀下去，但我也没能下定决心向他抗议……处理完这桩交易后，尼基福把钱放进钱包里，然后转身面向我说：“这下我净亏损十二卢布。”他这人真奇怪！他忘了是我为驯鹿付的钱，也不记得他曾保证它们能把我一直送到目的地。但此时，它们载着我走了不过 300 俄里，现在又得花钱去租新的鹿。

今天的天气真暖和，雪都稍微化了一些。雪变软了，驯鹿的蹄子踏过时，溅得雪块四处飞散。这就让驯鹿很吃力。我们的领头鹿只有一只角，样子看起来很普通。那头不孕的牝鹿在右边行进，勤勤恳恳地蹬着腿。夹在两者之间的则是一头矮壮的鹿，它今天才第一次知道和其他鹿套在一起走是什么感觉。在左右两匹鹿的护送下，它老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汉特人则在前边驾着载有我行李的雪橇。他外套外面又套了一件亮红色的粗布上衣，皑皑的雪地、苍白的森林、灰色的鹿群和阴沉的天空让他格外突出，他就像一个荒谬，同时又必不可少的斑点。路太不好走了，前一辆雪橇的缰绳都断了两次：每次一停下来，雪橇的滑木就会冻在路上，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把雪橇搬动。仅仅走过两鹿程过后，驯鹿就显得疲惫不堪了。

“我们在尼尔丁帐篷停下喝点茶好么？”尼基福问我。“到下一个帐篷还很远呢。”

我发现两个车夫都想喝茶，但我很舍不得浪费时间，特别是我们已经在欧尔维停了一个昼夜。于是我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随您的便。”尼基福一边回答，一边悻悻地用竿子打了一下那头不孕的鹿。

* * *

我们又安静地行进了大概四十俄里。尼基福清醒的时候显得很沉闷，也不爱说话。天气变冷，路面结上一层薄冰，路况又变好了。我们决定在桑吉—图尔—帕乌利停下来。这里的帐篷好极了，有长凳，还有铺着油布的桌子。晚餐时，尼基福为我翻译了没鼻子的车夫和接待我们的村妇之间的部分对话，我便听到了些新奇的故事。三个月前，这个汉特车夫的妻子自缢而亡。那么她用什么自杀的？鬼知道怎么回事，尼基福告诉我——用的是一根很旧的细绳子，用椴树韧皮做的，她把绳子一头系在大树枝上，“坐着”把自己给吊死了。男人当时在林子里和其他汉特人一起猎灰鼠皮，他们的甲长，也是个汉特人，过来叫他回帐篷，说他老婆病得很厉害（我脑袋里闪过一个念头：“也就是说，他们也不会一下子就告诉他真相。”）男人却说：“又不是她病了就没人能烧炉子了，”——这意思是他妈妈还和她住在一块儿——“我又能帮上啥忙？”甲长还是坚持让他回了帐篷，结果就发现妻子已经“没了”。“这已经是他死掉的第二个老婆了。”尼基福讲完了。

“怎么？难不成第一个也是吊死的？”

“不是，那个是正常死掉的，得了病……”

原来，那两个漂亮的孩子是他与第一任妻子生的孩子，我们的这个汉特人在离开欧尔维时亲吻了他们的嘴，当时可让我震惊极了。他和第二任妻子生活了大约两年。

“也许是因为他们强迫这女人嫁给这么个人呢？”我问道。

尼基福便去询问那个男人。

“不是，他说她是自己过来的。之后他给了她家老人三十卢布

做聘礼，他们就在一起过。至于她为什么拿绳子吊死自己，这就知道了。”

“他们中间大概很少发生这种事吧？”我问道。

“你说不正常地死掉？汉特人经常这样的。去年夏天我们这边也有个汉特人拿枪把自己打死了。”

“怎么回事？是有意的吗？”

“不，只是个意外……我们县警察局还有个抄写员开枪自杀了。你猜在哪儿？——在警察局的瞭望台上。他爬到最高处，然后喊：‘你们这群狗娘养的给我看好了！’然后就把自己打死了。”

“他是汉特人吗？”

“不是……那小伙是个俄罗斯人……尼基塔·米特罗凡诺维奇。”

* * *

当我们离开桑吉—图尔帐篷时，天色已经暗了。尽管天气还是很暖和，但是解冻算是停下了。路面很好地固定起来了，虽然软，但是并不泥泞——尼基福说，这就是最合适的道路了。驯鹿毫不费力地拉着雪橇向前走，只能微微听见它们踏步的声音。最终，我们不得不给第三头鹿卸套，把它栓在后面，因为驯鹿在不需要出力的时候就会冲到一边去，可能会把雪橇碰坏。雪橇在路面上平稳安静地滑行，就像小船游弋在池塘光滑的水面上。浓艳的黄昏中，森林看着比白天时的样子更庞大了。我完全看不见路，几乎感觉不到雪橇的移动，感觉就像是被施了魔法的树朝着我们狂奔过来、灌木丛飞快地跑到一边去，还有挺拔的白桦树旁，被雪覆盖的老树桩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一切都仿佛充满了奥秘。夜里的森林安静极了，能听见驯鹿急促而又平稳的“哧——哧——哧”的喘气声。在这种节奏当中，成千上万个被遗忘的声音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突然，这

幽暗的森林深处传来一声口哨，听起来神秘莫测又无比遥远。而与此同时，汉特人在离我五步远的地方把自己的驯鹿分散开来。之后又是寂静，又从远处传来一声口哨，树木则悄无声息地从一片黑暗跑向另一片黑暗。正当我半梦半醒的时候，一种不安和担忧突然让我焦虑起来。从我一路旅行的情况来看，汉特人一定觉得我是一个富商。僻静的森林，深沉的夜，方圆 50 俄里既无人烟，也无狗吠。该拿什么阻止他们呢……？还好我有一把左轮手枪。但手枪锁在皮包里了，而皮包则捆在车夫的雪橇上——也就是在那个没鼻子的汉特人那里，此时此刻，他在我眼里不知为何看起来尤为可疑。我决定，等到下一次停歇时必须把左轮手枪从皮包里拿出来放在我身边。

我们这位穿着红披风的车夫真是个奇人！缺少鼻子看来并没影响他的嗅觉，感觉好像他能靠嗅闻确定方位、找到道路。他认得这里的每一丛灌木，在林子里赶路就和在帐篷里一样淡定。他跟尼基福说了些什么，原来是这里的积雪下面应该有苔藓，也就是可以在这里喂鹿。我们停了下来，卸掉了套具。现在是凌晨 3 点钟。

尼基福向我解释说，他们科米的驯鹿很狡猾，而他尼基福不管跑了多少趟，都不会放它们去自由进食，总是会栓着它们。把鹿放走很容易——可之后要是找不到了怎么办？但汉特人坚持己见，保证说驯鹿不会跑走，然后就把它放开了。这种高尚的气度赢得了我的好感，但我还是怀疑地端详着驯鹿们的口鼻。要是长在欧尔维帐篷周围的苔藓更吸引它们，该怎么办呢？那样的话可就真是非常悲惨了。不过，在按照纯粹的道德根据把鹿放走之前，车夫们砍了两棵高大的松树，把它们劈成七截圆木，每段大概有一俄尺半长。这些圆木分别挂在每头鹿的脖子上，用来勒住它们。只能希望这些吊坠不会太轻了……把鹿放走之后，尼基福去砍了一些柴火，

在靠近道路的雪地里踩出一片圆圈，然后在这个雪坑里生起了火。他在周围铺上一层云杉树枝，再搭了木板台子好让大家坐下。他们俩把两口小锅挂在两根插在雪里的湿树枝上，然后在锅里塞满正在融化的雪水……假如当时有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这场篝火旁的二月雪地饮茶会恐怕很难有什么吸引力，但老天爷特别眷顾我们，天气平和又温暖。

我怕睡过头了，所以就没有和车夫们一起躺下睡觉。我在火堆旁坐了大约两个小时，一边往火堆里扔柴让它不熄灭，一边借着它闪烁的光芒写下我的旅行印象。

* * *

天微亮的时候，我喊醒了车夫。他们轻而易举地把驯鹿抓了回来。在他们把鹿牵过来戴上套具的时候，四周完全明亮起来了，一切都显得如此平淡。松树的身影变小了，白桦树也没向我们冲过来。汉特人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而我昨夜的疑虑已烟消云散了。同时，我想起我在离开之前弄到的这把老古董左轮手枪里只剩下两颗子弹，并且把手枪给我的人曾劝我不要去用，免得发生意外。所以那把手枪还是放在皮包里。

我们走过了连绵不断的大片森林——松树、云杉、桦树、苍劲的落叶松、雪松，以及岸边的河柳和柔韧的五蕊柳。路况很好，驯鹿平稳地行进着，但跑得并不快。前面雪橇上的汉特人低着头，哼唱着他那只有四个调的忧郁小曲儿。也许他是回想起了那根用椴树韧皮做的旧绳子，也就是他的第二个老婆用来吊死自己的那根。森林，还是森林……在这一片广袤的地区就只有这千篇一律的森林，但同时它的内部组合又极其丰富。这边，一棵腐烂的松树半截栽倒，横跨了整条道路，像是一道拱门。它十分巨大，皑皑白雪覆盖着它，低悬在我们头顶。显然，上个秋天的时候这里的森林被火

烧过。枯萎而挺直的树干立在两旁，树皮和树枝都被烧光了，它们就像是被毫无意义地扎了许多洞的电报杆，又像是封冻港口里收了帆的桅杆。我们在这片火灾遗址里走了好几俄里，然后就是一整片云杉林，它们枝繁叶茂、郁郁苍苍。这些参天古树彼此挤在一堆，高处的树梢紧紧接合在一起，遮挡了太阳的光芒。树枝上织着一些绿色的线，就像是粗大的蜘蛛网。鹿和人在这些古老的云杉中间都显得愈发渺小了。之后树木忽然变细小了，覆着雪的空地上，几百棵年幼的枞树分散着冒出头来，相互之间隔着相等的距离，在严寒里冻得僵硬。在道路拐弯的地方，我们差点猛地撞上一条载着木柴的小雪橇。雪橇是由三条狗拉的，车夫则是个汉特小女孩，一个大约五岁的小男孩走在侧面。孩子们很漂亮。我注意到，总的来说，汉特人当中并不缺乏容貌可爱的小孩，但到底为什么成年人看起来就那么不像样子呢？森林，还是森林……这里也发生过森林火灾，看起来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烧焦的树干之间，嫩芽在向上生长。“森林为什么会着火？是因为点篝火吗？”“哪有什么篝火？”尼基福回答，“夏天这儿连个活人都没有，路都沿着河边走。林子是被乌云点着的。云里一阵闪电，然后就燃起来了。还有就是树和树相互摩擦也会起火，风让它们摇来摇去，夏天树又干燥……灭火？谁来灭？风会助长火势，也会把火吹灭。上面的树胶会烧掉，树皮会剥落，针叶也会烧焦，但是树干会留下来。过个两年根就会枯死，树干就倒下来……”

这儿有很多光秃秃的树干，看着已经摇摇欲坠了，有的树干就靠在旁边云杉纤细的枝条上。而这棵是几乎要倒在路上，却中途停下了，树梢离地只有三俄尺，天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必须弯下腰才不会碰伤脑袋。高大云杉的地带又延伸了几分钟，随后突然出现了一条通向小河的林间伐木通道。

“春天的时候沿着这种通道很好抓鸭子。这些鸟儿春天会从上往下飞，太阳落山以后就在这通道上拉上网——从一棵树拉到另一棵树，一直到树梢最上面。那么大的网，得有大渔网那么大才行。然后人就躺在树下边。一群鸭子飞进通道，到了黄昏，这一整群都会涌向网子，然后一拉绳子，网就会落下来，把所有猎物都盖住。一次就能抓到 50 只，只要来得及把它们给咬住……”

“什么咬住？”

“得把它们杀了它们才不会飞走，对吧？所以就用牙齿从上边咬住它们的头——只要来得及的话……血就这么顺着嘴唇流下来……当然，拿棍子也能杀它们，只不过用牙齿可靠些……”

一开始，驯鹿就和汉特人一样，在我看来好像都长着同一张脸。但我很快就确信我们的七头鹿各有自己的长相，然后就知道了怎样去分辨它们。我不时会对这些奇特的动物生出柔情，它们已经让我离铁路的距离缩短了五百俄里。我们的酒喝光了。尼基福显得十分清醒、脸色沉闷。汉特人依然哼着他那椴树韧皮绳子的小曲儿。有几分钟时间，我感觉难以言喻的奇怪，我想到我，正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隐没在这片广阔荒凉的大地上。两架雪橇、七头驯鹿和这两个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而向前移动着。这两个人，成年人，都有自己的家室，他们离家而去，经受了这趟路程上的各种坎坷，就因为某个异乡来的第三人、对他们两个来说都很陌生的一个人，需要他们这么做。……这种关系处处都是，但也许，它在别的地方都不能像在这里的泰加林里一样突然激起人的想象，因为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就这么粗糙地、赤裸裸地摆在面前……

* * *

在夜里让驯鹿觅过食之后，我们路过了萨拉杰伊帐篷和门克—雅—帕乌利帐篷，中途只在汉格拉兹帐篷休息了一会儿。这里的

人们看起来比其他帐篷的人还要更蛮荒，所有东西在他们看来都很新奇。我的餐具、剪刀、长袜、雪橇里的毛毯，都能让他们惊喜万分。所有人一见我拿出了新玩意儿，便咯咯地叫起来，发出满意的声音。为了打听情况，我摊开一张托博尔斯克省的地图，大声读出了所有临近的帐篷和河流的名字。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听着，当我念完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表示我全部说对了（尼基福是这么翻译的）。我身上没有什么小物件了，所以给了每一个男女三根烟和一块糖，感谢他们提供住处和炉火供我休息。大家都心满意足。一个汉特老婆婆，她比其余的人容貌看着更好一些，非常活泼，简直就爱上了我，也就是说，其实是爱上了我带的一切东西。从她的笑容中可以看出，她对这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事物有一种完全无私的欣赏。她帮我用毛毯包住腿，之后我同她热切地握手以作告别，各自用自己的语言说了些美好的祝愿。

“杜马是快开会了么？”尼基福忽然问我。

“都已经开第三天了……”

“啊哈……它现在在讨论什么呢？真该告诉他们，让他们明白，他们还真是‘够意思’。他们可是把我们这些人欺压极了，打个比方，面粉以前卖一卢布五十戈比，可现在那汉特人说涨到一卢布八十戈比了。这种价格叫人怎么活？而且我们科米人被压榨得更狠，运来一车干草得交税，劈一俄丈的木柴也得交税。俄罗斯人和汉特人都说‘这是我们的土地’。杜马该出面解决这问题的。县里派来我们这的那个警察还好，是个聪明人，那所长才是叫人忍受不了。”

“杜马没什么机会出面解决问题的，不然它就要被解散了。”

“就该这么办，把它给解散了。”尼基福点点头，补充了一点强硬的话，其中蕴含的力量让前萨拉托夫省长斯托雷平都会感到

嫉妒。我们晚上到达了尼亚克辛沃利帐篷，这里可以更换驯鹿。我决定不顾尼基福的反对去把鹿换了，他一直坚持说我们应该不换驯鹿，继续用欧尔维的驯鹿赶路，他提出些极其荒谬的理由，还在我去交涉的时候百般阻挠。我好长一段时间都在诧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我才明白过来他是在担心返程的事：他可以带着欧尔维的驯鹿回游牧帐篷去，把留在那里的自己的鹿拿回来。但我没有让步，并且用 18 卢布新租用了一批鹿带我到尼基托—伊夫杰利，那里是乌拉尔附近的一处大型金矿产业市镇。驯鹿的路程到那里便算完了，我还要在那里坐马车走一百五十俄里才能到铁路线。从尼亚克辛沃利到伊夫杰利有 250 俄里，也就是走整整一昼夜的路。

我们在这里重复了在欧尔维干过的事情：晚上没办法抓鹿，只能留下来过夜。

我们在一间简陋的科米木房里住下。主人以前给一个商人做伙计，但是两人相处并不融洽，结果现在他就没了工作。他展现出不同于农民气质的文艺谈吐，很快就让我吃了一惊。我们交谈起来，他以深刻的理解议论了解散杜马的可能性，以及政府进行新一轮借债的条件。“赫尔岑的全集出版了吗？”他顺便还这么问了我。但是这么一个学问人同时却又是个最纯粹的蛮族。妻子在支撑着整个家庭，而他甚至连一根指头都不动一下为她帮点忙。妻子给汉特人烤面包——一昼夜烤两炉。她既劈柴又挑水，而且除此之外还要操心孩子。我们在她家度过的这一整个晚上里，她连一个小时也没有躺下睡过觉。隔墙后面点着一盏灯，我从声音里能听出她还在忙着擀面团。早上她还是站着，生好茶炊，给孩子们穿衣服，帮醒来的丈夫穿上烤干的皮梅靴。

“为什么您那个丈夫不帮您呢？”我在和她单独呆在木房里的时候问她。

“真的没有活给他干。打鱼——没地方可打。他也不习惯去猎皮货。这儿也没人耕地，去年开始附近的人才第一次试着开垦。他能做点啥？而我们的男人又从来不做家务。他们也懒得很，说老实话，不比汉特人好到哪里去。所以俄罗斯的姑娘从来不嫁科米人，她何必自找苦吃呢？也只有我们科米女人是习惯这样子了。”

“那科米的女孩会不会嫁给俄罗斯的男人？”

“那可就多了。俄罗斯男人很喜欢和我们的姑娘结婚，因为没人比科米的女人更能干活。只不过俄罗斯的姑娘从来不嫁科米男人，这种事一次也没有。”

“您说附近的人试着耕地了。收成如何呢？”

“收成挺好的。有个人撒了一普特半的黑麦种子，然后收获了三十二普特。另外一个人撒了一普特的种子，收获了二十普特。耕地离这儿大概四十俄里吧。”

尼亚克辛沃利是我沿途见到的第一个尝试发展农业的地方。

* * *

我们直到过了正午才得以离开。新的车夫，就像所有的车夫那样，承诺说“天刚破晓”就能走，结果实际上快到正午 12 点才赶着鹿过来。他派了一个学徒同我们一起走。

阳光刺眼地照耀着。我很难睁开眼睛，即使有眼皮挡着，雪色和阳光也像是融化的金属那样灌进我的眼睛。同时一阵平稳的寒风吹来，不让雪继续融化。直到进了森林，我的眼睛才有机会休息一会儿。森林还是像往常那样，里面有大量的动物足迹，而在尼基福的帮助之下，我已经学会了怎样去辨别它们。这些是野兔绕来绕去的杂乱脚印。它们留下的足迹很多，因为这里根本没人猎野兔。它们的爪子踩得周围到处都是，痕迹向着四面八方辐射出去。设想一下，野兔们晚上在这里开会，结果意外撞上了巡逻队，四散而逃

了。这里山鹑也非常多，雪地上到处都能看到它们尖锐的爪印。狐狸也留下了一串媚人的脚印，在雪地里沿着道路笔直延伸了三十步左右。在那边的雪坡上，灰狼们一只接一只地下到河边，踩着同一道痕迹。到处都分散着森林老鼠不太显眼的踪迹。敏捷的白鼬在好多地方都留下了踪迹，仿佛是一根拖在地上的绳子的绳结留下的印痕。道路上则布满了好多巨大的凹陷，这是驼鹿笨重地踩踏过的地方。我们在晚上又停了一次，取下了驯鹿的套具，燃了一堆火煮茶喝，然后到了早上我又焦虑不安地等待驯鹿回来。在出发去找它们之前，尼基福预先告诉过我，它们当中有一头鹿脖子上的圆木松开了。

“那它是跑了吗？”

“它还在这儿，”尼基福回答，然后立刻开始长篇大论地责骂驯鹿的主人，说他没给这趟路提供任何帮助：既没有绳子，也没有套索。我意识到事情进展得不太顺利。

首先抓到了那头偶然走近雪橇的鹿。为了赢得那头鹿的好感，尼基福一直模仿着它们发出的呼哧声。它走得够近了，但是一注意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又马上往后跑。这番景象重复了三次，最后尼基福从雪橇上拿了条不大的绳子，把它围成几个绳圈在地上铺好，再用雪把它盖住。之后他又发出了讨好驯鹿的鸣叫声。鹿小心翼翼踏着步靠过来的时候，尼基福猛地一拽绳子，绳圈就套住了它脖子上的圆木。车夫们用绳子拖着这头被捕的鹿进了森林，让它充当“军使”，靠近其余的鹿。之后过了整整一个小时，森林里已经完全亮起来了。我不时听到远处传来人的声音，然后万物又归于寂静。那头摆脱了圆木的鹿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我在路上听到过一些很有益的故事，说有时候需要三天时间才能找到一头逃跑的鹿。

不，他们领着鹿来了！

首先，他们抓到了所有的鹿，除了“自由”的那头。它四处游荡，坚决不向车夫们的讨好低头。然后它自己走到被抓的鹿中间，把口鼻埋进雪里。尼基福悄悄地爬到这头鹿近旁，然后抓住了这“自由人”的腿。它猛地一冲，自己跌倒在地，还把尼基福给撞翻了。不过它逃不掉了！最后的胜利者还是尼基福。

* * *

大约早上 10 点钟的时候，我们到了索乌一瓦达。这里有三个帐篷都被封死了，只有一个有人居住。圆木上摊着一大堆屠宰好的母驼鹿胴，不远处则是一头已经宰碎的野驯鹿。冻得发青的肉块摆在熏黑的屋顶上，中间还有两头从母鹿肚子里割下来的小驼鹿。帐篷里的所有人都醉了，他们并排睡在一起。没人回应我们的招呼。这房子很大，但是脏得难以置信，一件家具都没有。窗户就是裂了缝的冰块，再从外面用棍子抵住。墙上挂着十二使徒的圣像，历朝君主的肖像，以及一张橡胶工厂的广告。

尼基福自己在炉子里生起了火。然后一个汉特女人摇摇晃晃、醉意未消地站了起来。三个孩子睡在她的身旁，其中一个还在吃奶。这几天以来主人们打猎的成果非常丰富，除了驼鹿以外，还打到了七头野驯鹿，其中六头鹿胴还躺在林子里。

“为什么这儿到处都有这么多空帐篷？”从索乌一瓦达启程之后，我向尼基福问道。

“原因很多……要是有人死在屋子里，汉特人就不会住里边了，要么把它卖了，要么把它封死，要么把它移到新的地方去。同样，如果一个女人在她不干净的时候进了屋子，那就完了，换屋子住吧。他们的女人在这种时候要一个人住在临时的棚子里……还有就是汉特人正在飞快地绝户……帐篷就这么空下来了。”

“听我说，尼基福·伊万诺维奇，您从现在开始不要说我是商

人了……我们去工厂的时候，您就说我是歌德公司勘探队的工程师。您听说过这个勘探队吗？”

“没有。”

“您要知道，目前政府计划把铁路从奥布多尔斯克铺到北冰洋边，这样就能从那里用轮船直接把西伯利亚的货物运出国。您就这么说，我之前去奥布多尔斯克就是办这件事的。”

一天快要结束了。离伊夫杰利还有不到五十俄里。我们到了曼西人^[13]的奥伊卡—帕乌利帐篷。我请尼基福去屋子里看看里面是什么情况。大概十分钟以后他回来了，说屋子里全是人，个个喝得大醉——当地的曼西人同一些拉着货物去尼亚克辛沃利的汉特人在一起喝。我不愿进屋子去，因为我担心尼基福在这快到终点的地方又会把自己灌醉。“我不会进去喝的，”他试图让我放心，“我就从他们那儿买一小瓶路上喝。”一个高大的汉子走向我们的雪橇，用汉特语向尼基福问着些什么。我一开始听不懂他们说的话，直到双方都开始用地道的俄语恶狠狠地“问候”对方。过来的这个人没有彻底醒酒，而去了趟帐篷打听消息的尼基福也在这短短一段时间之内就失去了必要的镇定。于是我插话道：“他是想干嘛？”我把和他说话的人当成了汉特人，就问尼基福，但是他自己就回答了。他就是来问尼基福一些寻常的问题——运的是谁，要到哪去，尼基福却让他滚蛋，这就引起了进一步的“思想交流”。

“您是汉特人还是俄罗斯人？”我又问他。

“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我叫西洛潘诺夫，来自尼亚克辛沃利。那您是不是歌德公司的人呢？”

我吃了一惊。

[13] 曼西人（Маньси），旧称沃古尔人（Вогуличи），是西伯利亚西部，鄂毕河流域的原住民族，与汉特人有亲缘关系。

“是的，我是属于歌德公司的。您怎么知道这公司的？”我问。

“他们还在初次勘探的时候，就从托博尔斯克请我去他们那儿。那时候有个英国人在那儿，工程师，查尔斯·威廉莫维奇……他姓什么我忘了……”

“普特曼？”我不假思索地提示他。

“普特曼？不，不是普特曼……普特曼的夫人在那边，而这个人姓克鲁泽。”

“您现在做什么事呢？”

“我在尼亚克辛沃利给舒尔金家做伙计，从他们那里运货出来。只不过这三天我得了病，全身上下都酸痛……”

我表示愿意给他一些药。这下不得不进帐篷里了。

* * *

炉子里的火熄灭了，也没人关心这个。这里几乎一片漆黑。房间里人满为患，有的人坐在木板床上，有的人坐在地板上，有的人站着。按照惯例，女人见到陌生人来就用方巾半掩着脸。我点了根蜡烛，然后给西洛潘诺夫倒了一些水杨酸钠。烂醉或是半醉的汉特人和曼西人立马把我团团围住，开始说自己得了什么病。西洛潘诺夫给我当翻译，我则认认真真地把奎宁和水杨酸钠分给这些病人。

“你是不是住在帝都啊^[14]？”一个矮小枯瘦的曼西老人操着蹩脚的俄语问我。

“是的，在彼得堡。”我回答道。

“我也曾去过那里，参加展览会。我见过所有人，沙皇我见过，警察局长我见过，大公我也见过……”

“您是去那儿做代表团吗？穿着曼西的民族服装？”

“是啊，是啊……”所有人都赞成地点着头。

[14] 原文直译为：“你是不是住在沙皇生活的地方啊？”——中译者注

“我那会儿年轻，身体结实……现在老了，又得了病……”

我也给了他一些药。汉特人对我很满意，握着我的手，好多次恳求我一起喝伏特加，我婉拒他们之后，他们显得很是伤心。尼基福坐在炉子边，往茶碗里轮流倒上茶和伏特加，喝了一碗又一碗。我好几次意味深长地盯着他那个方向，但他聚精会神地看着手里的茶碗，做出一副没注意到我的样子。我也只好等尼基福喝“茶”喝个痛快了。

“我们从伊夫杰利出来走了三个昼夜，才走了四十五俄里，汉特人一直在喝酒。在伊夫杰利的时候，我们在米特里·米特里奇·利亚林那儿歇息，他是个很好的人。他从工厂那边带了新书过来：有《人民日历》，也有报纸。比如日历上准确地写着谁能领多少薪水：谁能拿20万，谁只能拿一百五。这是为什么？我绝对不认可这种事。我不认识您，先生，但我对您直说吧：我……不要……不想……也不支持……杜马二十号的时候开会了；这次会比上次好点。看看吧，我们就看看社会民主党的先生们会怎么做……杜马里社会民主党人大概五十个，民粹派一百五十，立宪民主派一百……黑色百人团则少得很。……”

“我能打听一下吗，您自己支持哪个党派？”

“照我的看法，我是个社会民主党人……因为社会民主主义以科学的基础看待一切事物。……”

我一下子清醒过来。在这偏远的泰加林，脏兮兮的帐篷里，一群醉醺醺的曼西人中间，某个小富农的伙计却说他因为“科学的基础”而把自己当成社会民主党人。说真的，我感觉到对我党派的自豪感涌上心头。“您老是呆在这种酒气冲天的偏远地方实在是可惜了。”我真心为他感到遗憾，对他这么说道。

“有什么办法呢？我以前在巴尔瑙尔工作，后来被解雇了。我

有家室，没办法，只能到这里来挣钱。跟狼住一起，就得学狼叫，入乡随俗嘛。我那时还不愿意跟着歌德的勘探队一起走，现在反倒是求之不得了。如果用得上我的话，您就给我写封信吧。”……我感到很难为情，想告诉他我根本不是工程师，也不是勘探队的成员，而是个逃亡的“社会民主党人”……但我想了想，还是忍住了。

是时候坐上雪橇赶路了。曼西人在户外围住我们，手里点着我应他们请求赠给他们的那根蜡烛。空气相当平静，连蜡烛都没有熄灭。我们好多次互作道别，有个年轻汉特人甚至想亲吻我的手。西洛潘诺夫拿来一张野驯鹿的皮，把它放在我的雪橇上当作礼物。他说什么也不肯收我钱，最后我只能送了他一瓶我随身带着“以防万一”的朗姆酒。终于，我们上路了。

* * *

尼基福的话匣子又打开了。他第一百零一次告诉我，他那时坐在他兄弟家里，尼基塔·谢拉皮奥诺维奇走过来——“真是个狡猾的人！”——然后他，尼基福，一开始拒绝了，还有上等兵苏斯利科夫给了他五个卢布，说：“运他走吧！”——以及米哈伊尔·叶戈里奇叔叔——“是条好汉！”——对他说：“笨蛋！你怎么不直接说你是要运这个主体呢？”……一遍讲完之后，尼基福又开始了：“我就完完全全地跟您讲一遍吧……我坐在我兄弟潘捷列·伊万诺维奇家里，没喝醉，就是喝了几杯，就像现在这样。但这没事儿，我就坐着。突然，我听到尼基塔·谢拉皮奥诺维奇来了……”

“这么说吧，尼基福·伊万诺维奇，我们马上就要到了。我感谢您，永远都不会忘记您付出的辛苦要不是不可能实现，我还会把这些事情刊登到报纸上：‘我谨向尼基福·伊万诺维奇·赫列诺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没有他的帮助，我不可能离开流放地。’”

“那为什么不可能呢？”

“警察盯上了怎么办？”

“对，确实。但您要是刊登出去也是好事。我以前也上过一次报纸。”

“说来听听？”

“是这样的：有一个来自奥布多尔斯克的商人侵占了他姐妹的财产，而我——说实话吧——帮了他的忙。说是帮忙也不算，就是……促进了一下。要我说，你有钱的话，那上帝都会保佑你。是这样吧？”

“呃……不完全对。”

“行吧……就是说，我促进了一下。没人知道这事，只有一个人，彼得·彼德罗维奇·瓦赫拉科夫听说了。这个坏蛋！他收了钱，然后在报上这么发表：‘一个小偷，商人阿德里安诺夫，把钱偷走，另一个小偷，尼基福·赫列诺夫，帮忙销毁罪证。’每个字都是这么明明白白印出来的……”

“您是可以起诉他的——告他诽谤！”我给他提了建议。“以前有位大臣叫古尔科，您可能听说过，不知道是他自己偷了东西还是帮别人偷了东西，有人告发他的时候，他就用了诽谤罪这一招。您当时也可以这么干。”

“我是想这么干！但我做不到，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这么做不是因为愤恨，而是开个玩笑……他是个聪明人，样样都在行。一句话跟您概括，他不像是个人，反倒像是张价目表！……”

* * *

大约凌晨四点钟，我们到了伊夫杰利，住在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利亚林的家里。西洛潘诺夫向我推荐了这位“民粹派”，他待人诚恳、极为盛情，我很高兴能用这段话向他表达诚挚的谢意。

“我们这边生活挺平静的，”我们守着茶炊喝茶的时候他对我说，“连革命也没波及到我们这儿。我们当然对时事感兴趣，会通过报纸关注这些事，支持进步运动，送左派代表去参加杜马，但我们自己没被革命发动起来。工厂和矿山那里面有罢工和示威，而我们就平静地过生活，甚至连个警察都没有，除了有个管开矿的县警察……电报要到博格斯洛夫斯克工厂区才有，铁路线也是在那，离这边 130 俄里。流放者？我们这里确实有几个：三个利沃尼亚人^[15]，一个老师，还有个马戏团的杂技演员。他们都在挖泥船上干活，没什么特别困乏的东西，就和我们伊夫杰利人一样平稳地过日子。我们这儿在找黄金，还有每到傍晚我们就会互相串门，见到哪家亮着灯火就去拜访……您从这儿能轻松去到鲁德尼基，没人会拦您。您可以坐地方自治局的邮车，也可以坐私人的车。我会帮您找个车夫。”

我们同尼基福告别。他已经醉到几乎站不稳了。

“您要小心呢，尼基福·伊万诺维奇。回去的路上可别让酒坏了事。”

“没关系……肚皮还能装东西，背脊也就没问题。”这就是他临别的话。

* * *

我逃亡故事中的“英雄”时间，也就是乘着驯鹿穿越泰加林和苔原走了七八百俄里的路程，到这里其实就结束了。在这趟逃亡当中，由于幸运和机缘巧合，哪怕是在最冒风险的路段，也比在计划阶段我自己所想象的情况和其他人根据某些报纸的报道所判断的情况要简单得多、平淡得多。之后的旅程就完全不像是逃亡了，前

[15] 此处指来自沙俄利沃尼亚行省的人，该行省包括现代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一部分。——中译者注

往鲁德尼基的大部分路程里我都同一位消费税税吏同坐一辆大雪橇，他正在对沿途卖酒的商店进行统计。

在鲁德尼基，我顺便向人打听了一下在这里坐火车是否安全。这里的地下工作者用当地特务的事情极力吓唬我，并建议我在鲁德尼基等一周，坐载重马车队去索利卡姆斯克，那边看起来比这里安全得多。我没听从他们的建议——而且最后也没有后悔。2月25日晚上，我顺畅无阻地在鲁德尼基坐上了窄轨铁路的车厢，一昼夜的缓慢行驶之后，我在库什瓦站换乘上了彼尔姆铁路的火车。之后，我沿着彼尔姆、维亚特卡和沃洛格达，在3月2日傍晚抵达彼得堡。这样一来，经过十二个昼夜的路途之后，我又有机会乘着马车在涅夫斯基大街上漫游了。这时间一点也不长，押着我们去“那边”就花了一个月呢。

我在乌拉尔专用线上时，还远远没有脱离危险：沿着这条支线走的话，他们会注意每一个“陌生人”，假如托博尔斯克发来电报，我就有可能在任何一个站点被逮捕。不过一天之后，当我坐进彼尔姆线舒适的车厢里，我就立刻感觉到：我的行动胜利了。列车经过了路上的一个个站点，而就在不久之前我们才到过这些地方，受到当地宪兵、警卫和县警察局长的隆重迎接。不过现在我的旅程走的完全是反方向，而且我乘车时的感受也完全不同了。在最初的几分钟里，我在宽敞而几乎空无一人的车厢里都感觉闷得慌。我踏上一片漆黑、吹着凉风的连接平台，不由自主地从胸膛当中迸发出一声高喊——这是快乐和自由的呼喊！而与此同时，彼尔姆-科特拉斯铁路的列车正载着我向前，向前，一路向前。^[16]

[16] 欲知后事如何，请阅读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中译者注

译后记

2021 年是思想斗争年。在译者一个激进主义者看来，再没有比这更适合用来翻译《1905》的时机了。《1905》这本书无论是从其写法上看，还是从其历史内容来看，都可以被称作为《俄国革命史》（托洛茨基）的前传。因此，可以说，前者的政治意义不下于后者。今天，译者打算简单在此谈谈《1905》的**部分**政治意义。

《1905》揭露了黑色百人团的**法西斯**性质。倘若我们直接把“黑色百人团”五个字打入搜索栏，那么我们目前可以得到的不过是“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反共主义”还有“君主主义”一类的标签。的确，前三者是法西斯主义运动常见的一系列标签，甚至最后一条标签也一向属于相当一部分法西斯主义者，但光靠几个标签并不足以让我们为其如此盖棺定论；不错，1905 年还不存在什么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但正如并不是马克思登上政治舞台以后才有了工人运动，法西斯主义为人世间带来的黑暗同样也不是先验的。那么，究竟是什么让黑色百人团运动有了法西斯的性质呢？原因在于，黑色百人团运动，是一个以为现存政权解决工人革命带来的执政危机为目的的**群众运动**。

在革命的洪水瘫痪了国家机能以及其暴力机关之时，当局的政治逻辑必然会促使他们抓住手中一切可以抓住的救命草。沙皇制度将国家社会化，为黑色百人团授予了无限的权利，以期消灭工人运动。而他们的惯常手法就是将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甚至种族矛盾，这点我们在“反犹主义”一点上可见一斑。所以，有的描述称纳粹党和新纳粹主义的思想都受到了黑色百人团的影响——这一点也算不上巧合。

不过，在 2021 年 5 月的今天，笔者认为，有必要指出一个事实：法西斯主义并不是非犹太人的专利。事实上，内塔尼亚胡的政

列夫·托洛茨基《1905》第二部分

权正是一个法西斯政权：他采取了激化民族矛盾的措施，利用群众运动来解决其执政危机。只不过，这种法西斯主义——或者我们可以暂且称之为“晚期法西斯主义”，变成了一种普遍的治理手段：他还没有来得及遇到阶级矛盾催生出的工人运动，而仅仅遇到了议会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反对党联盟，就采取了这种手段。这样的局势下，阶级矛盾当然也是被压制住的，晚期法西斯也会陷入无“康”（共产主义者和工人运动）可杀的境地——这也就导致他们必然只能开始杀阶级上的“自己人”。这里就更不用提巴勒斯坦人本身已经受到的压迫了——要知道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里面甚至还有犹太教徒！最终我们获得了一副讽刺画——21 世纪的犹太人创造了 21 世纪的水晶之夜！



（现代法西斯观察）

因此，在 20 世纪以反犹为名进行反共活动（比如强调托洛茨基的犹太血统以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是反动分子，在 21 世纪以“反反犹主义”为名与以色列臭味相投的一切人和事也是法西斯主义不折不扣的反动帮凶！

除此之外，《1905》的重要政治意义在于它是一本按**阶级—群众史观**——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写成的、正侧面描绘了**工人革命运动**的书籍。曾经知乎上有位左翼，考虑过要整理 1905 年革命及其之后到 1917 年革命前的俄国历史。但可惜的是，中文界相关的资料少得可怜，以至于这位同志除了求助于清一色的“党史”类书

籍外，竟不得不找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显然，伯克洛夫斯基期待的“更好的教程”最终还是没有出现。当然，我们自然没办法把史料的匮乏归咎于这位同志身上，但其余那些“过度关注政党关系”的人在这里还是值得批判一下的。以下我会将他们称为“党学家”。

党学家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他们的持有的观点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在他们的观点里，政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就如同**英雄与群氓**之间的关系。就算他们没有明着说出这一点，字里行间也会流露出对于群众深入骨髓的蔑视。在描述历史时，政党和群众当然无法形而上地分开，然而，革命的主角，一定是群众。一本描述群众的革命史，必然也不会漏掉政党与个人扮演的角色。求群众则两者皆存，求政党则两者皆失！党学家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把革命说成是某几个英雄人物或者是组织的过程，然而，归根结底，历史是由群众创造的，再花哨的党史教程，都无法把现实中的群众真正掩盖起来。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青年警醒，因为描写工人运动**本身**的书籍和材料**太少了**，以中文的面目面世的就**更少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许多青年在面对相关历史问题的时候，无不露出迷茫的神情——他们不是求助非群众史观的历史素材，就只能看看过往“领袖”在策略上的各种发言。如果一个人的思想里没有给群众的力量留下任何位置时，他又怎么可能不会变得毫无希望、死气沉沉呢？

还有必要再谈谈前些日子的某厂派遣工追索工资事件。作为一次半部分在赛博空间展开的小规模工人运动，它呈现出了半开放、去中心化的特性，这也就给了许多网络左翼一个摆脱空间限制，在近距离接触工人运动的机会。值得高兴的是，有许多左翼学生意识到了自己该做的到底是什么事情，他们整理了工人的一些

诉求，向外发布；对工人做了一些访谈，或多或少翔实地记录了此次工人维权的事件。这绝对是值得赞赏的举措。然而，同样也是由于这一开放性，在这次的维权事件之中混入了这样的一群“网左”：他们拿着网络上复制来粘贴去的材料，给自己筑起了道德高地，并以无比高傲的姿态来指责还没有觉醒足够的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不想解放自己”！这当然是错误的。那么，在当今的中国工人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还有什么呢？其实太多了：有那条件的，到工厂去，静下心来做工人调查，并在任何来临的集体行动之中做好翔实的记录；没有那条件的——非常幸运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赛博时代——则可以去借网络的便利性，进行工人调查，记录集体行动，甚至是哪怕转发或者单纯挖掘类似的记录，都能给今后的工人一个少走弯路的可能性。在这一工作之中，切记昌硕群里一位智者的教训：多听多记录，少说少动；切记，我们并不高人一等，恰恰相反，是我们必须**要从工人之中进行学习**。俄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工人阶级的**不断而且客观讲来不可能中断**的日常斗争，孕育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使他们在现实的刺激下，走上政治舞台。1905年正是俄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年份——流血星期日让无产阶级空前活跃起来，带着以往岁月积累的反抗性，走向了更广大天地的全面斗争。

2021年是思想斗争年——愿我们的读者可以用《1905》筑起知识的街垒，武装头脑，以迎接思想斗争的胜利！

Uni

2021年5月

火中的莫斯科啊焦烟弥漫，
普列斯涅在烧……普列斯涅在烧！
忠实的战友和我肩并着肩，
在街垒上紧握枪，坚守通宵。

子弹已打完……街垒已沉静。
“立即撤离！”这是严格的命令。
我们的战斗在排炮声中告终，
检点人数——亡九名，伤五名……

火中的莫斯科啊烟雾腾腾，
普列斯涅在烧……普列斯涅在烧！
“听着，同志！执行党的决定：
把武器藏好，把红旗藏好！”

在常常的地窖里藏好红旗，

九枝步枪，还有炸药的巨雷。
忠实战友通知我们全体：
“现在撤吧！从此地远远撤退！”

“等时辰一到，亲爱的坟墓
就要召唤我们作庄严的复仇，
黑暗凄凉的夜气将要消除，
迎来新麦般金黄的白昼。”

战友说，“必将有这一天！
我们的炸药，还会用得着！”
火中的莫斯科啊焦烟弥漫，
普列斯涅在烧……普列斯涅在烧！
——阿尔斯基《普列斯涅在烧》

